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书之归去来



自叙

30年代后期开始学写散文，算来已有五十多年过去了。岁月空添，成就甚少，只有惭愧。我是在五四以来散文的影响下学习写作的，会稽周氏兄弟的作品，尤所爱读。鲁迅《朝华夕拾》一卷，至今常在案头，每一翻读，有历久常新之感。朱自清、俞平伯的作品也给了我不少影响。稍后有何其芳，《画梦录》、《还乡杂记》有一个时期几乎成为学习的范本。这在我早期散文《锦帆集》的某些篇章中可以找到朦胧的影子。少年哀乐很自然地成为创作的主题。这个时期并不很长，等我作了记者以后，接触社会的机会多了，感慨也自然不少。觉得旧有的写作方法不能不有些改变。这就是我曾在某处说过的，感情变粗了。在这时，有一卷《关于美国兵》，从中可以看出这种变化的轨迹。这是在还没有报告文学这名目以前出现的报告集，所记的是一年中的从军生活。文章写得舒畅，酣恣，是我自己喜欢的作品。因为对记者的要求是多方面的，通讯、报告之外还得“客串”写些评论、杂文，这就进一步使手中的笔向多方面挥去。1946年顷在《文汇报》上写了一个连载《旧戏新谈》，就是硬逼着上马的。我不想写当时盛行的剧评，本钱也不够，没有听过谭叫天和龚云甫，只能从当时舞台上现身的演员着手。几十年过去，这些琐碎见闻竟也成为历史资料了。写法更是有意向杂文靠拢，眼睛看着台上，思路却转向人间。笔调更是纵横驰骤，不守规范。有时真能感到一种任性挥洒之乐。唐弢在《旧戏新谈》的跋中说，“我觉得作者实在是一个文体家”，这是很高的赞誉，也确实看出了《新谈》的特色。

唐弢的跋里还说：“我读作者的散文很早，深知他爱好旧史，癖于掌故，对前辈有他的向往，却不必真的效颦。这几年奔驰西南，远及印度，所见渐多，笔底的境界也更广阔，不复是伏在牖下的书生了。”这一段话，作为《关于美国兵》与《旧戏新谈》的创作实践，都是很恰切的说明。

唐弢说我爱好旧史、癖于掌故，也是确实的。当我在南京奔驰采访国共和谈的情形下，即使是那么忙乱，也还不能忘情于这座六朝名都，抽闲写下了一卷《金陵杂记》，也是在某一意义上的抒古伤今之作。几乎在同时出版的一册《锦帆集外》中还收入了昆明、贵阳、桂林三记，在在透露了抗战时流转西南的旅人心情，对南明史事的关怀，也是和国家命运息息相关的。这就初步形成了我对游记的看法。有那么两句老话，“英雄若是无儿女，千古河山漫寂寥”，来得正好，正好说明了这种执着的意念。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废弃笔砚之后，重新写起的大半也是这一类的文字，《山川·历史·人物》可以作为代表。

对旧史的兴趣，也引发了我对旧书的爱恋，于是写书话就成为此后写作的主题之一。从《榆下说书》起，有六七本集子都是偏重读书的笔记。鲁迅晚年杂文中的名篇的影响是显然的。《题未定草》、《病后杂谈》都是我爱读并学习的范本，苦不能似，亦无可如何。

综上回顾过去写作的经历，有一个明显的特征是风格的善变，这是在社会动荡环境下必然的结果。至于今后是不是还会变，自己也说不出。

1994年3月22日

书之归来去

书的故事

从小就喜欢书，也从很小起就开始买书。对于书的兴趣多少年来一直不曾衰退过。可是六年前的一天，身边的书突然一下子失了踪，终于弄到荡然无存的地步了。当时的心情今天回想起来也是很有趣的。好像一个极大极沉重的包袱，突然从身上卸了下来。空虚是感到有些空虚的，不过像从前某藏书家卖掉宋版书后那种有如李后主“挥泪对宫娥”似的感情倒也并未发生过。我想，自己远远不及古人的淳朴，那自然不必说；就连自己是否真的喜欢书，似乎也大可怀疑了。

最近，这些失了踪的书开始一本本又陆续回到我的手中，同时还发给我一本厚厚的材料，是当年抄去的书的部分草目。要我写出几份清单来，然后才能一本本的找出、发还。这可是个艰巨的任务。面对厚厚一本残乱、错讹的草目，灯下独坐，慢慢翻阅，真是感慨万千。每一本书的名目，都会引起我一些回忆，述说一个故事。它们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经历了怎样的周折才到了我的手中。自己曾经从中得到过怎样的知识，据以写过什么文字，获得过怎样的欢乐，……这样的故事，如果一一回忆，写下，那将是另外一本厚厚的有趣的书。当然，有趣也只是我自己觉得有趣，在旁人看来到底怎样，那可一点都没有把握。

如果说多年来从买书中间曾经有过一些经验的话，自然也可以这么说。这种“经验”，是否对今天的读者还有什么用处，倒是值得考虑的。如果只是搬出一些“掌故”“趣闻”，虽然也多少会有些资料价值，但到底过于无聊了。今天书店里已经很难看到线装书，如果按照这些“经验”企图加以实践，那也不免是笑话。因此，我不打算写什么“书林清话”之类的东西。此外，我开始买书时，本来是以搜求五四以来新文学书为目标的，不过后来不知怎样一来，兴趣转向线装旧书方面去了。旧有的一些新文学书的“善本”也陆续送给了与我有同好的朋友。因此这里所谈的大抵以买线装书的“经验”为主。

说起“经验”，其实也是平凡无奇的，甚至有些可笑……也说不定。我首先想说的第一条“经验”是，如果希望买到好书，在过去，只有肯出善价才是唯一的办法，其他种种门径，说来说去都是无效的。

如果说这也算是“经验”，在有的朋友看来，是不免过于可笑而且沾染了浓重的铜臭气味了。这样的话，就连过去以附庸风雅为要旨的达官大贾也不肯说出来的。然而它却是实在的，没有法子想。

我过去曾经一直不肯相信这一条，而且事实上也无法照办，因为我毕竟不是达官、大贾。我倒是一直跑小铺、逛冷摊，总希望能有好运气，会遇见什么宝贝。不过实践的结果是，巡阅书摊二十年，好像只买到过一册较中意的书。那是王国维的诗集《壬癸集》，薄薄一本，开本却很大，用的是日本皮纸。这是王国维住在日本时用古江州木活字所印。书中有墨笔小楷校字，是王观堂的亲笔。估计这书是他送给况蕙风的，因为卷中有蕙风的儿子又韩的印记。不知怎样流落在地摊上了。除了这本书以外，好像就不曾从摊上买到另外什么好书过。

事实上所有比较好的书，毫无例外，都只能从书店里得来。有一次我在一家书店里看到一部张宗子（岱）的手稿《史阙》以及康熙原刻的《西湖梦寻》，不禁为之激动了。书店主人告诉我这些书是从浙东山中收来的，是张

氏家传之物。说得也真历历如绘。没有办法，只好预支稿费，多方设法，终于买到手中。等我捧着书又路过书店前街的书摊时，才知道这些书原来就睡在这里的地上。是被书店发现了买去的。什么浙东山中云云原来不过是书店老板创作的美丽的故事。

这件事给我颇深的印象与教育，从此逛地摊时就再也没有了过去的那种好兴致。

我还有一次难忘的经验，是买到了崇祯刻的《吴骚合编》。这书按照今天的标准，是要列入“善本”书目的，但实在也算不得什么孤本秘笈。少具规模的图书馆大抵都是有的。不过我所遇到的一部却不是平常的东西。这是最初印的本子，项南洲、洪国良这些徽派名手的木刻插图，真是锋芒毕现，飘举的衣袂的线条、人物眉眼的细部刻画都清晰生动，和画本几乎没有区别。那张棉纸蓝印的封面，附有朱印牌记，起着三百年前出版广告以及版权叶作用的扉叶也完好地保存着。这种印本，是连“四部丛刊”续编的底本也是望尘莫及的。看书上的藏印，知道是九峰旧庐王氏的旧藏。当年此书从杭州出现，郑振铎曾与王绶珊争购。最后结果不问可知，教授当然不是盐商的对手。为了此书，我除了付出一笔现款，还贴上装了两部三轮车的线装书，这中间不少是明刻和清初刻本。这件事很快就为书店中人哄传，认为我是干了一件“蠢事”，也算是一桩“豪举”。这以后他们有了好书就总希望让我看到，虽然那结果是看得很多而买得甚少，但为我提供了极好的学习机会，却是不容抹杀的。

这两个小故事都发生在解放前后那段日子里。当时，书坊的景况很不好，几乎连维持都困难。旧书又大量从乡下、城镇流出，最大的出路是进入还魂纸厂。一个常到浙东收书的老店员一次向我叹气，说他在某地看到一大批旧书被当做爆竹的原料。其中很有不少明版的白棉纸书，还有一部初印的朱竹垞的《曝书亭集》。他想买了新的纸张向爆竹作坊换下这些旧书，结果被拒绝了。理由是新的“洋纸”在质量上远远赶不上旧的棉纸、竹纸，做起爆竹来卷不紧也没有韧性，放起来也不响。

我又听到一家书店的店主说起，从上海城里一个旧人家称出了一大批旧书，都已捆好堆在旧纸店里了，第二天就要送到造纸厂去。我就要求他去选一下，答应他以“善价”收买。他很不情愿地终于去了。第二天我去找他时，他递给我两本旧书，同时叹气说，旧纸店不情愿打开已经扎好的一捆捆旧书，因为每捆能选出几本是毫无把握的。他费尽唇舌，也只打开了一捆。他选出的两本书是万历新安诸黄所刻的《罗汉十八相》，大方册，是最精的徽派版画，和另一册黑格旧抄的《续复古编》，是顾氏秀野草堂的藏书。扎成一捆捆的旧书一直塞到纸店的天花板，难怪他们不肯一一打开，重扎……。据藏印知道这家人家姓奚，藏书室名“铸古龠”。关于这个藏书家，我也一直没有能查出更多的底细来。

这件事给我的震动更大。不久，郑西谛路过上海，当时他是中央文化部文物局的局长，正在视察各地文物图书的保存情况，我就将这些反映给他，同时提议，人民政府保护文物图书的法令和宣传教育工作都是极为重要极为迫切的工作，此外，必要的经济措施也是不能忽视的。国家应该用“善价”来收买有价值的古书。在当时，所谓“善价”，也不过是比废纸的价格高出若干而已。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运用经济规律阻止一切应该受到重视、保存的书籍进入还魂纸厂。这样做了，宣传效果可能比一纸公文更大，很快就

能收到不胫而走、家喻户晓的成效。而这将起保护全国城乡直至每一角落留存下来的古文献的作用。在国家来说，花费看来是极为有限的。

郑西谛确是一位对祖国文化遗产抱有极浓挚热爱的好同志。我至今还记得他听到反映以后的焦急和激动。他立即采取的措施是组织了一些旧书店的店员拣选即将投入还魂纸厂的“废纸”；这种关心以后又发展到将投入冶炼厂的“废铜”……。我不曾继续了解这些新开展起来的工作的细节，只记得曾被邀参观过一些拣选出来的旧书。有一册宋版宋印的宋人别集，书名忘记了，给我的印象极深，这是“残本”，但却是几百年来未见著录的书。

这些都已经是旧话，也是历史了。不过我想，也许至今它还有一定的意义，还不失为一种小小的“经验”。在着重进行宣传、教育的同时，恰当地辅以适度的经济措施，实践证明是有效也有益的。不只在经济战线上，在文化战线上也同样是如此。

1979年4月13日

这书是宋葛洪撰《蟠室老人文集》。宋刻、宋印，只剩下了十四、十五两卷。今在南京图书馆。《中国板刻图录》著录。1980年11月补记

古书的作伪

对于版本目录之学，过去有一种流行的片面理解。不少人是干脆把它看做版本鉴定学的，这自然很可笑。不过这种看法的产生，也自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古旧书籍本身一旦成为商品，价值规律就必然发挥作用。一切在市场上出现的通常现象也必然随之而来。买书的人和书店构成了既同一又斗争的矛盾统一体。“斗争”的焦点就集中在商品的质地和价值上面。时间久了，买书的经验积累渐多，逐渐形成体系，这就是所谓版本鉴定之学。

现在，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上面所说的那个“矛盾统一体”几乎已经邻于解体。旧书店的招牌，在一些大城市里虽然偶然尚能看到，但旧书，特别是旧刻、旧抄本书却基本上消失了。因此所谓版本鉴定学似乎已经失去了存在的依据。然而不然。既然这已经成为带有科学性的东西，就已有存在下去、并进而丰富提高的理由。目前，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确实积累了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其中属于古文献的图书部门，就迫切需要大量有一定专业知识的人员关心、整理、保存、利用。这可不是一个轻松的任务。要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是万万离不开这一环的。

今天，依然健在的版本学老专家真的已经是屈指可数了。中青年接班人的培养，已成为极为迫切的课题。我们现在有极为优越、为旧社会所不可想象的学习条件，在国家图书馆里藏有大量珍贵的古刻本、抄本书，用来比勘、研究的条件是前人所不可想象的，按理人才的培养是并不困难的了。不过事情往往又并不如此单纯。记得我曾听到一位老专家向我诉苦，他曾把着手教过一些青年，把宋元明刻的实物放在面前，细细地讲解那区别、特征……，说得舌敝唇焦，但效果却并不理想。过两天试试看，依旧还是分不清什么是清刻，什么是明刻，……自然更不必提更细致的问题了。他最后喟然说道，“当年我出了××元，买进了一部染纸充宋的假宋板，回来经人说穿，有好几夜睡不好觉。从此就懂了这一手，再也不会上当了”。这故事很可笑，所以今天也还记得清楚。不过我想，这应该不是笑笑就完的事。

要取得学习的成绩，付出学费是必要的。学费的付出也有种种方式的。那位老专家的取得了优异的学习成绩，对事物取得了比较深刻全面的认识，归根结蒂是由于他付出了“创痛巨深”的学费的原故。这还不只从经济意义上说是如此，像他所犯的那种错误，对一个“收藏家”的声誉，损失也是巨大的。

今天我们当然不会再用这种方式来培养专家，但它依旧不失为一种能够引起人们思考的思想材料。同时，我也并不想作为一个庸俗的笑话介绍给读者。

像这一类的“经验”，每一个买过旧本书的人都会遇到好多起，应该说是并不奇怪的。同时有一点也应该指出，过去有许多著名的收藏家，尽管他们藏有大量好书，有的还在版本目录研究上作出过很好的贡献，他们的著录，也不是完全可以凭信的。他们也会犯错误，也会做出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来。

季振宜是清初著名的藏书家，有《延令宋板书目》，读起来也真使人为之向往而佩服。不过我却买到过他所藏的《汉书》，那是明代正德嘉靖之间汪文盛的刻本，一些都不难识别的。但在卷前却珍重地钤了“御史之章”等三方大印。以后在每卷卷首，又钤了“季振宜藏书记”朱文长方印。细看那钤印之处，恰在“唐颜师古撰”一行的所在。而颜氏衔名之下却有挖补的痕

迹，原来汪文盛的衔名被挖去了。那用意是明明白白的，是企图灭去明刻的痕迹，冒充宋刻的，而作伪者恰是季振宜自己。这就使我对他的“宋板书目”产生了怀疑，不再相信那一册书目所收全都是宋刻了。

同样的情形还出现在曹寅的外甥董斋昌龄那里。我买到一部《七经图》，棉纸初印大册，用鹅黄的腊笺作面，书页里用宣纸作衬，全是康熙中内府的豪华装。每册卷前都钤了昌龄的藏书印。过了不久，又得到同书的残册，却是没有重新装池的明代原装，是四明卢氏抱经楼的旧藏。等我将两本进行对照时，奇怪地发现昌龄的藏印却钤在原来刻有新安吴继仕熙春楼字样的所在，原来也是挖补过的，和季振宜改造《汉书》是用了同样的手段。类似的情况我遇到过好多起，这两件都出之于著名的收藏家，所以记得格外清楚。

杜诗的版本可谓多矣，不过多半是注释本，白文的比较少见。我有一部八卷的杜诗白文本，板心下有“净芳亭”三字，前面有序，也不记刻者姓氏。但据板刻风气可以断定是明代嘉靖中所刻。前有阳城张氏省训堂的藏印。后来却发现，松江韩氏读有用书斋在书目里却指之为宋本。有一种韩氏书目，还附印了书影，对比一下，就正与我所藏的一本相同。看来这不像作伪，只是鉴定上出了差错了。后来又知道，“净芳亭”是许宗鲁的斋名，许刻的《国语》、《尔雅》等流传颇广，板心下题“宜静书屋”，知道的人不少。但这“净芳亭”却少见。细看一下，字体之古怪方板，也确是许刻的风气。像这种情况，一个鉴定者所能做到的也只是断定书册刊刻的大致时代，要了解更多的情况，就只得多看，多作对比研究，留心书目、题跋以及有关的一切记载。到现在我们还没有一部系统记述这一类知识的著作。我们今天的条件到底比前人好了不知多少倍，避免再犯韩应陞那种错误的保证也更充分，不过重要的还是艰苦的研究，没有这一条，别的条件都将不起作用。

过去在古书作伪的勾当中玩出种种花样来的大抵是旧书坊。染纸充宋、割去牌记、伪造印记、挖补缺卷、用旧纸伪造旧抄、临仿名人校跋，……创造发明也多得。不过买主付过“学费”，就像传染病患者的产生了免疫力，也会变得聪明起来的。要取胜就得别出心裁。我曾遇到过这种崭新的花样，虽然上了当，到底也还是爱他的本领。

有一次从苏州的某书肆看到一种题为《烟花小史》的书，是明代万历刻本。它包含了八种书，记得有《秦淮四嫩诗》、《薛涛集》、《仙仙集》等种种名目，十分别致。回来查《千顷堂书目》等多种书目，都找不到那名目。书中还有昆山叶氏的藏印，确是未之前见的怪书，赶紧出重价买了回来。仔细研究，发现其中一种在版心下面有“右编”二字，编者属名有“澹云王路”字样。前面那张扉叶，大书《烟花小史八种》，用纸确是明代竹纸，但较厚实；刊刻字体也极似明人风气，但到底微觉板滞。几经研索，我断定这其实是一种残本。王路曾刻有《花史左编》，这大抵就是所谓“右编”了。王路是晚明出版业向资本主义急遽发展时期出现的一个出版家兼编辑人，是马二先生的前辈。不同的是他经营的并非举业书而是迎合时尚的“通俗文艺”，看那作风是要算作明末的鸳鸯蝴蝶派的。这八种，除了薛洪度集份量较多以外，其他大抵是小册子。至于前面的扉页，则是书坊新刻的，那名目也取得好，完全掩盖了原来残本的面目。

我想，作为晚明通俗出版物的一种标本，即使是残册，也还是值得重视的。马湘兰、郑如英、朱今燕、赵彩姬等的诗集，也由于王路的介绍得以流传。书坊的花样玩得十分巧妙，可惜的是，原书前面想来原有总题和细目，

却因此湮灭了，这自然是版本目录研究中的一种损失。

我之敢于断定这是一种新的作伪的花样，因为我还从这家书店买到过用同样方法炮制出来的书，祝允明的诗、文、词、曲杂集。前面也有一张崭新的扉叶，题曰《枝山先生柔情小集》，下面还刻了一个葫芦，中题“四全”两字。这回是从《千顷堂书目》里马上找到了那破绽，祝允明这样的著作有七种，不是四种，总题也并非什么“柔情小集”。

也是这家书店，又曾发现过二本《陈大声散曲三种》，万历刻本。陈是明代著名的散曲作者，这书也是不见著录的。此书曾引起藏书家的很大兴趣，不记得最后是被郑西谛还是傅惜华买去了。那扉叶，不用说也是新刻的，那风格和我所得到的两种完全一致。这样看来，原书一定也是一个残本，也必不只三种。傅、郑两位都是著名的戏曲收藏家，我猜他们都不会知道这里是玩了花样的。

傅、郑两位同志都已逝世，陈大声这部散曲集如果历劫尚存，在编目的时候，我希望添加一个附注，说明《三种》云云是值得怀疑的。

1979年6月4日

谈“善本”

“善本书”这名目，现在知道的人不能算少了，但要具体地下定义、立界说，就不大容易。自有书籍之日起，应该说就已经发生了善本与非善本的争论，异说纷纭，莫衷一是，如果一一流览，是会使人头昏脑胀的。但仔细一想，争论之起，总是由于标准的不同。而标准在抱有不同目的的人眼中，又总是不一样的。以古书而论，它既是文献，又是商品。这就基本上划清了两种不同标准的界限，一切争论，大抵总是由此而起的。

清代中叶有一位著名的藏书家，黄丕烈（尧圃），以收藏宋板书著名。他有一个别号是“佞宋主人”，可以想见他的主张的坚决与真挚。他主张一切古书，以宋板为最好，因为它古。他校起书来，即使宋板书中明显的错误，也必据以“改正”非宋板的并不错误之处。他是主张越古越好的，可惜唐板还不曾发现，否则一定改号“佞唐主人”无疑。黄丕烈收集、鉴定、流传古书的功绩是不可否定的；他主张古本可贵，也并不错。不过他把事情搞过了头，终于弄得可笑而荒谬了。

黄丕烈并不是这一主张最早的发明者，在他以后这种主张又有了惊人的发展，一直到今天也还不曾消失。黄丕烈是藏书家，但后来又开了“滂喜园”的书铺，经营旧书交易。在古书商品化的过程中，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萌芽的浪头中，他都很有些代表性，因此在这里提出他来作为一种典型。

留心书市风气变迁的人，可以看出一种有趣的现象。在不同时代，人们对书籍价值的评断是不同的。从很早的时候开始，群经的地位一直占据着最高的宝座，那原因是容易理解的。到了清末，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那时晚明野史、清代禁书的身价突然上升了。这是民族主义思想风起云涌的结果；紧接着是群经地位的一落千丈；再以后是小说戏曲书变成了珍品，这自然是五四运动以后，俗文学研究兴起的必然趋势。再后来，是过去无人过问的地方志大行其时，这与帝国主义者的大力搜罗是密切相关的，他们为了不可明言的目的，想尽力占有资料，对中国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不过往往美其名曰人文科学的学术研究。

以上粗略的勾勒，是就书籍门类横断面观察的结果。大致说来，发展趋向还是健康的，那就是知识界摆脱了经义和道学，逐步走向实际，眼界也开阔得多了。其间每一变化，都有着深刻的社会变革的原因。越古越好的教条终于打破，“善本”的定义有了新的内涵。

如果我们拿宋人明人的藏书目录与清初、清末、晚近的目录书加以比较，是会发现很有趣的差异的。宋人不必说，明人目录中也大抵不记版本。从清初以毛氏汲古阁为代表的常熟派藏书家开始才有版本记录。同样，过去的藏书家很少记载地方志，但范氏天一阁与祁氏澹生堂是例外；记载小说的，除明人《百川书志》外，只有钱遵王曾加以注意；戏曲的命运尤为寂寞，只有也是园、祁奕庆藏书楼曾加记载。这都不能不使人佩服他们特异的眼光。如果谁收集了清末以来旧书店作广告用的目录，那就能看得更为清晰，因为照例在这些目录中都附有定价，不但可以看到书籍流转的踪迹，也能看到书市风气、供求关系的变化。这些，照我看也同样具有文献价值，不可忽视的。

前面提到的黄丕烈，一方面在藏书家中有重名；但同时也为讲求实用的学者所讥嘲，他们给他加上了“古董家”、“赏鉴家”……等徽号，大加调侃。我想余嘉锡先生的见解可以作为代表（见《论学杂著》），那意见不能

说是没有道理的。不过也不可说过了头，否则也会向反面转化的。有些旧时代的学人，由于条件的限制，没有可能看到丰富的古刻、旧抄的实物，他们讲求目录之学，往往是从目录到目录，缺乏实践经验，因此也容易发生不应有的谬误。版本学是一种科学，到底离不开实践。

说到这里，我想在为“善本”作界说时，至少要考虑两个方面，它们的文献的和文物的价值。

有些书籍，不只因为它古、稀少（所谓“孤本”、“罕本”）而可贵，还确是极可贵的工艺美术品。韩愈和柳宗元的文集，当然算不得罕见的东西，但宋世彩堂刻的韩柳文则无疑是国宝。那纸墨、刻工，就绝非后来别的刻本所能比拟。这两种书都有明万历中郭云鹏的翻刻本，也算是刻得好的，但与原书一比，实在是天差地远了。这样的古书，珍藏在国家图书馆里，是人民珍贵的财富，我们就绝不应讥之为“佞宋”。

过去有一种可笑的办法，就是在时代上画一条线，作为判别“善本”的标准。这条线大抵又是随着时日的流逝而逐渐后移的。清初的《汲古阁秘本书目》中就没有明版书，到了解放前，就将崇祯以前刻本通通算作“善本”，后来觉得不够妥当，就把一些清刻列入“乙目”，实在是形而上学的方法，其实还是逃不开尊古的旧框框。好像至今那影响也还没有完全消失。真的照此办理，明人所刻大量草率的“书帕本”……也将全部列入“善本”。自然，即使是明人的恶刻，也是值得保存的，但保存是一事，“善本”是另一事，没有混淆的理由。

如果真有这样一条线，则太平天国刻行的书，以及大量近代的刻本、稿本、抄本又将怎样看待呢？鲁迅、西谛所印的《北平笈谱》，成书不过四十余年，其文献、艺术、版本上的价值，难道是什么通常明刻所能比并的么？似乎文物出口的规定中也有这样一条线，同样也是极不科学的。这些，看来都是在上层建筑领域推行的“一刀切”作法的例证，都是值得重新考虑的。

和这个问题有关，可以看看当前出版机构印行古籍方面的一些问题。已经证明是伪书的李卓吾的《史纲评要》，被印成了精致的大册，这是叛徒江青的“杰作”，不必大惊小怪，但至今还被人们当做必读的历史课本，就值得注意了。朱彝尊的《词综》、沈德潜等的《五朝诗别裁》都不是什么“善本”。特别是《清诗别裁》（原名《国朝诗别裁》），沈德潜为了逢迎清朝皇帝，竟将一些明遗民的作品，改得一塌糊涂，连他自己祖父沈钦舆的诗也改得俯首帖耳、吞吞吐吐（可惜我所藏的沈钦舆集尚未发还，这里举不出例证），真是令人发指而且气短。印行这样的选本，而且浪费了人力物力大册精印，看来实在没有什么必要。

曹寅的《楝亭集》列入“清人别集丛刊”影印了，而且有两种版本。曹寅的著作是有印行的价值的，但是否影印，似乎也还值得考虑。当前纸张和印刷力量都还较为紧张，像这样的书，看来还是排印为宜，为读者的负担考虑也应该如此。听说还要印行纳兰容若、朱彝尊、金冬心等的别集，这些书之为“善本”，是无疑的，但它们究竟并非孤本，在雕版上也并没有影印的突出特色，排印之余，附加两张原刻的书影也足够了。

我是赞成搞好影印的工作的，国家所藏的重要善本是大量的，值得影印的也是很多的。过去一些学人以个人的力量印行过一些古书；商务印书馆那样的企业也印行过大量的古籍。但印制水平还不是令人满意的。今天，我们应该努力用最好的技术、有选择有重点地印出有代表性的国藏善本来，这在

保存珍贵的文化遗产、提供研究资料、进行国际文化交流上，都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数十年前，日本静嘉堂文库曾经影印过我国归安陆氏旧藏的《东京梦华录》等书，质量是不坏的。但在我们看来，也还有可以大加改进之处。我相信，我们完全有可能印出更精美、更能体现我国悠久雕版事业优异成果的复印本。这无疑是在出版战线上应该进行的一种重要工作。

1979年6月30日

谈“题跋”

一向喜欢读藏书题跋，买旧书时遇到书后有前人跋文的尤为高兴，辑录跋文的专集也搜罗得不少，好像对这个题目很有些话可说。可是稍稍过细一想，就感到要谈出些较有系统的意见还是很不容易的，例如题跋与后记之类应该怎样区分就不大说得清楚；又如“四库全书”的“提要”，事实上也是一些题跋的汇编，不过它是“钦定”的，过去的读书人一向对之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即使发现了其中有错误，也不敢指出；斗胆想提些意见，一开始也还是得先写上“伏读……”再进行声述，这可不是“百家争鸣”应有的气氛。因此，谁也不敢把《提要》当作题跋来考虑。此外，题跋本身也是五花八门，内容多样，有涉及考证、校勘的，有广告性的，有杂记琐事有如日记的，……总之，大别之不外两类，即学术性的与文学性的两大类。我所喜欢的则是后者。

题跋小文，是从宋人才开始注意并大量写作的。影响最大的应数苏轼和黄庭坚。他们所写也还不是书籍的跋文，过去一向被视为散文小品，这是与他们集中的大篇正宗文字对比而言的。此外，欧阳修、叶石林等也都写题跋，陆放翁更是此中名手。他们的流风余韵可以说一直延续到晚近也还不曾消歇。南北宋之交的著名女词人李清照所写的《金石录后序》更是突出的作品。这并非小品，而是她为丈夫赵明诚的三十卷学术著作所写的跋文。《后序》详细记录了他们夫妇从青年时代起辛勤收集古文物书籍的经过，以及靖康之变转徙流离中藏物损失的过程。李清照是文学家，《后序》的文学性也特别强烈，是写尽了家国身世之感的名作。《后序》留下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影响主要不是表现在学术性，而是在文学性方面。

长夏理书，随手翻得一些实物例证，现在就依次引录，少加说明，也许可以对题跋这一品种，略窥涯略。

《陕西四镇军马数》一卷，后附《会兵御虏》，明嘉靖刻本。收藏有季振宜三印，又“姑苏吴岫家藏”印。这是一册官书，也就是当时官刻的一种内部文件，应该算是机密的。因此流传不多，好像只在“近古堂”、“绛云楼”、“传是楼”的书目中有记录，那名目也多少有些不同。这是奇怪的。推想此书一定不只刻过一次，每换一任主管官员大约都要重刻几次。那些见于旧目的本子也都找不到了，无从对校。这本书是明代苏州著名的藏书家吴方山（岫）的藏书。在吴岫看来，这并非古书，而是崭新的出版物。但他却在卷中留下了五行手跋：

陕西设总制，自石凉杨公始。嘉靖七年春召归。晋溪公王琼继之，撰为此书。公由谪所起用，一平吐蕃，再平套虏。实以兵马素练，钱粮敷足，根本已固故也。下有会御事宜，乃其经略，故并刊焉。继其政者，当珍藏检阅勿忽。姑苏末学吴岫题。

此书原不著撰人，从吴岫跋中可以知道作者是王琼。所谓陕西四镇是“陕西镇”、“延绥镇”、“宁夏镇”和“甘肃镇”。书中详记各镇所属卫、所、堡设官及兵马数量，陕西一省民屯夏粮秋粮数目，以及《会兵御虏图》等，后面所附帖、札付等文件则是嘉靖七年冬至八年夏所发出。吴岫的跋算不上什么考据，这在他看来原不过是一本新书。但从他的看重此书，可以知道明朝中叶的藏书家还是重视当代文献的，并不像清初的常熟派藏书家，一味地追求古。其实也难怪，清初的政治气候已经不允许读书人留心当代政治、经济、军事等等事物，他们的一头钻进古书堆里，是应予原谅的。

《老子全抄》一册，竹纸绿格写本。版心上有“聊尔编”三字。书衣有墨笔跋：

此先夷度府君手自点阅之书也。计其时尚为诸生。先人手泽，子孙当世珍焉。不肖男骏佳谨识。时辛亥孟春，已七十八岁矣。

夷度是祁承

，明代浙江著名藏书家澹生堂的主人。祁骏佳是他的长子，彪佳的哥哥。辛亥是康熙十年。乙酉清兵下江南，祁彪佳自沉死。祁家诸子图谋兴复故国，组织抗敌力量，被人告发，破家。澹生堂的藏书就在此时散佚了。那详情在黄梨洲和全谢山等人的著作中都有记载。祁氏诸子佻佛，骏佳尤甚，常常把家藏书籍随意送给和尚。不过一些先世手泽还珍重保藏在家里。这一本《老子全抄》和另一本《易测》，就是因为是承 少年时的读本，保存下来了。这两书写手都极精，不像是抄书人的手笔，应是万历以前写本。卷中有朱笔、蓝笔圈点，是出于祁承 之手的。八千卷楼曾有澹生堂抄本《蝶庵道人清梦录》一卷，卷首有“旷翁（承 ）题，男骏佳书”的跋语，就都是这一类的“澹生堂抄本”书。

这两行跋语，中间隐藏着一段残酷的斗争故事，但跋文本身却一些都不曾透露，这是当时政治情势下必然的产物。祁骏佳不像李清照，虽然逃来逃去，到底还在南宋的版图之内，所以还能畅所欲言地发挥家国之痛；这在祁氏诸子就不可能，他们只能“寄沉痛于悠闲”，说两句“谈话”。

清代著名藏书家留下的题跋是很多的。如何义门、吴尺凫、鲍以文、黄荃圃、顾千里、吴兔床、陈仲鱼、钱竹汀……，这里只是随手拈来，自然还有很多漏略。不过由于上面所说的原因，他们都已将兴趣集中在版本、校勘上面，学术性的成份在他们的跋文中空前增大了。他们的劳绩是值得重视的。至今，在涉及版本目录之学时还不能不时时求教于他们的著作。这中间自然也有二三位是别有特色的。如鲍以文，他平生收藏、刊刻了大量的古书，但他并非完全是书呆子，他爱刻宋元人集，如汪水云的诗，这中间并不是毫无用意的。他也是个有风趣的人物，我有他所校的元人集，不只是卷中朱墨杂下，在每卷之后，还记下了何时、何地校毕此卷，还随手记下了气候、风物、人事……，是很有文学意味的随笔，较早的严虞惇也喜欢这样做，他在川江舟中读苏诗，每卷后的跋文，几乎就是一篇小小的游记，集在一起，就是一卷很好的出蜀目录。

黄荃圃也喜欢在题跋里记琐事，买书经过、书肆、书估、书价、藏家……，包括日常生活，都随手记在跋文里。虽然有些学者很不以这样的作风为然，加以讥笑，但我却喜欢读这样的题跋。他的题跋已经被搜辑汇刻为厚厚一叠，他曾经跋过的书的身价也被抬高到不可思议的荒谬高度。不管是怎样的破书，只要有他一两行题跋，就会身价百倍（其实百倍也不止），这则是很没有道理的。

我记起了二十几年前偶然得到一部《王注苏诗》，是万历刻本，是很普通的书，印本也很不好。不过这是翁同龢的批校本，从常熟翁家散出的，书中有许多跋语特别有趣，曾随手抄下，也至今不忘。这书先有虞山钱简臣的批语，翁常熟又借得严思庵的评本，用紫笔过录下来。翁的题跋是这样的：

光绪庚子四月朔，邑子翁同龢获观。

评点极矜慎，而于鄙意有未尽合者。余粗疏任气，老将至而未知所裁也。雍正辛亥距今百六十六年，展卷兴感。龢记。光绪庚子五月。

光绪庚子首夏，得此书于邑中书估。有雍正九年钱公简臣批点，丹黄烂然，颇极矜慎。是年六月汪柳门侍郎由吴门寄示严思庵先生手批本，前后数过，最后为康熙五十年辛卯，则又在此评本之前廿年矣。钱公于严先生为乡里后进，而手眼各别，因以紫色笔移写严评并圈点于册内，以证吾虞诗派之同异。

思庵先生古之狷者也。其罢官居京师时，至于绝粮，得人馈青钱二千始济，非其人必不受也。余削籍归田，生计日迫，然犹有书画数篋、墓庐一区，仰愧先生多矣。赝记。

批本中题记，往往涂抹过半，意当日文字之禁严耶？卷末有味闲居士鏊者，先生长子也。

庚子六月，北方有警，讹言纷然。回望神京，魂神飞越。此岂吾读书时耶？然舍读书又何为也。嗟乎，嗟乎！以庸流参大计，以华士谈诗书，以沾沾格律绳古仙之奇作，同一憾事！是月望，松禅。

自十六以后，无雨。几于流金烁石矣。余假菴卿侄舍以居，书室如斗，蚊雷轰然，临圈点毕，因记。六月廿九日。

在这十册书中，翁同龢用紫笔过录了严思庵的全部圈批，还在每一卷尾过录了有时长达数百千字的跋语，一色小行楷，这是翁氏晚年书法极好的代表作品。在这一切之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几段题跋中透露出来他的内心活动。

翁同龢是光绪帝的师傅，人所共知的“帝党”。康有为就是经他的保荐得到重用的。一般都把他看做戊戌政变的重要人物。其实他在四月二十七日就被罢斥了，而变法的诏书是五月初一日才颁布的。翁罢相后并未出京，在西太后重新垂帘“训政”，杀了六君子以后，才来追究他保荐康有为的罪案，终于被驱逐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懿旨”中并有“毋许滋生事端”字样。据马叙伦记，“常熟循故事，月具文投地方官云，‘具稟奉旨驱逐回籍严加管束原任协办大学士翁同龢稟知：本月同龢在籍并未滋生事端’云云，皆亲笔”（《石屋余渚》）。这大约就是“四人帮”横行时“思想汇报”之类花样的先河，不过比起清朝故事来，后者可是要严厉、紧张得多了。翁同龢幸而早生七十年，不但可以虚应故事地交差，还敢在旧书上白纸黑字大发牢骚，看样子他是并不担心抄家或追查“黑材料”的。翁同龢在乡下读苏东坡诗集时，正好是义和团起事的庚子年（1900年）。他虽久已退归林下，可是还念念不忘“神京”，并痛骂“参大计”的“庸流”（我不相信这是他的自我批判），他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他自己是否就不是“庸流”，在当时却是有争论的。他的同乡曾孟朴就在《孽海花》里为他绘制了大体上颇为传神的画像。他和李鸿章是政敌，甲午之役，他是主战派的首领，与主和的李鸿章是对立的。不过他也并非什么值得佩服的政治家，并没有什么远见。充其量不过是平庸的“状元宰相”而已，不只是书生论政的典型，也是将派别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的人物。这在同时人的评论中是可以找到不少记录的。不过即使如此，他的那些题跋，依旧不失为有意义的文献。他的关心国事，自然也是不错的。

与翁同龢同时或少后，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题跋作者。如沈曾植，收入《海日楼题跋》中的藏书题跋，大半论及版本源流，应该归入学术性一类，不过他的文字写得好，有一些是可读的散文。他是“遗老”，文章中带有浓烈的遗老气与寒酸气，有时十分可笑。如后来成为“四部丛刊”底本的《中兴闲气集》和《河岳英灵集》，就是他的旧藏，但在影印时，他的题跋却被删去了。收入《海日楼札丛》的也不完整，查原书，在“甲寅三月……”之前是被灭去了“宣统”二字的。甲寅是1914年，已在辛亥革命后三年了。沈

曾植和其他一大群遗老，躲在上海的租界里，还在奉着“逊清”的正朔。又过了七年，许多遗老在“宣统辛酉正月万寿节”（按即溥仪的生日），又在沈的家里聚会，还在这两部书上写下了“观款”。遗老的名单是“冯煦、王秉恩、邹嘉来、余肇康、吴庆焘、朱祖谋、郑孝胥、王乃征、章棫、杨钟羲、胡嗣瑗、陈曾寿、陈曾任、沈曾植”，共十四人之多。这些，在商务印书馆影印时，就都灭去了。显然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不见原书，是不能发现这种有趣的差异的。从这里，我们又可以得到两条经验：一，一切影印本，不只是“四部丛刊”，都是靠不住的，多少总有些有意无意的删削、改动，作为历史资料，还不是可以完全凭信的。二，看来版本还是值得研究的，因为它有助于提供真实的历史资料。

最后，不能不提到郑振铎。西谛是有名的藏书家，也喜欢写题跋。从他的题跋文中人们可以接触到他对书籍爱好的真挚的心。他在题记中经常会写下“大喜欲狂”、“为之狂喜”、“惊喜过望”这样的词句，只要与西谛相熟的，都会知道这些都是他得到一本满意的书以后真实心情的写照，不是做作出来的。他为《天一阁抄本录鬼簿》所写的长跋，可以算做标本，原文已收入《西谛题跋》与影印本《录鬼簿》了。我在这里想介绍的是他的另一篇题跋。这是他自己手书上板的《西谛所藏善本戏曲目录》后面的一篇手写跋。此书刻成于1937年秋，共二十二叶。刻成后只印了少量的蓝印本。那木板就寄存在上海的来青阁书店里。书店的老板怕这篇跋惹祸，就把刻了跋的那块木板毁掉了，剩下来的二十一块木板却还在。抗战胜利以后，来青阁又曾用这旧板印过少量的蓝印本，但已经没有原跋了。我的一册是书友郭石麒所赠，还是宣纸的最初印本，时间已经过去了四十年，书口处两行的蓝色都已退掉，但字迹还清晰，现在就转录在这里。

余性喜聚书。二十年来，节衣缩食所得，尽耗于斯。于宋元以来歌词戏曲小说，搜求尤力。间亦得秘册。唯一书之获，往往历尽辛苦。有得而复失，失而复于他时他地得之者；有失而终不可复得者；有始以为终不可得，而忽一旦得之者；有初仅获一二残帙，于数月数年后始得全书者。

盖往往有可喜之奇遇焉。人声静寂，一灯荧荧，据案披卷，每书几皆若能倾诉其被收藏之故事。尝读黄荃圃藏书题跋记，于其得书之艰，好书之切，深有同感。二十一年正月，丁上海之役，历年友好贻惠之著述，与清末以来之印本，胥尽于一炬，而所藏他书，以别度北平，获免于难。收书之兴，亦未少衰。五年来所获滋多于前焉。前夏举室南迁，藏书亦捆载而南。以所寓湫狭，将非所日需之图籍万数千册移储东区。不意今乃复丁浩劫，其存其亡，渺不可知。连日烟焰冲天，炮声动地，前方将士正出生入死，为国捐躯，区区万册图籍之存亡，复何足萦念虑，而歌词戏曲小说诸书，以藏于蜗居，独得幸免。抗战方始，此区区之幸免者，又安能测其前途运命之何若耶。唯中不乏孤本稿本，历劫仅存者。先民精神所寄，必不忍听其泯没无闻。爰竭数日之力，先写定所藏善本曲目如右。通行刊本千余种，均摒去不录。呜呼！书生报国，不徒在抱残守阙。百宋千元之弘业，当待之驱寇功成之后，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八月二十四日，郑振铎跋。

这是一篇文情并茂的跋文。可贵的是，在一般藏书家照例要感叹唏嘘的场合，作者却表现了十分昂扬的气概。而这就正像他的为人，他就是这样一位热爱祖国文化典籍，生气勃勃，努力工作至死不息的人。

1979年7月21日

谈禁书

不记得是谁曾经说过，“雪夜闭门读禁书”，算是人生一乐。我想这是说得不错的。要选一个下雪天，还得是晚上，外加关门上锁。这样的典型环境实在刻画得好，没有切身体会，怕是万万想不出的。

因此读禁书也就被赋予了一重浓重的神秘色彩，寥寥七字，包含的内容实在丰富得很。

溯本穷源，发明了禁书的手段并严格付诸实施的还是不能不首推秦始皇。这以后就有很长一段时间继起无人。虽然提起“图籍之厄”，烧书的事确曾不断发生，但那大都是战乱之间不问青红皂白一把火通通烧光，与嬴政的有目的、有纲领、有明确规定而且著之律令的焚书还是不能同日而语。禁书与文字狱发生关系，较早也较著名的是宋代苏轼的“乌台诗狱”，清代的张秋水有《眉山诗案广证》，就是专论此案的。张鉴的《冬青馆集》里收有许多有关南明史事的论文，他生于嘉、道之间，正当清代中叶文字狱盛行之后，他的特别关心宋代诗人苏东坡的命运，应该不是没有缘故的。

清代的乾隆皇帝，确是遥遥继承了秦始皇的传统，并后来居上的。论手段、论规模，也都远远超过了他的前辈。单是“禁毁书目”就先后修了几次，成书若干册。“禁书”成为一种通行的术语，也就从这时开始。不过有清一代，人们明明知道这一客观存在，但口中、笔下却谁也不敢提。一直到了清末民初，旧书店的商人才公然堂皇地把禁书字样标在书目上，同时售价也就相应飞快地提高，终于在有些图书馆的目录上也逐渐露面，做为审定“善本”的一种根据了。

为了习惯与方便，这里谈到禁书，也姑且以此为限断。

“禁书”虽然已经成为宝贝，但我居然也先后得到过若干种。这就使我悟出，禁书者，不论是有着无上威权的封建统治头子还是别的什么聪明人，也不论他们用尽了怎样的心机，到头来也终于是无效的。书是禁不绝的，因为有无数的正直、公平的读者的保护。

唐末的词人韦庄，写过一篇著名的长诗《秦妇吟》，诗中涉及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时的一些情况，有“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这样的句子。韦庄自己后来觉得不大好，“公卿”们看了自然不舒服，新朝的头目也不会喜欢的，因此就自行“抽毁”，从《浣花集》中删去，还给家属留下了禁令。这以后一千多年中人们都无法看到这篇著名的作品。不料终于从敦煌的石洞里发现了那抄本，而且有三卷之多。韦庄用心良苦的安排终于还是无效。那原因就是很有一些读者喜欢它，作品还是被传抄、保存下来了。

韦庄后来虽然贵为蜀相，他到底只是一个人，与能动用国家机器，在全国范围内搜查禁毁的皇帝是不能相比的。不过皇帝又怎样呢？事实证明，成绩也并不理想。不过两百年，清代禁毁的一些作品，也还是陆续出现了，并没有禁得一干二净。那原因也并不两样，也是得到了人民保护的结果。

近三十年前，我看到过从浙江绍兴梅市流出的一些山阴祁氏澹生堂的藏书。这是一批由祁氏子孙深藏密锁了三百多年的先世著述。大半是抄本与稿本。其中绝大部分是符合禁毁的条件。经过清初的残酷镇压，祁氏遭到了家破人亡的惨祸，但还是冒着杀头、灭族的风险保存下了这些著作。事实本身就是极为悲壮的。

这批书中有一部祁承 的《澹生堂集》，是崇祯刻本，在禁书目中是有

著录的。仔细一看，凡是集中“奴”、“虏”、“酋”……等字，都已用浓墨仔细地涂去了。同时我还看到一部清初抄本的《澹生堂诗文钞》，是祁氏子孙选抄待刻的稿本。原书中那些涂掉的地方，都经过细密的修改。这些工作，想来都是在“雪夜闭门”的情况下进行的吧？

后来在苏州又得到过一部刻于崇祯甲申（也就是典型的弘光刻本）的钱梅撰《城守筹略》，则是南明政府官员为了抵御“北虏”南下而提出的作战方略。奇怪的是这样的书，禁书目中也并未收入。可见清初统治者花了如许气力搜索、审查，工作也还是粗疏得很。原书卷一第一页的书名和作者名字都被什么人撕去了，撕得很马虎，卷一以下都还好好地保留着书名和撰人。这就不能不使人揣测，藏书者要应付即将到来的大搜查，他所藏的这种违碍书又很多，在惶急中只能这样马虎地处理一下的吧？那时代可能就在钱梅被捕杀头的前后。

我还有一部清初刻的《新乐府》，是吴炎、潘柟（潘耒的哥哥）的作品。这两位都是在庄史之狱中被杀头的。书前的作者姓氏也同样被撕去了。这样的残迹，好像意在提醒后来的读者，书册曾经历过怎样的命运，才终于保存下来，好像直到今天也还能隐隐嗅到血腥气，以文献论，是非常可贵的。

提到庄氏史狱，就不能不联想到偶然得到的一册稿本，《私史纪事》（这是经过修改的，那原题是《史祸纪事本末》）。这可是一册很有价值的稿本。作者是范骧，与陆丽京等三人都受到“庄史”的牵连。他们大概都曾为此书写过序或曾列名参校。案发以后一起被逮，被押解到北京刑部听审，后来总算放还了。这书详细回忆记录了起解途中，下狱审讯……以及如何打点营救，被释还家的全过程。浙江离北京有一千多里，天气又是严冬，范骧等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他们的身份是逆案的“钦犯”，在押解兵丁的驱赶下赶路，后来到了刑部狱中，前后半年光景，过的是怎样非人的生活，都有十分动人的描绘。不只是文字狱的珍贵史料，作为社会风俗史，这也是难得的原始记录。尤其使我吃惊的是，这本回忆录记下了三位老人在遇祸以后，彼此间曾经发生过的一些猜疑和互相责难。在书册的上端，有陆丽京的后人署名“宗楷”的墨笔批注，都是驳斥范骧、为丽京辩诬的。他们被释放归以后，不用说，家都已破了，陆丽京的结局是离家出走，不知所终。看来与这种纠葛是不无关系的。封建统治者的残酷迫害，在明遗民内部散布的矛盾……，这一切都是不能不引起人们深深的思索的。

《读书堂诗集》，原刻的黑格纸，精抄，无疑是康熙中的清写稿本，不题撰人也没有分卷，后面还有许多空白页，可证尚未编定。这是钱塘汪无己的诗集，无意中得之市肆，也是一种当然必禁而不见于禁书目的异书。无己名日祺，后改名景祺，是钱塘汪东山（霏）的儿子。此集所收都是少年时的作品，后来他投入年（羹尧）幕，因《西征随笔》一书获罪，“律以大逆不道立决梟示”。《西征随笔》的原件后来在故宫里发现，曾经有过新印本。作者是有才华的，笔记中有些纪事的篇章，其实是很好的短篇小说，此外也有一些揭露官场丑行的纪事，我读过以后始终未能发现获得如此大罪的根由。其实汪景祺最大的过错是成为年羹尧的亲信。当时议政大臣所定年羹尧的“大逆罪”的第三条就是“汪景祺《西征随笔》，见者发指。羹尧亦云曾经看过，视为泛常，不行参奏”。后来查嗣庭文字狱发，雍正正在“上谕”中还念念不忘于景祺，“去年正法之汪景祺，文稿中有‘历代年号论’，指‘正’字有‘一止’之象。”雍正作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完全可以和他的

继承人乾隆之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媲美。他写起“上谕”来，往往下笔万言，反复声说，终于使臣民陷入五里雾中不得不承认皇帝的“权威”而后已。他运用种种奇怪的逻辑，惊人的捏造，将他所选中的对象一个个罗织入文网之中，又一个个杀掉，还要罪及妻孥亲属朋友和简直毫不相干的人。雍正正是清代文字狱事业的奠基者，他提供了整套的纲领、理论和实践范例。可惜他的统治只持续了十三年，剩下的工作不得不由乾隆来最后完成。

据《永宪录》记，汪景祺“伏诛”以后，妻子照例要“发黑龙江披甲人为奴”。“景祺之妻，巨室女出。遣发时，家人设危跳，欲其清波自尽。乃盘踞匍匐而渡。见者伤之。”简单的几句话，写尽了一场阴森的闹剧的阴冷凄凉的结末。

汪景祺的《读书堂诗集》不过是少作，并无可观，全书充斥着封建文士无聊生活的描绘，但书前却有七八通诗序，作者都是当时的名家。除了朱彝尊、韩菼，现在已经记不起还有谁了。我曾经查过这些作者的文集，发现没有一篇序是保留下来的。这是奇怪的。朱竹垞的《曝书亭集》卷二十，还保留了与景祺在西湖“夜泛”的五首诗。这是因为朱集刊成在景祺获罪之先。但后印的本子，“日祺”两字就已经削去了。出于同样的原因，朱集卷二十三“喜青宫再建”诗，在康熙五十一年再废太子以后，重印时也削去了。一个作者的文集，由于政治情况的变化，不同时期的印本就会有不同的面貌。这就是藏书家重视初印本的理由之一，也是判断重印时期的重要根据，也算是板本目录之学的一点小小的知识。

上面随意想到的几个例子，几乎无一不是清初文网的漏网之鱼，这就说明，尽管皇帝雷厉风行，作为头等政治任务来抓，效果还是很很理想的。当时各省的封疆大吏和中枢的文化官员实在值得同情，他们担着身家性命的干系，一字字地读着汗牛充栋的书本，又实在捉摸不透皇帝老馆的定案标准，他们的为难是可以想见的。手边有四册《无闷堂集》，闽张远超然撰，康熙刻本。四库未收、禁书目也没有著录，照我看也是一条漏网之鱼。只要看卷中有许多地方都开了天窗，就可以知道了。文集卷七有一篇《徐烈妇小传》，照例这样题目的文章我是不大看的，但因为篇中挖去了将近一行而引起好奇，终于发现这实在是一篇很有意义的文字。传末“野史氏曰”以下的一节是：

甲寅之变，生灵涂炭。身污名辱，终于不免者，不独女子也。女子为尤惨。楚蜀两粤，不可胜数。以予所目击耳闻者，独浙闽江右。其死于锋镝、盗贼、饥饿、损伤、老弱废疾者不具论。其姿容少好，骡车马背犖之而北者，亦不具论。惟其弃载而鬻之者，维扬、金陵，市肆填塞。（以下挖去十五字）累累若若，若羊豕然，不可数计。市之者值不过数金，丑好老少，从暗中摸索。

甲寅是康熙十三年（1674年）。这里所说的是三藩之变，干出种种惨绝人寰的兽行的正是平定三藩的清军。其在浙闽江右一带作战的则是讨伐耿精忠的部队。扬州、南京的人肉市场，竟与奴隶社会无异。不见旧记，是无从想象的。那挖去的几句也不知道说的究竟是怎样的事物。但仅此一节，难道就不该劈板禁毁、追究作者吗？可惜的是乾隆一伙竟自轻轻地放过了。

乾隆肚皮里的标准，捉摸起来是困难的，但只要翻翻“文字狱档”，就可以约略知道那大概。不是连测字先生的方法都已采用了么？又还有什么标准可言？其实这也正是一种标准。运用之妙，也未必全出自“圣心独断”，大小臣工的努力也是万万不可忽视的。

皇帝也自有他的聪明，早已发现这样蛮干下去不是事了，必须转变作风，采取新的积极措施。这就是《四库全书》产生的背景。聚集群书，暗暗改削，写成“正本”，颁示天下。既得“稽古右文”之美名，又收统一思想之实效。确是一条好计。但这也并非乾隆自己的发明创造，列祖列宗早已有见及此并付之实施了。入关以后首先为崇祯帝治丧；康熙下江南专程去孝陵致祭，他写的“治隆唐宋”的“御碑”，到今天也还完好无恙。已死的明臣给以美谥，尚存的就用“博学鸿词”的办法招徕。这原是一整套政策的两个侧面。不懂这一手，是不能理解禁书的全部奥妙的。

禁书是一种历史现象，非常丑恶的历史现象。人类社会本来是没有这种事物的，但后来出现了，在某些时候还颇行时。我相信，它终究是要消灭的。前些时曾经就此进行过一些讨论。我自己是赞成读书无禁区的主张的。当然，一时实行起来并不那么容易。只要具有健康、正常的头脑的人，我想都应该赞成并努力创造条件把禁区彻底打破，并最终消灭这一丑恶历史痕迹的吧。那种一听见要取消禁区就不舒服，惟恐这种宝贝事物断种、失传的精神状态是奇怪的，不正常的。

“神农”尝百草，在他心目中本来就没有禁区。后来发现了毒药，他也只是向人们提出警告，同时写入本草，研究利用。他设了“禁区”然后又用科学的方法打开了“禁区”。假使一开始“神农”就是满眼“毒草”，不敢触动，科学的本草学、药物学是不可能出现的。

三十多年以前，在中国的许多地方，马列主义曾是“禁区”里的“禁书”。多少人如饥似渴地“雪夜闭门”读之，后来终于诞生了新中国。“禁”的后果往往却是相反的宣传，这是反动派所不及料的。这些事过去了还不算太久，大概我们总多少还有些印象吧。

1979年 11月 28日

再谈禁书

在《谈禁书》里讲了一点有关禁书的故事，意犹未尽，想来补充一下。其实哪里说得上“未尽”，简直是差得远，真的不过只是碰到了一点皮毛而已。即以禁书的性质而论，曾经碰到的一点是属于政治性一类的，此外还有另一个大宗则是属于“道德性”的。例如一般所说的淫书、猥亵书、色情书、黄色书……就都是。这最后一个名词是十年前才时髦起来的，是集大成的，意义更为“广泛”、“深刻”的一个专用词。就连过去最正统的道学家听了也会为之吃惊，好像世道人心之“古”，再也没有逾于此日者矣。我至今也还弄不清楚那真切的定义，除了几本确凿无疑的正经书之外，简直就不敢保险哪一本不是“黄色书”。

我还曾经表示过，我是赞成读书没有禁区的。我想，如果要受到质问，极可能出现的问题将是，是否对“黄色书”也主张不设禁区呢？甚至是，是否主张公开发行《金瓶梅》呢？这不是过虑，我想不少同志是必然会有此一问的。我想，我的回答依旧只能还是那样。当然，我也曾说过，“一时实行起来并不那么容易”。早已安下了必要的“伏笔”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迹近“离经叛道”的坚定信念，这就不能不追溯到四十多年以前，当我还在中学里读书时从报上看到的一条消息。那是报导新上台的希特勒在德国的“政绩”的，详细内容已经说不清楚，但那要点倒是记得的。那时在纳粹党的鼓动之下，德国的一些大学生捣毁了一位德国著名科学家和教授创立的一间图书馆，把所有的藏书（自然是“黄色书”）都搬到柏林大学，定期焚毁，同时还大声唱歌，那歌词因为是译成古诗形式的，因此至今还约略记得，他们唱道，“日耳曼妇女兮，今已得到保护兮”。

在当时一个中学生的头脑里，这消息确是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大学生烧图书馆，一也；烧了“黄色书”女性就得到了保护，二也。这疑团一直维持了很久，后来总算逐渐明白了一点，但最后的恍然大悟，是在过了四十多年，“前中学生”看到了在林彪、“四人帮”恶意煽动之下的一些“今中学、大学生”们的烧书“壮举”之后。论规模、论气魄，都远非今日的纳粹希公所能望其项背，这就是直到今天我依旧敢于坚持自己的看法的一个重要的根据。

照例要讲一点自己的经验。可惜的是这种经验并不多。因此发言权也就很有限了。记得也已是三十多年前了，商务印书馆新出版了据明刻本排印的“古今小说”，买来看了，其中有些篇中出现了一些，虽然数量不多，但读了究竟不免气闷，就写了一封信给张菊生先生。张先生当时是商务印书馆的“董事长”，年纪也有八十多岁了。但第三四天就收到了他一封亲笔回信，作了详细的答复，还请馆员把缺文抄下来附给我。这就使我对这位“戊戌”一役仅存的老新党非常佩服。已经近九十的高龄，又是德高望重的学者，但头脑并不冬烘，也不道貌岸然，依旧恪守着一位板本学家的好品质。比起另外一些年纪不比他大，但患得患失，说话荒唐，举止失态的老人来实在是好得远了。

1950年初，我在北京住了一个多月，无事闲逛琉璃厂，在一家书店买到一小册抄本《痴婆子传》。这是我买的第一册黄色古书。抄本并不旧，只是书坊制造的假古董。但却使我看到了一种久闻其名的“名作”，长了见识。后来到清华园去访问钱默存教授，谈起此事，被他大大地取笑了一通。后来

还写了一联诗相赠，那上联就是“遍求善本痴婆子”。又过了几天，我到北京大学的图书馆去看书。在办公室里看到穿了大衣索索地坐在那里的向觉明。承他的好意，允许我到书库里去随意阅览。在这里，不但翻阅了李氏木犀轩旧藏的许多宋板明抄、顾批黄跋，后来竟又闯入了“不登大雅之堂”文库。这是北大故马隅卿教授的遗藏。大约有两间房间，深绿漆的钢书架上满满的放着线装书，其中有许多就是这类该死的东西。没有好久，门外有人探头进来问讯，原来是来参观的一队中学女生。她们大约以为我是图书馆的管理员，问我这间书库藏书的特点。这真使我大吃一惊，立即颇为粗暴地采取了挡驾的措施。回想起来，当时我的举止神情，就俨然是一位标准的卫道的道学家。

提起马隅卿（廉），现在知道的人恐怕不太多了。他是五四前后就在北大工作的一位著名的小说戏曲研究者。喜欢并努力收藏着这方面的书籍。他的书斋取名为“不登大雅之堂”，用意也在此。要收集旧小说，就必不可免地要包括了黄色小说，也许这倒是“不登大雅之堂”的真义。当然，正人君子看了是要摇头的，后来马隅卿因为中风，死在讲台上了，有人就说这是他收藏这类坏书的“报应”。

那天我随意翻阅了大量的这种坏书，收获真是非常巨大。在旧日记里，还记下了所见的一部分书名，现在就抄在这里：《迷史》、《奇缘记》、《蕉叶帕》、《花阵奇》、《比目鱼》、《桃花影》、《定情人》、《醉春风》、《牡丹奇缘》、《觅莲记》、《意外缘》、《归莲梦》、《杏花天》、《绣屏缘》、《警寤钟》、《催晓梦》、《双缘快史》、《如意君传》……我当然并未一一通读，只是凭着作编辑的经验，少少一翻就明白了这些完全是用“三突出”的方法生产出来的标准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那些“英雄人物”，都是非常“高大”并“完美无缺”的。他们的本领也真大，譬如常人一顿能吃四五碗饭就已了不起了，这些“英雄”就有吃一百几十碗那样的“天才”。依此类推，这些一眼就能看出是极端虚假的捏造，无论作者反复声说是如何美妙、快活、圆满也都是完全无效的了。当时读后的感觉也完全不是“味如嚼蜡”所能形容的。我想，我后来的没有变为一位黄色书收藏家，主要要归功于那一次的见识了这许多“样板”。我又想，这些书之所以变为“珍本”、“秘本”、“孤本”，并非由于历代皇帝以至“道德家”们的努力禁毁，而是事物本身判了自己的“死刑”，正如前些年的“样板戏”、“样板小说”……一样。历史是真正无情的，这里又有了一个例证。因此至今我也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些人仍旧不能忘情于“样板”，一部《红楼梦》里据说有几十条（？）人命，在“样板戏”……背后又有多少条人命呢？人民群众之所以热烈欢迎近三年来涌现的大量优秀小说、话剧……，那原因又是什么呢？人们终于不能不得到这样的结论，想要真正打倒一种事物，只靠口号、声明、命令……是无效或收效甚微的，最聪明的办法莫如让它表演，彻底地公开地表演，请它自己打倒它自己。

顺便说说，在已出版的北大书目和“西谛书目”以及其他图书馆的目录里，都是把这些宝贝驱逐出境了的。这种作法并不一定妥当。出借可以慎重，但名目却应该保留。就如前面开列的一大堆书名，我大胆地抄了下来，因为这许多原已早见于公开的出版物，如1958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里就收了清代官员“销毁淫书目单”等文件，那里就有着更为繁多的记载，使我们知道曾经有过这许多名目，也是不为无益的。

我还曾被邀到“碧藻馆”去看过书。惜华非常好客，事先作了准备，找出来准备给我见识的“秘本”也有数十百种。不过因为有了在“平妖堂”（也是马隅卿的斋名）里的经验，对这些专讲“妖精打架”的故事丧失了兴趣，因此不但没有细看，连名目也不曾抄。后来听说这些宝贝一鼓脑儿都被那个“顾问”抢了去了，不知道现在还无恙否？著名的明刻《素娥编》也是那次在惜华家里看到的。书前有许多幅板画，人物长大，但图绘和雕板却不精，比起同时看到的一套“风流绝畅图”的照片来差得远了。这图是明代万历中刻本，还是彩印的，现藏日本。从板画史的角度看，是重要的作品。此外，也可以使我们知道，明代末叶社会上弥漫着的是怎样的一种风气。这样的文字和绘画，就是那么大量地、公开地刻印发卖着。人们一些都不以为怪，就好像火山爆发之前的庞贝古城里的情景一样。

如果要问这些该死的东西到底有什么用处？我想这就可以算作一条。我们平常看历史书，遇到讲起一个朝代到了没落衰亡前夕时，往往只能碰见一些原则性的义正辞严的分析批判，而且无论哪个朝代都几乎完全一样。结果只能得到一些虽然正确但却模糊的概念。在这种场合，这些宝贝实物就能给我们一点小小的帮助。

我的知识浅薄得很，见闻也不广。此外曾经见过的这类古书，除了景印的《金瓶梅词话》以外，就只有叶德辉所刻的《双梅景丛书》、排印的《宋人话本两种》等。丛书里所收几乎全是道士的胡说八道。我还买到过一厚本棉纸黑格抄的药方，是明代正嘉之际“卧云山房”抄本。从中居然发现了许多西门庆之流曾经使用过的配方，可见小说里所写也并非全是子虚乌有。还有就是从阿英同志的《小说闲谈》之类著作中，得到过一点零碎的知识。外国文献，同样也知道得极少。在印度，我曾买到过一本 Nefzaoni 所作的《香园》（Perfumed Garden），是 16 世纪阿拉伯著名的古典作品。印度这类书还多得很，买不胜买，只得了这一册。此外，就是 Havelock Ellis 的七卷两大本性心理学。这也是名著，在外国也曾是禁书，后来作为医学院学生的读本，公开发售了。无论是古典文学还是学术研究，都是很有价值的读物，给了我很多知识。我知道外国的道学家也并不比中国少。有一位著名的研究这种学问的学者死后，他的妻子就将他的全部手稿都烧掉了，认为只有这样做才算是尽了一个合格妻子的天然职责。像莎士比亚，也曾被斥责为“猥亵作家”。更不必提左拉和劳伦斯了。还曾有人作过规定，以尾巴骨为中心，画一个尺半左右的圆圈，禁止谈论圈内的一切东西，只赦免了胃。这样的事，我们也应该知道一点。于是对许多奇怪的议论也就不必大惊小怪了，“外国也有的”！

没有什么人会来主张无原则地开放诲淫诲盗的坏书，我想这一点是可以放心的。看来现在问题所在倒是我们应该有怎样一种精神状态。是应该解放思想向前看，努力打破一切束缚人民思想的旧框框，日益进步呢？还是抱残守缺地向后看，拚命维护今天看来已是奇谈怪论的“道德规范”，以至胆战心凉、不知所措呢？

至今也还是有不少同志把一切上层建筑的力量看得过于不可思议了。一有风吹草动，就向这里来找原因。小孩学坏了，是看了外国影片的结果。不能说没有关系，但只有这是唯一的原因么？思想混乱，是讨论引起的恶果，好像只要大家闭起嘴来，思想就会自然而然地趋于一致与纯正了似的。这样看问题的同志把我们的人民和青年到底放到怎样的位置上去了呢？他们又是

怎样看待经济这个基础的呢？我们学习了很久的唯物史观怎么一下子都忘记了呢？

1980年2月21日

书痴

看题目，这好像是从《聊斋志异》上抄了来的。一个年青的读书人废寝忘食地在书斋里读书，半夜里，一张少女漂亮的脸在窗外出现了，……后来，自然要有一段曲折、甜蜜的恋爱生活，然后，书生得到少女的帮助，终于考中了状元，作了大官。……

自然，这不过是说笑话。蒲松龄的思想境界是不至如此低下的。但在风起云涌继《聊斋志异》而出现的什么《夜谈随录》、《夜雨秋灯录》之类的作品里，这样的故事就不只是可能、而且是必然要出现的了。在那样的社会里，“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的“美妙”幻想，在读书人的头脑里，简直是独霸着的，这就使他们不能不整天价作着此类的白日好梦，也自然要进而写进他们的创作中间。

不过关于读书人真实的并非捏造的故事，也是有的。如果图便捷，不想翻检许多书本，我想，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是可以看看的。

叶昌炽辛苦地从大量原始纪录中搜罗了丰富的材料，依时代次序，把许多著名藏书家的故事编缀在一起，是煞费苦心的。他的书在这一领域不愧是“开山之作”，过去还没有谁就此进行过系统的研究。

叶昌炽的书另一值得佩服的特点是，他在取材时尽量选取的是那种“非功利性”的读书人的故事，因而也较少封建气息的污染。当然这也只能是相对而言。和“为艺术而艺术”一样，百分之百的“为读书而读书”是不存在的。读书，无论在什么时代，总都有他的目的性。但取舍之间，不同作者的眼光是大不相同的。我想这和叶昌炽自己就是一个生性恬淡，习惯于寂寞的研究，因而热爱书本的书呆子不无关系。

如果想探索一下，是什么促使人们热爱书本，那原因看来也只能归结为强烈的求知欲。司马光是爱书的，他所藏的万余卷文史书籍，虽然天天翻阅，几十年后依然还像“新若手未触者”一样。他对自己的儿子说过，“贾豎藏货贝，儒家惟此耳”。这是很坦率的话。书是知识分子的吃饭家伙，是不能不予以重视的。这里我把“儒家”译为知识分子，和“四人帮”的论客的解释是不同的。虽然在政治上司马光和王安石是对立的，但他这里所谓“儒家”看来也只是封建社会读书人的泛称，并没有什么格外的“深意”。

司马光自然并不是“为读书而读书”的人，他编写《通鉴》的目的是为了“资治”，一点都不含糊。他的得力助手刘恕也是一位藏书家，他受司马光的委托，经常走几百里路访问藏书家，阅读抄写。一次，他到宋次道家看书，主人殷勤招待。刘恕却说，“此非吾所为来也。殊费吾事”，“悉去之，独闭阁昼夜口诵手抄，留旬日，尽其书而去，目为之翳”。

也是宋代的著名诗人尤袤，则公然声明他的藏书的目的是，“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这个著名的声明，出之诗人之口，很有点浪漫主义的味道。他是道出了“为读书而读书”的真意的。近代著名学人章钰为自己的书斋取名“四当斋”，就是出典于此。

书籍是传播知识的工具，在知识还是私有的时候，知识分子对书的争夺是不可避免的。于是有许多见不得人的勾当干出来了。有一些还被传为“美谈”，其实正是丑史。过去的藏书家喜欢在自己的藏书上加印。除了名号之外，也还有一种“闲章”，有时要长达数十百字，就等于一通宣言。从这些

印章中，很可以窥见藏书家的心思。

陈仲鱼有一方白文印，“得此书，费辛苦。后之人，其鉴我”。这是很有名的印记，读了使人有一种无可奈何的印象，觉得陈仲鱼是挺可怜的。他这里所说的后人，并非指自己的子孙，而是后来得到他所藏书籍的人。在这一点上，他还是明智的，比有些人要高明得多。风溪陶崇质“南村草堂”藏书，每每钤一楷书长印，文云“赵文敏公书跋云：‘聚书藏书，良匪易事。善观书者，澄神端虑，净几焚香。勿卷脑，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夹策。随开随掩，随损随修。后之得吾书者，并奉赠此法。’陶松谷录”。这也是很通脱的。爱书，但私有观念并不怎样浓重，是很难得的。明代著名藏书家、澹生堂主人祁承 的印记则说“澹生堂中储经籍，主人手校无朝夕。读之欣然忘饮食，典衣市书恒不给。后人但念阿翁癖，子孙益之守弗失”。则已明显地露出了贪惜之念，而且要向子孙乞怜，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结果当然是失望。祁家的藏书后来被黄梨洲、吕晚村大捆地买去，吕还为此作了两首诗，其一云，“阿翁铭识墨犹新，大担论斤换直银。说与痴儿休笑倒，难寻几世好书人”。说了一通风凉话，却料不到他自己连同所藏书籍的命运比祁氏还要来得悲惨。

清末浙东汤氏藏书也有一方大印，“见即买，有必借，窘尽卖。高阁勤晒，国粹公器勿污坏”。说得更是开脱，而且毫不讳言，必要的时候尽可卖掉。这就分明可以看出，到了封建社会的晚期，“子孙世守”那样的观念已经日趋淡薄，而书籍作为商品，在读书人心目中的地位也已大大改变了。

但在明代或更早，这种通脱的意见是难以遇见的。著名的天一阁，就历世相传着极严格的封建族规。藏书应怎样保管，要经过怎样烦难的手续才能看书，……都规定得十分明确。有清一代，有许多著名的学者想登阁观书都被回绝，这样的纪事是很多的。约略与范钦同时的苏州著名藏书家钱谷有一方印记则说，“卖衣买书志亦迂，爱护不异随侯珠。有假不返遭神诛，子孙鬻之何其愚。”就大有咬牙切齿之意。钱叔宝是一位贫老的布衣，也是真正爱书、懂得读书的人，他的这种愤激的言辞是可以理解的。说得更为可怕的是明末清初宁波的万贞一（言），他是万斯同的侄辈。我买到他的藏书，读到他手钤的藏印时，是吃了一惊的。他说，“吾存宁可食吾肉，吾亡宁可发吾椁。子子孙孙永勿鬻，熟此自可供羹粥”。在我浅薄的见闻中，像这样说得斩钉截铁、血肉淋漓的可再也没有了。

为了保护藏书，一方面是训斥子孙，另一面则是威胁买主。可以作为代表的是另一方大印，不过已说不清是否是钱叔宝的手笔了。“赵文敏公书卷末云：吾家业儒，辛勤置书。以遗子孙，其志何如。后人不读，将至于鬻。赀其家声，不如禽犊。苟归他室，当念斯言。取非其有，无宁舍旃！”

话虽如此，有些人肚里明白，他们寄以殷切期望的孝子贤孙往往是靠不住的。明代的杨仪吉年老时就将所藏书散给了亲戚、故旧，同时还恨恨地声明：“令荡子鬻妇无复着手，亦一道也。”他大概看够了官僚地主家孩子“不肖”的实例，才想出了这一条计。他是隐约地看出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规律的，自然并不明白那原因。

以上通过几方藏书图记，约略勾画了藏书家愉快、痛苦交错的矛盾心情。这些位，如称之为“书痴”，大概是并无不合的。当然具有较为高明的识见者也不是没有。明末的姚叔祥就说过“盖知以秘惜为藏，不知以传布同好为藏耳”这样的话，是很有见地的。可惜的是并不多见。

“嗜书好货，同为一贪”。这是并非藏书家的极平凡的常识性见解，恐怕事实也确是如此。旧记中常常有人们千方百计搜求书籍的故事，有些自然是使人佩服的，有的就难说。比如朱彝尊买通了钱遵王的书童，把《读书敏求记》的手稿偷出来传抄，就被当做“佳话”写入了序文。这其实就是孔乙己著名的自我辩护的蓝本。“佳话”与“笑柄”的区别，完全以是否“名人”为准，事物的本质往往是被忽略了。在阶级社会里，人们的行动是不能不受社会阶级地位的制约的。孔乙己如果没有落魄，或有朝一日又阔了起来，他就会使出不同的手段来抢，人们也不但不敢笑，而且还要眼睛望着地面了的。

关于《清明上河图》或“一捧雪”的故事，人们是熟知的。因为有戏曲和小说的宣传。严嵩、世蕃父子的收藏，详细记录在《天水冰山录》里的，恐怕无一不是用同样手段取得的。但很少有人知道，严家父子的前辈，秦桧父子早已玩过同样的花样了。

陆游《老学庵笔记》记，“王性之（名铨，是作《挥麈录》的王明清的父亲）既卒，秦愔方恃其父，气焰熏灼。手书移郡，将欲取其所藏书，且许以官。其长子仲信名廉清，苦学有守，号泣拒之曰，‘愿守此书以死，不愿官也。’郡将以祸福诱胁，皆不听。愔亦不能夺而止。”这是八百多年以前的故事，但今天听来也还面熟得很。同时还不能不叹息古人到底“淳厚”，王廉清顶了一下，秦愔也就算了。如果换了陈伯达或那个“顾问”，你顶一下看，谁都知道那后果是什么。

中国历代皇帝有一种高妙的创造发明，好像一直不曾引起过怎样的注意。那就是“抄家”。一个奴才，受到主子的宠信，逐渐爬起来了，一路上贪污、受贿，巧取、豪夺，终于积累了一大笔家私。到了一定的时机，皇帝就将面孔一板，抄家问罪。既平了“民愤”，皇帝自己也在“山呼万岁”声中写写意意地将贪官的辛勤集聚搬到内库里来。这实在是极为巧妙的一举两得的方法，比起自己出面接受“孝敬”要干净得多也省力得多。因此一代代继承下来照办无误，不过一直心照不宣，也从不写进什么总结里去。到了十年浩劫之时，“四人帮”之流就全盘继承了这个办法，并加以发展、提高。原来只限于几个贪官的，现在就推广到全民中去。原来的口号是惩治贪污，现在就改为破除“四旧”。在深度、广度的变化上，都不能不说是受了清代文字狱的启示。一切书籍、文物、艺术品……只要用“四旧”的尺子一量，就再也没有地缝可钻，一古脑儿被抄了去了。

奇怪的是，当时作为“罪证”的“四旧”，今天在许多人的眼睛里又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当党和政府三令五申、拨乱反正，责成清理发还时，有的人就很不愿意。在他们看来，“四人帮”的反革命掠夺，在理论上是非法的，在实际上却是一种“成果”。

我不敢确说这样的思想状况有多少普遍性。因为即使抱有这种想法的人大抵也不肯坦白表示，他们嘴里说的往往倒是更为动听的词句。不过从具体的现象中可以知道它是确实存在的。我自己的几本破书被“四人帮”的爪牙抄去，已近八年。有些书就放在上海图书馆里，我也早就看到了那详目，知道是完整地保存着的。可是至今也还没有发还的讯息。偶尔去打听一下，就会听到全套公程式的答复。最后这种繁复的套话浓缩成一句，是“尚未清理完毕”，而且已经重复了若干次了。真是奇怪，难道那几本书就一直是点不清楚的么？

1979年12月20日

祭书

时令还没有进入农历己未年的腊月，不知怎的忽然想到了“祭书”。过去时代的读书人，特别是藏书家，到了一年向尾的某一天，总要举行这样一种仪式。把自己心爱的书陈列在案头，藏书很多的，大抵只是选取少量有代表性的书本，多数还要用鲜花酒醴作供，可能还焚香，然后大礼参拜，口中念念有词，不外是“长恩默佑”、“子孙永宝”之类的虔诚吉利话。这样的仪式常常要请好朋友参加。仪式结束后就大家一起赋诗。会画的朋友也许还要画一张画，接下去就是吃酒，再就是将有关的诗文刻进自己的集子里去。

过去我经常从诗文、题跋里看到这种纪事，觉得很有趣也很可笑。买了几本破书，居然还要玩出这许多花样。地主阶级也确是空闲得可以。

这种仪式所反映的思想也是明明白白的。首先是“知识崇拜”。过去是只有地主阶级有文化，要占有文化就得依靠书本。因此书就成了他们稳稳站在统治阶级内部、对被压迫的阶级实行统治的必要武器，即宝贝。而对宝贝是必需表示充分的敬意的。

其次，在旧社会，书籍也和其他物质财富一样，流转无常，易遭毁失。一般的说法是书有五厄，什么水火兵虫之类。仔细想想，其实又何止于此。如果每种书印出以后，一本都不毁失，那就真正不得了，现有的图书馆无论怎样扩充也将装不尽，而善本这名目也就不存在了。经验教训了读书人，他们为了免除这种厄运，也只能采取一种迷信的手段，祭。

我在这里讲起这样的故事，自然不是想来推荐什么封建迷信。其实用不着推荐，在我们这里，封建的事物还多得很，至少在目前，还用不着担心它会断种。同时，物质基础也到底不同了。把什么《基度山伯爵》之类供在桌上，对之顶礼膜拜的喜剧，用不着担心，是肯定不会出现。

我的忽然又想起了祭书，自然也有自己的原因。那就是，最近我又时时想起了我的几本破书，情不能已，这才产生了这样古怪的念头。仔细回忆，在过去的十多年中，这样的念头确是从来也不曾出现过。不过近来不同了，又开始动笔写写文字，也必然要想到过去曾经思索、考虑过的一些问题。有时想有所引据，或企图更过细地加以钻研，或想为久已酝酿的主题搜寻较完备的资料，往往只能掷笔而起，叹口气完结。明明知道自己有哪些书，所需的材料就在某卷某页，可就是看不到、摸不着。明明知道这些书都安然无恙地放在图书馆里，“蓬山此去无多路”，但还是没有法子想。

已经是八年以前的事了。当时我正在干校里当泥水小工。一天，换上了劳动服正准备上工，忽然一位头头来通知了，要我马上回上海去，第二天一早到单位里去报到。这是出乎意料的，是吉是凶，完全不能预卜。但自己明白，八成不会是好事。第二天遵命去报到了，先是受到大声呵斥，坐在门外，接着那位头头出现了，简单地说了一句，“今天要按政策没收你的全部藏书”。这时我就立刻省悟，为什么采取了如此神秘而迅速的手段，那是防备我会进行私下的转移。

在这简单的宣布之后，就是立刻出动。三十多条大汉、两部运纸卡车，浩浩荡荡向我的住所开去。车上带了几捆麻袋，人们花了一个整天又一个上午，总算把我全部印有黑字的本本全部运走了。我这样说，是因为到底还给我留下了几卷高丽笺，有的还是乾隆时的旧物，就因为那上面没有字迹。后来我就拿来一张张都写满了字。明知自己不是书法家，也不配用这样的旧纸，

但还是写了。我想，除了检查、交代、汇报之外，我还应该有些另外白纸黑字的东西。

在查抄过程中，还有许多有趣的细节，但在这里，略之。

我向另一位头头提出，是否留下一份目录呢？他向我大喝一声，道：“嚣张！”这是当时习用的词汇，我们都明白那意思。但今天出版的辞书里的解释却是不完备的，至少没有反映那特有的丰富而微妙的涵义。我想这是有些可惜的。

真是出乎意料。第三天，头头来通知了，决定要编一本目录，而且要我也去参加。我不明白，我的“嚣张”的建议是怎样终于被采纳的。但这种神秘的决策过程，也还是不去研究的好。

到了机关的一间大房间里，发现我所藏的白纸黑字的东西都堆在那里了。更出乎意料的是，发现了已经坐在那里的顾起潜先生。他是研究版本的老专家，是清代苏州著名藏书家顾氏秀野草堂的后裔。二十多年前就刊行了“明代版本图录”的，我过去在图书馆里也曾看见过他。我想，在当时，他应该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反动学术权威”，可是竟被弄来参加审定编目的工作了。那细节，我自然也没有打听。

我的工作只是编目，但只是一些被认为够不上善本资格的书才由我来处理。专家们自己动手的对象当然是不同的。我按照常规努力地编着，记下了书名，版本，册数，编成一种不折不扣的书帐。但到第三天上，头头来训斥了，说我在搞繁琐哲学，要我更加紧、简化地编。我想，单是杜诗，我就有十多种不同的刻本、抄本，用简化法怎么能行呢？但这样的“繁琐哲学”头头怕是不要听的，解释起来又太费口舌。因此什么也不说。这样，我自己只负责编了极小部分的目录。到了第五天，头头下令了，我还是回到干校去当小工。以后那些白纸黑字的事物的命运，就一些都不知道了。

这以后一晃就是五六年。说一些消息都没有也并不准确。曾经有好几次得到朋友通知，“写作班”里出现了我的藏书；图书馆里也有我的目录书在任人翻阅；甚至有些人从不知什么地方弄到许多画册在看，上面也有我的签名。这也是我的一种坏脾气，买到一本书，随手要写上自己的名字或题跋，有时还要钤印。因此也就成了这些消息提供者的依据。当时，听了这些消息，我也只是“一笑置之”。并不是真的看破了“红尘”，只是觉得愁眉苦脸或痛哭流涕都并不雅观也于事无补，还不如淡然处之的好。这也是我的一种坏脾气，二十多年前，一位头头就曾指出我这是“强颜欢笑”，自然就是不认识错误罪行的表现，因而给了我加重的处罚。

一直到1978年的年末，我才又去拜访了顾起潜先生。从他那里得到的消息是令人鼓舞的。他告诉我，我的藏书中间的线装书部分，都很好地保存在图书馆里，没有什么散失。同时因得到他的照顾，有些残破的书册，还修补装订过。只要等政策确定、发布，立即就可以发还。

此外，我还在另外的地方看到了顾先生手制的我的藏书中间属于“二类书”的一份详目，并奉命照抄了三份。我还好奇地打听过，怎样的书才算是“一类”呢？回答是并没有。我想，那大概是指宋板元抄之类的国宝吧。

我的几本破书够不上“国宝”的资格自然用不着多说。但对我却是珍贵的。因为它们被辛苦地买来，读过，记下札记，写成文字，形成了研究构思的脉络。总之，是今后工作的重要依据。没有了它，就只能束手叹气，什么事都干不成。

一年以来，也曾为此奔走过许多回，遇见过各种人物，经过的细节不想在这里细说了，总之是没有什么结果。人们的论调、手法，也都是极平常的，我们大家都非常熟习。如实写下，就难免要犯“公式化”的错误。在这里，我只想以一个遭受“四人帮”无情掠夺的受害者的身份提出一点卑微的愿望。何妨让我有条件继续工作下去呢？何妨落实党的政策使物归原主呢？今天，我能说出这些平庸的看法（在大批“资产阶级法权”的日子里，这就不只是“嚣张”而是“反革命谬论”）是不容易的，很需要一些勇气。因为想到古人祭书的故事，牵连讲了这许多废话，连我自己也觉得不免过于饶舌了。

1980年1月15日

书之归去来

知识分子和书的关系是很难用一两句话来加以形容的。从古以来，读书人曾用种种方式来表达他们对书本的感情。有些话是说得几乎有些可笑了的，但我相信这都是真实的，也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企图。因为尽管人们宣传他们如何爱书，也作不成学者，当不了大官，更发不了财。最多也只能使人留下一个书呆子的印象而已。

但在十多年前，“知识越多越反动”的高论上市以来，情形就有些不妙了。一个人如果有书X册以上，就无疑要成为“反动”的铁证。这个X的界限也并无明确界说，要看老爷的高兴而定。我并不是什么“藏书家”，但旧书是有几本的，其为“反动”自然已无疑义。紧急措施是将书橱、书箱……一律贴上白纸封条。好像这里面装的都是什么带放射性的毒物。每天回家看见这些交叉着的十字封条也真使人不舒服。后来，“荣幸”得很，那个和“四人帮”有密切关系的“大人物”说了话了，给了我“以伪乱真”四个字的考语，于是大小喽罗一拥而上，内查外调，翻箱倒柜，威迫劝诱，想方设法要找到我投机倒把的证据。不幸我没有学项子京的样，没有在每件书画上标明进价几何的习惯，满足不了他们的要求。于是就又动员“专家”写了洋洋数千言的“大字报”，将古今伪造书画、古董的法门统统搬了上去。不过提到我的却只有最后一句，就是说我统统继承运用了这全套本领。还把我常用的几十方藏书印钤在一大张白纸上，在大会上示众。这样我就不只是“藏书家”，而且也是“假古董制造者”了，那个“大人物”的“指示”也因而得到了“证实”。

又过了几时，索性将凡是白纸黑字的东西都从我这里扫数取去，承情只给我留下了几本，以供闭门思过之用。从此我就和书本告别，于今五年。

我至今参不透那个“大人物”在百忙之中何以会对我寄以如此的关注；同时也悟出了过去读书人说的那种以书为性命之类的话，也是夸张过份了的。书去之日，我固然没有感受到“挥泪对宫娥”的李后主式的感情；没有了书，我也生活得很好，并不失魂落魄。但有时会偶然想起，那自然也是难免的。

衷心感谢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从此知识不再是罪恶了；又逐步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最近我收回了一点木板书以外的藏书。虽然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光景，也还是非常高兴的。

大部头的，精装的，画册，小说……都大抵失踪了。这是可以理解的。“四人帮”及其爪牙，口头上虽然痛恨书本，实际上却是区别对待的。他们对“洋、名、古”也自有其偏爱，不过那取舍的标准有些不同。小说、图画，自然是有趣的事物，这是易于理解的。还有一个标准则是“定价”，在这里，他们到底也不曾逃开他们所深恶痛绝的价值规律。这样，我所能收回的大抵只是一些单本小册，对他们没有什么吸引力的东西。但即使如此，这些历劫归来的书册，还是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快乐。

日记·日记文学·日记侦察学

多年来的习惯，临睡之前，枕侧一定要摆几本书，好像不翻看几页，总不肯安然入梦。有时白天有什么事，当天的报纸有重要的文章来不及看，想在枕上补课，但效果往往不好。不是失眠就是弄得头脑发胀，引人入胜的小说也要不得，它会使你不能掩卷，就算下了决心熄灯，也还是要展转反侧……。我的经验，枕上读书，最好是短篇的散文、杂文，郁达夫的日记尤佳，简直是找不到更好代替物的了。

达夫的《日记九种》和后来的《达夫日记集》我都是多次读过的。说来可笑，二十多年前要写纪念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文章，缺少参考资料，达夫日记就曾帮了大忙。这怕是无论谁也想不到的。

不久前遇见刚从富春江上归来的苗子，闲谈中听他说起，达夫的日记手稿还安然保存在富阳的老屋里，由他的儿子珍藏着。最近这日记曾整理了一些陆续发表在浙江的刊物上，我曾草草翻阅过一点，说不出什么。据说，这日记的原稿和《日记九种》中所载，颇有不同。原来，达夫在发表之前，是曾加过工的。我这才恍然大悟，仿佛摸到了从“日记”到“日记文学”的途径。达夫先生在《再谈日记》一文中说起他发表自己日记的经过时，也没有透露这一节，这就使我非常高兴，因为又学到了一点过去所不知道的知识了。

日记，大抵总是写了给自己看的。不过当然也有例外。有些作者，当下笔之初，就已经打定了传世的主意了。如李慈铭，当写好了半年或一年的日记，就装订起来，准备旁人来借钞。不过《越缦堂日记》里常常会遇到大片大片用墨笔涂得一塌糊涂的地方，使人看了气闷。可见他老先生在借出以前，曾经仔细地检查过一番。这可不是我心目中日记的正宗。此外，如曾国藩的《求阙斋日记》、翁同龢的《翁文恭公日记》……大抵都有类似的气味，不过这些到底都是名人，他们日记的手迹，也都早已影印出来，而且研经治史，朝章国故，以至封建教条的种种内容也各已辑印行世，当然也都有其参考价值的。但这毕竟不是我所向往的读物。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写日记竟成了一种危险的恶习。特别是过去十年，不少人弄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往往只不过是在日记里被发现了什么把柄。因为是白纸黑字，是定罪的头等证物，因此也更为某种人物所重视与欢迎。如此这般，我发现，一门崭新的学问，姑且名之为“日记侦察学”吧，已经产生。这确实不是我的耸人听闻，而是有确凿的事实根据的。

我是有写日记的“恶习”的。而且也已持续了数十年之久。解放前写日记，虽然因为年青，阅世未深，不知此中利害，但到底心存顾忌。即使如此，今天看来，违碍之处着实还是不少。但上帝保佑，竟平安地保存下来了，没有出什么乱子。解放以后，放心大胆地记日记了，每年总有一本或几本。除了日常活动，书信往来，也记些读书笔记，创作意图，山川风物，文物图书。在我，是记得津津有味的，自然做梦也想不到有出版或辑录成书的好运。但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奇怪，这些日记，十年前的一天，一古脑儿被拿去了。我还清楚地记得“英雄”们发现它们时得意的神色。当时我还奇怪地想，这又不是银行存折，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呢？可证执迷不悟之深。

不久以前，这些日记又回到我的手中了，足足装了一麻袋。有趣的是，每本日记中，都有几十百条夹签，上有红笔批注；在日记里面，又划满了红杠子，也就是夹签指出的要害所在。每本日记的封面上，都贴上一张纸，上

写编号，年月，“已抄”等等字样。此外，就又发现了扎得整整齐齐的一大捆“抄稿本”。这就是根据夹签的指示，恭楷抄下来的分门别类的“日记摘抄”。这实在不能不使我惊异、佩服，而且感激了。真是作梦也不曾想到，竟变成了如此伟大的人物。在“四人帮”的爪牙们看来，我大抵是有被“宣付国史馆立传”的资格的。不知道到底应该放进“黑帮传”还是什么传里，反正是一展卷而材料皆备矣。真是不胜其惶悚屏营之至！

至今我还不忍擅自整理，夹签也一张都不敢抽去，也没有时间仔细研究。现在只能举几个例在这里。如日记中记与友人吃饭，就被归入“腐化生活”类；有记买书事就归入“进书”类；（按，这是执行那个所谓“理论权威”的“指示”，搜集我“以伪乱真”的“罪证”的。）记写了什么文章，就归入“炮制毒草”类；记采访荣德生、郭棣活事，就归入“吹捧资本家”类；出版了一册新书分送朋友，就批“从赠书名单看黄的关系人”……我只不过多少翻了一下，就发现我的平凡生活竟是如此丰富多彩！真使我开了眼界，重新发现了自己。

从一个角度看，这正是新兴的“日记侦察学”的发展与实践的一个好例。那用心之细密，分类之严谨，着实使人吃惊；从另一方面看，这又是“四人帮”的道德观、是非观……总之是世界观的极丰富、全面的展览。我想什么时候稍有闲空，就要加以整理、研究，这是完全有可能成为一篇有分量的学术论文的。这可实在并非什么笑话。

1979年3月23日

谈“掌故”

掌故，也有人写作“掌固”。它的溯源也算得很久很久，在《周礼》这样的古书里就出现过了。那是管建筑工程的一种官，大概这就是取名为“固”的由来。汉代也有同名的官，不过任务已经变为掌管礼乐制度等等事务，“掌故”的名目也在这时出现。“故”者故事也。后来就一直泛指上起朝章国故，下至乡里旧闻，上下古今无所不包的一种记事为“掌故”。好像一直也没有一种严密的界说，“四库”里“杂家”与“小说家”中有许多书就都可以归入此类。恐怕一直到清代后期，才逐渐有了一种较为明确的概念。笔记小说中谈考订、论诗文……这些内容都被排除在外，只留下有关政治史风俗史的部分。或者可以称之为小道新闻与家长里短的集合体。但到底也说不清楚。有许多事原是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例如研究有关官制与行政规章这些内容，如法式善的某些著作，在龚自珍看来就是正宗的“掌故”。但这只有留心政治制度史的人有兴趣，一般读者是不大看的。常人所读的掌故书有时也会包含这些内容，但重要的是要有故事性，或能说明某一政治事件者才算合格。这就是掌故通俗普及的过程。与近代政治、经济生活的急遽变化也有着密切关系的。几十年前出现的著名的《凌霄一士随笔》可以算是一种代表作。人们心目中的掌故概念就是这样逐步形成的。

为什么人们对掌故会发生如此的兴趣呢？我想这与人民对政治逐渐增长的关注是有密切关系的。我们都知道清末民初是怎样一种时代，在水深火热中过活的人民是不能不关心政治的。他们听厌了官话，看够了现实。自然想知道在这两者之间到底掩藏着怎样丑恶的东西。这中间也许有好奇心的驱使，但主要的还是想明白真相。小道新闻就是这样产生的。因为没有“大道”，“小道”的出现就不可避免。“小道新闻”是禁不绝的。经验说明，只有“大道”通畅，人民能及时知道他们关心的事，才是杜绝“小道”的唯一有效途径。有人把“小道新闻”写下来，作成一种笔记。过若干时，有时并不要多久，就是“掌故”了。

掌故也有缺点，那就是传闻异词，不实不尽。这是难免的。变成了“野史”的“掌故”，曾出现过不知多少。写这种东西的人，一不想骗钱，二不想出风头。因为这既不能公开印行发卖，也作不成登上学者宝座的阶梯。倒是危险得很，弄不好会招来意想不到的祸事。没有强烈的政治冲动他们是不会动笔的。这些“野史”虽然有缺点，但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正史里不敢记、不愿记、不能记的事，就大半保存在这里。即有不实不尽，经过历史研究者的比勘研究，可以得到补充、纠正。“野史”的价值，已经为无数研究家加以证实，抹煞不掉的。

掌故的有趣，还在它包含着另外丰富的内容。例如写《随笔》的（徐）凌霄（他是“一士”的哥哥），就是久居北京、知识非常渊博的一位“杂家”，他的研究重要方面之一是戏剧。他看过许多名演员的演出，和他们成了熟悉的朋友，自己也能粉墨登场。他对京戏艺术有很高的欣赏力，是真正的“内行”。他写的掌故里就包含了大量可贵的京剧艺术发展史料。他们弟兄合作的《随笔》在《国闻周报》和其他地方连载发表了若干年。今天计划重印徐一士的著作时，就应该更广泛地搜求、整理，搞得更为完备，把值得保存下来的东西全部拿到手。

举出这个例子，就是想说明掌故的内容的广阔与丰富，有关文化史、风

俗史的许多方面，都是不应遗漏的。

过去有许多读书人有一种习惯，喜欢随时将读书所得、耳目所及，听来的故事，偶发的感触等随笔记下来。积久就变成一种“札记”或“笔记”。许多掌故的内容大抵就包含在这样的笔记之中。我以为这是一种好习惯。至少在表现了作者的勤奋这一点上是值得佩服的。当然，由于作者的见识、理解、学养的不同，这样积累下来的笔记质量差别极大。有像《日知录》那样的作品，也有庸俗无聊、充满了“逆妇变猪”、“雷击不孝”之类“故事”的大杂烩。这是难于避免的。不过不要紧，时间的推移、人民的鉴定，终将会作出公正的筛选。我见过不少明人笔记，论板刻之古，传本之稀，无疑都应列入“善本”之林，但一看那内容，则庸腐俗滥，简直使人生气。我想这也许就是它们之所以成为“善本”的最重要的原因。因为这是早为读者厌弃，因而被淘汰的幸存者。我想，也不必因此就束手束脚，写回忆录、写笔记的风气还是应该大大提倡、鼓励的。不能因为有“流弊”将正确的东西也一并抛弃了。

抢救材料的说法好像是近几年才有人提起，这确是非常紧迫的一项任务。有许多装了满肚子珍贵“掌故”的老人已经一一离去了，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焦虑。徐森玉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文物鉴定家、版本学者，更因为他活得长久，经历了现代史上几个重大的历史阶段，见闻就自然丰富。他曾被周恩来同志称为“国宝”，确是当之无愧的。但也因此而在十年动乱中吃了很大的苦头，死去了。我认识他时森老已经七十岁了。他是喜欢谈天的，一谈就是好半日，天南地北，无所不及。这里面就有无数“掌故”。有一次，听他谈起刘申叔（师培）的故事，那真是生动极了。刘师培的有些佚事过去我是听到过一点的，但这次才知道那真实的详情，还有细节。可惜我不会作“报告文学”，没有记下来。又一次谈天时有许君在座。森老就谈起他的先祖许槌来，就是选刻了有名的《六朝文絮》的许珊林。森老称赞许槌是晚清有极高成就的刻书家，列举了他刻过的许多种有名的书，有些名目连他的裔孙也不曾听说过；又谈到在苏北曾看见许珊林的遗墨、信札，谈到他的生平活动，这些也一点都不错。这许多都使我非常敬佩。他的腹笥之宽与记忆之强真是少见。遗憾的是森老从来不写笔记，满肚子的“掌故”没有一个字记出、留下。60年代前后，组织上为他配置了年轻的助手，协助他整理出了几篇著作，是有关碑帖、石刻的论文。听说他不怎么习惯于这种工作方式，往往寂然相对，兴致索然。再也没有了那种雄谈惊座的兴致。我想，助手的学识、兴趣、工作方法……都是起很大作用的重要因素。这个问题今天也还是存在的。为老专家选配助手、研究生……时，都值得细密考虑。决不是简单地派了人去就万事大吉了。

最近看到一份古籍出版规划，看到其中“历代史料笔记”中的选目，觉得非常高兴。也为“掌故”之学得到应有的重视而感到安慰。这里就选入了徐一士的两种作品，都是曾经印行过的。我当然希望不只限于重印，还可以搜集旧刊，选辑佚文，使之更为美备。又看见《立斋闲录》的名目，也像遇见老朋友那样的高兴。不知道所据是否鲁迅旧藏的明抄本。鲁迅先生在文字中曾两度提到此书，其中记有明永乐帝的许多故事。这类野史曾给先生以不小的影响，正是鲁迅思想形成的重要来源之一。记得这书好像是收在一部名为《国朝典故》的大丛书里，《闲录》只是其中一种残本。曾见过不少这丛书中的零种，都是明人皮纸蓝格写本。这书今天也还不难配全的吧，那么就

不如印全书。明人很喜欢编印这类掌故大丛书，如陆深的《俨山全集》，事实上就是一部当代掌故的汇编。

看看选目，也真有过屠门而大嚼的快乐。更希望的是能尽快地陆续印出，到手。选目也还可以补充，印行也可以考虑缓急先后。首先考虑的应是质量，其次则是传本的多少。如顾起元的《客座赘语》，实在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书，是明代前期直至隆万之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掌故的汇集。又如鲍鈇的《亚谷丛书》，就是传本甚少的著作，一直未能见到。比起王阮亭、焦袁熹的一些笔记，少见得多，似乎理应先印。不过经过十年动乱，《居易录》这样的书，也轻易看不到了。情况已有所改变。但总的说来，给与有份量的稿本、罕见本以优先的地位，是应该的。重复见于“善本丛书”选目中的稿本《蝇须馆丛话》五十二卷，就不知道是怎样的著作，以张秋水的生平学养估计，这著作必然是内容非常充实而重要的。能抓紧印出，当是读者殷切的期望。至于怎样印，也是值得考虑的。读者当然希望得到整理排印的本子，不只方便，而且价廉。非不得已，可以少用影印。国藏的善本孤本，不只有文献价值又有印刷工艺重要价值的就要印得精，价高些是无妨的。这既是代表国家文化水平的印刷品，也不是人手一册的普及物。现在读者最头痛的是印了一些不是非常必要而又价格奇昂的书。如暖红室的曲子、疆村所刻词等，动辄数百元，宣纸大册，锦函精装，有什么必要呢？又有多少读者买呢？充其量不过在一些机关、学校的图书经费中占去一份金额而已，实在是一种浪费。宋蜀刻本唐人集确是够得上“国宝”资格的书，但现在的印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原本的风貌与雕版工艺之美很难从中看到了。如果排印一下，前面加上几叶书影，是容易的。价钱也低得多。不妨参看一下几十年前日本影印的《东京梦华录》等。我认为，以我们现有的印刷水平，加上努力，完全有能力赶上以至超过日本印本。这样才不致辱没了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重宝”。

要想找一本有代表性的掌故书来试加评说很不容易。手头有一本分量不多却很有特色的小册子，是文廷式的《闻尘偶记》，发表于1981年四十四号《近代史资料》，不大为人所知。其实是可以单行的。

文廷式是戊戌政变前活跃于中国政治舞台的有名人物。他是“帝党”，也是“清流”，但思想开明，学养深厚，有浓厚的爱国思想。这本小册子记的是自己亲历亲闻的政治轶闻，抒发了深切的感愤。有不少具有史料价值和至今读来仍可发人深省的章节。劈头第一句作者就说，“闻事不记，释家之智；闻事辄录，史家之学”。这就有很深的感慨。文廷式精于佛经，他的《纯常子枝语》中有许多篇幅都说的是这个。我读了一点也不能懂，不知道这里所说可有别的奥义。但照我粗浅的理解，作者只是说，老和尚装聋作哑，两耳不闻窗外事；自己却作不到，他作的是“史官”，只能随时记一点下来。书末又有一条说，

杂史之类虽文笔俚鄙，识见猥下，然后世必有取焉，以其记载当时之事足资考证也。乃若十余年来，则秉笔之徒，大率市井；其受重资而任编纂者，意主于谀，固不必论矣；如近日所刻《中兴名臣事略》者，则惟誉曾门，而于各军之得失，将帅之功罪皆不能言。……

不但痛快揭穿了古今官史的通病，也正好说出了掌故的价值。作者在小序中又说，

俄而天衢有棘，海水群飞；身列史官，职居讲幄。既与其事，当尽其言。是非在人，毋庸私著。和戎经岁，嬉游任时；砚水不乾，嘉谈易忘，随而笔之，命曰《闻尘偶记》。后有览者，

知其意焉。丙申正月，罗霄山人书于京邸。

这年的二月他就被那拉氏削职赶回家去了。所以书中后半出于追记，不及前面记事之详密而有价值。小序写得很美，也很好地写出了作者的性格、心情。那有感即书的意见，也是很好的。书中所记，多半是当时政治之昏暗与官吏之庸愚，特别是当帝国主义者的炮火打破了闭关锁国的中华帝国大门之顷，朝廷贵官和士大夫阶层的反应，特别具有史料价值，也显示了作者头脑的清醒。

例如，“余曾记朝列中长者”，大学士张之万已经八十六岁了，句下附有小注，“官年如此，或云九十矣。”其他一律在七十以上，连武臣也不例外。年老还打不紧，思想状态如何呢？

天下之病莫过于陋。荀子以劝学为亟，儒家之至言也。乃近时则间巷之议论出于小说，士大夫之道学亦只出于善书。若徐荫轩协揆固未尝非端人，而其津津乐道者乃以《太上感应篇》、《文昌阴骘文》为极则。翰林之无识者靡然从之。以此为学，而欲内修政治，外攘夷狄，岂不难哉！

这真是可怕的事。也是难以想象的事。茅盾小说《子夜》中的吴老太爷死抱着一本《太上感应篇》，刚接触十里洋场的粉香艳笑就送了老命，有的人还不相信，以为是小说家的装点。在这里就得到了历史的证据。这《感应篇》原曾是当年的权威政治课本，不见旧记，是不可能明白这底细的。更可叹的是被文廷式认为不失为“端人”的徐桐，也就是徐老道，在四年以后庚子之役中又闯下了滔天大祸，不但自己的老命，连国家的命脉都差点给断送了。“端人”也许可以译为“正派人”或“老好人”吧，但如不同时还是一个“明白人”那就将比一般庸碌人要更危险。历史上说得就是如此明白！

这些大官怎样对付“深沉”的俄国使臣呢？“惜吾中朝大臣惟知向琉璃厂争购瓷器以为答礼，无有知其觐国之意者矣”。这是必然的，一些都不值得奇怪的。

甲午战败以后，朝野纷纷议论办洋务，文廷式的意见是“然天时人事则犹有所待也”。因为“中国未有行政之人，则一切善法皆成秕政”。在当时能提出这样的意见，不能不说是非常难得的。他又记德国使臣的话说，

德使升科语人云，‘中国此时又急急置船购械，此吾德国所愿。然中国有船而无驾驶之人，有炮而无教习之人。不知费息借之金钱，办此无益之废铁，果何谓也。’箴砭切至，足以悚愧！

文廷式所极为震动、惭愧地接受了的意见，按照我们今天的理解就是，四个现代化不是可以买得来的。

我看，这一些就是《闻尘偶记》的精华所在。此外，当然还有不少有趣的记载。如“甲午开捐，举人二万金一名”，这是官定的“功名”的市价。“戊子、己丑以来，京师爱着薄底靴。达官贵人尤尚之，其名曰‘跑得快’。”我想这并非什么“服妖”而是老百姓深刻尖锐的批判。文廷式对翁同龢是有看法的，说他身兼师傅、军机……等五个“至要之职”，但还是说“不能办事”，“一彼一此，迄无定见”。误国的责任他是推卸不了的。同是清流，同为帝党，他也并不回护。至于“朝鲜兵事初起时，凡有要电，均由译署。枢廷酌改而后进御”；“闽督谭锺麟电请以兵船游弋海面，属台湾抚唐景崧请派战船扰日本海边，此两电五、六月到京，迄今九月，上竟未之见。”这样的怪事，在当时是不奇怪的。甲午战后割台，文廷式说：“台境沦胥，致命之士不见一人，而仗节死义者乃平日之商贾庶民也。盖朝命予敌，固不以身殉责之官吏欤！”作者的悲愤与同情所在是极鲜明的。“丁酉十月，德意

志国取山东胶州”，这时北京正为慈禧太后补祝万寿，大家欢天喜地。作者记下了当时南北洋大臣的来往电文：“北洋之致南洋也，电文曰：‘无理可讲，无法可挡！’南洋之致北洋也，电文曰：‘无兵可调，无饷可筹。’”作者又记下了当时出现的“怪话”，“说者以中国为四无之国云”。一切怪话都是这样产生的。必须先出了某种“怪事”，接着才会产生相应的“怪话”。作为一个唯物论者，就不能不看事实，专责怪话。这也是可以看得明明白白的。

1983年1月7日

谈掌故

小时候喜欢读笔记，凡能到手的无不浏览，杂七杂八地实在读了不少。说笔记，其实还应说是掌故较为确当。一般笔记大抵是正统的。其中有专谈典章、科甲的一类，十分枯燥，一直不敢问津，如《枢垣纪略》之类。又有诗话一类，虽然也可看，但到底是另一部类了。还有专记忠孝节烈、神鬼报应的一种，更是乌烟瘴气，不敢领教。说来说去，仍是以记历史轶闻、社会生活、自然名物的最合口味。这就显然与别种不同，一般只可称之为掌故了。中国旧日笔记的来源甚古，唐宋人的笔记流传下来的很不少，到了明代，就更多了。曾听人说，掌故之学，始于龚自珍，这似乎是一种误会，龚所注意的怕还是较偏重典章官制，与我们通常所说的掌故不同。

我最早接触的笔记是徐凌霄、一士兄弟的著作，连载于《国闻周报》，后来集印为单行本的有《一士类稿》等两种。徐一士的写作方法大抵很受孟心史《心史丛刊》的影响。搜集大量的原始素材，以一人一事为经，编织成文，读了非常有趣。孟先生所著有关龚自珍、董小宛的考证，都是著名的名篇。关于董小宛与清世祖的关系，后来陈垣更写下过著名的论文，《语录与顺治宫庭》等。这已经是史学家的正规论文，但仍不妨视之为掌故。冒广生的《孽海花闲话》，则是以做笺注的方法记述晚清政治历史人物的着力之作。这都是晚近出现的有典型意义的作品，而以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为结穴，此后这类作品就中断了，衍化为形形色色的文史资料，显然属于另一部类了。寅恪先生的这部书，是晚年失明之后的大作，正是涉及明清之际的一部大掌故，它为我们勾画出了这个大时代的面影，细读之余，能使人获得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至今南明史著作中还没有一部书可以赶得上它。当然，细琐、牵强之病不是没有，但终不能掩盖它的光芒。

以上说的是大块文章，至于零玃碎锦式的笔记，则可以举出邓之诚的《古董琐记》，篇幅不大而包罗万象，无所不谈。邓先生还有一部《清诗纪事初编》，对所收的每个作者的生平行事，作品评论都有精确的考释，也可以看作清初历史人物的一部掌故大作。枝巢子的《旧京琐记》则是专记北京一地的掌故汇编，笔墨干净，娓娓可听，在同类著作中可为代表。

抗战初起时即以汉奸罪被诛的黄濬的《花随人圣庵摭忆》也是一部分量不轻的掌故笔记，重点在晚清以还的政治事件，旁及诗话，文史考订，内容是丰富的。如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就以此书所记最为详尽，举凡官方案卷，时人记述，无不搜罗。此书敌伪时期由瞿兑之印于北平，印数不多，市价奇昂。前几年上海书店重印，流传遂广。但很少人引用及之，或于其书获得线索，著文时却不提其名姓。只有陈寅恪曾有“今日开编惜此才”之句。汉奸是无可原谅的，如其著作仍有用处，也不必一概毁弃。也许这是人们应该采取的态度。

武昌刘成禺的《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是我爱读的一部掌故书。这是专记袁世凯的一部专著，继之而起的有张伯驹的续作，对原作提出了质疑与补充。刘成禺还有一部《世载堂杂忆》，初时发表于《新闻报》，50年代印成单行本，也是有史料价值的有趣读物。

以上所记，以晚近出现的掌故书为主，概不上推至清代著作。最后，不能不谈到马叙伦先生的《石屋余渚》和《续渚》，这部著作是连载于1946—1947年的文汇报上的，是我据马先生的日记《香影楼日札》选抄发刊的。后

由建文书店印成单行本。当时选抄的标准是我擅定的，大抵以我的个人趣味为依归，今日重读，仍觉得有趣味。实在也是短篇掌故笔记的结穴之作，以后就再不见此类笔记问世了。当然，那些充满了悠谬之说的作品，我不想在这里多说。

《石屋余渾》和《续渾》确实是有其特色的。这原来是作者的日记，不是准备公开的东西，因此就不少坦率的独抒己见的处所。在这里，可以选录几节。

赵之谦是有重名的金石书画家，作者据李审言的《脞语》记其遗事说，“……叔私造魏碑…售于世；书有润格，如应亲友之作，于首一字必淡墨书之，使之有别。又由杨惺吾介绍京师汇文堂为刻《续寰宇访碑录》而不付工资。则叔竟无行至此耶？”

除了李慈铭在日记中曾加痛骂之外，说赵之谦坏话的也仅见有此。又有《画可复定乎》一文，则揭出了晚近画坛的一种积弊。“吴湖帆之弟子各展其所画以饱人目，余亦往观焉。极佳者寥寥，而出售者已多。详察之，盖所谓捧场者也。最奇者有数幅粘小纸，书某某先生复定，并有粘上两纸者，此示有好者须‘依样画葫芦’也，余谓言艺术无论作者手段如何高妙，决不能二三纸如出一辙，否则必影写耳。”开画展而以小红纸粘于画件下方，云某先生定及复定者，是一时风气。记得抗战中在重庆参观丰子恺先生画展，亦多有此种“复定”者。也许漫画笔墨简单，无妨照画耶？但“非赏鉴者可知”则可断言。

马先生善书，日记中亦多评书之语，其论王福庵与沈尹默云：“特尹默不可与福庵并论。尹默书功夫不差，相当知笔法，惟以深于临摹，入而不出，故灵变不足。然无匠气。究非今日其他书家可望其肩背也。近时如慈溪钱太希、永嘉马公愚书，皆有王字底子，但一望而为匠人书，皆无笔法可得也。”

这里提出书法的“匠气”，确是真知灼见。今天街上的市招，有许多是“名书家”所书，但匠气扑人，不可忍耐，每遇此种恶书，总不能不想起马老此论。

马先生喜欢听歌，日记中常有记载。兹录湖北水灾义务戏观剧日记如下：

“忽焉有感，肠回意惨，悲从中来，书李后主词以解之，而悲愈甚。乃与智影往开明听余叔岩歌。叔岩不应歌者数年矣，今晚为救济湖北水灾而出，座无虚席。其所演为打棍出箱。往年观谭鑫培演此，出神入化，可谓观止。叔岩虽不及，而闲谈尚得鑫培之遗风余韵。歌音顿挫处无俗响，马连良真小巫耳。然问樵最佳，闹府次之，至打棍出箱，实已强弩之末。盖叔岩体弱，虽养息数岁，犹不能任也。数月前曾观谭小培演闹府至出箱，毫无父风，今观叔岩演此，又如食橄榄，可数日味矣。然余忽起一念，谓智影曰，此时此中曾有人念及国将亡耶？于乎，余乃亦此中一人耶？”

这真是一节出色的剧评。可见老辈听歌的经历与观感。今天的读者怕已不能充分领略其中的滋味，而京剧在从极盛转为中衰的消息，都可于此中领解一二。

马先生又精于烹调。从前北京餐馆中有一味驰名的“马先生汤”，即出于他的设计。日记中也有记录：“余亦喜制饌品，馀皆授归云以方，使如法制之，如蒸草鱼、蒸白菜之类，余唯试味而已。君三白汤必余手调，即诸选材，亦必与目。三白者菜、笋、豆腐也。然此汤在杭州制最便，因四时有笋也。豆腐则杭州之天竺豆腐，上海之无锡豆腐，皆中材。若北平豆腐，虽选

其隳，亦不佳也。此汤制汁之物无虑二十，且可因时物增减。唯雪里蕻为要品，若在北平，非向西单市场求上海来品不可也。然制成后，一切物味皆不可得，如太羹玄酒，故非诚知味者不知佳处。曾以汁贻陈君朴，君朴煮白菜豆腐食之，谓味极佳，而其家人不赏也。如就一二品增其浓味，便对一般人胃口，称道不置，然非吾汤矣。往在北平，日谒中央公园之长美轩，以无美汤，试开若干材物，姑令如常烹调，而肆中竟号为马先生汤，十客九饮，其实绝非余手制之味也。”

这真是一则绝妙的掌故文章。在通常的笔记中是难得遇到的。《余渾》二集中涉及民俗信的所在多有，不愧为笔记文学的压卷之作，姑选录数则，尝鼎一脔，可以知其佳胜矣。

1994年5月9日

谈校对

谈《文林谈屑》中“文字疏忽”一节，谈到报刊上出现的某些差错，以及连带发生的一些感想，深有同感。只发现有关章太炎的一些事有点出入。章名炳麟，字枚叔。“太炎”是别号。他还有一些别署，不过人们大抵不熟悉。

我想在这里对在报社工作的校对同志们表示一点敬意，因为我想起了一些往事，记起了一些老校对，引起了深深的怀念。当然，我不是要为报刊上出现的差错辩解，差错无论大小都是要不得的，必须努力减少、消灭。

我在报社工作的时间不很短。好像所有的行当岗位都干过了，只除了不曾踏入医务室。当然，校对也是干过的了，而且干过两次。在“传统”的报社编辑部的“等级观念”中，好像校对是被排在最低一档的，比资料室还要低。于是在二十多年前我在第一次降级中就是先到资料室，然后才又调到校对组的。没有在校对组工作过，是不能知道这种“传统观念”之荒谬的。如果没有校对，一张报纸简直就不可想象将成为什么样子。而出了差错，首先被记起查问的也是校对组。但事实证明，很大一部分差错是由原稿造成的。校对没有对文字提意见修改的权利，只能照稿校读。有时就出现了明知是错也不能说、不敢说，只能让它错的怪事。

记得我初到校对组时，还不深刻理解这中间的奥秘，非常天真的以消灭差错为己任。一天，新华社电传稿发来了一条新闻，大约是北京各界人士抗议美国企图把藏在台湾故宫博物院里的文物运往美国的座谈会吧。参加者中有朱启钤，但原稿写着的却是“铃”。电稿通常模模糊糊，有时难读得像天书，但偏偏这次的“铃”字清清楚楚，毫无可疑。我向组长汇报了，以××保证（忘记曾赌过什么誓了）这个字不是“铃”而是“钤”。组长迟疑了好半日，又去层层汇报，最后终于接受了我的“保证”。后来是第二天全国的报纸都是“铃”，都错了。后来新华社还发了更正。

我说这个故事并不是想证明自己知识渊博，我不过看过营造学社出版的书报，记得这个名字而已，当然也听说过“一辆汽车灯市口，朱三小姐出风头”的朱三小姐就是朱启钤的女儿。

当时报社里校对的方法是两人对坐，一个人读“小样”，一个人看原稿。这对我是一次真正的考验。只是在这时我才发现自己原来是一个“白字”大王。也许说得夸张了一点，即使不是“大王”，也差不多。有许多字能懂、能用、能写，也自以为能读，但事实证明有些音都读错或读得不准确。和我搭档的一位同志手边有一本小字典，已经翻烂了。他随时翻出某个字来给我看，校正我的读音，并教我正确地写简体字。我的感觉就仿佛小学生第一次进学校开始识字一般。

我还发现校对组的同志对待像我这样“调”来的人的态度也比较好，他们看我时眼色是有些异样的，但还是以平等相待，而且有时还表现了同情。组长是有点严厉的，不过也适可而止。也许是怕训斥得多了，我会紧张起来，酿成大错，使他也不得脱身。

第一次当校对时间不过半年。工作得还不错，没有什么大错误。只有一次偶然疏忽。一条国际新闻的小标题中把“尼克松”排成了“克尼松”，我没有能发现。这是那一段工作中发生的最严重的错误。不久，我就到乡下种稻去了。

我得到了许多知识，明白了校对工作的重要。同时还懂得许多干了多年校对工作的老同志都是很渊博的，他们懂得的事真多。能辨识各种“名家”的手稿，那些“天书”是从已出或将出的草书大字典中都找不到出处的，只能靠自己的聪明与经验猜测，而居然能猜得八九不离十。同时还得担“风险”。他们改正了原稿中许多错字，还建议编辑修改文理不通的地方。至于文字的思想性，在校读中也常常议论，而且往往是非常有道理的，但这只能私下评论，不能提出建白。对时下名家的文字，他们也都有一把评论的尺度，相当准确。可惜的是过去的偏见使他们无法提供许多有价值的意见。而只落得一个错误制造者的恶名，这实在是很不公平的。

当然，现在的校对水平是有点不及从前了，青年同志比起老一辈来也确实差得多。这是十年动乱留下的种种弊害之一。这不只不足以作为轻视校对的口实，相反，应该是加意重视的根据。在评定级别职称声中，好像还没有听到校对员的职称应有怎样的规定，我觉得也是一种疏忽。

第二次当校对是在1966年初。正是“山雨欲来”之际，就被事先送进了“地下室”。这一次又遇见了许多老朋友，他们也依旧是老样子，并不刮目相看。当然，形势是紧张的。有许多机密稿件指定由专人校对，排成大字稿。像我这样的人是不得与闻的，要校也只能校排好大字的定稿。不过也有例外。有时忽然发来一份急件，指定明天必须见报。是手稿，属着新鲜别致，例如“劲松”这样富有“革命”气息的笔名。我的坐在对面的老搭档这时就向我眨眨眼。我明白，手里这份原稿是有来头、有分量的。字写得歪七扭八、改得一塌糊涂，也不像过去习见的“名家”手笔。老搭档大概是要我留神伺候，不要搞错的意思。我们仔细地紧张地工作了好半天，总算搞好了。等到去食堂吃夜点的途中，老搭档这才轻轻在耳边告诉我，这篇大文的作者原来是姚文元。

这时的“金棍子”虽然已经非比等闲，但金光闪烁尚未达到使人睁不得眼的程度。但我也着实为得亲手泽，并比人民早几小时得闻宏论而感到了非凡的“幸福”。

形势越来越紧张，工作也越来越辛苦。日报慢慢变成了晚报，枯坐在朝西的房子里晒着骄阳，等待“最后新闻”、“重要照片”的时候也越来越多了。千奇百怪的“反革命活动”出现在报纸版面上的次数也突然猛增。当时看样报就得映着日光反覆审视，看两面的标题、文字、图片有没有“恶意”的重叠。用最小字体排出的广告，也出过不少麻烦，要特别注意。班前班后的批判会也增加了。初校的错字统计是每天批斗的由头，就从这里上起纲来。进食堂也要坐在特别的桌子上，穿过如林的大字报夹道要目不斜视。唯一的好处是发给的黑牌在晚上不必严格悬挂，离开报社交给问讯处时，上日班的人刚刚到来，使我觉得异常侥幸，好像颜面到底还保留下一些，不曾丧失净尽似的。

“梁国虽好，不是久恋之家”。我逐渐悟出了这话的真理性。校对组里危机四伏，不知何时就会出一个不知怎样的“错”，而这“错”将被做出怎样的解释也是毫无把握的。这时，我的老搭档也不大翻动那本破字典了。因为字典提供的是没有现实意义的解释，已等于废纸。有一天我下了决心，打了报告，为了“脱胎换骨”，我坚决要求到更艰苦的地方去体力劳动。当时与我在一起工作的同伴还不以为然，他总觉得脑力劳动到底比体力劳动好些。我可是没有动摇。报告很快得到了批准，好像还得到了“表扬”，说我

多少表现了一点改造自己的决心云云。当时听了颇觉得有点惭愧，我可实在并不是这个意思。

我被分派在运输组。每天坐了大卡车到处运卷筒纸，到过港口、车站、码头、仓库……许多地方。我想，不是“一月革命”，我恐怕是不会有机会见到这许多世面的。奇怪得很，不久，我就发现摆弄几百公斤的卷筒纸，比起捉住那些比碎米屑还小的密密麻麻的黑字要轻松得多。

这时，我也真正懂得了校对工作的伟大与艰巨。

不到一个月，那位反对我体力劳动的朋友也到运输组来了。原来他签发的一条戏目广告中出了“大错误”，不知道怎么搞的，每个戏院名字上面照例都有的一句口号中，“万寿无疆”的“万”字，竟自错为“无”字，而他竟自未能发现。

在他上工的第一天，我当然要加以欢迎。但握手之际，看着他那副尴尬面孔，还是忍不住说出了一句：“你也来了！”接着哈哈地笑起来。

1983年3月1日

书 缘

想起自己开手买书时的往事。旧书浩如烟海，都摆在书店里书摊上，袋里的钱有限，应该买这本不买那本，是要有个算计的。找指导老师不容易。大学里还没有文献学、版本学这类课程；前辈藏书家也一个都不认识，只得设法自修，而参考书更是难得。偶然碰上了叶德辉的《书林清话》，不禁大喜。如饥似渴地读了，又按照他的指引，搜罗起书目题跋来，从钱遵王的《读书敏求记》，黄丕烈的《尧圃藏书题识》，一直到《鲁迅日记》每月后面的书帐，每见必收，迄今也有了百十来种。翻翻书目发现这也有个发展过程。最早的《艺文志》之类，往往只留下孤零零的一个个书名，有时连作者和卷数都不记，实在使人遗憾。到了明清之际，藏书家的书目里在作者卷数之外，才偶尔注明“宋板”、“旧抄”字样，觉得有些意思了。再往后，书目中出现了记行款和黑白口……的附注，参考意义又多了一层。人们还不满足，以为如此还不足窥见古书面目，从杨守敬开始，又集印了《留真谱》，此后公私藏家也纷纷景印书影，一时蔚成风气。一直到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出现，可以说是一部系统完整的留下了古书面目的大丛书，读者从中不但接触了古书的体貌，也看到了中国雕板文化的发展轨迹。真的为买书人提供了极好的教材。前些年北京图书馆编印了《中国雕板图录》，从纵横两种视角，反映了我国雕板发展变化的历史面貌。书是用珂罗板精印的，质量远远超过了过去的许多书影。

门径稍稍摸到以后，接下来就是实践，这中间也有个漫长的有意思的过程。买书是要交“学费”的，往往上了不知多少当以后才能多少懂得板刻前后、书卷完缺，……这当儿，读题跋就更觉得有意思，更能体会到得到或失去一本好书后的高兴和颓丧，也就是说进一步领会了书趣。于书本内容之外，对纸墨刻工……也逐渐有了欣赏的眼力。买书而讲究这些，似乎太奢侈了些。然而不然，古刻本自有其工艺美术价值，是不容忽视的。同是一本李杜诗，把铅印本与旧刻本放在一起，自然会显出差异来，读时的心境感受会是完全两样的。有时得到一册禁书，不免要想到它历劫仅存的不平常命运，从而更凭添几分珍惜之情。这样，每一本书好像都有一个自己的故事，无论新知旧雨，在藏书者看来，其间都有一段书缘。把这书缘记下来的就是书跋或书话，而这正是我所爱读的文字。

《书林清话》迄今还不失为有趣的著作，不过也确是有点陈旧了。今天我们需要的是本视野更开阔、更富有历史感的新作，给爱书和跟书打交道的人作伴，为他们带来知识和乐趣。听说《书文化大观》就要付印，读了它的目录，知道这正是我所期待的著作，只可惜今天市上已不再见线装书的影子，即使增长了见识也没有机会付诸实践了。

禁本小记

清朝的禁书，过去有一个时期曾经是图书馆和藏书家极力搜求的对象。为此，当时旧书店出版的目录上就特别标出哪些是禁书，不言而喻，价钱也特别来得贵，往往不是一般读书人所能到手。这里说的是抗战前后的情形。一直到解放之初，旧书的身价一落千丈，大秤论斤，好像只有塞进还魂纸炉的资格时，人们才再也没有了心思来讲究什么禁书。近来翻阅几种禁书目录，发现其中有些熟习的名目，都是过去曾经遇到或偶尔买得的。历劫之余，书架上居然还剩下了几种，于是就取出来一一翻阅，对照当时查办禁毁书籍人员所加的按语，留意那犯忌的处所，好像也多少能看出“圣意”与审查官员的心思。这些又大抵是明清易代时人的著作，自然也保存着一些值得珍重的史料。诗文也各有特色，显示着一代文风诗风的面目，这些都是文献价值以外值得着眼的地方。又因为到底少见了，作为板本书也有加以纪录的必要。因作《禁本小记》。

《南山集偶钞》

《南山集偶钞》，“桐城戴名世田有受业尤云鹗编次”。康熙壬午刻本。半叶十行，行廿一字。前有方苞序，宿松朱书序，辛巳人日受业尤云鹗跋，又目录。全书计收书十首，序四十二首，记二十一首，传二十五首，论三首，说四首，杂著五首。白口，左右双边。板心中记篇名及写作年份，每篇叶数各为起讫。每类前各起大题。其中有一处书名已为后人用墨笔改为《南函集》，作者名字也涂改为“戴吝槿由直”，应是《南山集》狱后事。

《南山集》案是康熙后期有名的文字大狱。官书及野记都称之为《南山集》狱，其实指的就是这本《偶钞》。是尤云鹗就平日所藏钞本百余篇付刊的，仅当全集五分之一。刻成十年而狱起，官方据此论罪，并非另有《南山集》一书。

戴名世是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一甲二名进士，与方苞齐名，都是兼做古文和八股文的名家。康熙五十年，副都御史赵申乔揭发书中违悖之处，指的就是《偶钞》卷首的一篇《与余生书》。余是介绍曾为永历中宦者的犁支和尚叙述滇黔间事给名世的人。原书说：“而吾乡方学士（按指方孝标）有《滇黔纪闻》一篇，余六七年前尝见之。……学士考据颇为确核。”这就触犯了清廷的大忌，康熙在御批中说：“案内方姓人，俱系恶乱之辈，方光琛投顺吴三桂，曾为伪相。方孝标亦曾为吴三桂大吏，伊等族人，不可留本处也。”又说：“方登峰之父（方兆及）曾为吴逆伪学士，吴三桂之叛，系伊从中怂恿；伪朱三太子一案，亦有其名。今又犯法妄行，方氏族人，若仍留在本处，则为乱阶矣。将伊等或入八旗，或即正法，始为允当。”可见在康熙看来，此案因有作《滇黔纪闻》的方孝标卷入，又有族孙方苞为《南山集偶钞》作序，与三藩事件联系起来，就觉得格外严重了。其实戴名世在《与余生书》中还有许多有关明史的议论，也是清廷不能容忍的。戴名世说：

昔者宋之亡也，区区海岛一隅，仅如弹丸黑子，不逾时而又已灭亡，而史犹得以备书其事。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闽越，永历之帝两粤、帝滇黔，地方数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揆以春秋之义，岂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昺之在崖州，而其事渐以灭没。近日方宽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讳者万端，其或菰芦山泽之间，有仅仅志其梗概，所谓存十一于千百，而其书未

出，又无好事者为之掇拾流传，不久而已荡为清风，化为冷灰。至于老将退卒，故家旧臣，遗民父老，相继渐尽，而文献无征，雕残零落，使一时成败得失与夫孤忠效死、乱贼误国、流离播迁之情状，无以示于后世，岂不可叹也哉！

戴名世在这里为南明争正统，倡议修南明史，想发动明的遗民、遗臣收集史料，纂辑成书，总结一代得失成败的教训，即使是书呆子的白日梦，在清统治者看来到底是危险而不能容忍的。更何况戴名世又错误估计了形势，天真地说什么清朝的文字之禁已经放宽，更是不折不扣的梦话，其必然碰到统治者的刀尖上，是毫不奇怪的。戴名世又表示，他“于明史有深痛”，有纂修明朝全史的雄心，在收集史料的问题上也对清廷的修史进行了指摘：

前日翰林院购遗书于各州郡，书稍稍集。但自神宗晚节，事涉边疆者，民间汰去不以上，而史官所指名以购者，其外颇更有潜德幽光、稗官碑志，纪载出于史馆之所不及知者，皆不得以上，则亦无以成一代之全史，甚矣，其难也。

这里所触及的正是极为敏感的，为清朝千方百计回避、讳饰的历史。在民间倒是清醒的人多，并不天真地遵命将藏书献出，可见大家都明白，万历以后明与后金的关系是碰不得的禁区。而戴名世却直截了当地点出了，虽然在官文书中不曾明确指出，无疑这一节也是他致死的重要原因。

关于文集的刊刻，戴名世在给好友刘大山（岩）的信中曾有说及：“今年冬，有金陵门人欲钹仆古文于板。仆古文多愤时嫉俗之作，不敢示世人，恐以言语获罪，而门人遂以彼所藏抄本百篇，雕刻行世。”可见作者本人也不是没有警惕的。刘岩在戴名世案内也受到牵连，据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刑部衙门奏：“编修刘岩，虽不曾作序，然不将书出首，亦应革职，金妻流三千里。”后来得到宽大处理，减去死罪，但流放充发是不免的。刘岩的文集《匪莪堂文集》是清光绪中叶刻行的。诗集名《大山诗集》，五卷，康熙后期刻本，不入禁网，但诗中怨望之处是很不少的。如《读苇间集》，是纪念故友姜宸英作，就有“呵壁无从诉此冤，悲填胸臆愤张髯”之句。《哭家西谷侍御》诗说，“我罹文字祸，不敢歌大招”，更是对自己的遭遇表示了抗议，而且公然说出“文字祸”来，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幸运的是没有被发觉，罪上加罪。只此一例，也可见当日文网虽密，到底还不曾剔除净尽，不能说不是失败了。

戴名世和刘继庄（献廷）、王崐绳（源）都是好朋友，在《送刘继庄还洞庭序》一文中，称赞刘“不从事于科举”是“真能读书者”，说刘“尤留心于史事，购求天下之书，凡金匱石室之藏以及稗官碑志、野老逸民之所记载共数千卷，将欲归老洞庭”，认为刘是修撰前朝史事的同志。戴名世对明代史料的关心无时不有所表现。《天籁集序》是为康熙刻白朴的词集所撰的序文，已不见于原书，想来也是因避忌而抽去的。序说：

顷余有志于先朝文献，欲勒为一书。所至辄访求遗编，颇略具。而今侨寓秦淮之上，闻秦淮一二遗民所著书甚富。当其存时，冀世有传之者而不得，深惧零落，往往悲涕不能自休。死而付其子孙。余诣其家，殷勤访谒，欲得而为雕刻流传之。乃其子孙拒之甚坚，惟恐其书卷之流布而姓名之彰者。呜呼，祖父死不数年而其子孙视之不啻如仇讎，

其终必至于磨灭……

从这里透露的情况可以看出，在政治压力下，人们是怎样的战战兢兢，深藏密锁，不愿将有关明清易代史事的著作付之刊刻。戴名世痛骂这些不肖的子孙，不考虑现实政治条件，固然不免偏激，但从另一个侧面也揭露了文字狱的罡风，不但斩杀了大量已刊的著作，更扼杀了也许更多的文稿，使之

胎死腹中，其践踏文苑的凶残业绩，更是应该予以充分的估计的。

戴名世还为弘光遗臣王养正立传，盛赞其抗清死难，虽然遇到“大清兵”字样提行以示尊敬，但立场却鲜明地站在烈皇帝、安宗皇帝（弘光）一边。在《吴江两节妇传》结末的赞语中，又借机大骂投顺的贰臣：

吾尝读顺治实录，知大兵之初入关也，淄川人孙之獬即上表归诚，且言其家妇女俱已效国装。之獬在明时，官列于九卿，而江淮之间，一介之士，里巷之氓，以不肯效国装死者，头颅僵仆，相望于道而不悔也……

今天人们都熟知清初因薙发而丧生惨痛故事，却不大知道因通令换衣冠也曾造成惨重的牺牲。戴名世在另一篇著名的《画网巾先生传》中就记下了薙发令下后发生的悲壮故事。文章开始就说：“顺治二年，既定江东南，而明唐王即皇帝位于福州，其泉国公郑芝龙阴受大清督师洪承畴旨，弃关撤守备，七闽皆没。而新令薙发更衣冠，不从者死。于是士民以违令死者不可胜数。”可见剃发与换装是连在一起的。在叙事过程中，对洪承畴、郑芝龙的批评倾向更是显然。他几乎不放弃任何机会来发抒故国之思，在另一篇《郭烈妇传》的赞中也说：“嗟乎，海岱之间，自明时多公卿贵人，冠盖相望。及易代之际，左公萝石而外，卖国叛故主者多矣。而女子之以节烈著者，颇时时不绝也，岂不异哉。”借封建主义男尊女卑的大帽子，痛斥卖国投敌的公卿贵人，正是戴名世思想的一条主线。

《南山集》案最后的处理是：“戴名世从宽免凌迟，著即处斩；方登峰、方云旅、方世峰，俱从宽免死，并伊妻子充发黑龙江。此案内干连人犯，俱从宽免治罪，著入旗。”只杀掉一名主犯，比起乾隆朝的文字狱来还要算是宽大的。入了旗的方苞，后来赦归了，还写进了《满汉名臣传》，成为桐城派古文的开山人物，则更非少年时与之齐名的好友戴名世所能料及的了。案戴名世尚有《忧患集偶钞》一种，亦列入禁书目，刊刻体式与《南山集偶钞》全同。后附《子遗录》一卷，康熙四十年（1701年）宝翰楼刻本。《南山集》则未见原刊著录，只于清末用活字排印《南山全集》十六卷，题“戴潜虚田有”撰；又有光绪十六年木活字本，亦十六卷，改题“桐城宋潜虚撰”。

《峤雅》

清初刻本。“明福洞邝露湛若撰”。半叶八行，行十五字。每半叶双套边，刊刻甚精。板心下有“海雪堂”三字。卷首大题下有印云，“字字离骚屈宋心”及“族来孙邝瑞重镌”一行。前有皖雾灵山人阮自华大字隶书序，小像，自赞，《石巢诗话》一则，后附“文部”，尾叶题“峤雅卷之二终”，似此书为二卷，但《千顷堂书目》称八卷，大概是连同诗类分体别起大题一并计算的。

邝露，广东南海人。明诸生。隆武时召为中书舍人，唐王败死，赴桂林。永历中入翰林。后奉使还广州。清兵攻城，城破抱所宝琴赴水死。看他的生平经历，诗集中自然多的是感事伤时之作，不必审查就可断定应予禁毁了。但军机处奏进的禁书目中却有详细的案语说明：

查《峤雅》，明邝露撰。中多空白，以文义推之，皆指斥之词。露虽于大兵入粤时抱琴死节，然在明末受业于阮大铖之门，最相契厚，为其狎客亦最久。诗中所称石巢先生，即大铖也。其死与明末逆案诸人之死相似，仅足自盖其愆，未便因此而存其诗，应请销毁。再此书卷首削去卷数，似非完本，应行令该督抚再查。

这里所指的就是同一刻本，卷中空白，也一一俱在，卷首小印所引诗，见王渔洋《论诗绝句》，“九疑泪竹娥皇庙，字字《离骚》屈宋心。”据此，刻书当在顺康之际了。审查案语中借阮大铖大作文章，把邝露打入逆案，作为应予销毁的理由，倒是别出心裁的论法。其实诗集中处处都是违碍词句，原不必拉上阮大铖定罪的。七古《花田饮陶十一白郎》诗后附注云：

是年燕都已陷，吾粤游舸不减昔时，南都初建，志士多绝裾之游；而尸素巨公，燕巢飞幕之上。黄才伯云，“越女不知摇落早，涉江犹唱采芙蓉”，信然。

《赵夫人歌》小序中“迎驾邕宜”、“西迓乘舆”等都指的是永历帝，都照例抬头。诗中起首处有“自矜娇艳无双质，嫁与将军北射”。骑冯陵风雨急，金陵铁锁何嗟及。”两个空白字都是“胡”字。诗末附记说，“永历二年闰三月十五日，东粤始复冠裳……”又有咏张家玉侍郎的《二臣咏》，诗后小注更详细记述了张抗清前后的业绩，死节始末。邝露始终是奉南明正朔的，称明军为“王师”，与“清军”相对应，而感事伤时的词句更是随时流露。在禁书中间，可以算是十分标准的一种了。

阮大铖的《诗话》中对邝露评价极高，说：“湛若诸律，以曹、刘、鲍、庾之才，降就沈、宋之法。如驱八骏，折旋于蚁封之上，故韵流于苏、李，而酝酿深于辋川、襄阳。超百粤而孤出，陵三唐而特奏。”可说推许备至。《峤雅》中与大铖投赠之作不少，也并未删去。阮的《咏怀堂诗》前有“岭南门人邝露序”，略云：“饮明堂在邹之醇，割西园南皮之腴，弹厌六代而砥柱乎柴桑。其协律之什，伯玉翕焉禅纯，摩诘圣焉禅智，三唐无其匹也，况下此者哉。”而结以“诵其诗，知其人，庶几可以论世”。邝露不但高度评价阮大铖的诗，同时也肯定了他的为人，此序撰于崇祯十年（1637年）前后，正在阮髯因瑯案下台隐居读书之时。此序意在为阮髯翻案制造舆论，是显然可见的。这就使鲍以文在《赤雅》前序中不能不说，《赤雅》书前“旧有怀宁两阮序引，削而不录，俱为先生辱也。先生少尝师事大铖，崇祯间为阮序《咏怀堂诗》，称门人某百拜。（按，此不确，以文可能没有看到阮集刻本。）洎阮罗织东林，乃贻书绝交，侃侃千言，可与侯氏《壮悔堂集》中一书并传。予友陈君同舟，曾于金陵市上见之，惜乎不获附此书以行也”。鲍以文的这些话代表着读书界的一般意见，与军机处的审查意见的出发点几乎是一致的，不同的是一个想为之辩护，一个则是借此作为销毁的理由而已。

《经 堂文稿杂看》

康熙刻本。曹炎藏书，后归稽瑞楼、旧山楼，二百年来未出虞山。开卷为杂著两种：（一）《半茧园十叟图诗》，前有二泉居士（叶奕苞）序，凡十图，对页各有题咏；（二）《醉乡从事图传》，前亦有二泉居士序，也是左图右文。其后为《金石小笺》二卷，属“昆山叶奕苞九来著”。又“文稿”。最后为附集，计收陈其年《半茧园赋》，姜宸英《小有堂记》，施闰章《春及轩记》，葛芝《下学斋记》，归庄《儷然堂记》，彭士望《归云阁记》，徐开任《半茧园记》，李良年《三友园记》，顾苓《扞虱庵记》，魏禧《经堂记》。

叶九来是清初著名藏书家，叶文庄菴竹堂的后人。这一册书和后面所附清初著名文士的文字，都是昆山一郡极好的地方史志资料。刊刻精雅，体式不一，看来是刻于不同时期而汇为一集的。九来还有诗稿八卷，杂诗及诗词

五种，也是康熙刻本。未见。但就这一册杂著文稿看，内容多半是考订金石旧史之作，看不出有什么违碍之处，不知何以竟得到“荒诞悖逆，语多狂吠”的评语而列入禁书。《文稿》中有一篇《赠白生璧双序》，倒是为吴梅村《琵琶行》诗作笺的好资料，其中提到了崇祯遗事，不无兴亡之感，也许就是碰到清朝痛处的所在，但无论如何也找不出“狂吠”的痕迹，也许只有天生特别嗅觉的人才能辨析得出吧。

白生之先吴人也。徙家南通州，凡五世。祖父挟琵琶游塞上，生独好游江南，亦挟琵琶以行。先是太仓吴学士遇白或如于王太常之南园，闻琵琶称善，或如为学士进新曲，乃明崇祯帝十七年间事。叙述乱离，嚙嘈凄切，至于泣下。……学士赋六百二言，亦曰《琵琶行》以赠之，而或如名益重。戊戌夏访予茧园，请奏所谓新曲者，一再弹，满座怆然。予不忍其终曲，朗诵学士《琵琶行》以乱之，而或如亟称生之技更善。或如者生之叔也。盖生之祖在涓，从塞上将士授数十曲，皆山坡羊小令，生独得清商杂调于旧才人，曾侍玉熙宫宴者，故其技益进。

文章后半论南北伎乐好尚的变迁，更是有意义的记录，而感慨牢骚也就从这里出来了。

予因有感於江南盛时，金陵吴趋馀杭之里，门第相望，鼓钟不绝。所奏伎乐皆尚吾邑魏良辅所定之昆腔。若琵琶者，以为北方之乐，屏而不御。故生之祖父技虽胜，仅从塞上游，势使然也。然十馀年来，生与或如以其技游於南，南之人忽好之，识者以为天地之气于是变矣。自北而南，固足信也。无何而向之门第相望者，迁为戎营夷为牧圉，而鼓钟不复作焉。呜呼，高岸成谷，深谷为陵，吾生三十年中，盛衰递见，何止白生祖孙父子间乎？

戊戌是顺治十五年（1658年），上推十余年正是甲申乙酉之顷。作者这里的感慨是明显的，也许这就是触犯禁忌的要害吧。不过同样作了《琵琶行》的吴伟业的运气则要好得多，《梅村集》中谈及明清易代史事的地方更多，故宫黍离之感也在在流露，但全集只抽去了钱谦益的一篇序，终于保存下来了。《军机处奏准抽毁书目》中对《梅村诗文集》有以下的说明：

此种系国子监祭酒吴伟业撰。伟业诗才俊逸，卓然成家，曾蒙皇上御览褒咏，外省只以其与钱谦益并称江左三大家，因而牵连并毁，实无干碍，应请勿庸销毁。惟卷首有钱谦益序一首、书一首，仍应抽毁。

同时顾有孝选的《江左三家诗钞》，也只抽毁钱、龚二家作品，《梅村诗钞》三卷特许存留。这些处理办法都是得到皇帝批准的。是不是曾经御览赏识就可以从宽审理呢？也未必尽然。看来这中间总还有些不大好直白说出的原因。

《国史记闻》、《嘉靖以来注略》

《国史记闻》十二卷，天启刻本。九行，十九字。题“巡按江西监察御史沁水臣张铨辑，男锦衣卫指挥同知臣张道濬订，门人巡按山西监察御史江宁臣徐扬先较”。前有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张铨序，天启四年（1624年）徐扬先序。

禁书目著录，附注说：“其卷九内有叛降朝鲜一段，应请禁毁。”查原书，这是天顺三年己卯（1459年）的记事。

建州夷酋董山叛降朝鲜。

董山潜结朝鲜，受伪制，为中枢密使。辽东巡抚程信调得其制书，疏请乘其未发，先诘之，可伐其谋。上遣给事中往朝鲜，锦衣译者往建州。两酋初不肯承，出制书示之，皆惊服谢罪。这是早期的东事纪录，也是《国史记闻》全书中仅见的记述。原书记明

历朝史事，起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朱元璋起兵濠州，迄正德十六年（1521年）。书中所记边事，大抵都是西北诸边攻守的史实，虽然奴虏字样常常出现，但到底于满洲无关。只有这一条记下了建州先世的史迹，不但称之为“夷酋”，而且揭露了叛降的事实。这自然不能不成为避忌销毁的口实。其实张铨本人就是亲身参预了东事的，最后死在辽东。徐序说：“方忠烈（张铨）之感慨东事，新置大帅也，抗疏非之。未儿，一一如所云。举朝神其识。神祖命往监军事。忠烈不以台资谢，单骑受代。今上初年，臣已忝同台，尺一才通而辽溃之报旋至，忠烈之惨旋闻。”张铨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官御史，曾上疏论辽东战守形势，募兵选将诸事。四十八年张铨又上疏奏谏：

“国家之乱，皆起于民穷财尽，履亩加赋。七厘未已而九厘，穷民何以堪此。大内积金如瓦砾，而发帑之请，叫阍不报，加派之议，朝奏夕可。岂财为皇上之财，而民非皇上之民耶？”（《五朝注略》卷十二）

在当时的台谏中可以算是敢说话的。

张铨随即被命巡按辽东。天启元年（1623年）三月，“奴酋率众度浑河，首犯沈阳。按臣张铨先下令迁降夷于城外，贺士贤不从。将士凭濠而守。贼驱土填堑，我兵连发炮热，装药即喷。贼遂蜂拥过濠。城内降夷应之。……沈阳遂陷。”后来清兵直抵辽阳城下，“李永芳遣人请降，（袁）应泰许之，命竖受降旗于城上。……应泰、张铨与分守何廷魁，三人坐城东楼，铨谓应泰曰：‘坐公尸居游魂，致我无成事而死。’应泰曰：‘公无阌外责，尚可退守河西，泰不才，当死于此。’铨下城，应泰举火自焚。……铨为贼执送李永芳。永芳曰：‘跪我，我官汝。’铨斥曰：‘反贼耳，何官！’永芳令驱之城外斩之。数日间，金、复、海、盖州卫，悉传檄而陷贼。”

以上是从《五朝注略》中辑出的有关张铨的事迹。这《五朝注略》也是清代的禁书，禁书目题作《嘉靖隆庆万历天启四朝注略》，漏掉了《泰昌注略》卷十二，可见疏略。禁书目小注云：“查四朝注略系明许重熙撰，内第七卷以至十四卷，诋斥之词甚多，应请销毁。”说得正是事实，这书不像《国史纪闻》，七卷以下几乎没有一叶没有有关辽事的记载。我所见的一本是山阴祁理孙的藏书，崇祯刻。半叶十行，行二十字，白口单边，题“太学生臣许重熙编次，右春坊臣许士柔参订”。卷首版心下有“秣陵高文所刻”一行。前有“旧史臣董其昌序”，崇祯六年（1633年）“吏部候选监生臣许重熙《嘉靖以来注略》序”。

在崇祯初年就已编刻了直至天启末的当代史，可见明人纂修私史的积极。董其昌在序中说：“臣间尝睹嘉靖朝有若大政、编年、识余、闻见诸录，万历朝有若笔麈、邸抄，泰昌天启朝有若日录、从信、纪政，……皆可为纪述之光。”可见当时私史之多，不过到今天除了《嘉靖大政类编》第一二种外，都极少传本了。董其昌又说：“臣其昌谓史之难，难在近事。”“故末世以史为讳，讳于近也”。这确是深知此中甘苦的话。他又称赞此书“可以破讳近之疑，可以镜治朝之概”，也不是泛泛的溢美之辞。

以上两书都是山阴祁氏的遗藏。《国史纪闻》前有“家在鉴湖之滨”朱文长印、“竹中小隐”白文方印。通体蓝笔点阅。应是祁彪佳居父承丧时所读书，与所点阅《两朝从信录》为同时读物。彪佳有手稿《万历大政类编》，其原始素材就是取于《从信录》等书的。这部《五朝注略》则是祁理孙的手批阅本，卷首有墨书两行云：“藏书楼午后课，乙未四月二十日开卷，布衣臣祁理孙记。”乙未是顺治十二年（1655年），作为明的遗民，在天翻地覆

之后，仍闭门读书，究心前朝史事，而且特别留心卷中有关辽事的记载，用朱圈一一于书眉注出，这些后来就都辑录在稿本《东事始末》中。祁理孙的注意所在正好与查办禁书诸臣是不谋而合的，虽然他们站在截然相反的政治立场上。

检阅各种禁书，不能不推这《注略》是名符其实、质量极高的样品。现在只少举数例：

“奴儿哈赤杀其弟连儿哈赤，并其兵，复侵兀喇诸酋。”（万历四十年十一月）

“奴酋僭号后金皇帝，改元天命。”（万历四十七年五月）

“奴酋发伪榜招降，诟侮无状。”（万历四十八年三月）

“辽抚袁崇焕奏逆奴求款情真。”（天启七年二月）

“六月，奴寇宁远。诸将凭城御之，炮伤奴兄召力兔。奴兵解围退去。经抚阎鸣泰袁崇焕，各奏厂臣先事绸缪之功，总兵赵率教奏称，仰仗魏忠贤妙算……有旨，厂臣秘谋妙算，屡建奇功。奴胆已寒，灭之有日。”（同年六月）

当辽东兵事紧急之时，正是魏忠贤等气焰冲天之日。欺上瞒下，敷衍塞责，终于弄得不可收拾。经过上下的一齐努力，总算使明朝弄到亡国。这一切在七册《注略》中是斑斑可考的。祁理孙在十多年以后，还念念不忘总结败亡的经验教训，那愿望是真诚也是可哀的。就在他闭门读书之际，发生了大狱，弟弟斑孙遣戍辽左，祁氏也因此破家。虽然史家都不视此案为文字狱，但实质上正是同一类型而发生较早的一起大案。因此这两种晚明的当代史著作就在禁书之外又有了独特的文献意义了。

《秋水集》

集十卷，勾吴严绳孙撰，康熙雨青草堂刻本。半叶九行，行十九字。版心下有“佚亭”二字。卷一至八诗，卷九、十词。前有叶方霭序、吴绮词序。当尚有朱彝尊序，未刻入，见《曝书亭集》卷三十七。

江宁布政使刻“奏缴咨禁书目”中有督部堂萨觐知无锡、金匱二县查缴禁书三种。严绳孙撰二种，此《秋水集》外尚有《明史列传》。另一种是绳孙子严泓所撰的《青梧集》。

严绳孙是纳兰性德的好朋友，自然也 and 权相明珠有着密切的关系。《秋水集》中不但收有和纳兰倡和的诗，也有和张见阳、秦松龄、姜宸英、顾贞观、徐乾学等往还的诗篇，他们都是一个政治集团中人。后来明珠罢相，政局一变。绳孙此集之列为禁书，看来当与当时政治斗争有关。至于集中诸诗，除了偶有牢愁之句外，实在也看不出有什么忌讳之处。卷六收应制及侍从引见诸作，都极尽恭谨，《平滇恭进》诗前小序更是提行抬头，卑辞颂圣，可以算是恭顺的典型。翻书时遇见这种地方，总免不了感到满身的愉快，好像看到在电影中描写旧时代某些大人物出场，甚或只是在说话中偶然提到，人们都要立正致敬的光景。《秋水集》中有这些应制颂圣的诗篇，却终于逃不脱禁网，实在是可笑又可悲的。

严绳孙的诗写得不坏，自然感怀身世的作品要来得更有特色，但如果追究起来，也是可以做为“怨望”的实据的。如《某园》一诗：

“十年桑海倍煎心，草色名园不可寻。欹柱倚风移旧绣，断垣经雨见遗簪。山僧礼数支门急，江燕惊猜避客深。惟有青山如昔日，不能重上上头吟。”

这里所咏不知是谁家园林，总之是不便明指。诗是游苏州时所作，如拟

为海宁陈之遴的拙政园应该也是可以的。

同时又有《灵岩呈继大师》一诗，是写给继起弘储的，腹联云：“兴亡满眼今何夕，去住无心我未僧。”说得尤为显露，表示了与逃禅的遗民同样的心情。《秋日杂感》一组诗中，也处处有着兴亡之感：“近说东南多战垒，车书回首几时同”、“总是兴亡千古地，莫教潮汐送闲愁”、“试看明月三分夜，犹有萧声杂鼓鼙”、“侧足横流群盗在，乾坤何处有吾庐”。《杭州杂感》四首，有“纷华何处说先朝”这样的句子，又说“指点凤凰山上路，不堪萧瑟起边愁”，说“乱离时节懒经过”，应该都是绳孙少年时的作品，在入京以前。“君看沧海横流日，几个轻舟在五湖。”（《自题小画》）可以代表作者这一时期的怀抱志趣，与入都以后浮沉政海的心情是大不相同的。卷六《集朱竹垞同年寓斋送留仙前辈》一诗，当作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松龄因顺天乡试事下狱放归之顷。

此夕亦良宴，胡然歌路难。故人先我去，霜月是愁端。

别酒那可尽，世情真倦看。十年征逐意，留梦到长安。这就直白地述说了对十年中间京师宦海生涯的厌倦，可以作为绳孙后期诗作的代表。

果然，卷七开卷就是《春日蒙恩予假南归》诗，其中如“吴牛避热先愁喘，宋鹤冲风且退飞”、“去来我亦无心者，何必从人定是非”，都是同一心情的抒写。其第三首云：

抟飞端不到青雯，高足都看几要津。遮莫吾今先丧我，由来臣少不如人。官同王琰贫来久，世识嵇康懒是真。文酒故交云雨散，梦魂相望落花春。

明珠、纳兰身边的人物风流云散了，绳孙经过了十年风浪，终于悟出自己并非政治斗争中合格的竞争者，但也还不免流露出一种哀怨。

绳孙南归后又有粤东之行，留下了不少诗篇，有《酬梁药亭次余南归诗韵见送之作，并简别陈元孝屈翁山吴山带诸子》诗，其“驽骀北望宁无恋，乌鹊南来已倦飞”句就还不能忘情于京师，正是所谓名心未尽。不过这诗是写给陈恭尹和屈大均的，按照禁书条例，只要书中出现这些人的名字，就有了同样禁毁的命运，也许这就是《秋水集》列为禁书的理由之一吧。

谈武侠小说之类

小时候也迷上过武侠小说，大约总在高小初中那个阶段，不过时间并不长，读过的作品也很少。记得曾看过在天津的什么报上连载的《三侠剑》，至于“还珠楼主”的长篇巨作好像并没有读过，只是非常佩服他能那么一本一本地写个没完，觉得很了不起。《三侠五义》是读过的，后来又看了在舞台上演出的戏文，印象深刻。《彭公案》、《施公案》则并未读过，少有一点知识也是从舞台上的《八大拿》里来的。只有这么贫弱的一点本钱想来议论武侠小说是不成的，但也不妨追寻一点旧有的印象与观感。我记得看了许多“八大拿”的戏以后，最喜欢的是黄天霸戴的罗帽，觉得实在是漂亮极了。推而广之，锦毛鼠白玉堂的打扮也惹人喜欢，就是武丑扮的朱光祖，也觉得不坏，他头上戴的那顶帽子，很想什么时候借来一用，捉起蟋蟀来真是理想的工具。

为什么觉得黄天霸等人都那么可爱呢？理由也很简单，就因为他们都是维护正义，除暴安良的英雄。至于真正懂得了他们其实不过是皇帝、清官的鹰犬，则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从这简单的认识过程中可以悟出同样简单但却真实的道理。古今中外，一切武侠、公案小说，都是以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为脊梁的，不论不同的作者使他们的英雄施展怎样的本领、口吐飞剑，平地飞升……，这其实却不过是枝叶。在枝叶前面目眩神摇，甚至想上峨眉山修道的人不是没有，但只凭这一点却不足以说明武侠小说为什么会在社会上曾经有过那样的影响。

如愿寻根问底，太史公的《游侠列传》可以说就是开山的作品，一切必要的特点在他那里就已具备了。王国维说，“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履阅者之心，难矣。”说得不错，在这里还可以补充一点，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除暴安良，伸张正义……，也是人们喜闻乐见的，也是可以说明“吾国人之精神”的。没有这一条，一切武侠小说怕都不能存在。

当然，对“良”、“暴”、“正义”等等，都应该有具体的分析。不过这不能要求于一切读者，他们的好恶只是从朴素的正义感出发，往往无力也无暇细细推敲。

说到这里，可以推测一下近年来武侠小说广泛流行的原因。十年动乱之后，先是包公戏、说岳评话，受到热烈欢迎，接着才来了《三侠五义》以及五花八门的《××英雄传》之类，可以理解群众在经历了十年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大动乱后的心情。一切向邪恶射击的利箭都是可以引起共鸣、使人解气的。直到今日，动乱所留下的余迹也并未全部清除，引起人们痛恨的邪恶事物也未彻底绝迹。既然根株还在，那就不必奇怪枝叶的存留了。这推测不知道可否确切。

近来，各地出版社和大小投机家倾盆大雨似地推出了五花八门的武侠小说，他们是摸准了部分读者心理的。一时给出版事业带来不小的冲击，有人就担心，现在人们不再读文学书了，这样下去可怎么好？我觉得倒用不着惊慌。要紧的是拿出更好的货色来代替进而占领这部分市场。武侠小说是不会消灭的，但也不会长时期地独霸书市。读书这件事似乎也应该讲究一点“生态平衡”。正如马戏团里虽有熊猫、老虎，也代替不了戏剧电影一样。观众

喜欢马戏，但谁又愿意一年三百六十天看糊狮变把戏呢？读者群中有不同的层，年龄也是如此。我就不相信人们从小到老只抱着一本《蜀山剑侠传》（“还珠楼主”的有名小说），不，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1985年9月5日

谈影印本

《古逸丛书三编》已出版了第一种《忘忧清乐集》，《金石录》也将继续出书。“三编”的目录也已初步拟定。这都是听了使人高兴的消息。选印古善本书的工作得到国家的重视，具体进行规划并付诸实施，在解放后这还是第一次。周叔弢先生说，“不能让商务印书馆专美于前”，确是许多人想说的心理话。《古逸丛书》是清光绪中黎庶昌编刻的。黎庶昌和杨守敬在日本发现了许多中国古书，都是一千年来各种访华的日本人士陆续带回国去的。其中有许多在中国已经少见或失传了。于是他们就收购，编选，照式翻刻，集成了一部丛书。同时杨守敬又刻了《留真谱》初二编，每书只取一至数页，依原样翻刻，作为版本学者的参考。这是我国继影抄影刻之后最早出现的书影，在版本目录学上也有重要的意义。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有一个时期社会上也产生过轻视古代文化的思想，于是，这些辛苦从中国得来的古书有很多流落在旧书店里了，价钱也便宜，能为黎庶昌等买得。不过，日本人对问题发现得快，改得更快。不久以后，就把湖州陆氏皕宋楼的藏书全部买去，藏在静嘉堂里了。这以后的几十年中，更从中国弄去了大量古书，形成了一面倒的局面，致使郑振铎在四十年前发出了“史在他邦，文归海外”的惊叹。

若干年后，商务印书馆在张元济主持下，又编印了《续古逸丛书》，先后也印出了几十种。张先生把雕版改为石印，选材也更广阔、精审，那最后一种杜诗，是直到解放以后才出版的。商务印书馆影印的古籍，此外还有四部丛刊、四库全书珍本、元明善本丛书等许多种。他们还曾打算印一套《国藏善本丛书》，目录、说明、样张已印成一本精致的小册子，作为广告品散发，后来却并未印出。这个丛书是作为《续古逸丛书》的补充而设计的，其实与《四部丛刊》的性质也是相近的。不过没有严密的分类比例，只从版本角度出发加以选择而已。这与今天拟印的《古籍善本丛书》（第一集）性质也是相近的。如果说“三编”选印的是甲等书，那么不够甲等资格的就统统收在这里。

在商务印书馆复印的古书中间，《续古逸丛书》是有代表意义的，在选目印制时，自有其特定的标准。“三编”继此而出，这是在新时代、新要求下对前人业绩的继承，有些过去看不到或不可能提出的设想也应当考虑、吸收，这样就有可能在前人的基础上，取得进一步的发展与提高。

大体上说，编印“三编”工作的重点，就在选目和印制两个环节上，而决定这两者的前提则是出版这样一套丛书预期达到的目的。

看了初步拟定的“三编”书目，似乎可以说，这些书都是应该印的，只可惜数量太少。如从发展的眼光看，“三编”实在不应只收这几十种为限。如从缓急先后考虑，那对选目就可能不同看法。从选目的简略说明可以看出，入选的标准有这样几条，首先是古刻本（事实上也就是宋本）、孤本和传世有重名的书，例如曾受到黄丕烈重视的“百宋一廬中有重名之书”，就是好几种书的重要入选理由。

如果“三编”的编印是以保存、介绍我国辉煌的古典文化为主要目的，那么理所当然地就应该着重考虑反映我国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已为人类雕版印刷事业做出了怎样的贡献，在雕版、抚印上已达到了怎样的工艺水平，而且，这一切又是发生在怎样广阔的地域之中。

这样，就不只要考虑时代之古，还得注意到工艺之精，以及出现在全国不同地区的雕版印刷品的不同风格，和因纸张、印刷技术而形成的地方特色。孤本自然是一个重要的取舍标准，但不应是唯一或首要的标准。严格说来，只有未经传写，未经刊刻的稿本才能称得上是孤本。有许多已付刊刻的书，流传少到只有一部的通常也往往称之为孤本。但细想并不十分科学，还不如使用“世无二帙”这样的用语好些。有的书，如宋本《金石录》，就是在“断种”若干年后又突然出现了的。这就说明了孤本不孤的可能性。何况作为宋本，龙舒郡斋本《金石录》今天固然是“世无二帙”了，但《金石录》此书则是别有传本的，刻本钞本都有，实在也不好称之为“孤”。

从选目看，底本大半取之于北京图书馆，这是理所当然的。但其他全国重要的图书馆藏品收的就过少，几乎不成比例，似乎不能全面反映国家典藏的实际情况。如上海图书馆的藏书中，有许多就是极重要值得通盘考虑安排的。如宋蜀本唐人集，就是不折不扣的“孤本”，已有几种影印了出来，但印制水平不高，不能保存原本的风貌。作为普及本，又觉得过于浪费，为一般购买力所不及。上海是印过《纳兰容若手简》那样水平的影印本的。相信完全有可能印得更好些。已印而水平不高的，也可以在将来考虑重印。我们还有大批重要的古籍收藏在台湾，选其菁英列入选目更应是题中应有之义。推而广之，则一切流入域外的中国古刻善本，也都应在考虑之列。这设想看来有些迂远，但其实是必要的，至少在远景规划中应该予以周密的考虑。

说到内容，自然也是值得考虑的重要方面，但这与原本的雕版文献价值相比，却不能不放在第二位。在人们公认的古善本书中，不少是广泛流传的必备典籍，并非一般的读者、研究家必须加以参考的。另一些内容重要，从无传本的古籍，读者自然渴望一读，但从印数、书价各方面考虑，用“三编”的形式印行，都难以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如果说，过去人们“以代钞胥”还太烦难，那么今天，我们就可以用铅字排印。如再嫌烦难，那么就用石印，如上海古籍出版社印的《清人别集丛刊》，就用的是商务印书馆印《四部丛刊》的方法，也是行之有效的。最近看到台湾书店印行了大量解放前从大陆运去的善本古籍，一律新闻纸双面影印，小册硬面装订，“硬领皮靴”，用的也是同样的办法。当然这都与“三编”的任务和要求不同。

还有一个完缺的问题。过去的藏书家一直抱着牢不可破的完缺之见，他们轻视一切残缺不完的本子，影响所及，在书坊里的标价也大相悬殊。这种传统观念好像从毛子晋才开始逐渐打破。《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中就著录了大量的残本书，有些书的残缺部分还精工抚抄补足，这就是被人们称赞为“下真迹一等”的“毛抄”（“毛抄”不只是抄配，也有许多影抄的是全书）。汲古阁开了风气后清代许多著名藏书家在书目中也著录残本了；到今天，我们看许多国藏善本书目，残本的比重实在是很大的。这是应该肯定的实事求是作风。这样，有许多“世无二帙”的古书，就不能因其残缺不完而加以忽视；有些残宋本，缺卷由明人抄补，纸墨精妙成为别具一格的艺术品，更不宜以完缺之见决定去取。“三编”拟目中选入《钜鹿东观集》十卷，仅存七卷。余卷明人抄配，精妙绝伦。即其一例。自然，只存零页或大部书只存一二残卷，如无特殊理由，是要慎重考虑的。

说到选用底本，那就应该更多听取老专家的意见。在这里，一位经验丰富、见多识广、对古刻善本具有高度赏鉴水平，真能识得旧本之美的专家意见比起只是版本目录学者的意见就来得尤为重要而可贵。周叔弢先生对“拟

目”中选入的宋刻《陶渊明集》提出过这样的意见，“首行挖补，汲古阁诸印皆伪，似不可列入甲等”。这部“百宋一廬中有重名之书，称北宋本”的陶集原来也是叔弢先生的旧藏，是黄丕烈陶陶室旧藏宋本陶集之一。《中国版刻图录》说明中说，“毛氏汲古阁秘本书目定为北宋本，恐不确”。查《秘本书目》（拜经楼吴氏钞本）也只是说它是“宋板”并盛赞本子之好，并未明确指实为北宋，“说明”所指不知根据何在。看《图录》所收《陶集》书影，这是一种已经相当后印的本子，卷首第一行“卷第一”下有挖补一条，“宋本”、“甲”、“毛晋之印”，三印模模糊糊，看不真切。如未亲见宋本，仔细观察，仅凭书本纪录，或只看在黄丕烈的份上，听信后来藏书家的宣传，就作出决定，怕不是稳妥的办法。叔弢先生另推荐了也是他旧藏的宋刻《汤汉注陶诗》，理由是“精印，人间孤本”。这部“黄氏陶陶室旧藏宋本陶集第二部”，是四库全书所未收的，大字建本精品，没有通常闽刻那种严谨而显得局促的气势，来得分外雍容俊爽。如非“精印”，这些特点是很难领略的。

总之，选择“三编”底本，需要集中多方面的意见。尤为重要的是有机会多接触实物者的意见。文献与目录学家的意见当然应该尊重，一直被当作“古董家”、“鉴赏家”们的看法也不能忽视。我认为“三编”必须从审美角度进行判断，才能作出适当结论，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

新印的《忘忧清乐集》我在书店的玻璃橱里见过一下，没有麻烦店员取出来细看，因为我想价钱一定很贵，大约不会买。因此说不清印刷质量到底怎样。只是觉得比起商务印的《续古逸丛书》来，开本小了一些了。《金石录》比起《忘忧清乐集》来要重要得多。原本二十多年前曾在徐森玉先生的办公室里看见过一次。徐先生那天兴致非常好，他对我说，“你看看，这部《金石录》，像不像嘉靖本？”这部南宋孝宗淳熙龙舒郡斋刻本《金石录》，初上手真会使人看作普通的嘉靖刻本。那款式、刻工、纸墨、装订都非常相似。纸是白棉纸，没有一方藏书印记，原装也是朴素简单的，订书的丝线也有些脱落了。但仔细看时，就立即发现两种不同时代刻本的明显差异。同是写到，同是精整的楷书，但气氛完全不同。宋版书的书手并非个个都是书法家，但他们写出的每一个字都有自己的精神、风貌、意趣，有时还带有特定的古拙，值得一字字地细细观赏。明刻就往往经不起这样的审视。有些嘉靖本手写极工整，书法极漂亮，但就是不耐看。清代也有极精的写刻本，情形也差不多。倒是有些明初写刻本还保留着这种书手雕工的鲜明个性。尽管比宋本已有很大差距，有时比规范化了的元刻本还要好得远。

这部宋本《金石录》从南京津逮楼甘家发现，是被当做废纸秤出的，一时人们都感到意外。津逮楼甘氏过去印过一些南京地方史料，如《帝里明代人文略》等，但并没有藏书目流传，人们猜不出竟藏有这样的奇书。一百年来，南京屡遭兵火动乱，这部书的得以历劫幸存也实在不可思议。50年代初我路过南京时曾访问过津逮楼的遗址，那是一座双层木构的楼，相当大，虽然年久失修，但依旧保存完整。雕花的木窗上空荡荡的没有一张窗纸。我走上楼去看，地板上空荡荡的，只有一个墙角还堆着一些烂纸。其中有残零的清刻本书，上面都钤了津逮楼的印记。楼下有一排矮小的平房，住着甘家的后裔。我在他们手里还看到过一部嘉靖刻，白棉纸印的医书，有甘氏印记。这楼后来不知道怎样了。今年春天我在南京曾向文化界许多人打听过，已经没有人知道津逮楼的名字了。

想用文字来说明宋明刻书的差异是困难的。我想有一种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取宋本原刻与明人翻刻对照观察。传世有很出色的明翻宋本，如袁刻《世说新语》、东雅堂、济美堂翻世彩堂本韩柳文，……这些书的宋刻原本都还依然健在没有毁失，只要将两者加以对比，就能非常容易地看出那差异所在。我们很难方便地看到宋板，这里书影就成为不可少的参考资料。而书影必须是精印的，能忠实反映原刻风貌的，才能作为比勘的依据。明人翻宋本有时是很忠实的，当时宋板书还不像今天这么希奇，有时就将原书拆散一张张贴在木板上，请刻工依式翻刻。难怪有时候竟达到了形神逼肖的程度。不过刻工的技术水平、工作习惯、使用工具到底不同了。他们的工作方法与审美标准也改变了。方块字的许多细部构成，如书法家的“永字八法”所分析的结构组合，都出现了分明的差异。这种差异就在不同时代形成了不同的风格。在书法、雕版中都存在着这种变化，而且大体上也是一致的。鉴定书画与鉴定板刻都不是神秘的、高不可攀的学问，必要的知识往往可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获得。

时代风格之外，在鉴定雕版时也还另有一些辅助依据。如不同时代、地区使用的不同纸张与印刷方法，文献中的著录、收藏印记、装潢样式……也都有一定参考价值。一切与书画鉴定都非常相似。书籍在它应有的文献价值之外，又有自身的文物价值、工艺美术价值，就因这些重要因素形成。

取古刻书一页至数页，忠实地依式翻雕，集多种书的样张，就能为读者提供一种认识、鉴别古刻本比较系统的参考资料。杨守敬想出了这个主意，刻出了《留真谱》，这是与《古逸丛书》相辅而行的划时代著作，是在宋元本行格表一类研究成果基础上进一步的发展与创造。等到石印与玻璃板的印刷技术出现，许多新的书影出现了，比《留真谱》又前进了一大步。

作为一种新生事物，《留真谱》为传统的版本目录学增添了新的科学性；在当时雕版技术上也达到了高水平。杨守敬的这些贡献是应该肯定的。七八十年来旧本书和书影的复印，有了很大的发展。企图达到的目的是两个。在保存、流传古典文献之外还要求在最大可能限度内传真，保留本书的原有风貌。使读者在阅读之余同时获得欣赏古代印刷精品的愉悦，并增加鉴别古书的知识。

粗略地计算一下，一些重要的藏书家，常熟瞿氏、吴兴刘氏、武进陶氏（所收大半为木犀轩李氏书）、松江韩氏和故宫博物院都出了藏书的书影，《文禄堂书影》、《明代版本图录初编》等也相继出版。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则更是一部大书影。这许多大都用的是石印方法，也间有用少量珂版的。建德周氏所印宋本《鱼玄机诗》、《孝经》等尤为精美。明本《杂剧十段锦》、《琵琶记》、《苏门啸》、《千秋绝艳图》等也都有珂版印本，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从数量上看，商务印书馆的成绩最大；从质量上看，则还远远算不得精美，就连有名的《续古逸丛书》也还是用的石印，只不过开本特大、用纸讲究而已。鲁迅、西谛翻刻的《十竹斋笺谱》，西谛编印的《中国版画史图录》（珂版、罗纹纸）则是这一时期出现的有代表性的重要图谱。

日本印的《图书寮宋本书影》，《静嘉堂书影》等都非常精美，特别是按原式影印的宋元旧本，以《东京梦华录》为例，不只用珂版精印，还套色印出了收藏印记，连蝴蝶包背装也照原式复制，确是远远超过了《续古逸丛书》的水平。不过因用日本皮纸印刷，与中国古书的风貌不能不产生某些

距离，此外也还有其他可以改进提高的处所，并不能认为已是无可超越的。

建国以后，北京图书馆编印的《中国版刻图录》是一部高学术水平，印刷也相当精美的图谱。此书用珂 版影印，其中彩色套印诸幅，尤具匠心。编印依时代、地域为序，也是有创造性的处理方法。说明部分反映了多年来版本目录学术研究的成果，总的说是一部有代表性的重要的版本学著作。

除此书外，长期来同类印刷品的质量则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比起过去的水平是下降了。1978年上海古籍书店复印的《善本书影》恐怕是自有书影以来少数印刷最差的一种。它可以提供一种样本，说明古刻的面貌、风格可以被歪曲到怎样的程度。《中国古典文学版画选集》则是另一个例子，证明线条的失真（主要是变粗）可能给版画效果带来怎样的损害。这两书都不是石印，但效果比石印还不如。珂 版是比较理想的印刷手段，但效果也可能大相悬殊。在这里，工艺水平是起决定作用的。掌握了一定的技术，还应对古刻风神、韵致有必不可少的敏锐感受，这样才有可能想方设法运用恰当的印刷技巧加以再现。总的来说，近三十年来善本复制的工作没有能达到过去曾经有过的最好水平，也没有在使用新的印刷手段中创造新的经验，这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复印古书本身有不同的任务与要求，理所当然也应采取相应的不同对策。如只是为了文献资料的保存与流布，那就应该采用较为简便、低廉的印刷工艺，以适应普及的需要。但为了重视古代雕版文化的高度成就，检验今天印刷技术达到的高度，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应该毫无顾虑地创造前所未有的优秀成果，印出哪怕是少量的但高水平的具有民族风格的豪华本来。这是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前人辛勤创造了那许多惊人的雕版印刷精品，在我们面前树立了高标准，我们理应交出无愧于先行者的答卷来。

1983年8月18日

谈“全集”

书店架上除了摆着大量的单行本，也点缀着名家的文集、选集、译文集、全集……等多种名目。这里面以全集为最少见，目前好像只有《鲁迅全集》一种。不过郭沫若、茅盾的全集也都已开始编辑，并陆续出版。随之而来也听到一些议论，全集到底应该怎样编才好？的确，这是一个值得慎重考虑的问题。

真正的全集，据我想，自古以来就从来不曾有过。虽然旧书目录里间有诸如《山谷大全集》那样的名目，不但“全”，而且“大”。但同时也就暴露了这名目的可疑。既有“大全集”，不就暗示也有不够全而且大的“全集”么？还有，这又是按了什么标准区分的呢？总之，所谓全，充其量只不过显示了一种相对的完整性而已。

既然称之为“全集”，顾名思义，那么就应该把作者平生的一切言论，见诸文字和口头的意见都一一收罗在内。最好还包括了作者的“行”。蔡元培的《蔡子民先生言行录》的编辑方式是不错的，虽然那也并不是“全集”。

新版的《鲁迅全集》在作品之外又尽可能收入了完整的日记与书简，这方法是好的。但严格说来还算不得“全集”。先生大量的译作，整理、辑集、校定的古籍，收集的汉画像、古砖，辑印的中外版画……就都因实际困难没有一一收入。缺少了这些，读者就难以见到先生的“全”。作为“全集”，也就多少失去了依据。

认为只有创作，才是应该收入“全集”的唯一内容，看来不能说是全面的。

40年代后期，巴金曾经打算编定他从事文学工作以来比较完整的结集，就是将译本考虑在内的，初步定名为《巴金译作集》。后来有人说“译作集”读起来有点像“遗作集”，恐怕不妥当，计划搁下来了。

上面所说的其实是很难实现的一种“高调”，而“高调”最后又十九会变为“空论”。为了切实起见，倒不如研究一下编“全集”可能遇到的主客观种种困难，也许对实际工作有些好处。

“全集”一般说有自定和代编两种。人们大抵重视自定的“全集”，因为它可靠，没有误收的伪作，也反映了作者晚年最后形成的见解。这当然是不错的。不过照上面所说对“全集”的要求加以衡量，却并不尽合理想。白居易的诗集是他自己定稿的，一式抄写了好几份，分藏在几座庙里。（我怀疑乾隆皇帝将“四库全书”分抄几份藏在全国各地的几座“阁”里，就是从这里受到的启发。）因此流传至今的白氏《长庆集》是比较完整的。但到底经过了作者的修改、删定，显示的是白居易晚年定型的思想。如果想研究他前期中期的思想变化，就得格外小心，应该设法搜求他的朋友、同辈的诗文和史料、笔记仔细比勘，才有可能明白较近事实的真相。凡是自定的“全集”，都多少存在着这方面的问题。有的作者把“身后名”看得很重，不是企图以道德家面目永存，就是想以文章家资格传世。这些私心杂念都会影响原始真实面貌的保持。朱彝尊晚年编定全集，不因贪吃冷猪肉而删去二百韵的《风怀》情诗，曾使许多人佩服；但他到底还是删去了不少旧作。有的作品因不够成熟或显得平庸而被删，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有些不坏的作品却因另外的原因删去了，如他在中年自刻的《腾笑集》中的一些诗篇。“腾笑”是朱彝尊自嘲的话，表示了他改变政治立场后的复杂心情。他在晚年删去了这些带

有自我批判气味的作品，还砍去了与牵入政治案件的许多友人的关系之作。证明手定的《曝书亭全集》其实是并不“全”的。想研究朱彝尊，想知人论世，只靠这样一部“全集”是不够的。

同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李慈铭的《日记》手稿上面，被他用墨涂掉了许多，有时几乎是整页的涂，这并非一般的文字修饰，或对学术观点的修正，几乎都是丑诋别人的话。从删而未净的语句的恶毒，可以推想那些涂掉的字句都是怎样的东西，大约是连他自己也觉得不像话了的。

作者自订全集，当然有他自己的自由。或严或宽，各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标准，也都应该受到尊重。不过一旦白纸黑字写成文字，作品即成为客观存在；若已流传，就又产生了社会影响。作者可以“悔其少作”，表示自己后来的态度，但应负的责任总是推卸不掉的。在历史学家和文学史家看来，资料的收集当然以尽可能的完整、真实为第一要义。如作者已经逝世，无法对身后旁人的辑逸……工作表示任何意见，当然不成问题，作者如还健在，那就可能发生种种麻烦。有的作者是深悔其少作的，非常希望若能侥幸逃过“摸金校尉”之类人物的翻尸倒骨，就是如天之福了。可惜近来文学史家中的考证流派逐渐兴旺发达，各种旧期刊、旧报纸、罕见的书本也都一一复印行世。此外还有不少奇异的渠道，例如在档案袋中有时就藏着珍贵的文学史的材料。……真是使人寝食不安。我有时确也对此深表同情。“文化大革命”中抄家风起云涌之际，我就见过弄堂里一位老太太被勒令穿起她几十年前的旧旗袍、高跟鞋、涂起口红来上台示众。这些东西都是从她家的箱底里翻出来的，也确是她当年用过的衣饰，完全是历史的真实，赖也赖不掉。但同样真实的是，她已有好几十年没有这样打扮了。怪只怪她因懒或舍不得，没有及早处理掉这些“四旧”的遗迹。大约许多人都从这类“革命行动”中吸取了“教训”，大家不约而同地一起烧起书来，还有字画、古董，……一切看来不妥的东西，这真是一场浩劫，是水火兵虫之外更厉害的一场浩劫。

被“发掘”出自己的“少作”的作家的心情，大约和那位被“勒令”穿起旗袍示众的老太太有点相似，着实值得同情。作品又不比旗袍，只有几件、十几、几十件，而且又流散到天涯海角了，想销毁也办不到，真是命该如此。古往今来的作家，有许多都曾有这种苦恼。有些作家而兼宰相以至皇帝的大人物也曾动用过政治力量与影响销毁已不合时宜的旧作，成绩也不理想。韦庄费了许多力气想从文学史上抹掉自己的早期名作《秦妇吟》，不料一千多年后还是从敦煌石室里被发现了，还不只一种抄本；雍正帝下令销毁御制的《大义觉迷录》，二百年后也在琉璃厂的破书堆里发现了。只不过便宜了书店掌柜，卖得了好价钱。

这一切都说明了一个事实，用笔写下来的东西，是砍不掉的，只能老老实实地承认，世上如真有热心好事之徒，具有曹操发明并设置的“摸金校尉”那样的能力与品德，从什么地方发现了自己的“少作”，最好还是抱欢迎、合作态度。在鉴别真伪、说明背景、阐释作意……等方面加以协助。当然也有权表示对这些“少作”的处理意见，而这是完全应该受到尊重的。我想在这方面为我们作出了极好榜样的还只有鲁迅先生。他的态度、意见就非常明确的写在《集外集》的序言里。

我这样说，只是表示自己对鲁迅先生意见的完全赞同，并无怂恿作家们都来编印“集外集”的意思。理所当然，有资格、有必要编“集外集”的作家，除了鲁迅之外，并不是很多，这是必须遵循实事求是的精神来对待的。

近年来海外有些研究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的学人，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积累了不少珍贵的资料，提出了一些有分量的研究课题，这都是值得感谢与佩服的。流风所被，也给国内的研究工作以刺激、推动，这也是好现象。只是有一节，海外学人那种“为文学而文学”的、猎奇搜秘的、乾嘉学派式的繁琐考证学风也传了进来，并在某些方面得到了表现。这就使人看了有时感到老大的不舒服。例如一些已经谢世的著名作家，他们的遗稿、逸事都有人在着意搜求，并陆续发表、成书。这工作自然是可取的，也是为读者所欢迎的。不过有时泛滥无归，连私塾窗课和早年幼稚的艳诗那样的物事也拿来发表、出版，就不免有些奇怪。我是懂得这类物事的价值的，也主张应予大力搜集、妥善保存。但它们应该被安放在文学资料馆里，而不是印成几千万册，放在新华书店架上。凡事不可一刀切，万一真的发现了鲁迅当年在三味书屋里的窗课，或在江南水师学堂里做的《云从龙凤从虎论》，那自然应该区别对待，收入《集外集拾遗》中去。

还是鲁迅说过的话，文人或作家，“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身后的一切就只有听人摆布了，这实在是一种很大的悲剧。这中间，孝子贤孙以及各式各样的“无聊之徒”的代为编刻全集有时就会成为极重大的不幸，鲁迅真的也有自知之明和预见，他自己在十多年前就曾被各色人等牵出来戴上时髦的纸冠，披上异样的服饰，串演了不少活报闹剧，这一大笔宝贵经验到今天还不曾很好地结算过。但要使工作取得决定性的改观与进步，首先要紧的还是对旧经验的总结，也就是说在付了昂贵的学费以后要翻翻成绩报告单。

鲁迅是幸运的。他的全部著译除了一二小篇都已在生前手定出版；他又在编《集外集》时明确表明了对自己著作的态度。由旁人编定全集时就不会发生什么困难。收集的逸文也都是手稿或剪报，只有少数使用少见笔名的文字出现过争论，也无关大局。这就使他作为一个作者能够立于不败之地。无论旁人怎样出于好心或恶意给以梳妆打扮，都不必担心。铅华洗尽见真醇，鲁迅还是鲁迅。人们对鲁迅是非常尊重的，虽然没有谁说过鲁迅的话“句句是真理”，但也没有谁敢从他的“全集”中删去任何篇目。连“四人帮”也不敢。只偷偷地抽去过一些书简。这自然是由于先生的崇高威望。其实这也是人人应该遵守的公正对待任何作者的正常态度。不过实行起来是很不容易的。

在作者身后为之编定全集的大抵总是与作者有亲近关系的人，如朋友、子孙、崇拜者。为论敌出版全集在过去是很少的，人们还没有发现“反面教材”的利用价值，常用的手段不过是烧和禁。自从乾隆皇帝编定“四库全书”，在手法上才有了突破，但也只是偷偷摸摸的搞一些小动作。整个衡量起来，其作用就远不及孝子贤孙、诸亲好友作出的“蠢事”效果的显著。我以为，在这里“蠢事”这个词用得是恰当的。一般说来，只有好心办出的坏事才能称之为“蠢事”，即使有时事情办得已经近于可恶，但也只好依旧称之为“蠢事”。这中间是有一条不容混淆的界限的。

我买到过许自昌的几本诗集，这是“借茶”“活捉”（《水浒传》）作者的诗集，流传很少，连《千顷堂书目》里都没有著录。这本书是从甫里（苏州用直）许家流散出来的，是万历原刻。卷中有作者和他的儿子、孙子、重孙（许自昌、许元方、许虬、许心宸）四代藏印，可见是许氏世守之书。许自昌的诗作得并不怎样高明，几乎湮灭不传也是无怪的。但在他的子孙们看

来，却不是这样，一定要重刻“全集”。在重刻之前就得重行编定，于是这两种诗集《咏情草》和《卧云稿》中就布满了朱笔墨笔圈点删改的痕迹。不但删改，而且还随处留下了记事，看来还是在北上起早骡车中所改。修改有许元方、许虬的笔迹，也有不知谁何的笔墨。改笔大不高明，有时反而越改越坏。有些改动是可以明白那用意的。如“若还识得妾心愁，犹胜沙场战胡虏”句，“战胡虏”被改成了“建旗鼓”；“郎征胡虏为封侯”句的“胡虏”改为“辽海”（俱见《咏情草·寄征衣》篇），这是清初犯忌的字眼，为太平计，是非改不可的。但“辽海”也并非怎样稳当。改来改去也不过是换汤不换药，难怪重孙许心宸就在书眉上跋道：“此册墨笔未知谁手，俱非先子（虬）书，改句未妥。丙申（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七月十六日申时附识。紫逊弟同阅片顷。丹丞。”

从书前书后的许多题跋中可以看出，许自昌的子孙是很宝贵先人的遗稿的，保藏了一百多年，还打算重刻“全集”，但却辛辛苦苦作出了这许多蠢事，不过后来终于未能刻成，只留下了这原本，保存了许自昌的本来面目。他的诗作得并不高明，写的多半是醉生梦死的生活，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也是严重的。但他在饮酒拍曲之余，心里也还记挂着东北的“边事”，这一点很清楚。也许是当时“诗人”的时髦题材，也说不定。这岂不是无论哪一派的文学都无法完全脱离政治的一个好例么？如这诗集经孝子贤孙删改之后付之重刻，那么后来的读者就连这一点也将看不到了。

这种大刀阔斧地修改前人旧稿的风气，在明末大抵十分流行。这种作风的形成又与当时选家势力的膨胀有关。晚明资本主义萌芽在出版业的表现形式是书坊林立，执“选政”的编辑大量出现。他们不但选刻时文，还编刻大量的通俗书籍，畅销的经史基本读物。杂凑丛书，代刻文集，业务兴盛得很。许多旧书在改头换面之后就化为崭新的“著作”。明代初期雕版家笃守原书，翻刻旧版的严谨作风遭到了很大的破坏。这风气一直沿续了下来，直到清初朴学学风兴起才开始得到扭转。

生活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沈德潜曾是红极一时的选家，他的《唐诗别裁集》等选好以后先送呈御览，目的无非是借皇帝老馆的声势树立自己的权威，虽然经历了一些波折，到底如愿以偿，将御制序刻在《唐诗别裁集》的卷首，四周围起龙纹花边，朱红套印，以别于墨印的正文。这种宣传手段是有点用处的，有效期竟一直维持到不久以前。《别裁集》的真价只能由文学批评家来评说，我在这里想指出的只是沈德潜一种极坏的恶习，就是像三家村塾师那样喜欢篡改古人的作品，而且并不声明，连金圣叹使用过的抬出“古本”来的手脚都免去了。可谓鲁莽霸道之至。如有空闲，找出入选的原作，一一对校，那是会找出全部罪证来的。为简便起见，姑举二例。

《含翠轩诗钞》，长洲陈叶筠撰，康熙王闻远刻本。原书书眉有旧人墨笔注，卷二《张睢阳庙》诗上注云，“此首归愚尚书选入《国朝别裁集》，后半首经其点窜。”原诗下半“遗像毗还裂，英雄气尚嗔，惊飙何处起，犹似扫黄尘”。四句被沈德潜改了三句，变为“卞壶拳还握，苋弘血尚新，灵旗风卷处，……”不论原作或改笔，我都看不出有什么好处，实在没有什么金铁之分。另一首入选的《寄许子逊》，原作的起句“一别经年尺素虚”，被改为“不见南来双鲤鱼”；“春来何处堪凭吊”，“来”改为“深”。这真是好恶随心，信笔点窜，恰如老夫子批改学生的课卷。选家而有这样的专断权力，是使人吃惊的。

沈德潜对古今诗人，都看作自己的“诗弟子”，就连他自己的祖父也不曾放免。《明诗别裁集》卷十一收沈钦圻诗五首，但小传下识语却说，“兹录感时伤事六章”，不知何故（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沈钦圻字得舆，诗集名《晤书堂诗稿》，乾隆中沈德潜刻本。前有陆世廉序，后附沈德潜撰《先祖行述》。集甚少见，三十多年前我偶然买到朱鹤龄的《愚庵小集》，这诗稿就附订在第四本后面。后被掠去，好不容易最近才找了回来，使我有可能与《明诗别裁集》对照，举出沈德潜删改的实例。

沈钦圻的诗写得不坏。有感情、有文采、有史实。但沈德潜所选的并非集中代表之作。五首之中，也点窜了三处。《书事》诗尾联“唐家灵武业，望断素冠人。”“冠”改“衣”。这是因改字面，同时也抽换了原意的。《咏史》诗指斥南明弘光小朝廷的乌烟瘴气。第二首颈联云“殿上黄幡绰，宫中郭顺时”，被沈德潜改为“乐奏李天下，歌传郭顺时”了。

汤大奎《炙砚琐谈》卷中一节：

太仓崔不雕（华）诗，‘丹枫江冷人初去，黄叶声多酒不辞’，人目为‘崔黄叶’。沈归愚以丹枫黄叶，不无合掌，易‘丹枫’为‘白苹’。归愚好擅改名作，往往点金成铁。此却大胜。然亦有来处。明鄱阳董士昂（轩）太宰句云，‘黄菊清香人病后，白苹风冷雁来初’。二诗风味何相似也。

汤大奎指出了沈德潜的恶劣作风，可见这已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公开秘密。又指出沈的点窜原则，不过是“合掌”之类的老教条，也就是只求字面好看，事实全可不顾。至于字面到底是否真的能改得好看，实在也危险得很。奇怪的是汤大奎说沈德潜也有改得“大胜”的时候，还找出了那“来处”，似乎颇有点比较文学研究的味道。不过我以为这正是谬论。脱离实际，脱离作者原来的真实感情，只求字面上好看，不惜作伪。这正是一种恶劣的倾向。将古今一切诗人，包括自己祖父在内的作品，一并看作小学生的作业，放手点窜，毫不脸红，还把改头换面后的赝品充做原作，推荐给普天下看官。这种作风，放在今天，是应该吃官司的，实在已脱离文学批评的限度很远了。

由别人来编“全集”或选本，发生沈德潜这种事故的例子是很少的。但也还是逃不出“为尊者讳，为亲者讳”这一条大原则。出于种种不同动机，人们总希望先人或名人脸上有光，这也可以称之为一种“好心”吧。但效果却往往适得其反。混淆了是非，塞进了假货，佛头着粪，弄巧成拙，在汗牛充栋的旧书中，这种例子多的是。说来说去还是吃了不老实的亏，只因缺少起码的实事求是精神。这种惨痛的教训值得我们牢记不忘，在今天编“全集”时也不宜忽视。

1983年9月16日

书的梦

北京琉璃厂每年春节的厂甸书市是有名的。可惜我没有赶上过。从前人对厂甸的记述来看，这实在是知识分子最喜欢流连的去处。钱玄同刘半农诸人差不多每年都排日往游，他们所照顾的也只是路边的书摊。教授们并不是买不起好书，为什么只对书摊有浓厚的兴趣，这是很有意思的事。在书店掌柜的看来，店里积压的普通书、残书、丛书零本只有趁每年一次的厂甸才有出清存货的机会。可是在读者看来。这中间不免会有漏网的好书，可以用便宜的价钱买到，这是一种有趣的知识竞赛，是比眼力的好地方。钱玄同就在书摊上买到过鲁迅刻的《会稽郡故书杂集》，不只是今天，就在当时，这也是珍贵的善本了，因为书刻成后只印了一百本，而书板也早已毁掉。又如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的长沙最后刻成定本，也是罕见而有很高版本价值的。这类几十年前刻的短书小册在掌柜的看来自然都是无足轻重的东西，因而得为“扒螺蛳船”的于无意中得到，带来不少愉快。要说厂甸吸引人的特点在此，也许不是无稽之谈。

要说厂甸是中国传统书市的先河也不能算错，那区别只在于卖的全是线装旧书，而今天的书市推出的则是新书而已。新书市的吸引力在于品种繁多，读者有可能在这里发现久求不得的书籍。这正好从反面衬托出许多书店的萧条枯寂。逛书店是一种“嗜好”，是会成癮的。前些年每天午饭后总要利用午休时间和朋友去兜一个大圈子，跑遍邻近的几家书店，几乎每天都能带回几册新书，觉得是无上的快事。这确是一种“癮”，很难戒除。幸还是不幸呢？这种积年旧癮近来竟自戒绝了。附近有一家新华书店，过去也是常去看看的。不知如何，近来经营方式大大改变了，除了卖玩具和幼儿读物外，文艺柜里只有五颜六色的编译流行读物和武侠小说，社科部分则只有当代名人传记和研究交际和发财门径的著作。人民文学、中华、三联等社的出版物很久以来就销声匿迹了。从踏进去到走出来通共花不了三分钟。去了十次也不一定买成一册新书，因此过门不入就成为当然的事，逛书店的“癮”也因之而戒除，这也许是“有一弊必有一利”吧。

不逛书店是不是算得上一“利”呢？如从经济负担上着眼，可以说是的。虽然久不买书，书目录有时也还看看。今天收到一张古籍新书目，看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的预告，估价是二百九十五元，不禁吃了一惊。过去因为买旧书，诸家藏目与图书馆目录、藏书志等都是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多年搜集得大致完备，有四五十种了。这《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是最新最完整的集大成的专著，自然是不能不买的。前年“经部”出版时，发了一下狠买下了。这种将近百元的大书过去还不曾买过。这次“史部”就要三百元，还不必说更为繁重的“集部”，预计全书总得要一千元才行。如靠投稿所得来买书，只此一部书目就得净写作五万字，这可是个大工程。不能不望而却步了。书价飞涨，几块钱一部的货色已经不大了，少少有些份量（这里指的只是厚度）的动辄十多元、几十元，买书已经成为“超前消费”，这真是过去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

因为住处逼窄，书只能胡乱堆放或包起来置之高阁。这就带来了一种意外的烦恼，记不起什么书放在什么地方，有时为了找一册书要登高爬梯，翻尽了几十百册终于失望的时候也不是没有。找书成为一种繁重的体力劳动，这也是过去想不到的。那么，不再任性多买新书，不再增加书的数量与乱的

程度，也不能不算是一“利”。这是我近来悟出的一点“心得”。虽然颇近于“酸葡萄论”也顾不得了。

1990年10月1日

翻旧书

最近在一个座谈会上，听到一种意见。那大意是说，长久以来，我们过于重视鲁迅的后期杂文而忽略了他前期的作品，现在是应该引起注意的时候了。不禁吃了一惊，觉得这正说着了自己读书的毛病。说鲁迅后期的杂文，因为学会了马克思主义，所以作品就更全面，更深刻云云，几乎已经成了“定论”。至于前期，是信奉着进化论的，思想境界就不那么高，对这一论点，我一直就有着怀疑。说一个作者前期与后期思想上有变化是不足怪的，但硬要一刀斩断，好像到了某一阶段，就显示出前后截然不同似的，则不免是梦话。正如抽刀断水水更流一般，这一刀不免是无效的一挥了。

因为这缘故，于是就又取出了全集的第三卷来，这一册中收入的是《华盖集》及其《续编》，这正是作者和章士钊及“正人君子”们斗争时的作品。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作者对该史所发出的感叹。他说：“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逝，独与我们中国无关。”这是劝人读史的，就在差不多同时，周作人也写过“闭户读书论”，表示了差不多相同的意见。那重要的差别是，周作人揭出的是暗黑的宿命论，认为世事一无可为了；而鲁迅则不然，他说“幸而谁也不敢十分决定说：国民性是决不会改变的。在这‘不可知’中，虽可有破例——即其情形为从来所未有——的灭亡的恐怖，也可以有破例的复生的希望，这或者可作改革者的一点慰藉吧。”（《忽然想到》）。可以看出同样的前提得出的是怎样不同的结论。关于改革者，鲁迅又说过这样的话，他在介绍《工人绥惠略夫》这本小说时说：“岂但那时，譬如其中的改革者的被迫，代表的吃苦，便是现在——便是将来，便是几十年以后，我想，还要有许多改革者的境遇和他想像的。”（《记谈话》）。这里所说的也仍然是读史，小说也是史。作者的眼光远注于若干年后，仿佛预见到不同时期改革者的艰辛，但他仍未泯灭了希望。他指出“如果历史家的话不是诳话，则世界上的事物可远没有因为黑暗而长存的先例”。“然而将来是永远要有的，并且总要光明起来”。（《记谈话》）鲁迅前期的遗文，就这样给此后的改革者以如此炽烈的鼓舞与激励，直到今天也还虎虎有生气，先生的遗教，并不曾过时，而是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不是明明白白的么。

《鲁迅全集》第三卷中收有有关三一八惨案的几篇文章，如《纪念刘和珍君》，那真是饱蘸了血泪写成的。段祺瑞们的军阀政府的暴行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作为历史，只要先生的文字不灭，总还会给人们留下难忘的记忆与教训的罢。摘抄太费篇幅，我只想引用短短的几句话，鲁迅说，“请愿的事，我一向就不以为然的”。（《空谈》）又说，“我以为倘要锻炼群众领袖的错处，只有两点：一是还以请愿为有用；二是将对手看得太好了”。如果反其意而论之，则是学生的请愿，还是相信政府的表现，这是不能漠然视之的。当然，段祺瑞们是不足以语此的，所以才说这是一种判断上的错误。

1989年5月2日

访书

多年来，苏州对我的最大吸引力是书。访书在苏州，比起北京的琉璃厂，杭州的留下，南京的状元境……味道完全不同。

整整三十年前，也是这样的秋天，鲃肺汤上市的时候，我陪了叶圣陶、郑西谛、吴辰伯到苏州去旅行。在车站上遇到周予同，他是从上海到苏州社会教育学院去上课的。一把拖住他们到学校去演讲，没有谁肯去，事实上当时他们谁都不能公开露面。郑西谛就要我去讲，我当然不会去，因为，我连一些在学院说话的资格都没有。西谛还是不住地说，他真的不是在说笑话，正经得很，还说我是“三人行中最少年”。这事还恍如目前，而西谛的墓前如果种了白杨的话，怕真的也“堪作柱”了。

记得那天晚上在酒楼上夜饭，三个人都能喝，结果是虽未沉沉大醉，也相差不远。从酒楼出来时，观前一带早已上灯。西谛却吵着要去访书。先到玄妙观，在一家书店里看书，我花了一块钱买了一部康熙刻本的《骆临海集》送给了辰伯，因为他是义乌人，与骆宾王是同乡。从玄妙观出来后又到护龙街上去访书，书店都早已上了门板。西谛就擂鼓似的敲门，终于敲开了。书店的主人是认识他的，就热诚招待。记得店里刚收得许博明家的一大批藏书，善本不少。特别是整整一架地方志，几乎都是康熙以前的清初刻本，西谛大声连赞“好书”。其实我知道，他不久就要到香港转往解放区，不想买，也没有余钱买书的。不过他还是告诉我，“这些书是非买不可的，机会不能放过！”好像我是百万富翁似的。这情景也还如在目前。

从这家书店出来时，大约已是八九点钟了。给秋夜的微风一吹，大家也多少清醒了一些，算算护龙街上的旧书店，至少还有十多家，怕是不能遍访了。正是：“酒已都醒，如何销夜永？”西谛还是不肯回到宿舍去，终于想出主意，要去看汪义庄里戈裕良手叠的假山。记得也是在护龙街上，钻进了一条狭狭的小弄，在昏暗中看见一座假山。自然是什么都没有看清楚，而且后来知道，这实在也并不是汪义庄。

这次访书的经过，想来虽然有些可笑，但确是十分美好的回忆。

那以后，我就时常到苏州来，每次总要有半天到一天的时间花费在书店里。当时的护龙街与玄妙观，真是书的海。不只是书店，连马路两边也摆着摊，连地上也都是的。相熟以后，还会被书店主人邀请到楼上去看他所藏的“秘本”，残书。这在我都是最大的乐趣。如果将所见、所闻、所得记下来，我看是不会输于我的同乡先辈李南涧的《琉璃厂访书记》的。

不过这种“盛况”没有维持好久，苏州的书市逐渐消歇了，到江青伙同林彪抛出那个《座谈纪要》以后，整整十年，苏州市上就再也不能看到一册线装书，这中间又出现了另一种传说、神话似的故事。总的说来，恰如一场伟大的魔术吧。现在那谜底也逐步揭开了。如果记下来，其奇诡、悲壮就更非李南涧所能梦见。

自然，那些熟习的书店经营者，也一个都不再露面，久违了。

这回，当我从怡园出来，漫步走进对面的古籍书店里去时，却十分意外地被几位店员叫住了。真的是意外，十年不见，彼此都还“无恙”。于是被让进内间，泡了茶。坐下来谈天。这两位老朋友，是最近才从江苏北部的农村里调回来，归了队的。在过去的十年里，线装书是被视为典型的“四旧”的，那从事收集、流传线装书的人又该是什么呢？这是不言而喻的。他们的

命运就不必说了。

现在终于“无恙”地回来了，那就好。我就问问他们最近的业务，曾经收到过什么好书？对旧本书在民间流散情况的估计，今后如何开展保护、征集的工作等等。问题有一大堆，而且并不都是愉快的故事。我不想写什么调查报告，因此在这里就略之。

好书，是日见其少了。近年来他们所收的可以看看的善本，说来说去也不过十种左右。就选抄两种名目在这里。嘉靖刻的贾谊《新书》，冯班校宋本；毛斧季的抄本《翦绡集》和《梅花衲》；归昌世的稿本《假庵杂著》，是记苏州掌故的；黄丕烈跋的明抄本《野客丛书》……

我又被让到楼上的书库里去看书，这真是好久没有过的快事。虽然看起来不免使人失望。书的质量是远远不能和过去相比了。现在摆在架子上的，过去大抵是放在地上的东西，甚至还不及。为了“不虚此行”，积习难改，我还是花了四角钱买了一册光绪十七年金陵刻本的《煮药漫抄》，书是薄薄的一本，只二卷，是诗话之类的东西。作者则是嘉兴叶炜（松石）。他是在同治甲戌（1874）应日本文部省之聘，到东京的外国语学校担任汉文教师的，那是日本的明治七年。叶松石在光绪六年又重游大阪。此书则是病中所记。前面有日本湖山老人小野愿的序文（明治十五年）。

买到这本小书，我是非常高兴的。不只因为这是隔了十多年以后，重新阅读得到的第一本旧书；更为了这是一百零四年前，在中国还没有派遣公使时就到日本去进行文化交流的前辈的作品。在敬爱的邓副主席访日的时候，得到此书，实在是极为使人高兴的事。

1978年11月4日

西泠访书记

1957年4月中旬,我到杭州游览,曾访问过坐落在里西湖的浙江图书馆。这里是清乾隆中所建的七阁之一——文澜阁的旧址,是著名的江南藏书胜地,那抄写了七部之多的“四库全书”复本之一,遵照“十全老人”的意愿,就藏在这里。杭州是江南文风兴盛之区,大批的读书人都到这里来借抄、借读经过删削、改造、加工的钦定典籍,颇发生了一些影响。这无疑是清代文化统制政策取得的一个不小的成功。后来经过太平天国的战争,这里的“四库全书”损失了一部分,也流失了一些。地方上一些有钱的读书人就又来辛辛苦苦地补抄,后来不知道终于补全了没有。不过那时的人力物力到底远远不及“乾隆盛世”,补抄本无论纸墨、抄工、装潢比起原本来是天差地远了。

在过去,浙江图书馆在全国公私藏书家中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地方性图书馆。解放以后,浙东故家藏书大量流出,一些地方上的藏书家的藏书也先后聚集在这里。它的收藏丰富起来了。1957年我访问时,曾经被接待到楼上看了一些旧本,还带回了两部新印成的“特藏书目”。细细检阅,发现新入藏的书籍中间,其实也并无值得注意的宋元旧板,精华所在倒是一些明清以来的浙人著作的刻本、抄本和稿本。这中间颇有未之前见的秘书,而这恰恰是全国性的重点图书馆无法相比的特色。当时曾摘记了一些名目,想什么时候再到杭州来借读。可是“人事粟六”,一眨眼二十年,没有机会再到湖上,而且后来这愿望好像也成为一种荒唐的梦了。

当时我所希望借读的群书之一是“明季刻本、抹云楼旧藏”的柳隐如是撰的《戊寅草》一卷一册。这是一册异书。关于柳如是这个人物,我很早以前就发生了研究的兴趣。曾经搜罗了她的《湖上草》和《尺牋》的旧抄本,她的《事辑》,还有附在钱谦益文集和清初诗词总集中的她的作品,此外就是大量散见于清初文集、野史、笔记中有关她的记述。可惜的是,一直没有看到明末原刻的她的诗集。我只在王闾远的《孝慈堂书目》中看到过著录,还注明“棉纸”印本,可证是明末原刻无疑。此外,在马叙伦的《读书续记》卷六中看到一段详细的记载。那是高欣木旧藏的《柳如是尺牋一卷、湖上草一卷》,一共二十四页,不只是原刊,还有林云凤的题诗,许多名人题跋、印记,和王国维的三首题句。据马夷初说,这书曾经张元济与高野侯“竞购”,最后高以五十银元买得。这在当时,应该说是相当可观的高价了。这书后来不知流落何许。现在见于浙馆书目中的《戊寅草》,是怎样的书呢?可能就是《湖上草》的改题重刻之本,也可能是另一种未之前知的诗集。戊寅是崇祯十一年(1638),正是如是下嫁钱牧斋之前活跃于湖上的时候。

为了一决此疑,1962年曾托到过湖上的陈凡代为探询此书,后来还承他亲笔抄了一卷副本见赠。可惜他所见的并非《戊寅草》。而是张宗祥手抄的《湖上草》,一些都没有与通行本不同的地方。

这次在睽隔了十多年以后重游杭州,特别是看到陈寅恪教授《钱柳因缘考证》的序言以后,心里一直记挂着这书,终于在一个春晨又来到了文澜阁的旧地。庭院依然,只是更增添了一些萧寂。一般的游人是不会到这里来的。走进去看,那楼房,楼梯,还有管理图书的人员,好像与过去都没有什么变化,到处都充满了一种古意。我说明了来意,还取出了一位过去浙江文化界领导人的介绍信,并出示了工作证。不过这一切都没有什么用。那位老同志是二十年前担任过领导职务的,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故将军”。要看“善本”

书，这些都无用。还得向领导机关申请，得到批准才行。

后来经我说明住在上海，来一次杭州不容易，可否给予通融，这才打了电话，向领导机关请示。最后的指示是必须指定一位馆员在旁监视，才能阅读。这使我异常高兴了，监视就监视吧，这又有什么关系。我被安置在会客室里等待管理员登楼取书。大约过了半小时，我得到了答复，“找不到”。原因是专门负责善本的同志下乡调查善本去了，原有的善本因为编目的原因被打乱了，这里没有人能摸得清。“什么时候熟习善本的同志才能回来呢？”答曰，起码半年。要想快，就只有申请、批准，打电报叫回来。

这时，我终于最后地断念了。我既非长官，又非学者，想看一本旧书也算不上什么“要公”。打电报调人，这样的提议是真的使我吃了一惊的。

这就是过了二十多年，几经努力，终于还是看不成一本小册子的始末。

走出图书馆，坐在湖滨的石凳上，面对春光明艳的西子湖，不禁想起了许多事情。

多年以来，我对跑图书馆一直缺乏勇气，尤其是去看善本书。在旧社会，只有专家学者如胡适之之流才有看善本的幸福，不必说了。解放以后，情况大大改变，但善本书的神秘性却又增添了新的成分。为了保藏善本所制定的新办法也更完备而丰富了。在阅读国家藏书的权利上，如陈伯达和那个“理论权威”以及十年来崛起的林彪、“四人帮”写作班子的大小头目……，简直形成了一个新的“特权阶层”。他们不但可以无视一切规章制度，任意取阅藏书；甚至还发展到了动用国家力量任意劫掠公私藏书，任意迫害读书、藏书人的地步。

在“四人帮”覆灭前夕，私人藏书已经成为一种“罪恶”的、罕见的现象。连新华书店也开设了租书部，这就说明了个人买书一事已经不合时宜，甚至连新华书店本身的存在似乎也发生了疑问。这大抵也是张春桥念念不忘要加以消灭的“资产阶级权利”的一个方面吧。在这种情况下，有谁还想到“善本”呢？就是在梦里也难。

善本书是国家的瑰宝（在日本是叫做“文化财”的），应该尽最大的努力加以保护，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它也不单纯只是一种“宝贝”，只要锁在保险箱里就好了；还得想到利用，使之为人民作出更大的贡献。粉碎了“四人帮”以后，大家知道重视书籍了，这是非常好的现象。但办法却不多，看来唯一的措施就是锁在什么妥当的地方。说“妥当”好像也不尽然，有些胡乱堆了十多年的书库，据说就已经发了霉，不可救药了。林彪、“四人帮”非法劫掠来的书物，发还的积极性也不高。与其还给原主去研究利用，好像总不及锁在图书馆这样的地方来得稳妥。理由么，有好多条，而且都十分堂皇，可惜的是都和实际有不短的距离。

保护善本，古今中外都有一套办法的。为了满足查找资料的需要，像显微胶片那样的设备，是若干年前就已经在使用了。为了其他的理由，必须接触原物时，就要另有一些严格的规定。怎样读书，其实也是衡量文化水平高低的一种尺度。记得孙从添在《藏书纪要》里就有着详细的说明。最常见的一种必然避免的手法，是用右指给舌头一舔，然后去掀那书页。古书用纸以棉料、竹料为多，哪里禁得这样的掀弄呢？好像这在过去还是颇为通行的办法，相传《金瓶梅》的“作者”，就将书页下角浸了毒药，送给严东楼，当他用那种手法读得津津有味时，就不觉地中了毒。可见即使是大官，看书时也往往采用此法。此外，如用指甲去划开书面，翻动书页，也是要不得的。

一切书，不只是善本，都受不了这样的待遇。诸如此类，必须订定一种规程，即使有些繁琐，也还是省不得。

现在全国的图书馆都在进行善本编目的工作，这是完全必要、亟应完成的。不过也不可忘记同时还有其他方面的工作要作。为了编目，连书都找不到了，事实上等于关门。这可不是好办法。

好像这也不只是图书馆里才存在的独特现象。最近报上在讨论传统剧目的推陈出新，有人就主张当前最重要的是“总结”，然后再来“选择”、“改革”、“提高”，最后才是为人民提供醇正无疵的优秀剧目。这是不能不称之为高论的。依了它，戏院就得先行关门，等待这个伟大的过程的完成。这和图书馆的有些情况有些类似，但也有不同。善本书睡在那里，只要不火烧、水湿、霉蒸……，什么时候打开门来都不成问题。传统剧目则不然，它们多半活在一些仅存的老艺人身上，现在就来抢救还嫌有些晚了，哪里等得到那伟大的“总结……”过程的完成。老艺人还会有多少活下来；即使没有死光，还有多少能工作呢？

这样的高论，其终极目的不过是取消而已。希望在对待善本书的问题上，不出现这样的倾向。

1979年7月13日

姑苏访书记

最近应朋友之约到苏州去住了两天。苏州过去我是常去的，照我旧有的经验，苏州的可爱，第一是那儿的旧书多，每次去都能看到一些别致的书，偶然也能得到几种。其次是那儿的饮食好，可以吃到价廉物美的小吃。如元大昌酒店里各种下酒的零吃、包子和面。至于园林之美倒还在其次。荏苒若干年，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上面所说的两种特色基本上已不存在了。

住在大井巷，出门走上大街不远就是怡园，现存唯一的一家旧书店就在对面。我每次来苏州总要去坐一坐。这里有些店员还是过去的老相识，承他们的好意，每次都被让到楼上去坐一下，我也总是要求他们拿出几种书来看看。这种享受，在全国说来也是不易获得的了。记得去年，我还在这里得到过一本乾隆原刻的《冬心先生画竹题记》，总共不过十来叶，可是用的是旧纸，大字仿宋写刻，墨光如漆，前面还有一张高翔画的金农的小像，用的是雍正中刻《冬心先生诗集》前小像的旧板，不过后面的题赞却换了方辅题、杨谦写的篆书。关于冬心自刻书的纸墨之精，徐康在《前尘梦影录》里曾经讲起过。他说，这种自刻书用的是宋纸，印刷用墨取的是捣碎了的晚明清初佳墨碎块。在中国雕版印刷史上可以算得是非常突出的精制品，这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初经过百十年安定休息，经济上升，文化繁荣的面貌。《画竹题记》的用纸，是一种深黄色极厚实的竹纸，帘纹很细，还夹杂着一些未能融解的植物纤维，是一种较粗的古纸。我不敢断定这是否宋纸，但和宋代印刷佛经的用纸是相近的。去年在北京图书馆看到《冬心先生续集自序》，用的也是同样的旧纸，可见徐康的话不是没有根据的。

金冬心以画著名。不过他的文字写得也是很好的。写在画帧上面的小诗、自度曲、题记，刻在砚石后面的铭文……都有一种突出的特色。中间往往吐露了诗人画家的思想、感情。我常常感到这也应该算是一种特殊规格的杂文。金农是生活在封建社会的文士，他也只能发发那种特定的牢骚。不过时时反映了社会现实给他带来的刺激也是事实。在《画竹题记》中随便摘取一条：

比日不出。非不出也，避城狐社鼠之相窥也。既不出矣，招剡溪之人来，画老竹数竿，在大石罅。石作飞白者一，作黛黑者一。下有败棘，有恶草。不意幽林绵谷中伏处此辈也。画毕掷笔太息，自解不得。吾当搔首问青天耳。

这些话说得也够露骨的了。因为是题在竹石的画幅上面，看画的人也大抵随口称赞一句“高雅，高雅”，没有引起注意，遭到迫害，实在要算他运气。

冬心的作品曾有过多种翻刻，算不得孤本秘籍。不过能偶然得到作者自己刻印的原刻本，还是使人高兴的。除了雕版印刷史、美术工艺史上的价值以外，还有一种特殊的亲切之感。譬如《北平笺谱》，有鲁迅、西谛签名的初版本和只有编号的再版本带给读者的感受就大不同。这是往往要被人们说成是“玩物丧志”或“古董家数”的。当然，这里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国家安定，经济繁荣，才能有随之而来的绚烂文化。在这里，我是赞成“衣食足而后知荣辱”这句话的。

这次他们也取出了几种书，不过非常失望，没有什么有趣的东西，只有两本旧拓的“兰亭”，有程瑶田的题跋，是旧山楼的旧藏。闲谈中间，知道他们现在是以经营新版古籍为主的了。下面的门市部里确也陈列了大量的新书，这中间，不必说是有着不少各种版本的《三侠五义》、《七侠五义》、

《好逑传》、《捉鬼传》、《儿女英雄传》……的。这后一种，有一家书店的版本还题作《侠女奇缘》。这几种书，在全国各地的新华书店里都大量地供应着；如果不是专营“古籍”的地方，就还有各种翻译、创作的“奇案”、“女尸”、“推理小说”、惊险样式之类的作品！老实说，这种“繁荣”的景象，看了是只能使人感到单调与寂寞的，就像在沙漠上看到一丛丛仙人球、仙人掌之类的多肉植物一样。

至于线装书的货源，那确是少得多了。这自然是他们改营新书为主的基本原因。不过情况也不是绝对的，三吴一带到底还是有悠久历史的文化之乡，遗存虽已不多，但并非绝无仅有。苏州市图书馆仅有的两部宋刻书就是近年来他们收集的。附近地区请他们去收购藏书的人家也还不少，不过因为经营方向、人手……以及其他一些意想不到的原因，已经使他们长久以来放弃了这方面的业务了。

闲谈中听到了很多故事，都是不易忘记的。他们有一次在乡下发现了一屋线装旧书，已经邻于霉坏了，里面很有些善本。向县机关提出来，进行了整理。但不许由新华书店收购，当作宝贝又堆在另一间房子里。后来再去看时，许多书都残失不全了。一部孙星衍手校的明刻白皮纸《白虎通》，只剩下了两本。另外两本说是院子里的谁煮饭没有引火的东西，抽去当了柴。

多年来遇到过不少经营旧书业的人，他们都有相当丰富的经验，见识广博，记忆力很强，装了满肚子的关于旧书流转的故事和知识。我总是劝他们抽空回忆记一点下来。不过效果很小。他们不是推说文化水平不高，就是根本当作笑话来听。有许多人，如上海、北京的郭石麒、杨寿祺、孙实君、孙助廉……，他们如果肯作这个工作，是可以拿出不下于孙殿起的《贩书偶记》这样的著作来的。至少写出像李南涧的《琉璃厂书肆记》、徐康的《前尘梦影录》那样的作品是毫不困难的。可是一本也没有，这些人都已先后死去了。闲谈中我出了一个题目，苏州一隅几十年中某些藏书家，其中有些是小藏家，他们藏书的主要内容，流散始末，……现在记录一下还不是很困难的。这一类地方性的文献史料都是值得搜集保存的，全国每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都应该来作这个工作。

抢救、收集古旧书籍文献是一项重要的工作。由于历史原因，过去这工作是通过旧书行业的渠道进行的。目前，就很自然地划归新华书店系统经管。他们虽然同样要与书打交道，但业务的内容、性质是完全不同的。至少用新华书店现行的经营方针进行一刀切的管理是不妥当的。正如世医、儒医、兽医……虽然都有一个医字，却万不可误会他们干的是同一行当。望文生义在这里只能引起误会，造成损失。

在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里，有那么一些从事古旧文献搜集、整理、流通的专业工作者，是完全必要的，绝不能说是浪费。照我的粗略估计，在北京、上海、天津、苏州、杭州……，现在还在岗位上有一定鉴定水平的古旧书工作者，一起怕也不满几十个人。这真是一种岌岌可危的局面。接班人的情况好像也不乐观。不要好久，人们把家藏的宋板书送到店里，也无人能加以辨识、处理的情况必将出现。更不必说散落在全国各个角落的古典文献了。当然，宋板书送到书店里的事现在是很少了。但也不能说今后就完全没有可能。宋刻宋印的苏诗，就是由藏书者的后人送到苏州书店里的。当然，这是极罕见的情况。书店因此而得到的利润也很少，与经营《三侠五义》所得完全不能相比。不过文化事业毕竟不是一般的营利事业，这里不好用一把

唯一的尺子来加以衡量。

1981年7月15日《人民日报》的“读者来信”中发表了一封读者呼吁“从废纸堆中抢救古书画”的来信，就报告着一种触目惊心的现象。一个县的文化馆里有四千多册古书画（这句话有语病，照例画是不能论册的），管理的人员说，“这些书画是从县公安局收集来的。前段时间，县公安局的同志把古书画当废物烧掉，不知毁了多少。他们不是故意毁书画，而是不知古书画的重要”。当地另一位在法院的同志说，“这些残缺不全的东西有啥用？！我们机关里还有一堆。你若是要，到我们单位去拿”。

这事发生在湖北竹溪县。可以证明我从苏州听来的故事并不是仅见的，倒有着一定的普遍意义。公安局和法院严格说来不能算文化机关，在那里工作的同志缺少必要的文化修养也是不宜过分责难的。不过我们必须设法从速改变这种状况，则是无疑的。

1981年7月16日

西南访书记

得到一本《一氓题跋》，翻阅一过，看到有两处涉及与云南有关的著作，很感兴趣。牵连想到了1956年的西南之行和一路上访书的种种往事。时间已经过去二十五年，当时所见的一些旧书不知今天是否依旧无恙地藏藏在图书馆里。访书中也曾引起过一些零碎感想，当时没有来得及写下，似乎也还可以补记一点下来。

那次的旅行是从重庆开始的。后来到了成都，又去了昆明和大理、芒市等一些地方。每到一处总要去寻找旧书店、看看图书馆，如果是有这样的地方的话。西南一隅的古文化遗存比起江南和中原地区来相对地要少一些，特别是书籍，在过去公私藏书的目录里著录得很少，因此也显得特别名贵。例如以收藏明刻方志著名的天一阁，按早期的书目，浙江一省的省、府、县志几乎没有什么遗漏，但四川、云南、贵州、广东、广西这些省份的方志，就只各有寥寥的几种。不用说，像宋刻《临安志》、《四明志》那样的古本更是没有看见过。按照明代的规制与习惯，地方官都有纂修刻印当地方志的责任或风气。刻好以后版片就藏在衙门里。书并不发售，只是存档并送给上司或同官。如果自备纸墨，通过关系，也可以请求刷印。祁承在家书中就讲到过他托人刷印了某几省志书的事。范钦是兵部右侍郎，搜集起来自然更为方便。天一阁中的方志，绝大多数都是嘉靖一朝所刻，这也正是范钦在兵部作官的时期，有些书直到今天还没有装订过，依旧保留着印刷初毕的形态，就都是明证。顺便说一下，像这种保留着散叶或仅只用绳捻订起，或保留着明代包背装、原装的书，如非过于敝坏，是不可轻易破坏原式、重加装裱的。周叔弢先生在跋述古堂抄本《李公文集》时说：“余尝谓书之精神在纸光墨采中，非极渝敝，不可轻付装潢，况世之能手如钱半岩者又不可多得邪？”说得是极对的。有些蠢人，一书到手，不问情由，一律重新装裱，还自命为作了极大的好事，其实正是没有文化的表现。

范钦利用职务便利搜集了大量全国各地方志，自然是作了一件好事，比起同为大官却不肯作这种“蠢事”的人来说，他算得是一位了不起的文化名人。

北京图书馆编著《中国版刻图录》一书，序言和说明，多出赵万里先生手，是一部有相当学术水平、印制得也精美的图谱。我觉得其特色之一、也超越了过去的同类著作的是，开始注意到刻书的地域性。过去的版本研究，只是注意到时代前后的一面；到了王国维作《两浙古刊本考》，才开始把过去笼统地称为“浙本”、“赣本”、“建本”……的方法进一步精密化。不过他研究的还限于“古刊本”，明本就不予论列，更不必说清刻和近代的出版物了。但这只有在今天的条件下，才可能作进一步更广泛、深入的研究。想认识我国雕版印刷历史的、完整的面貌，只了解纵的历史演变是不够的，还必须作横的了解与研究。而研究明代雕版地域性的绝好素材，我以为要推方志为第一，它所提供的是可靠的资料。限于体例，《版刻图录》所收的方志不多，而在其他许多刻本地域性的推断上，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疑点。

例如张岱的《西湖梦录》，刊刻地区《图录》在说明中定为“山阴”，想来这是根据张宗子的籍贯和“凤嬉堂”的家刻样式确定的。但在原书的“凡例”（张岱的孙子张礼）中却说，“是集为从弟溱携来岭南，而韶州太守胡公见而称赏，令付剞劂，……爰授之梓人，钁以问世”。那么这书可能是粤

中刻本了。但到底还是不好下结论，这里最好还要有雕版风气、纸墨……等方面的旁证。

《图录》说明在宋刻本《春秋经传》下说，“（刻工）吴孚又补刻耿秉本《史记》。耿本《史记》刻于广德郡斋，而刻版皆出杭工，因推知此书当亦杭州地区刻本”。利用宋本书多有的刻工姓名来推证刊刻时代、地区，也是一种科学的好方法，不过这也会带来困难。杭州的工匠怎么会跑到江南东路的广德去做工的呢？所以还是把它算作了杭州地区的刻本。雕版工人当印刷业有了进一步的商业性发展时是会增加流动性的。杭州离开广德又很近，他们是完全有可能临时被招请来工作的。像这种不易明确解释的问题，到了商业性的出版事业有了更大发展的明清，就更为普遍地存在着了，我们就必须寻找更多、更有说服力的证据来加以说明。

《一氓题跋》著录了明刻丽江土知府木氏所撰诗四种，确是非常难得的佳本。1956年的冬天，我在昆明翠湖图书馆古色古香的小楼上看到从丽江木家收集来的几种木氏著作时，曾经引起了非常的激动，不只因为这是我在云南看到过的最旧的雕版书，还为它雕印之精美而惊叹。同时也感到这是边疆与中原兄弟民族中间文化往来、融合的实证，是重要的文献资料，远远超过了它本身的文学价值。这些书是：

《雪山诗选》上、中、下三卷，嘉靖写刻本。前有杨慎序，后有杨跋。序撰于嘉靖己酉。共分《雪山始音》、《隐园春兴》、《庚子稿》、《万松吟卷》、《玉湖游录》、《仙楼琼华》等六个部分。八行十六字。这是用一种黄粗皮纸印成的最初印本。《云南丛书》所收的《雪山诗选》应该就是根据了此本。卷前有赵藩的印记，估计是较早从丽江木家流出的。

《万松吟卷》，中宪大夫木公撰。嘉靖刻，九行十五字。有嘉靖癸卯杨慎序，后有同年自跋。刻印精美与前书全同，也有赵藩印。

《玉湖游录》，丽江木公恕卿著。嘉靖刻，八行十五字。有贾文元嘉靖乙巳序，张含序，后有自跋。太和李元阳批点，雕印同前。

《仙楼琼华》，丽江木公著。嘉靖刻，八行十五字。杨慎序。

《雪山始音》上、下卷，丽江木公恕卿著。张志淳序（嘉靖二年），嘉靖刻，八行十五字。这也是写刻本，但字体古拙而较小。

《隐园春兴》，雪山野人著。嘉靖刻，八行十五字。前有嘉靖元年自序，后有嘉靖六年自跋。书前有“隐园春兴班”两页，刻工古朴，文字在似可解似不可解之间，后面还有“子张子译而毕之……”的话，看来似乎原本用的是本民族的文字，是纳西族还是白族或别的什么文字，就不知道了。

《雪山庚子稿》，丽江木公著。嘉靖刻，八行十六字。李元阳序，张含志。大字写刻。

《万松吟卷》，中宪大夫木公撰。万历以后宋体字重刻本。八行十五字。前序则是原版的后印本。

《芝山云集》四卷，“丽水解脱道人木增生白父著”。崇祯刻，八行十八字。周延儒序（天启癸亥），张邦纪序，傅宗龙序。几篇序文的作者属名之前都列有长得吓人的全部官衔，卷前在作者之后写着“华亭董其昌玄宰父改阅批点；毗陵周延儒挹斋父、燕山张邦纪瑞石父参订；昆明傅宗龙括苍父校正。”这是晚明流行的刻书风气，请全国、本省的名人来参预校订。丽江虽然远在滇南，也受到了这种风气的感染，可见木氏家族这时又进一步接受了更深的汉文化。但坦率地承认诗篇曾经过董其昌的“改阅”，倒还是保存了可贵的质朴的。

《明丽江知府木氏雪山端峰文岩玉龙松鹤生白六公传》（卷上），冯时可撰。《云南木大夫生白先生忠孝记》（卷下），蔡毅中撰。崇祯刻，竹纸蓝印。崇祯十三年“敕谕”则是朱印的。这里记下了木氏的世系和木增的全部作品名目。

《云 淡墨》存卷三之六，木增辑。崇祯刻，八行十八字。这是一个残本。书前还留下了几行题记，“书得自丽江木家，不全。存三、四、五、六四本。似明末清初版。不忍留在乱纸堆中，故亦检出。祝又祥十一月十三日。（章）”

这就是我在翠湖的图书馆中看到的全部木氏家集，共十一种。这最后一种是类似读书笔记之类的东西，卷三是记花草的，所引书有丘文庄《群书抄方》、《养生诀录》、《云仙杂记》等。也抄了许多史传中因果报应的故事。卷六则是“释庄义”，是高头讲章式的读本。水平不高，但可以看出本家受到汉族文士的影响之深，他的府第里也应该有着一个相当丰富的图书馆，如果保留到今天，将是不下于天一阁的一座藏书楼。早在正德前后，木家就已经收集汉文书籍了。

按照通常的习惯，这一批木氏家集无疑是要定为明嘉靖至崇祯中云南的丽江刻本的。其中有一两种写手、刀工也确是非常古拙。不过就绝大部分刻本看来，可以毫无疑问地断言，这是出于最纯熟的苏州地区的写样、雕版工人之手的。例如吴曜、黄周贤这样的写手、雕工所刊印的书籍，与木氏家集所显示的正是完全一致的嘉靖中吴开版的典型风格。尤为奇怪的是，木氏家集印刷用纸是一种特制的黄皮纸，这种纸只有正德嘉靖前后苏州地区的出版物偶有使用，如华氏、安氏的铜活字本书十九就都是用的这类纸，它与典型的云南皮纸则是完全不同的。《一氓题跋》又著录有《张愈光诗文选》，这书的嘉靖刻十卷本用的就是一种典型的云南棉纸，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说，“惟滇中纸最坚。家君宦滇，得张愈光、杨用修等集，其坚乃与绢素敌。而色理疏慢苍杂，远不如越中”。这里所说的云南产的皮纸的特点是极突出的。它比不上“越中”所产的白皮纸的细净漂亮、颜色雪白，纸色是微黄的，映光看去，没有淘净的楮木碎屑还往往存在，但它的坚实也不是江南的棉纸所能比拟。这部《张愈光诗文选》是曹倦圃的旧藏书，后归明善堂，八行十七字。赵维垣序。这才是典型的滇刻滇印本，与木氏家集诸种完全不同。

看来，要科学地断定书籍的雕版时代和地域，是还可以借助印刷用纸这样的辅助条件的；有时，辅助条件也可以化为主要条件，如这里的情况就是如此。木家是土司，又世代好客，结交中原文士。他们自然也可以不远万里从江苏请来写手、雕工，运来印刷用纸，在丽江刻印。但我总觉得不大像，还是把文稿寄到苏州刻印来得方便些。云南自然也有刻工的，但比起苏州地区来，就粗率得多。在土知府看来，是不够理想的。木家祖孙的这种心理状态，就与现在有些人的看待“洋货”相类，这是不难理解的。可以作为旁证的是，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木增条下说，“又尝于叶榆崇圣寺得《华严忏仪》四十二卷，延僧赍付苏州雕版，置嘉兴楞严寺。”这就说明木家确曾派人到江南刻书，可知所刻必不只佛经一类。

其实照我看来，明代中吴地区的雕版水平固然已经达到甚高的境地，一些精致的写刻本，确也美妙非常，可以当做书法范本了，但它代表的正是江南的水软山温的那种风调，并不足以压倒、取代滇中刻本雄健恣肆的风格。有一种嘉靖刻的《杨升庵诗》，就是阮元在《天一阁书目》中所说的“书用六行，字俱行草”的那一本，刻工极为朴茂，我怀疑这是用杨慎手写的诗稿上版的。笔画的锋棱转折处依旧保留着刀痕，这似乎不如中吴刻本的细腻圆转，但却极好地传达了行草书的气势、风貌。在明中叶以后的雕版中，这是突出的有代表性的作品。除了少数继承了元刻风气的明初精槧外，正嘉以还已经极难看到这样的刻本了。至于所用的皮纸，正是扯也扯不断的“与绢素

敌”的那一种。此外还有一种《高峣十二景诗》，也是杨升庵作，嘉靖滇中刻本，七行十五字。全书只有四叶，是近于颜体的写刻本，也刻得极为浑朴。这可能是升庵当时刻了投赠朋友的“诗筒”，他也寄给了木公索和，那和诗就保存在《雪山诗选》里，但原倡的五言六句却改为五绝了。

现在转录杨升庵原作第一首《翠岩晚霭》和木公的和诗，也许可以看出这位木知府在大诗人影响之下掌握汉文化所达到的水平。

“金碧染峰端，岚沉暮霭宽。趁虚穿翡翠，刻竹坐琅玕。海气如圆，分明入画难。”（杨慎：《高峣十二景诗·翠岩晚霭》）

“日暮翠屏开，俄看触石来。海光分缥缈，林影共徘徊。”（木公：《雪山诗选》。原题为《升老筒来，命作高峣十二景诗，续书于后》。杨慎在这第一首诗后的批语是，“此首绝佳，绘出翠岩景也”。）

明清以来，版本目录学者在鉴定版刻中已经走过了长长的一段路程。最早也最习见的一种办法是全凭个人经验的“目验”。有名的藏书家或老书贾，一书到手，往往一眼就能断定这是何时何地何人所刻……，自然也有许多失误，但一般说大抵是正确的。不过他们赖以作出判断的根据却说不出，他们凭的仅是经验，并不曾加以分析、总结，上升为理论。后来人们逐渐试图摸索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宋元本的行格表出现了，刻工姓名也有人进行统计了，还出现了“留真谱”、书影之类的参考图录。这就多少有了一点科学性，不过限于条件，见书不多，粗陋是难免的，因而科学性也就不高。也有人注意到古书的用纸，他们说，宋版书“纸白如玉”，不能算错，但也不免过于笼统了；他们也注意到宋纸的帘纹，说有“×指阔”，或者说“宋纸于明望之无帘痕”（沈子培引张丑说）。当然也都是粗略的说法，但这总的趋向是正确的，是从实际、实物出发的。可惜进步不快，闲言闲语也不少，什么“古董家数”，“玩物丧志”之类的话常常能听见。即如章实斋那样的学者也不能免。其实版本学是一种科学，是不能忽视的。不讲版本的学者很难说是完全的唯物主义者，至少他的唯物主义是不彻底的。

近来研究古纸的人多起来了。关于灞桥纸到底是纸还是布？造纸术是不是蔡伦发明的？……争论颇为激烈。这当然是很好的。传世晋唐书画的纸质也经过了初步的鉴定，“澄心堂纸”、“剡藤纸”这些名目也有人进行推测了。这许多都是很好也很必要的工作。不过迄今仍有大量实物存世的古书画、图籍，使用的都是用全国各地生产的纸张，从宋代开始，也有了千年上下的历史，却还没有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如果将这些资料加以系统的比较、分析、测定，那就不只能对书籍、书画的鉴定提供科学的依据，对造纸史的研究也是极有意义的基础工作。有许多精妙的古纸，我们现在已经不能制作了，甚至连名色都说不清楚，实在是值得遗憾的事。我们曾经有过洁白如玉的宋纸，也有染了各种美丽颜色的古纸；有罗纹旧笺，也有绝无帘纹的桃花纸；明代盛行的棉纸，细分起来，该有多少个品种，恐怕至今没有谁能说得清楚；被视为印书低级品的竹纸，花样就更多了，其精粗美恶也大不相同。大量的实物可以供研究者利用，甚至为了化学分析而取样，也没有多少困难，不比古书画，只能靠眼睛观察。谁能从《平复帖》或《伯远帖》上撕下一块纸角来进行科学测定呢？

有时候弄清了较近事物的状况，会有助于认识更早的同类现象。像造纸手工业的发展就是如此。我们今天看起明刻本来，以经历的年岁论，差不多就和黄蕘圃的看待宋版书一样。可是我们还多少保留着黄蕘圃的观点，认为

明清以来的出版物是不值得重视的，主要是因为它们还不够古。老实说是一种时代的错误。

西南访书续记

坐落在昆明翠湖公园中的图书馆，是一个很幽静、很可爱的地方。抗战中住在昆明的时候，曾经到这里来过，至今还依稀记得那小小的庭院，进门处由群花组成的篱落，和几楹古老的木结构楼厅，这一切过了十多年似乎完全没有变化。小院中的山茶正在盛开，艳丽、火红，在只有昆明才有的阳光底下，是一片三月的阳春，事实上却是1956年的岁暮了。

在书楼上，我花了两三个下午，读过了百来种馆藏的善本。在我，这真是一种享受。“善本”，是有着种种不同的涵义或理解的。这里并没有也不该有一把绝对的尺。在这里，没有宋元刻，没有明抄或旧活字本，也没有时髦的词曲或插图书。最旧的本子也许是“思溪藏”和元明刻的零本经卷，中有三宝太监的“发愿文”，是他印了送给五华寺的。不过这里的一些有关滇南的图籍，则是别处找不到的，有些则是孤本。来到一处地方，能看到这许多带有浓重乡土色彩的藏书，真是使人高兴的事。

这里有两种康熙刻的担当的诗集。《脩园集》八卷，题“滇中唐泰大来著”，收自万历丙午起诗。前有李维楨、陈继儒、董其昌序引。八行十八字，刻得极为拙劣，用皮纸印，确是滇中刻本，这里收的是他还不曾出家以前的作品。另一种名《榭庵草》七卷，题“鸡山僧通荷担当著”，康熙刻，行款同前。卷一诗起崇祯壬午，有自为序跋，时担当七十六岁。

《云南丛书》中收有《担当遗诗》，不但不全，刻得也太坏了。担当是明清之际著名逃禅的遗民，是诗人也是画家。抗战中在重庆看到过胡小石先生手写的一副诗轴，那是一首自作的六言诗，“总角簪花旧院，白头泼墨榭庵。鸡山烟霞绝世，归来何必江南。”印象极为深刻，到今天不忘。在那个时代，读到这样的诗，是不能不使人激动的。诗人来自江南，来自担当和尚少年时曾盘桓过的秦淮河畔；在诗里却夸说云南鸡足山的风景，简直可以代替魂梦里的江南故乡。但诗人知道，读诗的人也明白，这其实是替代不了的。

关于“簪花旧院”的故事，就在《脩园集》里。

云鬓恼新霜，不分娇花放。佯羞采嫩枝，插在儿头上。（诗题：《余年十三，在金陵。湘兰老马姬采花为余簪鬓，戏呈》）

集中还有一首《西湖怀古》，却是能写出少年唐大来的心事的。

春去犹闻春酒香，湖山千古想钱唐。西冷倩女情楼小，南渡忠魂墓草长。枉把十年教歌舞，难将一棹载兴亡。渔家不改游人老，桃柳含愁对夕阳。

馆中又有旧抄稿本《孙髯翁先生诗集》，这是昆明大观楼著名长联作者的诗集，未见刻本。集中有《咏担当》诗，“剩水残山聊尔尔，那有闲情称画史。但将白眼送浮云，也似黄鸡归故里。六朝新样秣陵秋，百尺鹅溪一段愁。寄与江南阮司马，庞家居士自风流”。

又有《吊担当上人》诗：“黑水青天外，苍山古雪边。儒生而墨者，酒客亦诗仙。杖锡来鸡足，春花叫杜鹃。画中三两笔，仿佛义熙年。”都是珍贵的有关担当的资料。

一般认为，明刻书以崇祯刻本为最晚。又有所谓弘光刻本，那是指甲申乙酉之际刻于江南一带的书，算是颇为名贵的东西，原因是时间短促，出版不多。但永历刻本却还不是绝无仅有的。此外还有“吴”纪年刻本、洪化刻本，则是吴三桂反清以后所刻书；秦王刻本，是永历中所刻。这些云南地区刻印的书，过去几乎没有受到藏书家的注意，更不曾见过实物。这次却在翠

湖的图书馆里见到了。

《升庵年谱》一卷，周四年刻本。刻甚精，八行二十字，完全是典型的康熙刻本风格。板心下有“高峽藏版”四字，前有升庵小像。周四年即康熙十六年丁巳，时在三藩反清起事之后四年，战事在江西湖南一带进行，昆明是后方，依旧歌舞升平，为杨升庵建祠，祠成又刻年谱序里详列倡议、捐资的同官姓氏、有云南按察使来度、左布政宗彝、右布政丁浴初等若干人。三藩定后，这书必不能免于焚毁的命运；如按册查拿，“从逆余党”将一个也逃不脱。这样，可以知道这仅存的小册之可贵了，实在要比书虽不存仍留记载于禁书目录者还要可贵。再过了两年，就又有《三教经》一卷之刻，《三教经》者，《孝经》、《四十二章经》、《道德经》也，刻版极类万历刊本，颇精，七行十六字，皮纸精印，前有“洪化己未岁长至日灵武夏惟修序”，应该称之为洪化刻本了。〔按：吴三桂于康熙十二年（1673）称帝，国号周。戊午（1678）死，孙世璠立，改元洪化。凡四年，己未为1679年。〕这是三藩变后在纸墨上仅存的余迹。记吴藩事的野史则有《胜国遗臣臧否传》二卷，皮纸黑格旧抄本，版式狭长，有如帐簿。前有作者史淮序（康熙四十七年）。这是以吴三桂事为终始的晚明野史，近于“剿闯小说”，应该也是可珍的史料。三十多年前我访问翠湖图书馆，目的是想搜集有关吴三桂在云南的历史记录，没有什么收获，也许这些书当时还不曾入藏。今天人们又开始议论吴三桂，也对有关云南史地种种发生了浓厚兴趣。这就不能不希望地方上的出版机构，有计划、有步骤地重印一批重要史料。这些珍本，确是不应让它以孤本仅存的方式酣睡在图书馆里了。

可以与丽江木氏媲美的是清初姚安土知府高峽映（白族），他的名著《妙香国草》的康熙原刻本也收藏在图书馆里。只要看他的题属，“古庐陵高峽映雪君父著”，就能知道他的汉化之深，并对汉文化有怎样的兴趣了。同校门人也仿效了师傅，在题属上用“古坪”代替“石屏”、“螳川”代替“安宁”。这书采用的是诗话的形式，大量地介绍了大理一带的古迹、风俗、传说……，是时代较早网罗较备的重要地方风土志。像“武侯水南战处”、“唐天宝战士冢”“上关花”、“风孔”、“雨铜观音”、“蝴蝶树”，都是当地著名的风物、旧迹。

云南远处西南边陲，中原文士极少来游的可能，他们过去不肯放过这样难得的机会，总是尽量把见闻记录在自己的诗文著作里。早期的著作如《云南行记》、《炎徼纪闻》等留存的虽不多，但却无例外地显露了猎奇的倾向，也反映了当地社会文化与中原地区的差异。从明代中叶算起，有关云南的著作有几个时期是比较丰富的。首先是杨升庵，他是个大知识分子，因获罪远谪云南，居住了很久，给当地带来中原文化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以杨慎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文士集团，其中有不少是兄弟民族的文士。他们之间的交游和倡酬，使当地的文化面貌迅速与中原地区靠拢，风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影响一直延续到16世纪中叶，前后有一百五十年之久。南明永历在滇黔之间一直维持到1661年，有相当数量的明朝臣民随同南来。永历覆亡以后，有的人就流寓当地，有的作了和尚。他们带来的是更为完整的汉文化体系，从政治设施到军旅、文事、宗教……，都是中朝的仿效、模拟。这是云南进一步向中原接近的另一重要时期。三藩乱后，清朝并未放松对边疆的控制，云南与内地的往来也更为密切。从晚明直到乾、嘉，重要的著作如徐霞客的《游记》、王昶的《春融堂杂记》，一直到桂未谷的《札朴》，都是很有特色的

作品。至于清初人的诗文集有关云南风物、民俗的记载更是所在多有，有关永历的野史也留下了许多种。这几乎全是中原文士的著作，而像《妙香国草》这样白族文士对乡邦风土的记述与吟咏，就是十分少见而可珍的了。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经折本。棉纸，朱印。后有草书跋语，题“永历乙未冬秦王书”。有“秦国之章”朱文大方印。这是永历时秦王孙可望的刻本，也是滇刻中一种别格。

孙可望旧是张献忠的部将，绰号“一堵墙”，是永历一朝后期的支柱人物之一。但因与同是献忠余部的李定国发生矛盾，导致内部力量分化，最后叛降了清朝。翦伯赞旧作《论南明第三个政府的斗争》，成于1940年。慨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在论文中指出永历一朝是寒族与缙绅的混合政府，后者执行的是分化“闯贼”余孽的政策，因而导致败亡。这自然是一种分析。但孙可望的种种行事，见之于晚明野史中的，也是不可忽略的历史真实。鲁迅曾据屈大均的《安龙逸史》介绍过孙可望的剥皮法，是大家所熟知的。他的千方百计要永历帝封自己做秦王的经过，也是有名的故事。他还拒绝接受“平辽王”的封号，理由是“二字王”没有“一字王”来得风光。乙未是永历九年，是他已经杀了陈邦传父子、剥了李如月的皮之后三年，秦王已经做定做稳了，这是他极重视也极得意的事，于是刻佛经时就以秦王名义写跋、钤印，规格与明代诸王的藩府刻书一般无二。这虽然只不过是一册释典的小册子，其意义却是别有所在的。

图书馆藏书以旧刻集部书最多，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中所记滇僧的著作，有不少这里还保存着原刻本，可能都是援庵先生未见之书。有一种《何蔚文年谱、诗话》，后附传奇三种。书为康熙抄本，每种传奇都有作者的题词。三种传奇的名目是《缅甸十四片》、《插一脚》、《摄身光》，这都是研究戏曲史者未之前见的。《缅甸十四片》一种应该是写近事的历史剧，题词云，“缅事目击，乃日久亦恍亦忽。错舛且忘，如忆往梦。偶填词得《缅甸十四片》，真长歌当哭也。若以漏多瓦少，又略补益。然猿听三声，已不禁泪下，那得再”。何蔚文生于乙丑（天启五年），康熙三十八年卒，是崇祯、永历、康熙三朝和三藩事变的亲历者。

《云南矿厂工器图略》不分卷，道光刻本。九行二十四字，全书共五十叶，前有图十一叶。刊刻极精。题“赐进士及第兵部侍郎巡抚云南等处地方吴其浚集，东川府知府徐金生绘梓”。又前人所著《滇南矿厂舆程图略》二卷，图也极精，不下于芥子园诸种。这是非常重要的有关云南矿产、冶炼工艺、地方经济、科学技术的资料。所见科学技术图籍的旧刻本中，这要算是极精的一种，可以看出清代后期所达到的水平。书极罕见，未曾著录。《贩书偶记续编》有同一作者的底稿本《弹谱》一卷，《弹弓新编》一卷，有道光辛丑序，可见他对图谱之类是很有兴趣的。

1956年冬昆明市上还有零零落落的几家旧书店，比起成都和重庆还多少热闹一些。在五华山下的马路上，所谓“逼死坡”那块石碣的对面，就有一家小小的旧书店。每天从旅馆出来都要经过，走进去看看，和书店主人谈谈，知道了一些昆明书市的情况。据说1953年左右，昆明市上还有很多旧书，经他的手卖出的明刻本就有万把册，被一位刘某买去最多。其中有一种《腾越厅志》，万历刻，白棉纸印本。像这样的“善本”是看不见了，不过我也买到了一册康熙时人的诗稿，前有名印曰李含和，号金沙，和著名诗人阚祯兆是朋友。诗集保存了大量吟咏云南风土的篇章。这自然是不见著录的地方文

献，后来送给了翠湖图书馆使它与同时的许多诗人的作品作伴。

光华街上也有一家旧书店，书很整齐，但没有什么别致的东西。最名贵的也只是清初写刻本如《渔洋精华录》之类。书店主人还介绍我到另外一处地方去看书。这并不是书店，在一个大院落里的几间屋子里装满了旧书，我觉得仿佛走进了一位学者的书斋。据说书都是抗战后期联大教授们卖掉的，有的是生活所迫，有的则是复员时带不走，才留下来的。书都很整齐，当然并没有什么版本书，不过有关社会科学的古代典籍参考用书是相当完备的。这不是一两个人的东西，是许多老年、中年的知识分子，间关万里，辛苦从北京搬了来的。最后却不能随主人一起北归，留在了滇南。我望着满箱满架的这些旧书，不禁惆怅了许久。

1956年昆明市上最有意思的书店，大约要算近日楼附近，云瑞西路的一家了。在广场一边有一排双层的木屋，这里是一排小店，店堂内部几乎转不过身来，他们的货色就都摆在门口木板架起的摊子上。这里也有一家旧书摊。木板上胡乱放着最破最烂的旧书，特点是大半是皮纸印本，又几乎全部蛀过，书页前后蛀得蚊帐似的透明了。门口摆着的不过是样品，店里阁楼上还顶天立地地塞满了这样的破书。

可以猜测小店里的货色不是来自昆明市上，极可能是从外县运来的“废纸”；它们也不是从藏书家手里流出，或外省读书人带来，全部是地道的云南刻本，我想上楼去看书，主人慷慨地答应了。他说只要不怕脏就行。

我在阁楼上看了半天，走下扶梯时两手墨黑了。选出的书中间记得有一厚本皮纸旧抄的“杜诗”，后来寄给了成都的草堂；又一本是雍正刻的《云龙州志》残本，皮纸印本，翠湖图书馆没有此书，就留给了他们。此外《云南通志稿》和《云南备征志》的残册，也都是原刻皮纸印本。

关于云南的旧本方志，现存最古的也许是《景泰云南图经》了，原本旧藏丁氏八千卷楼。此后有正德《云南志》、万历中谢在杭的《滇略》，都不是本地人的著作。由本地学者纂修的地志名著是大理李元阳的《万历云南通志》。据图书馆里的同志见告，这书的原刻本三十年代发现于北平，当时索价二千二百元，后为天津任凤苞买去。龙云向任要来了一部晒蓝本，托商务印书馆排印了五百部，送掉了一些，剩下的都堆在五华山上，经过火烧，剩下来没有几部了。此书原刻在日本的尊经阁和早稻田大学都各有一本。

我想，全国的地方图书馆和出版社，实在应该把认真收集、保管、流传当地地方志的任务担当起来。这是责无旁贷的光荣任务，也是为子孙后代设想的迫切任务，也是纂修新的方志的重要基础工作。翠湖图书馆印过一本馆藏全省方志目录，虽然旧本不多，残本不少，但他们殷勤访求的心情是值得钦佩的，他们作的是寂寞但却重要的工作，人们将越来越深刻地领会这工作的重要意义。

来云南之前经过重庆成都，也都到图书馆和书店去访问过，看到过一些很有特色的好书，这里来不及一一记下了。我只想谈一点有关西谛藏书的故事。

1948年顷，我偶然在上海一家旧书店里看到一本郑西谛手写的《纫秋山馆行篋书目》，用荣宝斋格子纸写成，大约收入二千种上下线装书。后面还有长跋，历数收集这批书的艰难经过。书店的人告诉我，郑先生托他们卖掉这批书，价钱并不太贵，已经有一位在四川经商的客人想要了。我知道郑西谛当时的经济情况不好，他正在印几种大部头的图谱，又买了许多唐俑和参

考书，天天为还债发愁。政治压迫又日益严重，他已经开始为离沪远行作准备。在这种情境中卖书是不奇怪的。这批书中有一大批明刻本，虽然并非孤本秘籍，但治学的人被迫卖掉藏书，总是使人难过的事。不久前为了给吴梅村的《鸳湖曲》作笺证，我向他借得张天如的《七录斋集》、陈子龙的《几社壬申合稿》，刚刚用毕还掉，不料也见于这本目录中间。这就使我很不舒服，总想能设法为他保存下这批书才好。取得西谛的同意之后就东奔西走，凑借书款。最后凑齐的那天下午，因为其中有一部分是银元，还跑到河南路的马路市场上去向摊贩换成纸币。等我提了一袋“金元券”赶到书店，已经上灯了。店主人笑嘻嘻地对我说，币值猛跌，原来议定的价钱不算数了。这真使我一下子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如果提了钞票去换回银元，那就连一半也捞不回来，同时实在也失去了奔波的兴趣，在不得已中下了决心，用这笔已经不算钱的钞票选购了十来种旧书，嘉业堂寄存在店里的旧书。这笔书债直到十年以后才最后还清。那本西谛手写的“书目”也押在债权人那里。这样，当1956年我在重庆枇杷山上的图书馆里发现了这批曾想赎买而终于未成的“纫秋山馆行篋书”时，是不能不感到意外与激动的。《西谛书目》早已印行，我想，这批书目如作为“外编”增附其后，就像《天一阁书目》之有内外编一样，好像也是可以的吧。

1981年8月25日

湖上访书记

壬辰冬日，随军赴浙东一隅慰问，过杭州，演越曲祝英台故事于湖滨。时方严寒，一夕，雪花如掌，经行坊肆，访书于丰乐桥堍，过松泉阁，买得元板范文正集于主人许，有顾大有、周九松二家印记，艺芸精舍原装未损，意颇乐之。更问它书，遂出此见示，执以为元刻，索重直，盖以作者为张翥也。余告之此明刻也，更读序文，知其人杨氏，主人颇悻悻，交易未成，亦遂置之。明年秋，余为盖叫天先生事来杭，寓湖楼二月，暇时屡买书市内，更过松泉阁，此书仍在。主人必以归余，价只少减。余因久未得书，因念得此明初旧刻亦佳，遂挟之归沪，细检始知卷尾割去数行，补以旧楮，心颇怅怅。浙东汤某即汤寿潜，其家书之雪库装者，往往残帙，余遂告之肆主，责以不诚，其人亦声言不知。因念此本终无完日矣。后二月又过肆中，主人亟出书一册曰，此《脩颜集》下半，可配前买之本，展卷惊喜，即出重直得之。此书递藏于吴金氏、杭州汪氏，咸丰兵火，遂成劳燕，今更合并，又九十五年矣。甲午五月。

此本买归后，细阅始知为不全本。此页为汤某割去四行，别以旧纸补之，以充全书，颇为憾。十日前更过武林，估人告于旧家见此集残本后半，纸墨如一，闻之惊喜，意亦未敢便信也。三日前与燕同游湖上，暇时过肆，残本已至，果是一书，欢喜无限，以重直赎归。下半凡存四十九至九十九番，又跋一页，是汤氏得此，割去四行而又失去一页也。振绮原目作二册，咸丰庚申辛酉，杭城两遭兵燹，此书散出，分析异地，今乃展转同归余斋於百年之后，书福墨缘，如见如是。付工重装前漫识。癸巳十一月卅日，晨窗记。

癸巳十一月廿九日，与燕同寓湖上，游孤山、紫云、栖霞后，饭于张英杰先生家，观老人彩衣舞绸，后趋车过市，得此残本一册。此振绮汪氏书也，原订二册。付工重装，仍为二册，以还汪氏之旧。并记

文瑞楼目卷八有杨翥睇颜集一条，振绮堂目卷四情字明人集类第二格有睇颜诗集二册不分卷一条。近更见振绮堂目蓝格稿本，与活字本编排不同而所记更详。云此书为金星韬藏，后归曹倦圃。然此本绝无洁躬一印，不知何故。此本序第一番汪印上旧有元 补之迹，或是曹溶旧印所在耶？丁酉六月初七日雨窗。

余澹心《东山谈苑》卷一，“杨仲举翥，吴县人，少孤贫，与兄戍武昌，为乡校师。杨文贞公士奇流寓武昌，偶憩翥馆，以无资告。翥遂让其馆而自教授他所，日往返十余里不倦。后文贞当国，乃相引拔，官至尚书”。此笔记中仅见者因更录之，戊戌十月。

梁维枢《玉剑尊闻》卷一德行类记，杨翥醇谨清约，与物无忤。邻有作檐沟注水于其庭者，则曰，晴日多，雨日少。又有侵其屋基者。则曰，普天之下皆王土，再过些须也不妨。是亦深通黄老之术者也。

《静志居诗话》卷七云，“杨翥字仲举，吴县人。少与兄戍武昌，为乡校师。仁宗驿召，授翰林编修，历修撰，迁廊府长史。景泰初，擢礼部左侍郎，寻进尚书。有《睇颜先生集》。《睇颜集》借之琴川毛氏，蒙叟为施铅评云，‘宜亟焚毁，勿暴其短于后世可也。’未免太过。杨公长者，当存其言。以予所录二首，亦自成章。……”据此知竹垞选《明诗综》时，系借本于汲古毛氏，绛云楼藏明人集至富，亦未有此。竹垞之言自是忠厚长者，牧斋数语，文人轻薄之状自见，宜其有天巧星浪子之目也。仲举原集俱在，诗虽未甚佳，以置明人著作中，亦非下乘，较何李之俦，反少做作气。东涧之言，不足论也，戊戌大雪前五日重跋。

案：《睇颜先生诗集》不分卷，明初刻。半页十一行，行二十字。上下黑口，四周双边。大题下属“门生汤澂编录、同郡陈宏校正”。前有长洲陈顾序。收藏有“金星韬藏书记”《朱长》，“汪鱼亭藏阅书”（朱方）。又浙东汤氏藏印二方，其一云，“见即买，有必借，窘尽卖。高阁勤晒，国粹公器勿污坏。”写刻朴茂。全书分在朝、纪行、述怀、游览、酬和、赠寄、燕饮、庆贺、亲族、孝节、节序、山水、园林、花木、公署、道释、题画、堂宇、送别、哀挽、杂题、四言等二十二目，后有跋，失去尾页，当是陈宏撰。

50年代前期曾多次来往湖上，吸引我的不只是美丽的湖山，最不易忘的倒是这里有忘年的师友和那么多的旧书店。我曾在这里搜得鲁迅先生在东京印的《域外小说》初二集，郁达夫旧藏、封面上有他亲笔题属的清人词集，自然还有更多的旧本书。为了编写《盖叫天舞台艺术》纪录片，借住在西湖湖楼，过了一个美好的秋天。居室在二楼，推窗远望，孤山背后的放鹤亭正在目前。工作的日程是每天上午到金沙港盖老的住处去半天，说戏并谈剧本。一面吃茶，一面听他海阔天空地谈天，梨园旧事，艺人生活，湖上风光，几乎无所不谈，对剧本却不及只字，只是说“你们看着办吧”。他的名作《洗浮山》因为是“八大拿”之一，不好处理，他主动地提出，可以改为《七雄聚义》，把贺天保改为朱全，剧本结构、场次、词句都用不着大更动，很简单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在一起去海宁看了一次潮以后，他又兴致勃勃地提议，影片中可以考虑加入汹涌澎湃怒潮的镜头，插在朱全的武场刀花之间。这是一个奇突的想法，颇有电影艺术蒙太奇的意味，同时也表现了他对自己舞姿的欣爱与理解。这是他创造人物、设计身段的一贯思路。可惜这个设想因种种原因没有实现。

在盖老金沙港住宅的百忍堂内，正中的长案上安置着一尊高不逾尺的关羽的紫铜座像，侧身而坐，神色偃然，是出于无名匠师的杰作。盖老说他是在荒摊上买得的，因为这正是舞台上经常出现的子午相，是塑造人物身段极好的参考，侧身而坐，不但避免了正面入座的呆滞的缺点，而且也照顾到了台下观众不同的视角，无论怎么看都是美的。盖老并未接触过美学，可是在他的谈话中出现得最多的是“美”字。他是无时无地不在观察大自然、人间相、艺术品……时时敏感地吸取美的事物并糅和到他的舞台形象、舞蹈中去的。在这方面，他实在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创造者。

在他的家里，有许多佛像，人们也许以为他佞佛，其实他多半是当作雕塑艺术品搜集的。有一次与他一起游城隍山，走入城隍神庙时他对我说：“我是北方人，来到杭州落户，应该拜拜地主。”从随意谈笑中很能表现他对神佛的态度。

每天在他家吃过中饭，总是叫几部三轮车全家一起出门，我们几乎跑遍了杭州的名胜。碰到下雨。他就进城去洗澡，然后在饭店里晚饭，饭后到剧场去听李伯康的评弹《杨乃武》。他是北方人。寄居江南这许多年却仍未改乡音，但他却能领解苏州评弹趣味并发生极大的兴趣，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事。

盖老好客，留人吃饭是常事。我想吃了他许多次了，总得还请一下才对。一次在城里晚饭，我先到帐桌上预付了餐费。盖老饭后要夫人付帐时方才发觉。他哈哈大笑道：“三杯酒，把我的大事误了。”这是《四进士》里宋士杰的唱词，他把下句“信阳州无有好人”改为“金沙港”。从这件小事也可以看出他的机智和燕赵豪侠的流风余韵。

碰到下雨或盖老去洗澡时，我就去蹓书店。当时浙东一隅的故家藏书大量地流散出来，据说在一处河码头每天都有从乡下装运旧书来的船只，在这里论秤当废纸卖出。几家书店都有人每天在码头茶馆里坐守。看见好书就随时抽下，用少高于废纸的价钱买得。不过这样的机会不是旅人所能获得的，还得经过书店才能展转到手。杭州的旧书店又有一种特异的习气，他们信托的是掮客和上海的书商，有好书不情愿给上门的顾客看。记得有一次走进抱经堂去看书，店主出去了，只有女主人应门。我在残书架上看到一叠鼠啮之余的破书，中间有好几种结一庐朱氏的旧藏，论价付钱之后，店主人一步踏

进店门，大惊失色，一手夺下扎好的书，说“不卖了”。最后重新议价，以几倍的价钱才得成交，还扣下了一本旧抄《百川书志》的吴枚庵旧藏本，说什么也不肯卖了。当然，并非每家书店都是如此，像宝贻斋严氏、松泉阁王氏，都还可以从那里看到不坏的旧书。湖滨的大观楼也时有精本，振绮堂汪氏、结庐朱氏、叶润臣、包子庄、缪荃荪的旧藏本都有时能遇到，叶润臣晚年移家杭州，不久逝世。他的藏书大概都是随身带到南方的。这是一位很有特色的藏家，我没有遇到过他收藏的明以前旧本，可能早已流散了，但他的藏书余烬 50 年代还时时可以遇到，都是清刻精善稀少的本子。

松泉阁主人王松泉是一位可以谈谈的书友，他和阿英相熟，常替他收集晚清资料和戏曲小说。我从他手里买到《晞颜集》，先后两次得到两个残册，竟能配成全书，而且就是振绮汪氏旧藏的一部。这是很难得的一次巧遇。这本诗集是明初旧刻，可能刊于天顺中，写刻、字体朴茂，带有明初刻书特色，犹有元板遗意。算作善本应该是无疑的。不过杨翥的诗实在作得不太高明，难怪钱牧斋说了那些尖刻的怪话。保存文献是一件事，文献本身的价值则是另一件事。最近编印“全×诗词”之风大盛，从保存历史文化遗产的角度看，自然是一件憾事，但我怀疑这个“全”字是不是可以做到。明清人的诗文集浩如烟海，仅就今天所能见到的劫余的册籍辑录，恐怕远远说不上“全”，而这种“全”字号的大部书，除了对专业研究者有用之外，普通读者怕是不要看也看不了的。而善本也并非全是质量高的著作，简直是必然的。

白居易的名句：“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我买到过一部乾隆中杭州人的诗集就叫《一半勾留集》，照例，诗写得并不高明。我想，照我的意思，除了西湖的一半之外，那另一半值得勾留的应该就是杭州的旧书了。我忘不了借住在里西湖湖楼的那一段美好的日子。楼居是寂寞的，特别是连朝秋雨的夜晚，只有翻阅新买得的旧书，才能多少排遣客居的孤寂。天色已晚，在暮雨潇潇中唤一只小艇摆渡到楼外楼去吃饭。郁达夫诗中有“极贱杭州酒”的话头，当时的杭州，酒饭确是便宜的。酒罢，仍乘小船回住处去，淅沥的雨声更紧更密了。倚枕读湖上诗人的诗集，对比今昔的湖上风光，仿佛与厉樊榭、丁钝丁、杭堇浦结伴同游，真是有趣极了。

这一回买得的旧书中，有一部《静便斋集》，是找所喜欢的，曾在卷尾书头写过两篇题记。

癸巳秋日，余居湖上几两月，寓居在西泠里湖，楼室正对孤山放鹤亭，风晨月夕，常苦行笈无书，乃过市穷搜之。会于一肆见杭人文集不少，选得数十种，此书预焉。忆尚有瞿晴江集，以其为画人，有重名，遂索高值，未能得也。此集殊佳，于中可知杭州故事不少，近日少暇，始得读一过。所论梅村两跋尤佳。王氏自有独见，惜其名姓不彰耳。己亥正月初四日记。

（《静便斋集》十卷，仁和王曾祥麟徵著，乾隆刻本。前有乾隆二十八年槐塘汪沆序。宁化雷鋹《两王生小传》，两王生者，曾祥与江都王世球也。）

癸巳秋日，余客湖上二月，时去市上观书，而绝少佳本。无已，乃买清刻集部读之。未几而旅寓厨中遂满，时时取而阅之，面对孤山，秋雨凄冷，赖此破寂。此本得之松泉阁，乾隆刻也。作者不甚著于艺林，向于符氏《秋声馆吟草》中知其姓氏，所从游者，如杭厉诸先生皆名宿也，亦时能于卷中摭摭一二故实，是非弃物也。今日捡得，拟付工重装，漫识卷端。甲午腊月廿五日记。

访书琐忆

几十年来胡乱买书，颇有些特别的经历，不易忘记，当时就随手写在题跋里，闲时重看也觉得有趣，常想记录一点下来，大概也可以算作“书林逸话”之类。说起题跋，自来就有学术性与随笔性两大类。学者重视的是前者，考辨故实，校订文字，有功于学术研究，历来被看做题跋的正宗。但在我自己，喜欢的却往往是后者，而其代表作者则是黄荃圃。他的藏书题记经缪荃荪、吴昌绶等搜辑重刻，有煌煌十册之多。看那内容，虽然也谈板本、雠校，但更多的是记书坊、书友、藏书家故事的“闲言语”，而这是很为许多学者所不取的。黄荃圃先是买书、刻书，后来又卖书，还开设了滂喜园书店，商人当然要重视广告，在黄荃圃那个时代，还没有近代流行的种种广告手段，于是有人就说他的题跋也就是广告。这很丢了读书人的面子，遭到讥笑是当然的。不过我觉得这种指摘并不公平。黄荃圃在题跋中总是直白地记下了书价，书籍的抄刻先后，是否善本，是全本还是残帙这些细节，而这作为广告是不合适的。因此我怀疑他在买书的时候，是否就先已算计着出卖、获利。

真的把题跋、目录做为广告手段的是缪荃荪，那已是比黄荃圃晚一百多年的清末民初。古书作为商品，有了更广阔的市场，大官僚、大商人、大地主为了积累财富和附庸风雅也纷纷收罗古本，日本、美国的“洋庄”生意也日见兴隆。缪荃荪的办法是刻书目，每当他聚积到一批书以后就急急的刻《艺风堂藏书目》，在每种书后面附加的板本说明，就大有广告气味，夸张的语句是经常出现的。从许多实物看，这种说明常常有错误；但并不是缪荃荪的鉴别力特别低下，只是他千方百计地想把这些书说成不可多得的宝贝而已。他的藏书目录一刻再刻，以至三续，这就给书坊开了先例，纷纷印发书目，变木刻为石印，出板更为迅速，成为不折不扣的广告了。

继缪荃荪而起的有傅增湘，他也先后刻成了几种书目与题跋，而尤值得注意的是不久前出版的他与张元济的通讯集。这是比题跋更为直白的经营古书业务的纪录，不但保留了大量古书流转的珍贵史料，也更暴露了藏书家活动的真相。

以上说的都是旁人的事，与我本来无甚关系。不过天下事有时确是不可思议，二十年前承蒙一位熟人揭发，说康生有话，我在书前书后写的许多题跋都是企图“以伪乱真”的手段，目的则是投机倒把。因此造反派就要细查、追查，责令我细细交代历年所买的书，每本的进价……。这可是个艰巨的任务，只能坐在牛棚里苦苦思索，这时最容易记起的就是买书中一些有趣的经历。按照指定的前提，加以点染，是可以制作出符合要求的货色来的。当然，在“创作”过程中常常不免背离了真实，带有“哗众取宠”的趋向，则是难以摆脱的“历史局限”。自己虽然不满意也没有法子想。从这里是可以悟出“报告文学”写作的困难的，特别是个人的回忆，无论是痛骂或夸赞自己，都只能表现出扭歪丑恶的面目。这些“创作”的故事已经找不到了，并不可惜，不过作为“创作”的教训失误，总是不应忘记的。

1953年的秋天，我在杭州住了两个月，有很多时间就消磨在书店里。住处是在里西湖，出门叫一只小船横渡过去就是湖滨，上岸以后沿解放路走入新华书店，又从这里走到延龄巷、丰乐桥、清河坊，这些地方都零零落落开设着一些书坊。当时旧书业很不景气，货色也少得可怜。有一天踏进了抱经堂，店里空空地没一个顾客，只有女主人抱着小孩在看守。案上摊着零碎的破书，

真是一无可观。这时发现书架背后一叠叠放着许多残书，大约多年不曾触动，书上的灰尘也有寸把厚了，抽出两本来看，多半有结一庐的印记，真是意外的高兴。选了半日，得书一叠，问价付钱，正要离开时，店主人一步踏了进来，立时惊惶失色，打开纸包，一一检点，说是无论如何也不肯卖了。最后讨价还价，以十倍于原价成交。还被抽下了一本吴枚庵抄的《百川书志》残卷。在这中间，他还大声地叱责着主妇，使她几乎哭出声来。

塘栖朱氏的遗书本来藏在杭州，后来把重要的善本移至上海，残零书册都就地处理掉了，这大概就是这些书流落在旧书店头的来历。书并不珍贵，只是这点流转因缘很值得纪念。现在还在手头的是蒙古博明希哲所作的《西斋偶得》三卷、《凤城琐录》一卷、《西斋诗辑逸》三卷。嘉庆辛酉刻本，纸墨明净，是刻成后最早的印本。书前有翁方纲的序文和手书上板的“附识”，知道这是心斋（广泰）为妇翁刻梓的遗集。更难得的是书前有“大兴翁氏石墨书楼珍藏图书”的朱文大方印。可知是书刻成后持赠翁氏的本子。在卷尾还有墨书一行，“甲戌仲夏叶志诜借看一过”，下钤“平安馆印”白文方印。甲戌是嘉庆十九年（1814年），是书刻成后的第十三年。叶东卿是藏书家，还不能不从翁方纲展转借读，也可见此书流传之少了。

杭州丰乐桥堍有松泉阁书肆，主人王松泉与阿英相熟，是颇有眼力的书业经营者。那年秋天，在他的店里买到不少清代杭州诗人的集子，携归旅寓，颇能驱遣岑寂。清人别集那时真是贱如泥沙，可惜当地的图书馆不加重重视，听任这一大批地方艺文流散毁弃了。杭州也真是文风极盛的地方，乾嘉以还竟自出现了那许多诗人，当时雕版的工值又贱，刻集成了一时风气。当然这中间缺乏第一流的诗人，但也有名姓不彰、著作自有分量的作者。如王曾祥的《静便斋集》就是那时所得。他的两篇《吴梅村集书后》，就是我所见仅有的对吴伟业的严肃评论。

也是在松泉阁，前一年的冬天曾经见到一册明初黑口本的《睇颜先生诗集》，写刻，字体静雅朴厚，黄皮纸印，是浙东汤氏藏书。当时钤有汤氏印记的旧书，狼藉市上，比论斤的市价高不了多少，但这本书却为主人看重得非常，认定是元板，因为原书卷前只列编录校正人姓氏，没有撰人题名，而在陈颀的前序中却有“公讳翥，字仲举”的话，所以就确认这是元代著名诗人也字仲举的张翥的遗集。我翻看序文，发现中间又有这几句，“若礼部尚书致仕杨公，其颜之徒欤？公苏人也，……”就说这是一位明代姓杨名翥的诗集，主人听了大不高兴，立即将书收回去了。转过年来秋天，又走过松泉阁，主人一把拉住我，说那本黑口本不曾卖掉，是特为我留下的。劝我一定要买下，价钱虽然依旧很贵，但已不再坚持是元板。于是就买下，回来细看，才知道卷尾被割去了四行，已用旧纸粘补，虽然是个残本，不免有点懊恼。不料下一个春天再到杭州，书店主人却高兴地对我说，上次买去的是个残本，不过下半已经发现，还是劝我一定买下，凑成全璧。这次我不再迟疑，用比残本更高的价钱买下了。

这书前面有两方旧印，“金星轺藏书记”和“汪鱼亭藏阅书”，知道是先文瑞楼后归振绮堂的。查稿本《振绮堂书目》，有这样的记载：

《睇颜诗集》，不分卷，二册。刊本。金星轺藏，后归曹倦圃。明杨翥撰。字仲举，吴县人，官至礼部尚书。

这里说书曾归曹溶，却不见旧记，今汪氏印上有剝补痕，灭去的大约就是曹氏藏印。流传次序也应该是曹氏在前才对。值得高兴的是，这书藏在汪

家，在太平天国战役中失散，分别为两家所得，又都未因残帙而弃去，终于在整整一百年后得以重圆，实在是很难得的。我过去也曾有几次用先后买得的残卷配成全书的经验，不过那到底是拼配，是百衲本，与原是一书的分而复合是不能相比的。

《诗集》以“在朝”、“纪行”、“述怀”、“游览”……等若干细目分类，诗语平稳，缺乏特色。朱竹垞《静志居诗话》说：“《晞颜集》借之琴川毛氏，蒙叟为施铅评，云宜亟焚毁，勿暴其短于后世可也。”可以看出钱牧斋的谥刻，连竹垞也觉得他“未免太过”了，还是在《明诗综》中选入了两诗。余淡心《东山谈苑》也记有有关作者的故事，原来他是因为曾让馆于流寓武昌的杨士奇，后来士奇当国，“乃相引拔，官至尚书”的。梁维枢《玉剑尊闻》也记有他的一段故事，“邻省作檐沟注水于其庭者，则曰晴日多，雨日少”，说他是深通黄老之术的人。

上海复兴中路淡水路口曾有一家春秋旧书店，主人严氏，能装书。解放之初书市寥落，生活困难，我曾请他修补过旧书。有一天他对我说，过去他曾在宁波一户人家装书，这家的主人不懂书，但喜收书，只要送到门上，不论完缺一律收入，出价大约是明板白棉纸书每本一元。因此得了个“垃圾马车”的绰号。不过当时宁波市上的好书是很多的，散出的浙东故家藏书集中在这里，天一阁流出的书也常常可以遇见。所收满满的一屋旧书虽然大半是残本，但确也有不少好书。现在主人已经八十多岁了，住在上海，藏在宁波的书已先后给族人论秤卖出了不少。他取得主人的同意，可以到宁波去收书，不过缺少盘费，向我通融。我就借给五十元，答应书到之后请我来看，选中的书作价折回借款。

大约十天以后书由轮船运到。一起大约有几十麻袋，只好堆在书店隔壁的弄堂里。我得到消息后去看书，从清晨一直看到过午，弄得两手如漆，浑身灰土。书大半是残本，明本不少，但没有一部全书。当时我正收集明刻书影，大量的残本正是绝好的素材，就选了几十种。偶然在书堆里又发现了一包书，包皮的报纸已经发黄变脆，细白皮纸的原书却一些都没有损坏。这是四本《王状元标注唐文类》，明铜活字印本。卷首大题下次行题“祁东李氏铜板印行”。这是很少见的明初活字本，祁东不知道是什么地方，过去的书目里只瞿中溶的《古泉山馆题跋》中曾加著录，也不能确定祁东的地位，只是推测而已。原书四册，每册前有“春、夏、秋、冬”的签条，还保留下两纸。看铜模字体，扁体写刻，与苏南一隅的安氏华氏活字的风格不类，与较早的唐人小集等更是不同。这四册书却是全的，可以算得这次所得书中的白眉。全书别无藏印。《藏园群书经眼录》著录了同样的一部，则是劳权、徐渭仁的旧物，现不知流落何处。

这一次的买书经过大略如此，但在十年动乱中却成为一件大案。据说我曾到宁波去贩书一船，其中有多少种宋元本，发了大财云云。历数多年买书的经验，要算这次惹出的乱子最大了。

我的买书，正是有啥买啥，杂乱得很。买来的书也未能本本细看，总的印象是，旧书中间多的是封建说教的陈词滥调，偶尔发现片段的好意思、好文字，可真像披沙拣金那样的繁难。不过换一种眼光看，这又是可贵的资料，真想追寻中国传统文化的根，不能不从这里着手。杂和乱并不是坏事，只有这样才有希望较能窥见全局。

抄写旧时的记忆，实在也是很无聊的事。在今天的书市上，旧书已经不

再可能遇到。几十年中间，有的化为灰烬，有的变成纸浆，剩下来的也大都藏在图书馆里，想看一下也不容易，因此这些访书的故事，也真的成为梦一般的故事了。

1986年5月23日

琉璃厂

三年前来北京，住了十天。琉璃厂也去过一次，不过只是匆匆地走了一转，前后一总不过半小时。后来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起，那次来京，没有买到一本旧书，没有听过一次京戏，觉得可惜。不料这句话被朋友记住了。这次他特地到吉祥去买了两张票，又约我吃过中饭一起到琉璃厂去看旧书。使我一下子弥补了三年前的两种缺憾，真是值得感谢。

六月初的骄阳已经很有点可怕了。马路平直而宽阔，不过路边的行道树却稀疏而矮小，提供不了多少绿荫。走过全聚德烤鸭楼大厦，走过鲁迅先生当年演讲过的地方——师大院外高墙，随后发现了一座有如小型汽车加油站似的“一得阁”墨汁店。加紧脚步，好不容易才奔到了琉璃厂。看见在荣宝斋对面正加紧恢复兴建原有书铺的门面与店房。“邃雅斋”和“来薰阁”的原址都已出现了青砖砌成的铺面，除了柱子是水泥构件以外，其他似乎都保存了原貌。橱窗镶上了精细镂花的木框，还没有油漆。这一切看了使人高兴，在大太阳底下也不禁伫立了好半晌。

接着我们就走进了中国书店。朋友和在这里工作的两位老店员相熟，我被邀坐下来喝茶，看书，谈天。这一切都还能使人依稀想见当年琉璃厂的风貌。不过几十年过去，一切到底已经不再是从前的旧样了。

翻翻零本旧书，居然也买到了几册，没有空手而归。

《百喻经》二卷，1914年会稽周氏施银托金陵刻经处刻本。这是有名的书。三十七年前我在南京曾亲自跑到刻经处买过一本，不过已是新印，印刷、纸张都远不及这一本。但这是否就是原跋所称最初印的“功德书一百本”之一，却也难说，但初印则是无疑的。

此书已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印行，是为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而重印的，而且有两种版本。但到底都不如这原刻的可爱。也许这就是为许多人所嘲笑的“古董气”，不过我想多少有一点也不要紧。

《悲龠居士文存一卷·诗剩一卷》。赵之谦撰。光绪刻本。作为书画金石家，赵叔的声誉近来是空前地高涨了，印谱、画集都出版了不少。但他的诗文却极少为人所知。这虽然不过是光绪刻本，但并不多见，“诗剩”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薄薄的一本诗集，中间却有不少史料。太平天国攻下杭州，赵之谦逃到温州，这样，“辛酉以后诗”中就往往有记兵事和乱离情景的篇章，小注记事尤详。“二劝”诗并前序记平阳“金钱公”与瑞安团练“白布会”斗争情形甚详尽，是珍贵的史料。当然赵之谦是站在清朝官方一边的，他对太平天国的议论自然可想而知。

使我惊异的是，赵之谦对吕晚村也深恶痛绝，没有别的理由，只因吕是雍正帝钦定“罪大恶极”的“逆案”首要。诗注说，“南阳讲习堂，留良居室也。籍没后犁为田。今则荒烟蔓草矣”。这是吕晚村故居的结局。诗注又说：“然理学大儒合之谋反大逆，言行不相顾，不应至斯极也。往居都下，见书摊上有钞本留良论学书数篇，邵阳魏君源加墨其上，言留良人当诛，言不可废。余不谓然，取归摧烧之。”

这种推理方法与行动今天看来都是奇怪的。在赵叔看来，“理学大儒”必然应该也是忠臣，如与这模式不合，就是“言行不相顾”了。当然更不必追究逆案的是非曲直。这是从典型的僵化头脑中产生的思想，是极有价值的一种标本。魏源就和他大不同，虽然不能不承认“其人当诛”，但却肯定了

其人的思想，至少他明白两者之间应有区别。但赵之谦不能同意，取来一把扯碎烧掉了。这种行为简直不像是个艺术家干得出来的。思想僵化之后就有可能化为卤莽灭裂以至疯狂，这里就是一个好证据。

像这样的旧书，是算不得“善本”的，但买到之后还是感到喜欢。这大概就是所谓“书癖”了吧。不用说更早，就是50年代，像这样的书也多半没有上架的资格，它们大抵睡在地摊上。三十年来，琉璃厂（以至全国）旧书身价的“升格”是惊人的，根本的原因是旧书来源之濒于绝迹。这在我们的闲谈中也是触及了的，书的来源日渐稀少，这与全国机关学校大小图书馆的搜购有关。经营旧书的从业者也大大零落。仅有的一两位老同志都已白发盈颠，接班人则还没有成批成长起来，青年同志对这一“寂寞”的行业也缺乏热情。谈话中彼此都不免感到有点沉重，但也想不出什么“妙策”。

前一天正好访候了周叔弢先生。九十三岁的高龄了，他的精神依旧极好，眼睛能看小字，记忆力也一点都没有衰退。只是耳朵有点背了。只要一提起书来，还是止不住有许多话想说，他说的自然都是“老话”，但有许多是值得思索的。

他听说琉璃厂在重建了，非常高兴。但又担心，这些老字号恢复以后，有没有供应市场充足的货色，有没有精通业务的从业员，读者、买书人能不能从琉璃厂获得过去那种精神、物质上的满足，好像都是问题。

典籍、文物、艺术品、纸墨笔砚……，这些都不是单纯的商品，过去读者逛琉璃厂也不只是为了来买书。我想，我们至今还没有足够的、标准的、门类齐全的图书馆、博物馆，但在过去，我们却有很好的替代物。例如，人们到琉璃厂来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奔向一所庞大的、五彩缤纷的爱国主义大学校、展览馆。不只能看，还能尽情欣赏、摩挲品味，可能时还能买回去。这是一座文化超级市场，门类之广博，品种之丰富，新奇货色的不时出现，对寻求知识的顾客带有强烈的诱惑。这一切，今天的博物馆、书店……一切文化设施都不可能完全代替。人们在这里得到知识，还受到传统精神文明的熏染、教养；封建文化中有精华也有糟粕，但归根结底爱国主义内容的比重是占着重要地位的。

过去人们到琉璃厂的书铺里来，可以自由地坐下来与掌柜的谈天，一坐半日，一本书不买也不要紧。掌柜的是商人也是朋友，有些还是知识渊博的版本目录学家。他们是出色的知识信息传播者与咨询人，能提供有价值的线索、踪迹和学术研究动向，自然终极目的还是做生意，但这并非唯一的内容。至少应该说他们作生意的手段灵活多样，又是富于文化气息的。

在书店里灌了几碗茶，依旧救不了燥渴，这时就不禁想到在左近曾有过一家“信远斋”。小小的屋子，门上挂着门帘，屋里有擦得干干净净的旧八仙桌、方凳，放在角落里的几只盛酸梅汤的瓷缸。那凉沁心脾、有桂花香气、厚重得有如琥珀的酸甜汁水，真是想想也会从舌底沁出津液来。那不过是用“土法”冰镇的，但在我的印象里却觉得无论怎样先进的冷冻设备都不可能达到同样的效果。也许关键不只在“冷”，选料、配方、制作也有极大的关系。这样的“汤”吃了两碗以后就再也喝不下了，真是“三碗不过岗”。酸梅汤现在是到处可见了，人们一致公认这是好东西，还制成了卤、粉、汽水……，但好像都与信远斋的味道有些两样。

不久前在银幕上曾出现过一批以北京地方为背景的作品，其中有些是相当突出的优秀制作。《茶馆》、《骆驼祥子》、《城南旧事》、《如意》、

《知音》……。广大观众对此表现了浓厚的兴趣。能不能把这看作一种“怀旧”的风呢？从现象上看好像很有点像。但这与好莱坞曾掀起过的怀旧浪潮并不就是一码事。像这样的社会文化现象的出现，那原因往往是非常复杂的。过去的事物中确有值得怀念的东西，历史不能割断，记忆难以遗忘，这是极自然的。不同人对同一事物的看法则大不相同，好恶也两样。往往许多人都喜欢某种东西，但取舍之点并不一致。鲁迅也是爱逛琉璃厂的，但与某些遗老遗少就全然不同。鲁迅北来也到过信远斋，买的是蜜饯，那是因为天冷了，酸梅汤已经落市了的缘故。

从几十年前起，在北京这地方就一直有许多人在不断地“怀旧”。遗老们怀念他们的“故国”，军阀党怀念他们的“大帅”，……随着岁月的推移，这中间很换了不少花样。但这与住在北京的普通老百姓的牵连则不大。比较复杂的是作为文化积累的种种事物。有几百年历史的名城，这种积累是大量的、丰富的。好吃的菜肴、点心，大家都爱吃；故宫、北海……旅游者也一致赞叹。吃着“仿膳”的小窝窝头而缅怀慈禧皇太后的，今天怕已没有；游昆明湖而写出吊隆裕皇太后的《颐和园词》的王国维，也早已跳进湖里死掉了。总之，许多事物，在今天已只因其现实意义而为人民所记住，多时不见了就怀念。至于这些事物产生发展的政治历史背景，一般人是不大注意的，或简直忘却。这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怀旧”，与任何时代的遗老遗少都扯不到一起去。

研究近代文化史文学史的专家，还没有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近几十年以北京为中心产生的许多文化现象上，其实我倒觉得这是颇重要的，是了解新文化运动的产生与发展必不可少的环节。

以谭鑫培为代表的谭腔、以程砚秋为代表的程腔，为什么先后在北京这地方风靡了一世，我想这和当时的政治局势、人民心理都有极密切的关系。他们创造的新腔，正好表现了人民抑郁、愤激的复杂心情，新腔的特点是低回与亢奋的交错与统一。旧有的声腔，无论是黄钟大吕或响遏行云都已无法加以宣泄了。谭、程的声腔是不同的，这些差异也正好细致地反映了他们所处不同时代的细微变化。

以黄晦闻（节）为代表的新型宋诗流派，或“同光体”的发展继续，也可以看作一种时代的声音。梁启超喜欢集宋词断句作对联，同时搞这花样的还有一大批人。如其中有名的一联“更能消几番风雨，最可惜一片江山”，就不能看作简单的文字游戏。它道出了住在北方的中国人的普遍心情。姚茫父（华）曾为琉璃厂的南纸店画过一套小小的笺样，每幅选吴文英词句，用简练的线条加以表现。我以为也不失为杰出的作品。画面境界的萧瑟荒寒，不只表现了画家自己同时也是人民的情怀。

30年代林语堂编的《宇宙风》上，发表过不少记载北京风土、人情的文字，后来汇成了一本《北平一顾》，这应该说是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怀旧之作。过去我一直觉得这是没有积极意义的小品文、小摆设，发抒的是没落的感情与趣味。但后来想，这些文字都作于“九一八”与“七七”之间，那正是北平几乎已被国民党政府放弃了的时候，那么，这些文字就不能简单地划入闲适小品，而应更深入的体会那纸背的声音。

在那段时期，像这样的社会文化现象并不是个别的、孤立的。综合起来就能较为全面的反映人民的内心活动。在许多艺术家或并非艺术家说来，这就是他们反映社会现实独特方法。

时代发展、社会变革必然要使许多事物化为陈迹，这有时是不可避免的、理所当然的。其中也有一些是还应该存留、或以新的面貌恢复存在的。无论是哪一种情形，我们都应该加以分析、研究，为之作出可信的历史总结。这将为我们带来很大的好处。从而保持必要的清醒，不致陷入糊涂的、低级趣味的怀旧的泥坑，也可避免作出可笑的蠢事。对社会上存在或曾经存在过的一切事物，人们都必须表态，回避不了。而这正是对人们思想是否健康、成熟的一种考验。

1983年6月10日

记巴金

—

1942年的冬天，我和几个朋友离开上海到内地去。我的目的地是重庆，打算在那里继续读完没有结业的课程。在重庆，我没有朋友或亲属，对四川这个陌生而又亲切的省份则充满了迷惘的憧憬。我对四川的知识很大部分是从古书里得来的。例如唐代诗人李商隐美丽而不易捉摸的诗句。不用说，这是些距离现实十分辽远的古昔的影子。正如李商隐诗，“红楼隔雨相望冷”，当时在我心目中的四川，倒正像笼罩在如尘的雨幕后面的红楼吧。

在我的旅行包里藏着几封信，其中一封是一位中学里的老师写给我的。收信人是他的一个住在重庆的弟弟，当时已经是著名的作家了的巴金。好几年前我已经在天津学校的宿舍里读过了巴金的名著《家》，从小说里认识了成都。比起唐代诗人来，小说的描写可要真实、生动得多了。它更接近于现实。更何况小说里还有着活生生的人物，他们和千万个读者一起欢笑，一起哭泣。他们是住在成都的，成都是四川的一个城市；而四川则是中国的一个省……

我的旅行包里藏着好几封介绍信，全是父亲的朋友写给他们的朋友的。必要时我可能请求并获得他们的一些照拂……但其中我最珍重的是李林先生写给我的信。和千万个青年读者一样，我非常希望看到自己所熟习、喜爱的作家。自然，当时完全没有想到，我会选择文学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倒不是由于胆怯，当时多的是勇敢的狂想，其实是根本没有想到。

当我在重庆的扬子江上定居下来以后，就怀着激动的心情，跑到城里去找巴金。非常失望，他到桂林去了，没有遇见。在那一年苦闷、寂寞的日子里，我写了一些散文，记下了入蜀途中所看到的形形色色的风景、人物。1944年夏天，我离开了学校，来到桂林，准备到湘桂前线去。在来到桂林第一天的傍晚，我就到城里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去访问他，他又离开桂林到别的地方去了。这使我非常怅惘，今天我还记得一个人在斜风细雨中走过漓江江畔，在闪烁着微黄灯火的桂林街头徘徊的寂寞心情。

这以后我就到了印度。在那里我编定了我的第一个散文集子——《锦帆集》。我把这样一册幼稚的、薄薄的小册子寄给了巴金。这件事就足以说明我当时有着怎样的激情与勇气。我竟毫不惭愧地将一本年轻人的习作寄给了一位著名的作家并要求他为我找一个出版的机会。更出乎意料的是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回信很短，他告诉我已经把那本散文编入一个丛刊了。我在那封短信里没有发现一个前辈似乎应有的气派声口。这在当时甚至都使我感到有些失望。他那封装在重庆土纸印的信封里的信，我一直保存到今天。

我第一次看见巴金，是在1945年秋天的重庆。抗战胜利使我失了“业”，从昆明回到重庆，依旧住在九龙坡学校的宿舍里，开始了一个真正的“作家”的生活。那就是说，开始卖稿为生。我把一年多来看到的战争场面、人民的生活与苦难……用笔记录了下来。后来，我又成了一个记者。我到重庆市民国路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去看巴金。我在那座就轰炸后的断瓦颓垣改修的“大楼”的底层的书局办事处里看见了他。那一次见面好像并没有谈多少话。我自己说不出什么话来，同时发现巴金也并不是一个会滔滔不绝发表议论的

人，甚至是一个拙于言辞的人。我向他表示了敬意和感谢。我请他到上海后问候李林先生，我只知道李林先生在生病，却料不到那时已经邻近他生命的结束了。我很快地就结束了这次“访问”，在我记者生涯的初期，这是一次真正的“失败”。最近我还遇到一位当时在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的朋友，她还提起她当时的印象，说我那种说不出话来的样子简直不像一个记者，更不符合从我的文字中所能引起的关于我的印象。我想她的记忆是真实的。

二

《家》是巴金四十七年前写成的，是他影响最大的一部长篇小说。《家》在去年印行了新版，作者在《后记》里说，“我的作品已经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任务，让读者忘记它们，可能更好一些。”我读到这里就立即在眼前浮现了一幕不易忘记的场景。去年冬天一个早晨，我走过上海老西门，发现马路上排着一条长长的队伍，队伍之头在新华书店门前，尾巴则看不见，已经伸展到中华路上去了。在上海，排成这样长的队伍是少见的。在书店关紧的铁门上面，攀附着一大群年轻人，看样子是中学生；队伍中间有男有女，有中年人也有老人，他们都安静地排着队。时间还早，离书店开始营业大约还有两小时光景。我猜不透今天书店有什么新书供应，就找一位老先生打听，他对我说：“听说今天书店里可能供应《家》。”我肃然了一下，就赶车去了。

我坐在车上想，巴金在《家》的后记里表示的愿望，可能是并不切合实际的。今天的读者，看来还不想忘记这部四十七年前出现的作品。

我最近又读过一次《家》，连同作者为作品写过的一些序跋。我思索着一个问题，作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力量。我觉得这是个复杂的问题，应该留给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去解答，我自己只能思索一些比较浅显、更为实际的问题。譬如，作者在序跋文里反复声明，小说里只有两个真实的人物。可是四十多年来读者似乎都不大肯接受这样权威的解释，他们直到今天还在关心着小说里一些人物的命运。看来读者并不都是像“特种学者”那样有什么“历史癖”，他们对小说里人物的同情、关心，或厌恶、斥责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完全正当的。这是一种善良的愿望，应该得到尊重。而且这正是说明作品力量的所在。

四十多年前我在中学里第一次读《家》的时候，也曾暗暗研究过我们的英文老师和觉民之间的关系，也想象过小说的作者与觉慧的关连。不用说，我当时并没有什么“历史癖”，也并无野心去写什么考证、索隐的论文，有的不过是一个年青人的好奇心。我也始终没有向我的老师探询过这样的问题，那原因也并非怕被扣上唯心主义的帽子，实在只是腼腆。我失悔当时没有向李林先生提出这个问题。我相信，我是不会受到斥责的，不，他不是那样的人。

今天，我倒想根据自己的回忆，说明小说所写并非真实人物的传记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最近我常常发现，我是只能研究这样浅显的道理的，而且觉得这是我的一种小小的进步。

我手边还保存着一册1934年的《南开同学录》。这已经是历史文献了。当年的老师有很大一部分已不在人间，同学也多半久已不通音讯。翻翻旧录，却能引起许多回忆，往往仍鲜明如昨日事。在“男中学部教员”里就有着这样的记载。

“李尧林，四川成都，本校西楼，燕京大学毕业英文”。

这就是我的英文老师，冈查洛夫《悬崖》的译者，李林先生。

在我的记忆里留存的有关南开的种种，有许多是美丽的。离开南开以后，我也曾住过别的几处学校，对比之下，就使我更加觉得南开是值得怀念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南开是什么天堂似的所在，不，完全不是这样。但，我仍不能不说，南开是值得怀念的。

后来也曾在南开做过教员的何其芳先生，曾经在一篇散文里不指名地称这个学校为一座“制造中学生的工厂”。我没有听过其芳先生的课，但对他的诗与散文是非常佩服的。其芳先生的愤慨和对南开的指摘，也都值得认真考虑，但我仍觉得不能简单地接受他的那个结论。不用列举别的理由，在南开，曾经有过李林、何其芳这样的教员，就很可以说明南开的特点。更不必说这座“工厂”的大量产品中间，曾经有过许多出色的人物了。1951年巴金从朝鲜前线回国休假，其芳先生在北京请巴金夫妇吃饭，我也被一起拉去。本来想向他提出这个问题，终于因踌躇而不曾提出。其芳先生在经历了长期的磨难之后逝世，在这里我要表示一个曾经受过他影响的学生的敬意与悼念。

南开中学的教员也真是五花八门。有浑身卫道气息的老夫子；有刚从美国回来的教授太太；有才从大学出来、比大学生大不了几岁的不像教员的教员；有“从×××先生习武二十年”的武术家，自然还有必不可少的“辅导干事”。就是这样一些出身、教养、性情、作风都天差地远的人在南开独特的“教育方针”统摄之下工作，这是一个怎样复杂的矛盾集合体，是不言而喻的。在这个教员群中，李林先生是个十分突出的人物。

在他的班上，有时课上了一半，他会突然宣布，全班排队到外面去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已经忘记了，大约是到墙子河边去散步吧，反正与英语无关是肯定的。他教英语，大不注意死板的文法，而着重阅读与朗诵，还有就是教我们唱英文歌，这可是经常的，每次上课都要唱。到今天我还记得一首歌的词句和唱法：

Row, row, row your boat, gently down the stream, merrily,
merrily, merrily, life is but a dream.

这大约是，我平生会唱的、得自恩师传授的唯一一首洋歌，儿歌。

这样的教授方法，在南开的主管人看来，大约总不免有些离经叛道，不过很奇怪，并没有听到他的饭碗曾受到过怎样的威胁，他在学生中间的威信倒是颇高的。他常和同学一起打篮球、打网球，有几个月还和同学一起在大饭堂里包饭，挤在八人一桌的枱面上用不够文雅的方式吃饭。当一本小小的文艺刊物《水星》在北平创刊时，学校校园里出现了一些征求订户的小纸条，下面写着“本校西楼”和他的签名。

回忆起来，早在中学时代我就有了买书的癖好了。学校外面有一家“会友书局”，专门经售文学读物和期刊。我是每天必去，而且总要抱两本回来的。不久，宿舍床头的木板架上，就排满了新书。记得有一天，李林先生把我叫到他的宿舍去，相当激动地问我，是不是买了不少新文学的书。然后就告诉我，一个姓傅的“辅导干事”当我们上课时去宿舍查了房间，翻检了我的书物，而且作为一种“危险情况”在教务会议上提出了。他说，他在会上和这种“荒谬绝伦”的意见激烈地争辩了一通，对这种侵犯学生自由的行为进行了抗议。他有些口吃了，说明他的激动还不曾平静下来，而且可以看出，

他虽然勇敢地战斗了，但并未取得胜利。结局大约总是不了了之。他最后告诉我要小心一些。对他的警告，我当时是并不理解也不重视的，心想买两本书看有什么了不起，学校的图书馆里不是也添了些书而且用硬纸板装了封面在出借吗？但对他的出面主持正义则是感谢的。觉得他和别的老师不大一样，他是和我们站在一起的。

我回忆这些旧事，希望为读者理解《家》这本作品提供一些资料。当时也想说明，照我看，李林先生和《家》里的觉民实在并不是一个人，他比觉民还要更大胆、更活泼，对旧的传统有更多的叛逆性，他还会作出更多使读者精神一振的事来。

不知怎的，又想到了《红楼梦》。

关于《红楼梦》的争论，可谓多矣。而且不只过去争论得热闹，将来的争论肯定还会更加热闹。过去一段时期，人们正确地批判了一种荒唐的论点，那就是把曹雪芹当做太史公，把《红楼梦》当做由“宝玉列传”“林黛玉列传”……组成的《史记》。这是只有有着“历史癖”的特种学者才说得出的昏话，对这种昏话不加批判是不行的。不过事情往往不是一帆风顺的，半路上有些论客出来打诨了，他们把本来是不错的意见一个劲地推、推、推……终于推进了荒谬绝伦的所在。谁要是对于曹雪芹的身世、经历，他所生活的时代、社会，作一些深入地研究，特别是与《红楼梦》做一些对比的研究，他们就气急败坏地喊道，“复辟了！这种复辟太典型了！”这些论客和“特种学者”实际并没有什么不同，花样尽管翻新，目的原是一样。把一部伟大的作品封闭起来，加以取消。不过如此而已。近六十年前，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对曹雪芹的创作《红楼梦》说过这样的话了：

“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而世人忽略此言，每欲别求深义，揣测之说，久而遂多。”

这是十分平实的说法，经六十年岁月的检验，已证明是非常正确的说法，特别是经过某些论客的疯狂践踏之后，回过头来看，更感到这种说法的可贵，因为它是实事求是的。

我并不想拿《家》和《红楼梦》对比，不过我觉得两者的产生过程确有某种程度的近似。巴金如果没有他最初十九年的生活，没有那些他所深爱、深知的亲人，没有使他坐卧不宁的激情，那么《家》的产生就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我经过思索以后得到的简单结论。至于小说家不是摄影师也不是太史公，则是属于常识范围里的事，这里可以节约加以论述的篇幅了。

不久以前巴金在闲谈中说起，他的大哥和三哥（李林）寄给他的信，他曾经保藏了多年，订成了厚厚几册的，十年前由他自己亲手毁掉了。他说，他是不想落到“四人帮”爪牙的手里，成为“展览”的资料。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一直都在微笑着。这些信已经毁灭了，他们的影子却清晰地留在《家》里面。作品自有它的力量，它会生存下去的。不论是怎样的“英雄”，对此都将无能为力。

三

1956年我到四川去旅行，过成都时曾去访问李家的旧宅。不记得那地方已经改为一个什么机关了，只在大门口张望了一下，远远地看了可能曾经是巴金的卧室和书房的屋子，就走开了。我没有走进去，没有去看花园，没有

去凭吊鸣凤自沉的湖边“遗址”。这就证明我的“历史癖”并不太深，头脑也还比较清醒。不过我当时确是有着一种小小的计划，我想，如果要认真研究巴金和他的作品，不了解成都的种种是不行的。我在成都住了一个月。看了不少川戏，看了廖静秋的《归舟投江》，这是一个很有才华的演员，当时已经身患不治之症，但仍严肃地坚持舞台工作。巴金很尊重她这种工作精神，他和几位四川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给“人大”写过一封信，提议给廖静秋拍一部舞台纪录片。信里有这样的话：“现代科学还不能保存她的生命，但是可以保存她的艺术。”后来她留下了一部纪录片。不久以后廖静秋逝世，巴金写过一篇纪念她的文章。从这件小事也可以看出巴金对川戏的感情。

在《家》里描写过五十年前川戏演员生活的一些小小侧面，在另外的文章里他还作过更详细些的说明，看来那时候四川演员的命运和《金台残泪记》这类作品里所描写的北京演员差不多。巴金对这些被侮辱与损害者是同情的。这一点，过去巴金的研究者似乎都没有加以注意，可能就是因为人们对这种社会现象缺乏必要的了解。不过1956年的成都已经再也找不到这种历史遗迹的余痕。访问老演员也很难获得这样的材料。我看过《打红台》后访问了著名演员面娃娃（彭海清），他谈了不少表演和川戏流派，使我增长了见识，但他并没有谈旧时代演员的生活，仿佛这一切都真的一去不复返了。在成都，唯一使我感到满意的是发现了一个别有风味的舞台，当时它还被使用作一个主要的营业性剧场。它是在一个旧宅的花园里，舞台不大，池座四周有朱红的游廊，外面就是花园，大约只能接待几百个观众，在这里我看了《抢伞》、《辩钗》……这些节目，感到环境和演出十分协调。我想《家》里描写的公馆里演戏那种场面，大抵就差不多是这样子。

巴金是很喜欢川戏的，川剧团旅行演出路过上海，总有些演员到他家去作客。不管是老演员还是年轻演员，都像熟人似的和他随便谈话。川戏在许多地方都赢得了不少热情的观众，其中不少还是狂热的爱好者。碰在一起就热烈地谈起来。在这种场合，巴金只是微笑地听着，把“内行评论家”让给旁人。他在《谈我的短篇小说》的末尾说：“我从小时候起就喜欢看戏。我喜欢的倒是一些地方戏的折子戏。我觉得它们都是很好的短篇小说。”他举了川戏《周仁耍路》的例子，作了分析，指出这完全是中国人的东西，从人民中间来的东西。他赞颂了我们深厚的传统。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给作家的哺育，而这也正是研究者往往忽略了。

巴金有着非凡的记忆力。50年代初，有一次饭后闲谈，他兴致很好，随口背诵了好多篇古诗，包括《长恨歌》、《琵琶行》这样的长篇。那时我正在起劲地买旧书，他托我顺便给他找一部旧版的唐诗选本。记得后来找来了一部《批点唐诗正声》，选本并不高明，不过是明万历刻，棉纸印的。巴金喜欢买书，但从不买线装古书，这部《唐诗正声》，大约在他的藏书里算是很别致的了。他还托我从相熟的旧书店里买过一整套《绣像小说》。《老残游记》就是最初在它上面发表的。此外还买过全套的林译小说……这些都是他年轻时熟习并喜爱过的读物。他摩挲着这些书时，表现了非常的喜悦。我记起他在《忆》里的一段文字。当他还是一个孩子时，晚上在清油灯下，跟着母亲读他自己手抄的词，这是个非常美丽动人的场景，它使我想起龚自珍的《三别好诗》和诗序。龚自珍说有三位文学成就并不太高的作者的作品，却是他一直深爱的，那原因，“以三者皆于慈母帐外灯前诵之，吴（梅村）诗出口授，故尤缠绵于心，吾方壮而独游，每一吟此，宛然幼小依膝下时。

吾知异日空山，有过吾门而闻且高歌、且悲啼，杂然交作，如高宫大角之声者，必是三物也”。龚自珍在这篇诗序里表现了他独有的文学特色之外，还表现了更重要，更真实的东西。

巴金的《家》里有两个真实的人物。一个是他的大哥，这是读者都知道的。还有一个呢？我问过他。他说：“是我的祖父。”

1956年路过重庆。抽空到“米亭子”去了一次。抗战中这里曾是旧书店的集中地，此刻是冷落的多了。旧书店只剩下两三家，货色也少得多差得多。我在散堆在门板上的烂书中间，无意中抽出了两本薄薄的诗集，是民国初年成都相当精致的小字刻本。我从书末校刊的后裔列名里发现了李林和巴金的名字。我知道这该是他的祖父的诗集了。带回上海，给巴金看了果然是的。

高老太爷和冯乐山这样的人物，在1956年的成都，恐怕已经再也找不到一个标本。因此想领教一下他们的“风范”，是困难的。但我在成都市上还是买到了《诗婢家笺谱》，买到死去不久的赵尧生（熙）的诗集和木刻小本《情探》。此外，他们的遗迹在四川各地一些名胜所在的刻石上，还留存着不少。他们有着那个时代一切遗老的共性，同时也有他们地区性的个性。就是这样一些确实无疑的地主阶级代表人物，也还是复杂的，不像“四人帮”论客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赵尧生的写出了《情探》，就是一个例子。我没有用《焚香记》和《情探》比勘过。据说两者是大相径庭的。《情探》是鬼戏，是为江青之流所切齿痛恨的鬼戏。但自从三十二年前读了鲁迅先生的《女吊》一文以后，我就对诸如此类的一切高论产生了“免疫力”。无论“‘前进’的文学家和‘战斗’的勇士们”唱出了怎样慷慨激昂的高调，一概当做“呆鸟”的嘶鸣。现在看来，这种认识又十分不够了。他们哪里只是什么“呆鸟”而已呢？这又是我近来的一点小小的进步。

在我看来，《情探》里的焦桂英实在是一个带复仇性的、很美也很强的鬼魂。如果人们不是同情、反而责怪她，斥责她的斗争手段卑怯而不科学，那么，照我看来，简直就和手执核子武器，却在嘲笑第三世界人民手里的雕弓与匕首者异曲同工，实在已经大大高出“呆鸟”之上了。

为什么冯乐山，或至少是冯乐山的诗友会写出《情探》这样的作品来呢？这就是使我感到问题并不那样单纯的因由。

1956年在成都的日子里，我还访问过《死水微澜》的作者李劫人，访问过“商场”的旧址，设法吃了有代表性的川菜如“开水白菜”之类，在少城公园吃过茶……目的是想写一篇探索《家》的时代背景……那样的报道，可是这个题目非常困难，时间又迫促，终于不曾写成。

过去，我也曾和朋友合作，用这种不太聪明的方法研究过《红楼梦》，不料却成了“典型的复辟活动”、“繁琐考证”的标本。我一点不明白，为什么一碰上“考证”，江青、张春桥之流就像被掘了祖坟似的发狂、发怒、发抖呢？他们为什么疯狂地反对写真人真事的作品？似乎这些都是不可理解的。现在可是悟出一点奥妙来了。

鲁迅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描写过他婴儿时代曾经戴过的银饰，上面镶着尺、剪刀、算盘、天秤之类的小东西。这是被当做避邪的法宝的。为什么呢？鲁迅解释道：“中国的邪鬼，是怕斩钉截铁，不能含糊的东西的。”对同样的事物，鲁迅对日本朋友增田涉也解释过：“总之，这些东西，都是为了弄清事物的。可见中国的邪鬼，非常害怕明确，喜欢含混。”考证这东西，终

极目的也不过是为了弄清事物。邪鬼之见而生畏，因畏生恨，非灭此朝食不可，不是明明白白的了么？

鲁迅后来为了探究和好奇，从30年代上海的银楼里买来了几乎一式一样的银饰，叹息道，“奇怪得很，半世纪有余了，邪鬼还是这样的性情，避邪还是这样的法宝。”现在是距离鲁迅发出这种慨叹又已过了半个世纪。中国的邪鬼的性情是否有了什么改变，也正难说得很。世间大约没有什么永久不变的事物，我想，至少比起它们的前辈来，今天的邪鬼已经变得更为伶俐，只是银饰式样的法宝，已经难以制服。但无论如何，斩钉截铁，决不含糊，这样的原则，在邪鬼不曾完全消灭之日，总还是适用的吧。

四

1946年秋我从重庆回到上海，到霞飞坊（现在的淮海坊）五十九号去看巴金，这已经是李林先生逝世的半年以后了。巴金和萧珊就住在三楼李林住过的书房里，这时他们已经有了一个不满周岁的小女儿——小林。现在是小林自己也有一个小女儿了。一次，我从一面走动一面讲话的小林的侧面，又看到了李林的瘦削、带了分明轮廓的深深小酒靥，我想，有些似乎已经永远失去了的东西，也还会在无意中出现……

霞飞坊的房子的开间不大，三楼临窗放着一只书桌，铁床放在后侧的角落里，其余的空隙全部被装玻璃橱门的书架占去。书架布置得曲曲折折，中间留有可以侧身走过的通路，就像苏州花园石假山中间的小径似的。书架里绝大部分是外文书。二楼的一间是朋友让出来的，是吃饭、会客的地方。

写完了《寒夜》以后，巴金没有再写新的长篇。这个时期除了翻译以外主要是作编辑工作，还有就是读书。客厅里客人来往不断，他有时陪客，有时就躲到三楼上去。有时来了客人，喊他下来，他就披着一件半旧的人字呢夹大衣，手里捧着一本书，眼镜推在额上，从楼梯上走下来。一面招呼，一面嘴里还唧唔地说着什么。自然，这时的来客一定是熟人。

这时他们的生活过得还算平静，经济来源似乎主要靠巴金在开明书店的版税收入，他的一些主要作品都交给了开明。在那些日子里，物价一天一个样子，甚至一天早晚也是不同的。书店的版税隔一段时间付一次，还是期票。领取版税，买回生活资料，则是一场紧张的战斗。我曾经协助过萧珊进行过这样一次“战斗”。我们一早赶到书店，取到支票，立即赶到一个在银行里工作的诗人朋友那里去贴现。领到用线绳扎起的一捆捆污秽的“法币”，借了一个小口袋装了，又立即跳上三轮车。按照事先的计划，飞快地把这换成一些日用品，才长长吐一口气，安心了。整个过程只需要很少一点时间，但毫不夸张确是一场战斗。在当时以笔墨为生者中间，有进行这种战斗的幸福的人是不多的，不，应该说是绝无仅有的。

巴金是怎样工作的？我说不大清楚。他总是一个人躲在三楼的卧室里工作的，而且多半在夜里。他做有关编辑的一切工作，有时还看校样，连插图、装帧都要管。他有一本外国印的厚厚的讲装帧的书，里面收了许多文学书的封面、扉页……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文化生活丛刊》的封面设计，就是从那里面取来的。他十分看重插图，有时为了一个译本要搜集两三种版本的不同插图。平明版的契诃夫短篇集封面题字是捉住靳以挥毫的。巴尔扎克的几本小说的开本、装订，则是仿照了法国的出版物。自然并不是什么豪华版，

但素朴、大方，自有风格，装订也认真。这套书后来重印时变成了硬纸面的“精装”，我看是反而“雅”得有些“俗”了。

巴金当了十几年编辑。他最早年编成的两套书是“文学丛刊”和“译文丛书”。“丛刊”一共出了十辑，鲁迅的《故事新编》就收在第一辑里；“丛书”的第一种也是鲁迅译的果戈理的《死魂灵》。这是这两套文学创作和翻译丛书的光荣。鲁迅先生用他晚年的最后两本书，支持了这两个新创办的丛书，这件事本身就带有一种传统、接班的意义。十多年前我在一次闲谈中问他，在他看来，中国的文学译本哪一种是最优秀的？他的回答是，《死魂灵》。我是同意这个判断的。我说不出什么系统的翻译理论上的根据，但我相信，翻译果戈理，比鲁迅更出色的译者，恐怕是没有了。

九年前张春桥曾经对一些搞“调查报告”的人发过一通“指示”。张春桥对列宁的只从经济上划分阶级十分不满，他要“发展”列宁的理论，他主张要从政治标准的角度考虑问题。张春桥把一大群人都定为资产阶级之后说，巴金算什么阶级？这个人实际上是个资本家。张春桥举出的理由是巴金家里是大地主，而自己则开过书店。

张春桥的“指示”提醒我们，巴金在文学编辑、出版方面所作的工作，是引起了这个帮的密切注意的。

手头没有“文学丛刊”，也没有“译文丛书”，说不出真确的统计数字。根据我的印象，这里出现的作者，已知名的和新人的比例至少是一半对一半，有时甚至是三与一之比。有许多有成就的作者，当他们在“丛刊”中露面时，都是不折不扣的新人。这样的编辑方针，怕不是一个精明的出版家所能同意的。巴金居然这样把书店开下来了，居然有了成千上万的读者，同时还涌现了一批优秀的作者。用张春桥的理论加以衡量，也可以算是一个奇迹。

写到这里，看到巴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纪念何其芳的文章，引起很多回忆。何其芳最早的一本诗与散文合集《画梦录》，就收在“文学丛刊”第一辑里。《扇上的烟云》就是这个集子的代序。这是一本薄薄的集子，全书也不过只有几万字吧。作者当时还是“一个穿长袍的斯斯文文的大学生”。今天的读者恐怕很难想象了，这样一本小书，在当时曾经引起过怎样的影响。就任其芳先生称之为“制造中学生的工厂”的那所学校里，它引起了毫不夸张的一种震动。人们传说着，一颗文坛上的新的彗星出现了。不久以后，同学们又以怎样的热情迎来了这位年轻诗人作自己的先生。我没有被分在其芳先生的班上，没有听过他的讲义，但自《画梦录》出现以后，我就是他的一个忠实读者，而且在以后学习写作时，总是记着这样一位先生。他后来所写的一些散文，《呜咽的扬子江》那一套旅行记留给我的记忆尤深。这些文章都收在《还乡杂记》里，这本书最早的版本在封面上却大书着《还乡日记》。这本书的样子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着，虽然书是早已失去了。

“文学丛刊”第一辑还给中国的读者和观众介绍了曹禺和他的《雷雨》。这以后又在接下去的几辑里介绍了《日出》、《原野》、《北京人》……我从“南开同学录”里还查到曹禺的名字，他是1928年的中学部第二十一次毕业生，还知道他有一个别号“小石”。

我手头没有“文学丛刊”，无法，但也没有必要提出更多的作家和作品了。当然不是说这里出现的都是“篇篇锦绣，字字珠玑”，但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的痕迹，却是张春桥之流无论如何也抹杀不掉的。

我看见过巴金那张不大的书桌，那上面堆放着怎样零乱的一大堆书报、

原稿……但我没有看见过他在这张书桌上工作的情景。不过我知道，他把生命的多大一部分消耗在这里了。今天，巴金的头发已经完全白了。每次我看见他，看着他那满头的银发，总会产生一种异样的感觉。1962年他的头发还是全黑的，使他的头发变白的，并不是四十年的工作，而是别的什么东西。我知道，这里有着一部没有字、或还未写成字的书。最近我还听他说起要写这样一本小说，我知道他不是随便说的，他是会写出来的。

巴金和他的哥哥李林在性格上是很相近的。无论是谁，和他最初接触时产生的矜持，总会在短暂的时间里消失，就像冰块遇见火一样。他当然不是一个演员，也没有受过什么交际训练，他甚至在这方面常常表现得相当笨拙。他有着一种特有的、完全不是造作出来的坦率与真诚。这实在是很有力量的。三十年前我称他先生，今天我还是称他先生，习惯了。这当然不是平常泛泛的敬称，可是我从未在他身上发现某种前辈的气息。和李林一样，他是自己的学生，后辈的朋友。

1947年，我在工作的日报被国民党封闭了，一时失去了写作和发表作品的地方。

这时，巴金把李林没有完成的威尔斯的小说《莫洛博士岛》的译本交给我，鼓励我把它译完。我向他声述我的语学素养不足承担这样的任务。他只是简单地微笑着说了些什么，就使我不能再表示反对。当然，我的天真与勇敢也是起了作用的。这以后，同样在他的鼓励、提示之下，我还译过另外几本书。这些都是不成气候的译本，但想起这些总会给我带来一种温暖，因为它们的出现是在被缴了械以后的事。也许可以不大恰当地比做“地下工厂”的出品吧。即使是被大石头紧紧压着，小草也还会钻出地面、生长、发育，石头再大再重，对水分和阳光是无能为力的。

和李林的冷静孤介不同，巴金是更为热情的。但这只不过是外表上的差异。在谈天的时候，对一件事，一种社会现象，他常常会激动地发表意见，说得很多。往往说不下去了，就皱起眉用断续地“真是，真是……”结束。多少年来他一直保留着这样的习惯，他现在是年过七十，满头银发的老人了，也还是这样，一些都没有改变。有时会感到他比过去激动得更厉害。谈论的事情有时是很细小的，但引起激动的因素却并不细小。他不可能是一个好演说家。他常常面对不少听众发言。这时他往往读他自己写好的稿子。就这样，听了还会使人激动。主要原因是他说了真话，说了人们所关心的一些重大的问题。二十年前，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十四卷《巴金文集》。这是他自己编的，收进了解放前的全部作品。对这一套“文集”，“四人帮”的评价是“邪书十四卷”；也有人认为，编得不太谨严，把什么文章都收进去了。这也许是有道理的。不过我总觉得，把自己几十年来所写的一切，全部展现在读者面前，这事情本身就是了不起的。这需要惊人的坦率、勇敢。这件事，很好地说明了作为一个作家，巴金身上最本质的东西：正直。

五

巴金写过好几本旅行记，这些都收在“文集”的第十一卷里。他还说过“我爱旅行”这样的话。

我不大清楚，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哪些算是正宗的“游记”作品。像《徐霞客游记》那样地理学家的著作，我是不喜欢的，只是作为科学家的调查报

告，加以尊重；柳宗元写的山水记也是有名的，我同样不大喜欢，觉得它还不如也是科学著作的《水经注》的有些片段写得好；柳宗元的追随者在千余年中所写的大量刁钻古怪、费尽心机的“游记”，我也同样的不喜欢。

巴金的“游记”作品，大概也不能称做正宗的“游记”。他的确描写过不同地域的风景、道里……但对古迹、名胜、土产……这些却毫不在意，在旅游事业蓬勃发展的今天，怕是不能满足旅行爱好者的要求的。在他的“游记”里，依旧是平凡的人物的生活和他们的快乐与痛苦的纪录。小说家写游记，大抵总会写成这个样子的，我想。

解放初期巴金参加了老根据地访问团，我是随团的记者。在一个多月中间，走过济南、沂南、镇江、扬州、盐城、兴化……许多城镇；工作之余，也抽空到过一些地方，不过这大抵并非名区、胜景，说来可笑，只不过是找个什么地方去喝茶、吃东西而已。

在济南，一天中午，我们走到一个地方去吃午饭。这家饭馆很别致，大约也颇有名，可惜记不起它的名字了。这是一个大园子，外面有围墙，十分破败了，进门以后就远远看到一个很大的水塘，塘侧是一座水阁，看起来是上百年的建筑物了，也许还不止。水阁楼上临窗有十多张桌子，空落落的只有我们两个顾客。坐下来就正好望着那个水塘，倒是十分出色的。济南著名的鲤鱼就养在塘里。这里的名菜就是什么×鲤鱼。

这实在是一个出色的饭馆，比起杭州的楼外楼，要好得远。

著名的鲤鱼的味道，今天一些都说不出来了。只记得我们在走近园门之前，在路侧看到的两座石碑。并非近时的制作，雕镌也颇工致，一座碑上大书道“秦琼故里”（秦字上面可能还有“济南”二字，记不真了），另一座碑上好像写着有关“三十六友”之类的字样。

在楼上落坐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向堂倌打听山东好汉秦琼的故事。他十分严肃地告诉我们，秦叔宝的故居确在这左近，而我们现在坐在上面的水阁，就是有名的“三十六友”结义之处的“贾家楼”了。我们也很严肃地听取了他的说明。

在吃着著名的鲤鱼中间，记得我们曾经进行过有趣的讨论。

当时议论了些什么，也完全忘记了。只觉得碑文非常有趣而已。

济南是有不少“古迹”的，我们没有去访，却在全然无意中碰到了这个似乎不曾有人提起过的“名胜”。

另外一次是在扬州。住在招待所里，偶然出去走走，在邻近不远的地方发现了一家茶馆。这茶馆是很特别的，大约是过去一处私家园林。从狭狭的弄堂走进，走进一座小小的门。里面是曲曲折折的游廊。扶疏的花木，和小巧的厅堂轩馆，这些也都久未修饰，颇为荒落了。但花木还在的。别致的是茶座就安置在每个能放得下小茶桌的地方，疏疏落落，星罗棋布，吃茶的人很不少。这很引起了巴金的兴趣，四川的茶馆是有名的，花样也很多，但像这样的茶馆却没有见过。于是就坐下来喝茶。这家茶馆的名字是“富春”。后来知道是个有名的地方。不但卖茶，还有点心，点心的花样也真多。每样试试，没有非凡的胃口是不行的。味道也很好，我记得有一种特大的包子，用香菇和其他材料做芯子，是非常出色的。平常多看见“维扬细点”的市招，这次才算真正得到一些理解。我们就这样坐着喝茶，吃点心，谈话，忘记了时间，一直坐到招待所里的人找我们回去吃晚饭为止。

这些小小的愉快的回忆，也许可以帮助说明作家生活的一个侧面。多年

来，我不记得他曾主动提议过到什么地方去旅行，去看戏，逛街……有时也偶尔出去吃杯咖啡，但咖啡究竟不如沱茶的有味，不能一次次地泡下开水去。我想可能是因为，我开始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是个中年人。

最近，当他的生活又开始忙乱起来以后，因为感到疲倦，打算到杭州去住两天。我问他想玩些什么地方？他眯起了眼睛，愉快地表示了他的希望，想到西泠印社旁边的茶座去喝喝茶。他从杭州回来以后，告诉我坐了一部车子跑了很多地方。我想，这大概不是他所希望的休息方式。不过他最后说：“还好，最后到了虎跑，喝了茶。”

如果说喝茶是巴金的嗜好的话，那也许是可以这么说的吧。

他也确实还有别的喜欢的事物，那就是书。他喜欢买新书，更喜欢买旧书。这里所谓旧书是指旧的外文书。上海过去很有几处可观的外国人开的旧书店，解放后另出现了几家，经营者大抵换了中国人。我陪他去跑过几次旧书店，他的兴致总是很好，当拿到一册好书时，眼里就会闪烁出异样的欣喜与光彩，用手提起厚厚一叠书时，也显得毫不吃力。我记得他曾买到过红色布面的蒲宁的全集，非常喜欢；还有一些旧俄作家的文集，还是十月革命前的版本，这都可以算是善本了。可惜我对此缺乏起码的知识，说不出更多的细节。记得有一次，他取出一册新得到的英国印莎翁戏剧人物图集给我看。虽是第二版，却也十分名贵了。那是彩色印的铜刻画，只有十幅左右，实在是美丽极了。巴金后来迁居到现在的住所，搬家时我曾自告奋勇去帮忙搬书。我看见堆在楼梯上下一捆捆的书，我实在只不过搬了两三捆。

巴金曾经珍重收藏过一些名贵的作家手稿。他给我看过鲁迅先生的原稿《选本》，还是寄给在北平出版的《文学季刊》的稿子，那真是一件艺术品，通体几乎没有什么改动，用毛笔写在印格的毛边纸上的。还有鲁迅先生《立此存照》的手稿，写在小幅的宣纸上，其中的引文，就从原来的报刊上剪下，贴在文稿中间。这使我明白了鲁迅文章中经常提到的“剪而贴之”的真相。还有先生在宣纸小幅上手书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封面题字，古朴如晋人碑版。这些，后来都已赠给了鲁迅纪念馆。巴金还为北京图书馆的手稿特藏部搜集了不少大部头的创作、翻译手稿。

一个作家对书物的感情，是很难用几行文字作出满意的表达的。鲁迅先生曾经讲起，一个文人节衣缩食去购买书籍，那心情正如绿林英雄的不惜重资买进盒子炮。大概也确是如此的吧。可是，这样平凡的事实，后来一度竟变成了难以理解的玄思妙想。几年前一些“四人帮”的打手、爪牙就曾理直气壮地质问我，“一个人有几本书，是平常事。可是你却有这么许多，想干什么？搞囤积么？”

这难道是吴敬梓或斯惠夫脱他们编造出来的么？不，这是真实。他们哪里想得到、写得出，我不相信世界上会有这样的天才。

六

巴金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四人帮”说他在1962年上海文代会上的发言，《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关于此案，我知道一点故事可以在这里说一说。

揪出、砸烂，并深入揭批“四人帮”，确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大斗争、

大革命、大胜利。通过近两年的工作，人们对“四人帮”是已经获得了一个概念的，不过还不够完整、深入。譬如说，“四人帮”的形成，以及它的流毒和余孽这样的问题，就都还值得深入研究。

姚文元这个角色的发迹并不太早，距离他的覆灭前后不过二十年，但一出现，就以其非凡的特色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其变化之快速也着实可惊。从吧儿到疯狗，演化的过程并不需要多长时间。姚文元很早就已获得“棍子”的声名了。人们送给他这个徽号，本已表示了明确的态度，没有必要添加多余的形容词。形容词是后来由江青补加的，叫做“金棍子”。

巴金 1962 年的那篇发言的确涉及了“棍子”，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人们一听就会联想到姚文元，这正是十分自然的事。记得那是一个很好的春天早晨，巴金发言以后，会议休息，人们在草地上散步。有很多朋友围着他谈笑。大家都说他讲得好，我却觉得他当时做这样的发言是冒着很大的风险的。巴金爽朗地笑着回答人们的问候，好像一点都没有什么。我想起他的发言的题目里有“勇气”字样，我想这确实需要一点勇气。

过了没有几天，上海文联举行唐代大诗人杜甫的纪念会。我赶到上海艺术剧场时迟了些，会议已经开始了。就在最后一排空着的位子上坐下来，我看见巴金还有几个别的人正坐在主席台上。不一会又有一个人进场，一屁股坐在我旁边，他不去听台上的报告，也不向左右张望，忙不迭地从袋里掏出一册刚刚印好还没有发卖的《上海文学》，翻开第一页就在暗淡的壁灯光下看了起来，打开那一页就是巴金的《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

他埋头读着，读罢一段就向主席台上一看，一面发出没有声音的暗笑，露出了满口的牙，接着就又埋头去读下一段。他偶一回头，使我看到了那露出得意神色的凛然的目光。这正是姚文元。

会议开了不到一半，姚文元就站起，把杂志塞进衣袋匆匆溜掉了。关于杜甫的报告，我一个字都没有听见，我的注意全部被姚文元吸引去了。我看到了一匹窥伺着猎物的牧羊犬的全部动作，似乎也理解了它的全部心理活动。区别仅仅在于，驱使着牧羊犬的是动物猎食的本能，在姚文元这里，更多的却是仇恨。这当然是一切畜生所无法企及的。至于这仇恨的不仅限于“个人恩怨”，它还有着更为深刻的内容，那是十多年后才慢慢悟出来的。

这以后果然就出现了一些流言，慢慢地流言变成了暗流……

从 1966 年下半年开始，我就没有再和巴金接触。他开始“靠边”的那些日子，我有好几次看到他在淮海路的邮局里买报，看见他一个人慢慢向作家协会走去，好几次想叫住他，都抑制住了。除了在报上看到他的名字用七行铅字排进标题以外，几乎没有听到他的任何消息。“四人帮”的爪牙经常“教育”我要学会“举一反三”，“由此及彼”的本领，我也确实学会了这种本领，我从自己的切身感受里好像目睹似的看到了他的处境。“牛棚”的样式虽然千变万化，“牛棚”里的气息却是息息相通的，闭着眼睛也能想象出来。

还是不久以前，从一位朋友口中，听到了他的一件“轶事”。那是在“干校”里发生的。他和另一个人同抬一筐饲料。路经一条垅沟，失足跌了进去。连忙爬起，身上的棉衣已经湿透，眼镜也失落了。赶回宿舍换了衣服，又慢慢摸回去，摸下垅沟，在烂泥里摸，摸来摸去，还是没有，后来水退了，发现眼镜却平安地睡在沟边的草地上。

当我听着他这个真实的故事时，我仿佛亲眼看见他那缓慢移动着的身影，看见他那覆满银发的头在芦苇丛中出没……我没有话，也不想再去打听

另外的故事，这已经足够了。

这中间我又听见了萧珊去世的消息。我连去吊唁、送葬的奢望也没有，在当时，这似乎是只有在小说《镜花缘》中才会出现的幻想。何况我听到消息时事情已经过去了许多了。

又过了好一些日子，我陪从北京来的一个画家朋友去访问了巴金。画家是接受了他的一个亲戚长辈，也是巴金的老朋友的嘱托，走过上海时代他问候。更重要的是要亲自看看巴金本人，听听他亲口说的话，哪怕是几句平平淡淡的话也罢。那时候，传说那么多，人们有时就不能不求助于更为原始的手段。

那时要去看望巴金也很不容易。好像要通过什么关系。这都是那位画家去经办的。在约定了时间以后，我随他去了，这是过了七年以后我第一次看见巴金，就在那一次，我发现他的头发完全白了。

他当时只能使用原来是客厅的一间房间，吃饭、睡觉、做事、会客都在这里。贴墙的一排大书橱也还在，但却封着。那位画家朋友是以机智风趣著名的，这时却变得蠢笨了，我自己就更不必说，我很不满意自己。

我们只坐了不多时候，大约吸了两支烟以后就告辞了。走到马路上以后，我却有着如释重负似的满意心情。原来的担心解除了。我发现他的身体更主要的是精神，还是老样子。他完全没有被压垮，用“四人帮”的语言来说，这个“毒瘤”完全没有被“化掉”的迹象。他十分坚强。他告诉我他在译赫尔岑的书，已经完成了第一部。改好以后准备自己好好抄一部清稿，保存起来，他没有提到出版，只是笑了笑。我记起很久以前他对我说过，赫尔岑的《一个家庭的戏剧》是他自己最满意的一本翻译。他现在继续翻译这本厚书，完全不带排遣余年那种消极颓废的情绪，这在当时那些阴晦的日子里，原是很多老人或多或少都有的心情。我用不着对自己不满，其实用不着说什么多余的废话，我已经获得了满意的回答。

又过了两年。1976年10月下旬的一天，在挤满了欢乐人群的淮海路上我又看见了巴金。他站在襄阳公园转角处，仰头在看一张高高贴在墙上的大字报。这次我没有踌躇，在他背上拍了一下，叫了他：“你好！”“你好！”这就是全部的对话了。我发现他显得年轻，也许是他那天戴了一顶帽子，遮住了头发的原故。他终于亲眼看到了“四人帮”的灭亡。

现代中国史上，充满严酷斗争和胜利欢悦的不平凡的一叶，终于揭过去了。

近两年中间，在祖国的大地上，发生了许多使人民高兴的事。除了使大家都感到高兴的大事之外，每人也都各有一些自己感到高兴的小事。现在，又有可能时时到巴金那里去喝茶、谈天就使我感到十分高兴。

虽然现在得不到多少人承认了，我还不能忘记我曾经是一个记者。记者有记者的习惯，或积习，总想使自己的见闻使大家也都知道，明白。下面是一些最近在巴金那里的见闻，也自然都是些小事。

有一次我走去谈天，一见面巴金就告诉我，刚刚检查了身体，心、肺……全身都没有什么毛病，看得出他是很高兴的。我知道，最近他公开作过承诺，“写到八十岁我有把握。”他的高兴是有理由的。

又有一次，我走去时他正有客人。过了一会我看见他送了两位解放军出去了。这是二十多年前他在朝鲜战场上结识的战友。最近他的客人很多，大半是过去没有见过面的，有些还是从国外来的。有一次，他拔去了几颗牙齿，

不好说话，谢绝了一次访问。不料从美洲来的华侨说，不要紧，并不需要他说话，只要看见他就行。

每次邮递员来时总给他带来一大堆书报信件。他习惯地把眼镜推到额上，一封封地打开来看。一边看一边说，实在应付不了这许多来信，得找个人来帮忙了。有的读者还寄了厚厚的稿子来。一次，他从枕头下面取出一封厚厚的信，告诉我这是一个日本读者寄来的。这个素不相识的日本朋友细读了他的不少作品，把自己的意见写信告诉他。他抽出信来翻出一段读给我听，是分析他的作品的主题思想的。听得出来，这不是一个职业的文学评论者；但也听得出，这封厚厚的信是真诚的，是经过认真思考以后写下的。

一个作家可以比做一棵树，植根愈深，根系铺展得愈广，树身就生长得愈粗壮，枝叶也更繁茂。这是很浅显也很正确的道理。“四人帮”一伙对许多作家的残酷迫害，最凶狠的一手就是企图把树根斩断，这是从根本上毁灭一个作家的有效方法。从巴金自己和许多受过迫害的作家的大量控诉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个事实。“四人帮”还刮过多少次“台风”，有些树被连根拔掉了，有些被吹得东倒西歪，不成样子。但多数躯干生得正，根扎得深的树终于存活下来了。他们又从人民那里源源不绝地得到滋养，千万条稚嫩但生命力极强的根须又很快地铺展开来，于是老树的枝叶也日复一日发生了新的变化，我从巴金身上看到了这个事实。他阅读那些不相识的读者寄来的信时，我注意他面部的变化，这里有欢喜，有激动……我产生了一种植物学家在显微镜下观察植物根系吸取水份、营养时同样的感觉。

巴金是恢复了他的青春的，证据是他从1977年5月以来写得不少。还没有一个重新拿起笔来的老作家能与他相比。他是勤奋的，他说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说这些意见好，是因为这是出自一个真诚的，勇敢的，关心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命运、人民的命运的作家之口的。

衷心祝愿老树开出茂密馥郁的繁花。

1978年秋

萧珊的书

这一篇本来是早已写好了的。今天读了巴金怀念萧珊的原稿，觉得文章不能不重新改写了。三十年前我和萧珊曾经是很熟的朋友。对于她的死，我是应该用文字来表示自己的悲痛的。除了文字（尽管它是那样的无力），我还能有什么别的手段么？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从十二年前的秋天开始，我就不再能到她家去作客，后来连她们的消息也不知道了。记得1967年春天的一个清晨，我到报社去上早班（当时我是一名运输卷筒纸的装卸工），在圆明园路北京路的转角处曾经看见她一次。当时她和另一位中年妇女在一起，匆匆地向外滩方向走去。我发现她憔悴得多了，但灵活的举止还是旧样。她大约没有注意我这个穿着劳动服的装卸工，我自然也没有去打招呼。现在想来，这是我最后一次看见她了。

她的病和死，我还是过了很久以后从人们的谈话中听到的，当然也不可能打听那详情。直到最近，我也一直没有向巴金打听过。很早我就知道他在写这篇文章，后来他曾几次谈起，文章只是开了个头，写不下去了。在这样的场合，我不想接口，总是岔到别的事上去。我明白他的心情。我担心他禁不起这样感情的重负。直到从他手里接过了原稿，才算舒了一口气。我为老人的坚强而高兴。我相信他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努力工作的诺言不只是说说的。通过这一篇浸透血泪的文字，我得到的是激励与鼓舞。我相信，阴暗的过去带来的必然是阳光璀璨的未来。在人类的历史上毫无收获的牺牲还从来不曾有过。

《怀念萧珊》记下的是充满了悲痛的故事，我倒想在这里写下一些欢快的记忆。自然我所知道的并不多，也不过是1946年以后十年中间的一些往事。当时，霞飞坊巴金的家——只是三层的一间书房兼卧室和二楼的一间客厅兼饭厅——曾被朋友们戏称为“沙龙”，萧珊就是这“沙龙”的女主人。每天下午和晚上，这里总是有客人，有时客人多得使这间正中放了一张圆台的屋子显得太逼窄了。客人当然绝大多数是巴金的朋友，但也有萧珊的一些搞文学的大学里的同学——她曾经是昆明西南联大的学生。不过不管是老一辈或同辈的，她都接待得好，客人们都喜欢这个女主人。她是宁波人，不过我好像没有听见她说过家乡话，她好像也不会说四川话，她说的是普通话，不够纯正的普通话。她高兴的时候，用不够标准的普通话和朋友谈笑时，真有一种生气，同时也极大地显示了她的善良、单纯、愉快的性格。她一直生活这样的环境里。熟朋友如靳以见面时总要对她讲两句笑话，有时还打趣她，靳以是把她当作小妹妹看待的，叫她的名字时总要把尾音提高拉长，巴金也总是这样叫她的。

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我一点都不了解她的处境，但那一切却都是可以想象的。我担心，她怎能忍受得住那些超出想象的折磨和侮辱？她能挺过来吗？事实已经证实，她没有能挺过来。

有时候她会显得有些神经质。那是弄文学的人所不可避免的。她常常捧着一小册屠格涅夫或别的欧洲作家小说的英译本在读，蜷着双腿偎在长沙发里细心地长久地读着。这时她就会跟着小说里人物的命运走，有时会提出玄妙的饱含哲理的问题或见解。这一切和窗外的现实是隔得多么辽远，但她提出这些来时是认真的。当她自己发现这一切不免有些突兀可笑时，就腼腆地一笑，合上书，又回到现实生活中来了。

就是在这前后，她开始译一点屠格涅夫的小说。我曾读过她最初的译稿。她还要我给她的译文润色一下。可是我哪能有这样的狂妄。她有她自己的风格，她用她特有的纤细灵巧女性的感觉，用祖国的语言重述了屠格涅夫笔下的美丽动人的故事，译文是很美的。

这就是 1953 年夏出版的屠格涅夫的《阿细亚》。前面附有五幅精美插图的一本小书。正因为这是一本小书，它又幸运地回到我的手里。紧接着她又译出了同一作者的《初恋》、《奇怪的故事》，和普希金的《别尔金小说集》。现在这几本书的平装本和精装本都已回到我的手中，这是使我感到非常高兴的事。

这些书的译成和印制都曾为人们带来很大的愉快。平装本是毛边的，这是有意继承五四以来最早的新文学出版物的传统。从《奇怪的故事》开始，又印了特印本。是蓝绸硬面烫金的，每种印的不多。我在印《旧戏新谈》时曾买了一些重磅木造纸做封面，还剩下了几十张，这时就献出来。巴金笑说，这拿来印书一定不好看。但印成的一百零五页的《初恋》，却实在不坏。米色布面烫金，封面是两匹马和一个坐在雪橇上的人。

.....

我很惭愧，只能用这样的文字来给萧珊作纪念。我希望，她的遗译还会有重印的机会。我相信，喜欢、感谢她的劳动成果的人，在我们可爱的社会主义祖国里，并不只是一个、两个。.....

忆俞平伯

—

我的开始与平伯先生通信，大约是在1940年。抗日战争后期，鲁迅先生的遗族因生活困难，有出售先生留在北平藏书之议。风子兄等几位受许广平先生之托，去北京劝阻并处理此事。顺便也访问了平伯先生，请他写了一张字，回沪后裱好挂在书房里。我看了非常羡慕，觉得实在是写得美极了。记得写的是临褚河南的《枯树赋》。就冒昧地寄了纸去，也要求照写一张，不久寄来了。果然神采飘逸，秀色夺人。这是一个短卷，用的是染了色的宣纸。这正是我当时附庸风雅的一种表现，以为染了色的纸总显得更为古雅，其实是弄巧成拙了。这张字没有付裱，夹在一本书里，历劫尚在，真是极大的幸事。原题“丁亥夏日，黄裳先生属临，即希正之。德清俞平伯”。下钤“德清俞氏”朱文方印。此印后来亦未遗失。1983年平老寄赠《论诗词曲杂著》时，卷钤所钤仍是此印。

也就是在这前后，平伯先生又寄来了他手写的《遥夜闺思引》，正与写《枯树赋》同时。这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用珂板道林纸影印，用两束红毡线订成一册，别致而雅洁。用“仿绍与本通鉴行格”纸写。版权叶题“中华民国三十七年五月，再版景印共叁百册。自写遥夜闺思引第六本。著作者，俞平伯，发行人暴春霆，承印者北平彩华印刷局。有著作权，不得翻印。定价国币拾贰万元”。伍、再、叁、拾贰等字皆空出，别用铅字红印。我不嫌琐细抄下这些，实在因为这本小册子也已是罕见的珍本了。这是一首纪事抒情的五言长诗，但不易理解。诗现收入《俞平伯旧体诗钞》中，书前叶圣陶序中说：“抗战期间，他作了一首五言长诗《遥夜闺思引》寄到成都给我看，我看了不甚了了。后来在北京会面了，他把这首诗的本事告诉我，把各个段落给我指点，可是我还是不能说已经理解了。这就是差距。”连叶圣老还不甚了了，就无论我辈后生了。不过字写得实在美，真是风神绝世。我就是当做帖看的，虽然没有临习过，也自知不是写字的材料。自然也欣赏篇中的清词丽句，觉得真是一种享受。

从此，就经常有函札往来，平老也偶尔写示所作。检点旧藏，还剩下两幅，除已印入我的《珠还集》的一首已辑入“诗钞”外，可补的佚诗还有六首：

棠梨玉倚沁园开，一似晨妆梳洗才。
雨甚风斜和粉泪，悄无蜂蝶过墙来。

三春花草轻离忧，婪尾犹堪敌素秋。
榴蹙红巾荷透水，合昏香满小庭幽。

南都城郭夕阳残，西望谯门指点间。
向晚青连江上驿，居然重睹六朝山。

（此纪梦之作）

佳游多半凤城西，出郭应知往迹迷。

桃瓣凋零新杏蕊，夕阳含雨又凄凄。
落英无主任风飘。飘堕泥中色尚娇。
重见红芳春烂漫，轻翻胡蝶恋花梢。

畸微名姓写春波，伫久河桥眼倦搓。
惆怅兰桡归未定，海云消息近如何。

二

1950年我到北京，曾到老君堂访问。这是我与他的首次相见。当时我在报纸编副刊，就顺便向他约稿。他当时经济情况好像不大好，也想作文换点稿费，但苦于没有题目。我就提出他早年所作《红楼梦辨》绝版已久，大可修订重写。他欣然答应了。于是后来出版的《红楼梦研究》的开头几章就在我编的副刊上发表。我还保存着几页原稿。他是不喜欢用稿纸的，随手抓着什么纸就写，大笔行草，辨识不易。不料竟因此而引起后来的一场轩然大波，这是我至今还觉得歉然的。这事他也还记得。我在《榆下说书》中曾引用他1950年一信，谈《红楼梦研究》出版经过，他读后给我的信说：“引弟五年书，可知重印《红楼梦辨》只为经济，与政治无关。可供谈《红》资料，亦第一手资料也。”

这以后就是二十多年的睽隔，音信不通，直到70年代后期，才又恢复通信。检点手边尚存的残零书札，竟还有二十来通。最早的可能是下面一书：

黄裳先生：奉五日手教，多承奖借，不胜愧荷。而谈言微中，窃有喜焉。三十年真如弹指，而世变之亟即在其中。曾有《鹧鸪天》云，“正道沧桑寄此身，飘零文字水萍因。”诗稿八卷，佚于丙午，前尘往事，过眼飘风，不复。

措意焉。缀辑词稿仅得数十首，亦不甚完全而所失不多。若海外印成，缘法亦可喜也。书中言往岁为公写字，均已不存。涂鸦何足惜，风雅意之惓惓焉。附奉前年所书南洋复制《如影》一册博笑。匆匆不尽，即候撰祺。平伯，三月十三日。谈红大作惜未得读，又及。

《如影》是他手书的近作，在新加坡复印，其中颇有斥责动乱中群丑之作，是诗人晚年干预生活直抒胸臆的作品，并未收入《旧体诗钞》。1960年以后的诗，作者是想另编一集的。从这时开始，我就又向他索书，前后所得不少。但已不再是早年的面貌，转为苍劲朴厚。1980年6月12日信说，

黄裳兄：惠两函次第收到。冗病迟答为歉。周姜二集皆珍品，容留读再奉上。谢刚主曾来，示之，伊更赏白石集，云难得。弟于板本是外行，其鉴赏当非虚，承惠南湖春雨图照片，弟夙慕娄东歌行，尤喜鸳湖曲，得之何殊拱璧，多谢多谢。近与圣翁摄影，又题俚句，一并尘览。复颂近安不具。平伯，六月十日。

又用诗笺写海棠诗一首，题为“八年四月海棠花前偕圣翁留影五言一首”诗云：

海棠稍晚晚，天气渐清和，
并立花间影，心期快若何。

我藏有周清真姜白石词集，因平老甚爱美成，所以寄去请他一看。周集是新刻，但由费寅手度王幼遐、朱古微、郑大鹤手批几满，底本多假得于嘉业堂刘氏及其他海上藏家，是很难得的。姜集则是康熙中武唐俞兰所刻，是少见著录的本子。难怪谢刚主要说它难得。“南湖春雨图”是吴梅村的手迹，上端有自书“鸳湖曲”全诗，与通行集本有异字。画为过云楼旧藏，后归上

海博物馆，我设法得到了一份照片，在喜读梅村诗的人一定会大有兴趣。与此同时我还把俞氏家集两种寄去，于1980年10月19日得复书云：

黄裳先生左右：赐书及珍本多种，次第收到。其中曲园公金缕曲单行本。曩所未见。家姊遗诗，刊版亦早零落矣。知有损惠之意，心铭奚似。蜗居芜杂，弟亦衰病，不如仍归邮架，庶几物得其所，寒门与有荣焉。弟涉猎殊寡，於板本芒无津涯，未敢妄涂，惧伤佳品，当谨为葆存，暇日披寻，可祛尘氛，其拜嘉惠多矣。港新晚报（9月27日）载郑逸梅君文谈弟儿时事，未知见及否？勿答不具，即颂撰祺。弟平伯启。10月19日。

同封又一信，

书未发，展诵尊藏《裁物象斋诗钞》，有题《浮生六记》诗，集端署名“阳湖管贻荪树荃”。按六记旧本，今刊俱作贻萼，或字误，或更名未可知，而荪字决不误。得校正此一字，不啻百朋，亦快事也。以闻。平又及。

三

数日后又有一信，附来《浮生六记的两个问题》一文手稿，也谈到题词人的名字，有“一字之差，关系匪浅”之语，又校正题诗异字，并推定沈三白的卒年。这一册晚清人的诗集，到了他手里，就能发现不少胜义，于此可见平老治学的严谨。

我曾从琉璃厂得到过一些旧纸，大都是从清宫中流散出来的高丽五色笺，其中有一种用小封套装起的高丽镜面纸，每只一元。不知道用途，推想可能是皇帝用的便条吧。这些旧纸因为没有字，在抄家时被放过了。就寄给他求书，他写来的是一副联语，

踏月六街尘，为观黛玉葬花剧；
相逢一尊酒，却说游园杜丽娘。

原附有小注。上联云，“民国初年，梅畹华初演斯剧，得往观场，未相识也。”下联云，“晚年於萃华酒楼座谈《牡丹亭》，拟赠以此联，而君艺名千古矣。”

此幅书于“庚申一九八 三月”。极工致，在我所见平老的晚年书中，是极难得的经心之作。联语提到《牡丹亭》与《红楼梦》，都是梅畹华的名剧，也都是平老潜心欣赏玩索数十年的名著。绾合得实在术巧了。平老喜拍曲，尤爱“牡丹亭”，曾写数文研讨，想来他们在席上相逢时的谈话一定是欢畅的。而他对梅的倾倒与伤逝，也在寥寥数语中显示无遗。这一幅小笺，实在是可当三绝而无愧的。

我又藏有曲园致朱之榛手札九通，都是写在自制笺上的，曾托君武带去，拟持赠平老，他覆信辞谢。1981年冬一书云，

黄裳兄：久疏书候，为念。顷由华君武同志转到去岁十二月廿日手教，并蒙见示先祖手札九通，感谢感谢。（当暂存，俟与书籍并取）盖作於光绪癸卯以后。有一书说到先舅氏善侯赴松江省亲可证。朱公盲目而公事极精干。苏人称“朱瞎子”，有名。弟儿时闻之颇熟，未能参谒。即使见过亦忘记了。盖是道班，管牙厘局，书中故向之借小轮拖带。屡署臬篆，皆呼为臬台，是否实授，未详。弟自今岁二月七日内子病歿，心绪至劣，久抛笔砚。近为“烹饪”杂志写一文五千字，记京杭往迹，说些外行话亦可笑。勿复不具，即颂著祺。平伯。五月六日，立夏。

曲园札九通已托友人转赠新修好的苏州曲园，不知已陈列否。这封信却可当作跋语，有许多事是很少有人能知道的了。俞夫人新逝，他的心绪甚劣，

又能执笔为文，可见已渐归平复。这篇刊于《中国烹饪》的长文是《略谈杭州北京的饮食》，是他晚年写得最长的文字。我已取来收入《俞平伯散文》中。下面的一封信又谈到沈三白。

“黄裳兄鉴：前寄奉《振飞曲谱序》稿本，谅已邀瞥。昨奉惠示《拜石山房诗》珍闕之本，感谢，感谢。有关沈三白事迹，曾见近人文中徵引，顷始得见原书，为幸。诗中记琉球归，似曾小住京华。其后应聘如皋，十年作幕。诗题未言何年祝寿，盖六秩也。卒年当近七旬，可补记载之缺。

近年所传悼红文物，大都以贗品牟名利，而诸贤评论无休，亦可异也。

前梦见一扁额，颇似小说，而义尚可通。承海外友人潘国渠君为书之。今附上照片一帧博笑。即颂冬安。弟平伯·十一月十日。（1982）

平老晚年绝口不谈《红楼梦》，但仍随时注意评论界的新动向。这里对前些年“发现”的“悼红文物”，干脆地予以否定，并以“考订”不休为怪，可见他的看法。所谓梦中所见扁额。为“汐净染德”四字，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

同年11月20日信，又谈到红楼，有一节云，“弟自六六年后，即未作文谈及，惩羹吹齏，或未愜輿评，而窃自喜。公谓如何。”对曹雪芹小像真伪等一系列问题表示不介入，是他晚年一贯的态度。同年12月3日明信片中也有这样的话，“红学一名本是谐谑，今则弄假成真，名显而实晦矣，明年上海将搜辑拙作旧稿三种，所谓‘炒冷饭’，良非鄙意。属为前言，均却之，代以二诗。”

四

上海古籍出版社前后印行了他的旧作三种，把可能搜集到的文字都收进去了，对读者是一大方便。他对这种重刊旧文的办法，持“中立”态度，即不赞成亦不反对。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拟编刊小文库，要我代选平伯先生散文，写信去问他是否同意，得覆书云：

黄裳兄：久未通候，时念。欣奉来书，知百花书店将出散文选，近时通行，我对炒冷饭不大感兴味，而来者不拒，只不参加意见。今得吾兄主政，足增光宠为幸。出新意选之不蹈科臼尤佳。弟总赞成，无他见也。定后先赐选目则尤妙。来书提及译本《六记》序，是否即《学林漫录》八集所载？忆其中尚有些讹文，未知入选否？文虽短而颇自喜。总是后言，乃承于写序时将作为线索，具见卓识，欣且愧之，固当同意，且以先睹为快也。近无写作，只有一短篇曰《虎丘·剑池》，将以原稿载《浙江画报》（明年二月）。惮繁言，总是简。承誉“切时弊”，其实是躲懒耳。编辑时如有疑，则随时示知。馀不一。复颂著安。弟平顿首。十二·七。

对于散文的编选，他还是很关心的。曾有不少信谈及，1984年1月3日有长信。

黄裳兄：二函详尽，不殊晤谈为快。各件均附还，分别答复如下。近颇重印拙作，如“选集”、“杂著”等等，我持中立，不赞助也不反对；因久遭批判，不便表态。今次编选得兄主持，可谓深幸，而事同一律，亦不拟多参意见。兄放手作去，我都赞成。

一、选目同意。中有二篇可商。各处选本皆未涉及红楼梦文字。“十二钗描写”，一文，曾于运动中大闹一场，入选是否有碍？盼郑重考虑，或商之出版社，如皆认可，弟不反对。文见《文学评论》，约在1963、64年左右，亦易觅。《振飞曲谱序》手头无底本，古籍新刊本杂著内有之。弟意或可不选。以此篇全用文言，昆曲知之者少，而其书又不甚佳。如“絮阁”文字不全。简谱亦不适用，而拙序勉徇作者，表示赞成，亦曲笔也。闻字数已超过，删之似属无

伤，然否？“无题”二篇，冷僻难懂，承兄保存，谢谢，可入选。如查《文学杂志》期数，即可知年月，且已在原稿中注明。剪报中文字标点，稍有订正，希察。稿已久忘，读之如同隔世。尊撰“编后记”清简扼要，在千言中表达出来，尤属非易，为佩。文字小节遵命略有涂抹，勿罪是幸！

手头无稿，去岁11月有小文付《浙江画报》，云将于2月刊出，底稿尚存，附博一笑，或未宜中选也。古籍要出《论诗词曲杂著》已见广告，样书未来，他日当奉赠。

圣兄近晤，忙于开会，精神甚健，远胜于我。所云《日记三钞》出否未详。近其长公子至善，以胆病住院治疗。勿复不尽，即贺春禧，弟平伯顿首。一·二九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他虽然说对重印旧作，不干涉，不表态，但还是关心的。自受批判到1986年1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为他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举行庆祝会止，并没有正式为他平反，那么他的“心有余悸”就是可以理解的了。论十二钗描写一文是我深深喜爱的。这是他的着力之作，是一篇难得的文艺批评，在汗牛充栋的红楼赏析文字中是少见的。写得如此深入细腻，入情入理，可算得是说理文的极致。我并没有什么顾虑，也根本没有考虑到那么多，但终于因为篇幅的关系，还是删去了。《振飞曲谱序》是按照他的意见抽去了的。

五

他对用简体字也有自己的意见。曾说，“用简体排，但有些字合并，令人无所适从。（如适作适，则洪适与胡适无别，亦无上下文可看），不知能酌量另铸字否？”（1984年9月24信）又说：《振飞曲谱序》未知收入否？假如已收入，请为注意此文末行有‘仆少悦里讴’句，‘仆’今简体作‘仆’，而改铸不便，则不得已改‘余’或‘予’均可，作‘予少悦里讴’，这样未免倨傲，然亦无法，以本非我意也。”（1985.5.27信）为一个字特地写一封信来，可见他的认真。《俞平伯散文》出版后，他还寄来王湜华所作的一张刊误表，其实错字还远不止这些。正如他在1984年7月9日信中所慨叹：“近刊多而印刷乱，览之有望洋之叹，奈何！”

1985年6月20日信片云：

黄裳兄：新著连翩，每荷分惠，俾快先睹，甚感。如《过去的足迹》，弟已看熟。不瞒您说，我已偷写一谈《圆圆曲》的小文，以论点含糊，不敢示友，况付刊乎。《鸳湖曲》大文正在浣诵。我初读是篇，喜其清丽，及研求本事反感空虚，盖事有难言，不得已也。知人论世，谈何容易。公谓如何。

这篇谈《圆圆曲》的文章，写好而不愿发表，我不曾读到，推想也还是怕引起麻烦，其实谈三百年前事与当前政治有何关涉，在这里不能不感到十年动乱留下的影响之深。关于此文，同年8月1日信又曾说及：

黄裳兄：以多病体弱，久疏音问，歉悚。于梅村诗别具新解，不灵辰伯西谛之赏音矣。若此正是“勇气”，可谓先得我心，雒诵深荷。名为“传来消息满江乡”的《圆圆曲》，虽有三题，并无一目，恐难贻观者之望，不过姑备妄说而已。盖叹惋情多，徵实之词少，殆不足当姚公之一映者。但他日固当以尘教也。

但后来并未寄来，我也终未得读。小册《俞平伯散文》出版，他是高兴的。1986年4月5日信说：“《散文》新编收到，至为感谢。‘小引’简短，清新，扼要，有仿佛另一书之感。‘金陵十二钗’固不宜阑入，于体例亦似不甚合。其短篇都有趣，最后一篇曰‘剑池’，极短，似兀然而止。后来本

当还有一段谈吴诗之作意，以偷懒，怕噜，惮‘商榷’之故，希亮察。其谈虎丘、说山塘，拉拉扯扯，正是引动他心事了。兄亦谓然否？”

《散文》这最后一篇，极短。初读不能懂，现在知道还有一层意思未曾说出，得作者自为说明，方始恍然。平伯先生晚年不知有多少奇思妙想，都在“惮”与“怕”之中湮灭了。真是可惜。偷懒其实只是托辞而已。这是真正的可惜，却已无从补救了。

平伯先生于去年 10 月逝世，噩耗传来，为之不怡者累日，想为他写一篇纪念文字，却感到无从下笔，展阅遗札，只感到人琴俱亡的空虚怅惘。我不惮烦地抄下这些旧信，不只因为这里留下了他生活思想的零星痕迹，也还是为了保存这些美丽的篇什。从苏黄以来，尺牘在中国文苑中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历代都有作者，但写得好的实在没有几人，在简洁的笔墨中传达情愫，“惮烦言，只是简”，在这“简”中却包含着丰富的内容。他的这些短笺实在和他的“梦遇”、“梦寻”是一路的，丝毫没有做作、装点，正像陈年老酒，醇厚而有余甘。他对晚辈的垂爱与期许，更是溢于楮墨。故以此文为先生纪念可也。

1991 年 3 月 10 日

沈从文和他的新书

——读《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眼前放着一本很大很厚很漂亮的书，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我很喜欢这本书。对它的学术成就进行全面的评价，不是我的能力所能做到的，不过可以说说我喜欢这本书的理由。

1950年1月底，在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我第一次看到沈从文。在这以前，我托朋友请他给我写过几张字，通过一两次信。他寄来的与杨金甫、张充和在一张很长的纸上写的章草现在还在手边，那是1946年夏天他们住在颐和园霁清轩时写的。在另一张属名上官碧的字幅后面，他写了一段小跋：

黄裳先生远道邮佳纸索书，为用李福寿笔涂抹，竟成墨冻蝇。复检旧纸经意一书，拙陋益增，始知婢学夫人，大不容易，仍只宜用起码价钱小绿颖笔，在公文纸上胡画，转有妩媚处也。因检习字一纸相寄。从文。

这多少可以看出《边城》、《湘行散记》的作者在抗战胜利回到北平后的生活情趣痕迹。但两年以后又在北京相见时，情况却有了很大的变化。记得那是一个风沙满天的严冬，已经快吃午饭了，我在午门右侧旧“朝房”（？）改成的办公室里看见了他。房子很大、很冷，里面放了许多张办公桌，他就坐在其中一只的后面。桌子上堆放着很多书、纸片、碎瓷块、破泥人……，正像一个荒货摊。他从椅子上站起，听我报出了名字，又转达了住在上海的一位老朋友对他的问候，他激动起来了。搓着手，不知说什么好，但说了许多。接着就一定要拖我到他家去吃炸酱面，而且反复说着炸酱面如何好吃，就像在小说里进行细致的描写似的。他穿得很单薄，围上一条围巾，我们就一齐走出了午门、天安门，跳上了叮叮当当的电车，好半天，才来到交道口。他住着两间小屋子，开门进去，家里没有人。他自己动手，烧开水、下面，搬出碗筷，请我吃炸酱面。吃完后立即动身依旧乘了叮叮当当的电车回到天安门去上班。在这整个匆忙的过程中他一直不停的说话，内容现在已经完全忘记了，但那好像好久没有了谈天对手似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此外，我觉得放心了。一个习惯于描写世态人情的小说家一下子来到午门楼上，整天与古物打交道，能行么？我发现他行。他不但习惯了新的生活与工作，而且立即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发现他是个对一切留下生活印记的事物都有兴趣，都会执着地进行观察、思索、记录的人。他写小说，写不是小说的文章，都持相同的态度，一种老实、认真，几乎达到可笑程度的态度。我相信他会很好地生活工作下去，并且会做出成绩来。

沈从文是著名的小说家。在读中学时就已经读过他的许多作品了。我特别喜欢他的并非小说的作品《湘西》。这本蓝皮小书，我先后买过三次。现在手中留下的一本是1944年湘桂战局紧张时在已经变成危城的桂林街头买到的。书里的《常德的船》……都是我非常喜欢、反复读过的。七年前我给作者写信时还提到我喜欢这本小书的心情。这是一本地理书，或曰地方志，但与旧地方志可完全不同。我常想，全国各地都有这样一本“方志”才好。这是一本风俗画册，人物像册，它不是小说，但作者运用的还是那种方法，和写《湘行散记》差不多的方法。

我读《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时，感觉就和读《湘西》一样，得到的也是差不多相似的满足与快乐。

这不是一本结构完整的中国历代服装史，不是先有了一个严密的理论体

系精细的大纲，再来搜集资料，论证成书的。它是从大量的具体的历史实物出发，进行先是个别的、然后是比较的研究，终于得到了某些带有规律性的认识。完整的、严密的体系的形成也许还是将来的事。但现已露出地表的林立的桩脚都是结实的，多数是经得起考验的，而且也已初步显示出宏伟建筑的规模。这本书最大的特点是它所体现的唯物的、从实际出发的精神。

像这样的著作，过去的学人是常常称之为“札记”的，水平高的就会成为小型论文的集合体。其间发生了有机的联系，得到贯通，就自然形成完整论著的雏形。读者欢迎这种新鲜的、丰富的、结实的论文合集，而厌弃一切只有大架子，内容却陈陈相因或空虚无物的“豪华建筑”。

这是一本开山之作，尽管还不完备，有待丰富补充，但到底有了第一本民族服饰史的研究著作了，过去我们是没的。

这是一本充满了爱国主义精神与民族自豪感的著作，我们的先民创造了惊人繁富、丰美、灿烂的文化，作者为我们掀开了这座伟大殿堂的小小一角帷幕，使人们得以多少窥见其神光陆离、气象万千的巨丽面影，这必将激发人们热爱祖国的激情。

祖国的文化遗产如此丰富。但经过多少年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掠夺，不肖子孙的破坏毁弃，愚妄者的排斥贬抑，已经濒于危险的境地。作者辛勤拂拭，叹赏摩挲，追溯本源，旁及支系，试探着摸出了一条路，总结出某些经验。他的工作不是孤寂的，得到了有远见卓识的领导和同志的支持帮助，终于作出了成绩。这一切本身就是值得欣喜咏叹的。一切都证明：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是非常有希望的，经得起无论是什么样的风雨，我们有强盛的生命力。

读《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时时会感受一种“左右逢源”之乐，它会诱使你翻出另外许多本书，对读、思索，并享受“左图右史”的愉快。三十年前我们有了郑振铎编著的几种历史图谱；更早些我们有过《读史方輿纪要》，近来又有了新的《历史地图集》。这许多著作都是为了同样的目的而编写的。它们都是开创性的著作，但也无法使读者完全满足。这本《研究》则是从前人的踪迹上所迈出不小的一步。如试将每章的研究内容各拟一题，那就将有《半臂考》、《幞头考》、《关于“啼妆”》、《哈巴狗的起源》、《足球古史征》、《唐代时妆的衍变》等许多小论文。小，指的是篇幅，不是指内容含量。

温庭筠的名句“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历代注家纷纷猜测，“小山”是“眉山”，也许是“屏山”，都不能使人满意。《研究》说：“唐代妇女喜于发髻上插几把小小梳子，当成装饰，讲究的用金、银、犀、玉或牙等材料，露出半月形梳背，有多到十来把的（经常有实物出土），……温庭筠词有‘小山重叠金明灭’，即对于当时妇女发间金背小梳而咏。”“也正是当时妇女头上金银牙玉小梳背在头发间重叠闪烁情形。”作者据唐人诗词、文献、《捣练图》、《宫乐图》、出土实物，作出这样的论证，是可以使人信服的，也许是可以“破千古之惑”的。

杜牧诗“轻罗小扇扑流萤”，写七夕夜晚闺中生活小景，人们一直以为这大概是写团扇那样的东西，历来的画家也大抵都这样画。但不免还是怀疑，这未免太大了一些，扑蝶（如宝钗）还可以，扑萤怕将劳而无功。作者就指出，在《宫乐图》和《唐李爽墓壁画》中都画有这种“轻罗小扇”，其实是有些像苍蝇拍子一样的东西。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作品中有大量历史、风俗资料，一向受到历史学家重视。陈寅恪著《元白诗笺证稿》，是其显例。但在《研究》中接触尤多，且多据实物及形象材料加以论证，更为亲切。白诗：“平头鞋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世人不见见应笑，天宝末年时世装。”作者根据近年大量出土材料和诗文形容结合互证，说明世人发笑的原因。作者的研究还能通观整个时代不同阶段的发展变化，指出唐代社会善于吸收融合西北各民族文化及外来文化给予妇女服装的影响，又怎样从前期的活泼健康变为后期病态的过程。元和时的“蛮鬟椎髻，乌膏注唇，赭黄涂脸，眉作细细的八字式低颦”，大约就是“啼装”的本意了。白居易并不是头脑僵化的诗人，但他是看不惯这种“出自城中传四方，时世流行无远近”的“时世妆”的，说这是“非华风”的。这就说明，应该怎样正确对待外来文化影响的问题，在唐代就曾经出现过了。

怎样将见于“舆服志”一类文献记载中的大量名色，与图画实物、陶俑……中的形象材料，一一拼合，避免差误，是非常细致繁难的工作。作者做到了胆大心细。他勇敢地判断，坚决的认定。不能想象这中间就必无差误，条条都是定论，但我们将为有了这样的初步的轮廓而高兴，这是走向更为完密准确的基础。作者在《研究》中写下许多篇独立的小论文，随时发表研究的心得，见解，但没有综合考虑，加以总结。其实他提出的问题是很多的。例如应如何正确估价实物、图像反映历史真实的程度；如何看待文学艺术作品中必然会有有的夸张失实可能；如何判定文物产生时代的上限与下限；……。这些都是会引起热烈讨论的有趣问题。

例如陶俑和石刻表现衣服飘带或马匹鞍饰，为了制作和保存的方便，对实物原貌是有所改变的，有时就和绘画中的描写有所差异。又如艺人在创作中，是容许也可能有所夸张、删略的。怎样理解、利用他们现实主义的作品真实性呢？又如，时代较晚的艺术家在表现早于他们时代很久的现实生活时，忠实性是会有程度的差异的。正如今天的戏曲舞台上的人物衣冠依旧基本是明代的一样，明代刻书中出现的大量插图，不论表现的是哪个时代也基本上是作品产生当时的面貌。但这并不排斥有袭用前代画稿、纹样的可能。这一类的情况是纷纭复杂的，也是必须慎重对待的。作者在碰到这些问题时都有相应的讨论和判断，是值得深入探讨讨论的课题。

作者研究的对象是服饰，这就要求将形态万方、彩色斑斓的实物用文字再现在纸上。需要散文家的出色才能，不只是忠实的再现，还得写出事物活泼泼的情趣。这是常规的科学著作所不易得的特色，全书有大量美丽的插图，而文字之美，却使读者感到姿媚转胜。

现存的大量文物，都以不同情况出土或发现于全国不同地区。在研究过程中作者对种种复杂情况都作了认真的对比判断。他论敦煌、论南唐、论西蜀各章，都显示了这种特色。如他说到前蜀王建墓的石棺座浮雕时有一节分析：

这个石刻，虽完成于五代前蜀四川成都，但由于唐封建主玄宗和僖宗两次逃亡四川，中原艺术家先后避难入蜀的极多，蜀中历来特别富庶，手工业十分发达，并且是生产锦绣地区，受战事破坏较小，所以画面反映的和墓中其他出土文物花纹图案，还多保留唐代中原格局。劳动人民工艺成就，健康饱满，活泼生动，不象稍后孟蜀文人流行《花间集》体词中表现的萎靡纤细，颓废病态。

这种平实的、鲜明的分析在《研究》中到处可见。作者在感叹劳动人民

的惊人艺术创造之余，总是同时见到封建主的荒淫无耻。在分析研究上层人物的服饰之外也尽力反映农民、猎户、船夫、手工业工人、兵士、奴仆等下层群众的衣着与生活面貌。由于文献遗存的限制，份量上容有参差，但作者并没有把书写成一部贵族服饰史。

作者希望致力于奠定新文物学的基础，希望打破过去以文献为主的史部学研究方法，这方向无疑是正确的。全书实际上也以这部分创见最多，估计展开不同意见争论的机会也必然最多。作者在表述自己的见解时是勇敢的、痛快的，毫不吞吞吐吐，支支吾吾。但应存疑时还是存疑，因而也少有霸气。这样的学风，也是值得欣赏的。

书画鉴定，也有悠久的历史了。人们一直承袭着的是传统的方法。到了60年代，张珩、谢稚柳等专家开始总结传统的经验，并有意识地摆脱以文献为主的偏颇，企图运用多种手段进行综合的鉴定。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书画是形象的艺术，通过笔墨的表现手段形成不同的风格，同时也对客观现实做不同反映。两者都无法摆脱时代历史的痕迹，因之也应该成为鉴定的主要依据。服饰、器物、风习……都是应加郑重考虑的因素，但过去注意得是不够的。《研究》则集中注意于此，对一系列传世名画的作者和时代都提出了有份量的新看法。这就使研究的范围扩展得更开，不是“服饰”一端所能局限的了。

相传为唐阎立本的《步辇图》，作者认为“或系北宋摹唐旧稿”，“原作即便出于唐人，时代也应比阎立本晚些”。对《职贡图》，认为“或宋人拟作”。旧传张萱作《唐后行从图》，作者认为“原画最早也是宋而不是唐”。“盗出国外传世本，时代且更晚。定为张萱名迹，实赏玩家以耳代目，人云亦云，殊不足信。”在讨论《虢国夫人游春图》时，提出当时贵重马具的“金银闹装鞍”，详做说明，并用以证明旧传北宋宫素然《明妃出塞图》就因全不懂得“五鞞孔制”，因而造成错误。又说：“元初画马名家赵子昂父子所画诸马，鞍具还采用五鞞孔制。事实上元代早已废除，画中反映，恰好证明传世诸作均临摹唐人旧稿，而非写实。”这是很精当并带普遍意义的意见。

传为唐周昉所作的《簪花仕女图》是研究鉴定家注意集中的著名作品，出现过不少论文。《研究》后出，但讨论最为详密，援据更为丰富。提出的两点看法也是新颖而有说服力的。著名的《韩熙载夜宴图》，作者认为“必成于宋初南唐投降以后，可能即成于降宋以后顾闳中辈，但不可能成于李煜未降以前”。举出的论据包括了画中人物的宋代特定礼节——拱手示敬；与南唐降宋官吏初期一律服绿这样的细节，可见作者心细如发，思考细密。如集合论许多名画时代的片段，即可看作一卷出色论文。

历来鉴定画迹时代的专家，多习惯于以帝王题跋，流传有绪，名家收藏三大原则作为尺度，当然未可厚非。可最易忽略事物制度的时代特征。……古人说“谈言微中，或可以排难解纷”。但从画迹本身和其他材料互证，或其他器物作旁证的研究方法，能得专家通人点头认可，或当有待于他日。

这是作者在引言中所说的话，表示了他对新方法的信心，也清醒地看到，在这方面一时恐不易取得一致，还有待于更长时间的讨论与辩难。这其实正是《研究》的整体精神。

进行这一类的研究工作，通常感到困难的是，时代远的，材料苦少；时代近的，又惟患其多。因此在比例上就难免呈现一种头重脚轻状态。如明清部分就显得过于忽略了，也是许多人感到不满足的重要意见。希望这一状况

能于不久将来得到弥补。文献遗存的丰俭是相对的。明清两代遗物看似丰富，但具体使用起来，也不一定就能够用。时日既迁，今天视为丰瞻的，可能明日也会化为窘乏。这是不能不要求研究工作加紧进行的。不应使人发出“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的慨叹。作者论及《红楼梦》中所举各种衣着式样，丝绸名目，如“皂靛裘”、“雀金泥”等，因所见当时实物多，体会深，说得就极有意思，远非仅凭文献作考证者可及。作者又说：

《红楼梦》一书中王府大宅布局，虽为北京所常见，但叙述到妇女衣着如何配套成份，都显明是江南苏州扬州习惯。据故宫藏另一雍正十二妃子图绘衣着，可知这时期宫廷里嫔妃便装已完全采用南方式样。这十二个图像还可作《红楼梦》一书金陵十二钗中角色衣着看待，远比后来费晓（原作“小”）楼、改琦、王小梅等画的形象接近真实。而一切动用器物背景也符合当时的情形。

这个问题就提得极好，也是至今未能引起多数《红楼梦》研究者注意的。其实故宫就是一个研究《红楼梦》的伟大实物仓库，可惜至今未作有效的发掘。

作者半年前有一信，还谈到这方面的问题：

近常在故宫博物院出版之《紫禁城》，见尊文谈旧戏。其实故宫尚保存得有十七、八世纪戏衣数千件，一说八千件，在世界上真可称“洋洋大观”。又康熙乾隆南巡画卷中有几万种演戏场面，均值得设法一一看出，若依据此等世界稀有材料，用一二年时间写一部大书，印十来本图像，在世界上亦必成一种伟大无比工作。

信是用毛笔写的，写后又用铅笔在信纸旁边作注：

似以康熙三十五年第五次南巡图为最重要。燕子矶场面极壮观。

且注明某某机关地区班子。还有江宁织造署图像十分重要。

一说到文物，就“如同小孩穿新鞋，过新年的一般”，立即激动起来，即使是活到了八十岁也依然如此。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这本大书实在应该重排出版，以普及面貌出现。即使附图简单些也好，这样必将在学术界、文学界、戏剧电影界……引起更大的反响，推动我们的事业前进。顺便也可加以增补，并改正少量错字。如《重屏会棋图》的说明，“南唐李煜”，但历代著录都指中坐者是中主李璟，是名句“小楼吹彻玉笙寒”的作者，李煜的父亲。像这类小小误排，还有一些，都应该改正。

祝愿从文先生身体健康，工作如意，在创作和研究中作出更新更大的成绩。

1982年8月18日

关于《管锥编》的作者

还是先抄下一封信来。

奉书失喜。年光逝水，世故惊涛。海上故人零落可屈指……契阔参商，如之何勿思也。弟无学可讲，可讲非学。访美时绝未登坛说法。彼邦上庠坚邀，亦皆婉谢。报章渲染，当以疑古之道疑今。兄旧是个中人，美言不信，必不受眼谩耳。明年或尚须远役，自知不舞之鹤，难为伏枥之骥，贻讥腾谤，且食蛤蜊。拙选初非惬意，本勿欲灾祸梨枣……未及细校，讹错殊多，重劳齿及，徒增颜汗。有小集一种，月内问世。差如韩陵片石，君堪共语也。×君美才，通函以少作相询。弟老而无成，壮已多悔。于贾宝玉所谓“小时干的营生”，讳莫如深。兄不为锦被之遮，而偏效罗帏之启，薄情忍心，窃有怨焉。弟此番在美，睹博士论文，及拙作译本小传，语多不经。一作者自加拿大来见，问之，则云曾至港台，遍访弟师友，采撷轶闻，弟乃知自传不可信，相识回忆亦不可信。古来正史野史，均作如是观。Voltaire所以言Pyrrhonisme del'histoire，身外是非谁管得，隔洋听唱×××可矣。佳笺玷污，愧甚。即颂近祉。弟钱钟书上，杨绛同候。四日

此信距离“北来得三晤……”函，中间正好隔了三十年。简尺中的风调、才情……却依然如昔，这是使我极高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访美代表团的《访美观感》中收有他的一篇报告，关于访美的种种都谈到了，这里也并没有更多的东西。此外，讲到了他的《宋诗选注》、《旧文四篇》、《管锥编》，又提到了一些海外学人辛勤搜集资料，对他进行专题研究的事。这种研究态度曾经是令我吃惊过的，看来简直就像乾嘉经师对待先秦诸子一样。吃惊之后也不免发生一点小小的感慨。三十年来，记得他的人是不多的。新文学史研究者忘记了这位惊才绝艳的小说家；选了一本别具炉锤的宋诗，又几乎成了“白旗”。记得1962年他到上海来过一次，出席大学文科教材会议。我设法挤进会议室去看他。在会议桌前相对，没有讲话，不过至今我还记得他当时眉宇之间的瞬息变化，“年光逝水，世故惊涛，”这一切，都在不言中进行了尽情的表述、交流。那次的经验也是奇妙的。没有问他“文革”中的经历，最近从一篇文章中知道，他在干校中当过信差。这在那种场合已经算是一种“美差”了，也许是对我们的学者的特殊照顾。几年以后这位“信差”拿出了一百万字的《管锥编》，海外学人热情地研究他的身世、著作……这是正常的、应该的。我并不完全同意他悔其少作的那些意见。

《管锥编》是一部有趣的著作。我说“有趣”，也许有人会不同意；也许我还没有读通这书的必要功力。但我还是要说，这是一本有趣的著作，比起我过去读《义门读书记》、《潜研堂集》、《二初斋读书记》、《读书胜录》……来有趣得多了，而广博深厚当然又不是能期望于过去的学者的。《倘湖樵书》、《辨讹类编》、《癸巳类稿·存稿》都是可观的著作，但与《管锥编》都不是一类。更不必提不可能出现于过去的著作中的新方法与新材料。此书出后，我想，有些史学、文学以至辞书工作者可能都会考虑增订、修改他们的研究成果的吧。

三十多年以前，我曾劝过一些亲近的朋友；宁可作一个“才人”也不要作“学人”。今天看来，这意见当然是过于偏颇了。不过当时那样说也有一定的理由。因为那是个完全没有作学问的条件与可能的时代，而学人的道路也确是艰苦、寂寞的。在默存先生身上，才人与学人却得到了十分理想、完美的结合，这可并非常见的现象。

他写给我的两首诗，都是旧作。《蒲园且住楼作》一律是我特别欢喜的。

夹衣寥落卧腾腾，差似深林不语僧。捣麝拗莲情未尽，擘钗分镜事难凭。槎通碧汉无多路，
梦入红楼第几层。已怯支风慵借月，小园高阁自销凝。

像李义山么？有些像。但义山没有这种深微、细密、凸现的写法。产生于不同时代的诗，当然不会有完全的一致。这是一篇精致的短篇，却只用了五十六个字。如果学他的研究方法来分析，这诗是会使我们联想起玉溪诗中坐在“隔雨相望”的“红楼”中的那位穿了白袷春衫的少年诗人的吧？这应该就是作者自己。不过研究诗比研究《管锥编》还要更困难得多，我不想更深入下去了。

1980年4月4日清明

忆马叙伦

马夷初（叙伦）先生逝世瞬已十年。日前偶然在书丛中检得他写给我的一张诗笺和一副楹联，不禁又回忆起一些往事来。我和马老过去并不相识，只是因为编报的关系，向他索稿，才开始往还，先后也不过年把光景。因为喜欢他的书法，恳请他写过不少字。不过今天剩下的只有这么两件了。那副楹联写的是：

明镜九叠翻宫本

石室三年读秘书

石室指的大概就是杭州南山的石屋洞。马老是杭州人，他自题所作随笔就用了《石屋余渚》的书名，他自用的也有一方“石屋”的白文印，都寄托着对故乡的怀念。上联呢，好像是对我当年不自量力地想作“藏书家”的一种委婉的调侃，也许并不是。我得到这副楹联时非常高兴，立即裱好挂在书房里。这次发还时已经弄得敝坏不堪，我索性将联芯揭下来，好像又是当年从他手里接过时的原样了。

诗笺上的两首诗是他听了程砚秋的《春闺梦》以后写的，应该也是旧作，这时因为看了我在报上写了《春闺梦》的小文章，所以又记起、写下的。他对程腔的评价是确当的，他用诗的形式细腻精确地写出了歌唱的特色，实在传神得很。

我知道马老从五四开始就是一位民主战士，当然也知道他是有学问的教授。他的著作也买到过几种。不过像《庄子义证》那样的书我还看不懂，只能翻翻《读书小记》这样的笔记。1946年他在上海的《民主》、《周报》……上经常发表锋利的时论，因此我就想，是否也可以请他给我编的副刊写些轻松的小文章呢？约好时间，我就到拉都路（现在的襄阳南路）一条弄堂里的一间楼屋里去拜访。四壁萧然，好像连书籍也没有几本。马老穿了半旧的呢长衫，架了一副老式玳瑁眼镜，头发灰白了。六十出头的人依旧非常清健。他的双眼总是眯起着带着笑意，谈话温和而委婉，一点都没有名教授的架式，也和我理想中的革命者全不一样。看来不过是一位中学老教员或一位钱店信。

我提出的要求，使他感到了非常的为难。当时的一些民主期刊大半是周报，他几乎把全部空余的时间都用来赶写时论了。实在没有余暇和兴致给副刊写稿。他稍一踌躇就从抽屉里取出了一册厚厚的稿本。这是用大张毛边纸订起的、有三四百叶的本子，封面题着《香影楼日札》几个字。打开看时，是一色娟秀的小行楷。这是一本“日记”，但也并非正规的日记。里面记下了琐事、见闻、随感、掌故旧闻、戏剧电影评论……五花八门，内容非常丰富。他把这稿本交给我：“你去翻翻看，也许可以随便挑选一些发表。”

这是出乎我的意料的。只不过是初次相见，就将这珍贵的手稿借了给我，一些都没有秘惜之意。这当然是出于对我工作的那张报纸的信任与支持。在那时候，那种斗争环境中，为了同一目标战斗的人们之间，像这样“相濡以湿、相濡以沫”的情形，是并不少见的。

不过在告辞的时候，他还是叮嘱了我一句，这稿本最好是留在家中，万不可放在报社办公桌里。“你们的报纸，说不定哪一天就会被封门的”。

这以后，就在报纸的副刊上出现了一个《石屋余渚》的小专栏，每天发表一或两节小文章。这是我选了出来请人重抄付排的。在选抄中间，我发现

马老的兴趣是十分广泛的，并不是专注于六书和老庄的研究。他喜欢听戏，和程砚秋相熟；也注意电影以及通俗文艺，连妇女时装这样的生活现象也随时留心。他也讲究烹调，北京的饭馆里曾有过一只“马先生汤”，就是他传下的配方。这只是一种豆腐汤，不过是烹调得很精致的豆腐汤。他对书法有很浓厚的兴趣，作过深入的研究，对执笔的方法有自己的创见，对历代书法和时贤书法都有独到的评论。马老还时时记下了他与陈汉第等同乡友人谈话中种种，都是有关杭州地方人物的有趣的掌故。在报纸上连载的日札后来由建文书店印成两册，估计尚不到原书的五分之一。可惜校印不精，错字不少。这恐怕是在报纸上发表时就已如此的了。

果然不出马老所料，《余渾》发表了没有好久，报纸被封了。更糟的是，抄写原稿的那位朋友，没有听从我的嘱托，把原书带到报社，锁在办公桌里，竟自陷于“敌手”。我只好硬着头皮又到办公室去走了一转，取了出来。奇怪的是，散布在走廊里的特字号人物，竟不曾发现、阻止。第二天，我就把这手稿交还给了马老。如果这本《日札》，今天还保存在什么地方，我想，那是值得印行的，就是影印也完全值得。

报纸封门以后，马老到我的住处来过一次。他还是那么随随便便，一点都没有紧张之感。他说，上海住不下去了，不久就要到香港去。过了些时，寄给我一封信，说我曾托他请沈钧儒先生写一张字，可惜“衡老已行”，没有办到。不久，他也走了。到港后还曾来过一信，劝我也离开上海。不久，知道他已进入解放区，等到在北京再度相见，已经是建国以后了。当时他是中央教育部部长。我到部里去访问，看见他精神振奋，工作紧张，完全不像一位将近七十的老人。即使如此，他依旧是那么从容、安详，和1946年在上海时没有什么两样。

1981年3月14日

（附记马叙伦《程御霜邀听其春闺梦曲》二首：“坠石崩云四座惊，最难渊默忽雷声。如今入耳皆凡响，歌到程郎世莫争。何必当年无定河，且听一曲眼前歌。坐中掩面人多少，论我青袍泪独多。”“坠石崩云”两句，下句出《庄子·外篇》《天运》：“子贡曰，然则至人固有尸居而龙见，雷声而渊默，发动如天地者乎。”）

忆郑西谛

今年春节前一直下雨，年初一忽然放晴，来了满天的好太阳。家居无事，想找一部书来看，顺手从书架上取下了《西谛书目》。我是常读书目的，这在旁人看来似乎不大好理解，不过这实在是很有趣味的。好书大抵藏在图书馆里，难得有借阅的机会，现在看看书目，有如坐在饭馆里翻菜谱，虽然不一定样样都点了来吃，到底也是一种享受。这《西谛书目》又与别的书目不同。他的兴趣杂，收罗的方面广，不大重视正经正史，但集部、特别是词曲小说、版画中却多有怪书（说得好听些应该写作“僻书”）。常常看到一种书名，就揣想这应该是怎样的一部书呢？如有附图，那么是出于徽派还是金陵派刻工之手的呢？这样想着想着往往会令人神往。“书目”里有些书是我见过的，还多少有点关系，这就更有意思。例如卷一有一条是《乐律全书》存四十二卷，是残本。其中有《六代小舞谱》和其他几种，就是我在徐家汇的一家旧纸铺里发现的。大约三四种，白棉纸大册，附有古拙的插图。那时我还不认识郑西谛，但对这位文坛前辈是非常佩服、心仪已久的了。想找个机会见见他。知道他多年来辛苦搜集着版画，就把这拿给他。那大约是1938年的春天，他索居在静安寺的庙弄里，弄不清门牌，就抱着书闯了去，居然给我找到了。

高高的身材，穿着一身半旧的西装，出现在有些荒凉的小花园里。厚玻璃镜片后面双眼睁得大大的。一面用手翻着书页，注意地看那版画，不由得漾出微笑来。他大约觉得有点奇怪，送书上门的不是书坊里的伙计却是一个中学生。

我终于认识了西谛先生，还从袋里摸出一小册《西行书简》，请他写几个字。他爽快地答应了，就站在花园的草地上，掏出钢笔，歪歪斜斜地写下了“旧游之地，今已沦为狐兔之窟。何日得重游”几行字。这大约就是我和他的“论交之始”。

在“书目”的尾页，我曾写了下面的几行题记，

此册所收颇多佳册，亦可见西谛收书之杂。然奇书秘册，往往而在。丛书亦多妙品。忆解放前曾偕西谛游苏，夜访书护龙街上，见怀新斋许氏书甚多，其中多丛书之大部头者。西谛顾而乐之，然无买书钱，笑向余曰，凡此皆可收也。余亦一笑而已。时秋高风景佳异，游木渎食鲃肺汤极美，转瞬二十年前事矣。丁未九月初三日夜记。

这件小事很可以表现出西谛书兴之豪。买下了多少万卷旧书，用樟木箱藏起放在书房、客厅里的富商大贾是说不上“豪”的。只有像西谛那样，身无分文还设法张罗举债收书，视书为性命的人，才能算得上是“书林豪客”。

在书画目录类书的书眉，我也写下过这样的话，

余曾收朱竹垞抄本郁氏《书画题跋记》、《续记》，谦牧堂旧藏。为西谛所见，强索为赠，未之许也。是时渠方锐意收书画类书，是以豪情如是。今日思之，徒增黄垆之感。

解放后西谛在文物局工作，在团城办公。一次我带了几部书到那里去看他。他照例一看见好书就要“雀跃”，要留下。记得那次有一册宋建本白麻纸极初印的《尚书图》，就被他“扣”了下来，立即送到图书展览会上去了，说好说歹才留下了这部《题跋记》。这当然说不上“豪夺”，不过他那见了好书就不肯放手的气势确是有点“豪”。“你多少钱买的？”接着就不容分说留下了。这本《尚书图》是胡心耘的旧藏。先为孙某所得，书实在太漂亮了。使他疑惑起来，是真宋本还是翻宋本，终于吃不准，以原价一百元脱手。

我是从来青阁买得的。宋本书的书价不过百元，这在今天看来也确实有点近乎神话了。

《书目》中有《春雨楼集》一书，也是我见过的。我在书眉上写：

此书佳绝，桃花纸印，有沈虹屏名印。1952年西谛来沪，余访之旅寓，案头有此二册书，因得摩挲。

西谛在北京工作，上海庙弄的藏书还零乱地堆积着，不曾运京。他委托一位姓杨的书友代为整理，不料却陆续被取出别售。我曾见过一张书单，也买到其中的几种。在一部永乐刻《刘尚宾文集》的书衣上看见有西谛手写的书名，觉得有些奇怪。后来知道确是从庙弄里弄来的。他闻讯以后，就趁视察之便，回家检视。顺手把这两册《春雨楼集》带在行篋里。此书是沈彩手写上版的精刻本，用桃花纸印，真是纸墨晶莹，眩人心目。卷前有“青要山人”小印。庙弄里的藏书，品种珍贵远过此书的不知有多少，但他却只选了这两册带在身边，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对书卷的“真知笃好”。此书西谛有手跋，“扬州何氏书于劫中散出，为孙实君所得。予闻讯往，得初印本芥子园画谱三集，诧为奇遇。见此书于目中，亦欲得之，而已为乃乾所取，求之不出。越一载，乃以千金易得之，挟书以归，喜可知也！纫秋。”

“纫秋”是西谛在抗战时期使用的别署。他曾写有《纫秋山馆行篋书目》一册，手为长跋。《西谛书目》后附有“题跋”一卷，都是从他所藏书的卷尾书头辑出的。这些都是很好的随笔，有时也讲到书的版本内容，但主要特色并不在此。题跋中所记书林掌故很不少，都是藏书史上的好材料。西谛与书坊中人极熟，题跋中也时时写到，可以看出，对这些“书友”，他的感情是不同的。他有一篇明刊《乐府先春》跋，写得极有意思：

杭州书客朱遂翔擅将不全书剝割目录，冒作全书，售得善价，予甚少与之交易。然彼爪牙遍布徽郡、萧山一带，往往多得奇书善本。王寿珊在世时，朱专擅其利，寻常顾客自不在其眼中。自王氏故后，朱失所依，始复见其持蓝布包袱，往来中国、来青诸肆间，盖彼于图书每不甚了了，唯恐失之贱值，不能不以郭石麒为耳目。石麒为书友中忠厚长者，从不欺人，书业中人无不特为顾问。劫中余闭户索居，绝人世庆吊往来。惟结习未除，偶三日辄至古书肆中闲坐，尤以中国、来青二处踪迹为密。一日天阴欲雨，正坐中国书店与石麒闲话，以无书可阅为叹。朱忽持一包来，予曰，此中何书？朱解包出之，乃昆调乐府先春也。予惊喜过望，即询其值，立偿之，挟书以归。……

我在此处书眉写：“此跋写朱遂翔神似。解放后朱设金笔肆，弃旧书业不为。余尝得文瑞楼钞《演山集》等於渠，价极昂。后所存善本多为孙助廉得去。”

记得当时在温知书店的小楼上，每天方桌上都有从朱遂翔得来的大批旧书，大半有九峰旧庐印记，及朱遂翔小印。最为煊赫的是北宋杭州猫儿桥马氏牋纸铺印的“文选”一册，就是高踞《中国版刻图录》卷首的那一本。

关于西谛，还有不少故事可写，今姑记此数则，以为纪念。

1985年2月22日

忆许姬传

四十年前一个春天的下午，我在苏州第一次和姬老见面长谈。（姬传当时不过刚五十岁，但梅畹华早已在客座中呼之为“姬老”了，其实他比梅还要小七八岁，于是朋友们也就跟着称他为“姬老”。）我是为了《舞台生活四十年》的写作去找他商量的。虽然事先已经取得梅的同意，但能不能坚持写作并在报纸上连载，却没有把握。姬老是梅的贴身秘书，朝夕相处，连载的初稿全靠他见缝插针地进行记录。梅的这部自传的能否写成，他实在是个关键人物。第一次见面他就给我一个很好的印象，洒脱、风趣，是个旧社会才子型的人物。他能诗、善书，对书画文物有相当的鉴赏水平，自己也从事收藏，这些在戏曲之外的修养，使他成为活跃在缀玉轩中一位少不了的人物。

姬老解放后一直住在北京梅家，又随梅剧团到各地演出，来上海的机会不多。“四十年”的写作是他将纪录草稿寄交他的弟弟源来，补充整理后送报社发表的。他没有按照自传的一般写法按年铺叙，却以梅的日常活动为线索，有机地将回忆组织进去，闲闲写来，别有一番趣致。无论是写法还是文风，都与通行的报刊文字有很大的距离。对此，是曾经有过种种不同的反映的。譬如有一种意见，认为梅先生应该着重介绍他的舞台经验，可以留做年轻演员的范本，而不赞成过多的细写生活琐事。我的看法却相反，觉得能通过一个人来看一个时代，才是一本成功的传记的重要因素。梅的一生，经历了好几次社会的大变动。作为一位杰出的艺术家，他与社会的联系是多方面的。几十年来的社会变迁，通过他的个人经历，是可以得到虽然是局部但却真实生动的反映的。具有这种特殊条件的人物，在每一历史时代中并不多，而梅却是相当理想的一个。这是我长久悬在心中的愿望。“四十年”当然并未完满地达成这目的，但也多多少少的带有这种特色。这就是能使读者清晰地接触到艺术家的全人，而不只是他在舞台上的献身，同时也感染到不同时代的社会气氛。

说到“四十年”的写作，姬传的笔路和文风也是有它的特色的。这与通常的报刊文字不是一路，也许难以得到某些人的赞赏，但我却认为是难得的可贵的。记得姬传曾和我谈起，他是有意学习他所熟读的《红楼梦》的笔路的，以为记录梅先生的活动与谈话，用报刊文字的写法不合适。这是深悉个中甘苦的话。“四十年”中记梅先生和许多老艺术人的谈话，声口、姿态都常有传神之妙，这种“白描”功夫，多半来自传统小说，一清如水，时起波澜，是别具一格的好散文。

1954年秋，我和内人到北京去小住。梅先生请姬传接车并安排我们住在北京饭店，又请我们在东安市场吃饭，饭后去剧场看川戏。本来旅行已经颇为疲倦，但看了许倩云的《卷帘求画》，大为欣赏，连倦意也没有了。事情已经过去三十多年，回想起来还如同昨日。

姬传是个快活乐观的人。我没有看见他有愁苦的时候。十年动乱中当然也饱吃了不少苦头，但我想他也还是嘻嘻哈哈地过日子的吧。这一点与他的老弟源来不同。这也就是他得享高龄的原因。

1957年以后，我几乎处于交游零落、离群索居的境地。但也还有时有往还的一二友人，源来就是其一，也时时从他那里听到姬传与梅家的消息。梅剧团来沪，也有机会与姬老相见，在天泉阁中话旧。除了谈戏之外，主要的话题是他们兄弟俩所收藏的书画，也谈到他们先祖许珊林所刻的书，这就是

有名的“许刻”。许珊林一生一共刻了多少种书，就连他们也说不清楚，我手边有两种，都是他们不知道的代师友所刻的诗文小集。说得高兴，姬老就取出许珊林所写斗大的五言篆书联，挂在陈定生的墨兰的旁边，相与欣赏。

姬老谈了不少过去在上海与一些书画收藏家往来的故事，庞莱臣、张葱玉、谭敬都是相熟的朋友。论经济力量，当然不能与他们相比，但也偶然得到一二铭心绝品，可以傲视侪辈。姬老曾买到过一册华新罗的诗稿，是画家手书的底稿，前半写得工整，后来就逐渐率易，到了最后九页，则潦草几不成字，这大抵已是绝笔了，最后一页还夹着衬写的格子。这真是稀有的书，我有新罗山人的《离垢集》，却从未前知他还有稿本传世。姬老说，这本册子后来换给蒋毅孙了，真是上了大当，可惜之至。言下犹有余痛，但随即一笑置之。这件小事是可以看出他的洒脱的性情的。

梅先生逝世以后，姬老还继续整理有关史料，撰写回忆文章。这以后很久没有见面的机会。直到1979年春，他南来料理源来的后事，才再次见面。这时他已迁返旧帘子胡同梅家了。转年我到北京，姬老和梅家的绍武约我在曲园吃饭，劫后重逢，故人无恙，真是值得高兴的事。他虽然年逾八旬，但清健如昔，谈起旧事来娓娓不倦。他谈起他的外祖徐致靖的故事，说是要将老人与戊戌政变的有关轶事写下来，这就是后来出版的《许姬传七十闻见录》。他还谈到徐老先生熟读《红楼梦》，有些意见是别人没有说到的，这些我已写入《京华十日》，虽不敢厕身于红学家言，也许可当红楼佚话，以记一时朋友谈讌之乐。那实在是值得永远记忆的快乐时刻。

1986年冬我到北京，一天下午抽空到旧帘子胡同去看他。天已向晚，缀玉轩的北房显得异常阴暗寂静。梅家的人都出去了，只有他一个人枯坐在沙发上，恰如入定的老僧。相见惊喜。已经八十六岁的他，依旧谈锋极健，还拿出新出版的《忆艺术大师梅兰芳》一书相赠，倚在沙发上用紫色笔题了字，这本书是他和源来所写纪念梅先生文字的合集，前面有所写的一篇序。姬老还是极有兴趣的谈书画，谈文物。他到柜子后面取出一方顾二娘雕的菌砚。有阳文款，是颇不经见的。谈起他所藏的一些“杂件”，如竹雕、砚石（有大端石寒星砚及四件小品）、宣德炉等，一一出以相示。他的记忆力是惊人的，几十年前的旧事都说得头头是道。我从他有些激动的谈吐中也感到了老人心情深深的寂寞。不必说，近来能找他来谈谈旧事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屋里装了一只大火炉，但似乎并未散发出多少热气，越发显出老屋的阴沉。

这就是我与姬老的最后一面。听到他以九十一岁高龄弃世的讣音以后，久久不能宁静。直到今天才能草草写成此文。晚秋的天色早已暗了下来，不能不使我记起缀玉轩中的景色和那次快谈的种种，觉得这一切都已不可再得了。

1990年11月5日

忆师陀

我与师陀相识，大约在1946年顷。他是霞飞坊的常客，我也常去。他经常访问的却并不是巴金，而是住在同一所房子里的另一家主人。虽然见面点头，但并不熟悉。只知道他是有名的小说家，曾经得过大公报的文学奖金，与何其芳、曹禺同榜。他后来放弃了芦焚的旧名不用，改属师陀，这笔名很特别，究竟何所取义也不清楚，后来也一直不曾向他打听过。

解放初他在上海出版公司当编辑（也许是编辑主任）。这书店与郑西谛有关系，由刘哲民主持，主要印行郑振铎主编的历史图谱和艺术传统等大部书，还影印过《鲁迅日记》和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编辑部好像只有两个人，师陀以外还有胡道静。他当然是主编文学书的，但并无值得记忆的出版物，巴金给了他几本翻译小说，如迦尔洵的《红花》等，都是只有几十页的小册子，我交给他一本《新北京》，是解放初访问北京时所写的访问记。

师陀不久就离开出版公司，加入了夏衍任所长的上海电影厂剧本创作所。稍后，我也调到所里，算是同事了，所里大概有编剧十名左右，没有固定的坐班制，每周开学习会一次，间或也看新片和讨论剧本，其余算是自由创作的时间。师陀在所里无论年龄、成就都是踞首席的人物，因此大家都称之为“陀老”。创作所的空气是平和、舒畅的。有些人连家都安在所里，师陀也是，但好像只是单人索居。打麻将经常举行的娱乐。我不会打，一次也没有参加过。有时候也出去吃馆子。师陀总是同去的。他喜欢喝点酒，喝了酒话就多起来，但并不谈论剧本创作的事，那是一定的。把一群人聚在一起，让他们从事创作，在生活上给以不错的照顾，这种办法不知道是不是成功，但完成的作品好像并不太多。而每人身上都背着几个创作选题，负担并不轻。写出了初稿，打印传观以后就开一次讨论会，会后作者根据五花八门的意见进行修改，再打印、讨论，有时这过程可以反复进行若干次，最后的结局却往往是“枪毙”。这种领导创作的方式是不是高明，谁都说不清楚，说不出意见，但却免不了困惑。师陀好像感到这样下去不是事，就主动要求去体验生活，到著名劳动模范吕鸿宾那里住一阵子，大约半年光景，回来以后打提纲，构思创作，后来好像并没有写成作品。这位在旧社会多产的作家弄得束手无策，创作所结束以后，就转到作家协会当专业作家去了。

师陀写不出电影剧本，却写了几篇历史短篇，记得有写曹操与西门豹的。还有一个独幕剧《伐竹记》，后来受到批判。他很生气。文革结束后他印了一本《山川·历史·人物》的小册子，前面有长长的一篇序言，大发牢骚。好像这是他解放后出版的唯一一册新作（另有几种都是重印的旧作，也全是文革后出版的）。

从创作所出来，不远就是静安寺。那里有几家旧书店，师陀常去看书，也买一些旧本。一次得到一册旧抄本诗集，不知道作者姓名。他经过仔细的考证，证明这是明末清初遗民诗人蒋大鸿的遗集，诗篇反映了清初江南的社会动乱，很有史料价值。后来还写成考证长文发表在香港大公报的“艺林”上。他曾给我看过那抄本，还打算重印，终于没有成为事实。有一年春天，我和他一起访问上海近郊，到过张泽，想寻访蒋大鸿的遗迹，什么都没有看到，倒是归途过陈子龙墓，在遗址前徘徊了好半日。可见他对晚明的几位遗民诗人是怀有深深的感情的。从书丛里找到师陀几通遗札，1984年3月的一通说：

“日前得乔木同志信，对《无望村的馆主》提出许多意见。另外还对我的其他小书提了意见。其中对《无望村》的有几条不能解决。首先是体例问题。‘小引’似于古无征，好像是‘五·四’以后才兴起的，也只限于文集；‘跋’是古代就有了的，也只限于诗文集，用以说明写成的原因。他提议应该加两个脚注，因为现在的青年多不懂了。其一是《打渔藏舟》，解放前我曾看过河南、河北梆子的演出，正式剧目叫做《蝴蝶杯》，又名《游龟山》，江夏县知县和他的公子、总督和他的公子，被打死的老渔父和他女儿的名字，连这出戏的故事，全忘记了。至于它的编剧为谁，更是懵然。其二是《秀才卖驴》，我小时候听大人谈过，似乎是一个秀才写的卖驴契约，全篇引经据典，不见‘驴’字，形容秀才的酸腐。以上问题，兄博览强记，兼之戏曲界熟人甚多，有以教我否？”

“去年文艺报（12期）刊载小文《谈风格》，讲到废名部分，我的原意是废名的作品仅能供少数人欣赏，不料经过十年内乱，竟会对人起陶冶性情的作用；经编辑大笔一挥，‘少数人’竟成了‘无人’，‘起陶冶性情的作用’竟成了‘对人能起什么作用呢’了。这么一来，我也就成了和他们一样反对废名派，岂不可畏也乎？”

“我认为诸如此类的情况，你是可以写一篇杂文的，虽然巴金已经写过。还有文坛上的‘左’，其表现是‘反污染’，开始跳得最高的人大都是历史上有过‘问题’的人，

虽然其中大多数是冤枉的。由此可见，全党倾向于‘左’，再加封建主义、官僚主义、乌七八糟的主义，我认为也可以写成杂文。当然一篇装不下，也会碰钉子，如果不会绕弯子的话……”

这是一封难得的坦率的直抒胸臆的信，虽然已时过境迁，但可以反映当时师陀的思想状况，所以还是抄下来。我当然没有能够如他的嘱托，不但没有对《游龟山》加以解释，杂文也没有写。他对废名的评论则是可以注意的。虽然没有明说，师陀的创作不能不受到废名的影响是显然的。

前些年随上海作协代表团去河南，师陀同行。他是河南人（杞县），对故乡风物自然是熟悉的，过开封时，告诉我关于龙亭的传说；游龙门时，叮嘱我在奉先寺石雕力士脚下找武则天施脂粉钱造像的石刻题记。这次旅行，大家都轻车简从，只有他带了一只铁箱子，装着写作资料，说是要在郑州住一阵，完成几本著作。其中就有重定蒋大鸿的诗集。可是大家不放心他的健康，还是一起回来了。

平时谈话，他也有不少独特的见解。如他不承认书法是艺术，又认定《金瓶梅》的作者是吴承恩，他曾仔细研究，在语言、习俗等方面发现《金瓶梅》与《西游记》有不少血缘关系。曾劝他写文章，总是迟迟不肯动笔。他颇有些藏书，房间里摆着商务百衲本二十四史，常说在这部大书里可以发现不少创作素材。可见他在晚年是有意从事历史题材的创作的。但终于缺乏动笔的兴致，没有能留下什么成绩。他去世那年已年届八十，朋友们打算给他祝寿，连日期都已定好了，不料他却骤然去世了。他的旧作重印的大约有三四种。有的他自己也没有存书，曾替他从旧书店里找到过几种，但也没有重印的机会。这是想起来也不能不感到寂寞的。

悼风子

风子于久病后逝世，前两天从书架上取出《晦庵书话》来重读，想起许多旧事，不禁有人琴俱亡之感。我与风子初识已在五十年前。《书话》里“书城八记”的“买书”一节，说起他开始买书时的往事。提到徐家汇有个废纸收购站。主人是个猫脸的老头儿，风子从他那里买到《新青年》、《小说月报》等旧期刊，是为搜求新文学旧本之始。他当时隐姓埋名住在徐家汇，住处就在我家近边一条深巷里。彼此，常常在那家旧纸铺内遇见，因而相识。我那时还是一个中学生，却已有了搜书的癖好，买书只能利用家里每天给的一点点心钱，在纸铺老板看来实在是上不了台盘的小主顾，但也曾收集了自沈雁冰接手编辑后的全份《小说月报》，不能说不是一种豪举，这自然是受了风子的影响。记得纸铺曾将《逸经》编辑部的全部家当论秤卖出，有印好的稿纸，有作者原稿，还有大量的旧杂志。我曾在其中搜得郁达夫《饮食男女在福州》的手稿，珍得收藏，可惜后来失落了。

当时我们搜求的不只是旧期刊，还包括了“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出版物。特别重视鲁迅、周作人等著作的初版毛边本，反正只是一两毛钱一本，所以每见必收。凡有所得也彼此相与欣赏，也交换藏书，丝毫没有因争购而引起的不愉快。我手边还保存着两册鲁迅的《唐宋传奇集》，扉页有我的题记，“三十七年一月卅日，在秀州书社买，此初版本也，仅上卷。前曾有三版者两册，已持赠弢公，归来后记”。另有周作人的《冥土旅行》与《玛加尔的梦》两册，都是初版毛边的“苦雨斋小书”，我在扉页上写着“一九五、七、十，夜访风子兄，索赠此册”。《书话》里有文记这套“小书”，称其“印得朴素，大方，极为漂亮”。并声称他尤其喜欢的就是这两种。大概因为喜欢，所以存有复本，为我索得。那时他的收藏已颇为可观，每过他的书斋，总是随意抽阅，时时遇见会心的好书，也常常不客气地索取，友朋戏谑，留下的是美好温馨的回忆，却是不可再得了。

最先留心收集新文学史料，为研究奠定了基础的，是阿英。但注意新文学出版物的版本，系统的加以评论记述的，则不能不首推风子。今天已成为显学的新文学史料研究，继起者的业绩在许多方面已超过了前人，但《晦庵书话》仍有其历史地位，是这一学术领域的开山之作。作为散文，“书话”这一形式也是值得注意的。以简短的笔墨，记事抒情，作者继承的是古老的优秀文学传统，使人想起的是陆游的“放翁题跋”和黄荛圃的藏书题识。回荡多姿却无空疏之病；网罗遗事，不离时代风云。所记三十年代前后反动派对革命书刊的封锁、扣留、禁毁与文化界进步力量的抗拒斗争，都是文化史上不可磨灭的大事，也形成了《书话》触目的特色。

解放后风子曾在华东文化部主管文物处，当时旧书贱如泥沙，多半落入还魂纸厂，有许多有价值的文献书物遭到毁灭，我曾与郑西谛谈起，希望文物部门采取一点补救办法。风子经办此事，组织了一些旧书店从业人员，去纸厂拣选，颇有收获。最突出的是得到了一册宋刻的《蟠室老人集》，是仅存的孤本。大字精刻，黄麻纸印，神采奕奕，动人目睛。这事他也曾记在《书话》里，但记忆偶误，说成是宋刻三十卷本《文选》了。大概这两册书的发现，在当时都曾哄传人口的缘故。

风子曾长期主编《文汇报》的副刊“笔会”，这是一处重要的文艺阵地，曾发表过不少重要作品，也展开过多次理论论争。有一个时期我也参加编辑

工作。每天他将选定的原稿和版样卷成一卷送到报社，由我看后交排字房发排。他的编辑方针是兼容并蓄，但坚持着进步的立场，旗帜鲜明。团结了广泛的作者，为文艺的繁荣尽了自己的力量。除了编辑工作之外，还要为报纸写点连载文字，似乎是当时一种风气。《书话》就是这样开手的，每天发表在副刊《文化街》上，一出现就受到注意与欢迎，又在别的几个地方继续地发表过，1962年出版，只四十篇。1980年增订再版，由三联书店出版，有毛边本，多附书影，更增读者兴趣。为近来少见的精本。朴素大方，比起风起云涌的所谓“精装本”来，实在要好得远，但懂得这种书趣的，却是愈来愈少了。

风子是老一辈的杂文家，又是鲁迅研究和新文学史的作者。晚年着手的《鲁迅传》恐怕也未能完成，是极可惜的事。这里只就《书话》少谈他收藏新文学版本的往事，以为纪念。五十年文字相知，一旦别去，使人难以为怀。好在风子的遗书俱在，每一展卷，如逢故人，则风子为不死矣。

郭沫若

一

1946年5月4日，在重庆的“抗建堂”举行了一次文学工作者的集会。有郭沫若的演讲，艾芜、杨晦等有关小说、理论等方面的工作报告。参加者还有曹靖华、力扬、黄芝岗诸位。我当时在为上海的一家报纸作特派记者，就坐在台下第一排听讲。郭老那时不过五十刚出头，精神饱满，作报告声音极响亮，演讲的内容已经记不起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对当时的时局是充满了愤激的。那正是旧政协会议和校场口事件之后，只要是有正义感、爱国心的人都不可能有怎样平静的好心情。郭老慷慨激越的演讲，自然就不可能不带有特定的时代色彩。

郭老讲完，从台上一跃而下，坐在我旁边的空位子上。抗建堂的台口并不高，但他这一动作还是使我吃了一惊。

我心里在盘算，这是一个很好的采访机会，不可放过。郭老是重听的，交头接耳的方式不行，怎么办呢？我从笔记本里摸出了一张纸，写下“请郭先生赐予访问的机会”几个字，接着又提了六个问题，下半留着空白，就请他用笔作答。

我把这个“问题表”递了过去，他接过一看，马上就接过我手里的钢笔，作出了答案，很快地还了给我。

这张“问题表”后来被我夹在一本书里，久已忘却，前些时候从发还的乱七八糟的文件堆里又被我重新发现，真是说不出的惊喜。现在就摘抄几条在这里。

“先生何时赴京？”

“六日至十日之间。”

“先生赴京后工作计划如何？创作？剧作？”

“将往上海。两种都想进行。另外还想研究历史，尤其是农民运动史。”

“对于郁达夫先生遗集事，及郁先生的最后的情形有所闻否？”

“到上海后进行全集事。无所闻。”

“先生对最近时局的观感若何？”

“我是乐观的，虽有曲折，但民主终必胜利。”

我还提过一个问题，“先生近有诗作（旧体诗）否？可否见示一二。”因为问题写在纸背，他没有看到，没有作答，真是可惜的事。

二

1947年，我在上海编报。报纸有一个《文学周刊》是郭老主编的。另外还有《新思潮》等几个周刊，也得到他多方面的支持。工作作得热气腾腾，十分起劲，斗争越尖锐，白色恐怖的阴影就逼得愈近。当时朋友们都有一种明确的预感，报纸迟早要被封门，这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就抓住这最后的机会，大干一场吧。我曾为副刊设计了一个栏目，分请一些文化界的作者、作家……写字，准备集有成数以后制成锌版发表。不过无论我们怎样加紧工作，终于还是赶不上反动派的封条来得快。这些墨迹的陆续收到绝大多数都

在报纸封门以后了。一起约有近百张，我一直好好地保存着，但在十年前的一天，一起被拿去了，被看做“反动”的“罪证”，至今还下落不明。

又是一个意外，郭老给我写的一张字，却被夹在最近取回的一本旧书里。为什么它没有和其他墨迹放在一起，连自己也记不清楚了。

这是写在溥心畲画的诗笺上的一首七绝，诗题是“三十六年七月偶成”，其时约在报纸被封两月之后。

偶语诗书曾弃市，世间仍自有诗书。

周厉当年流彘后，卫巫勋业复何如？

当重新发现这诗稿时，我的惊异更是难以形容。如果不是原迹写着明确的时间，人们是有理由怀疑它是十年前的“近作”的吧。

诗里用了两个典故。“偶语诗书”，自然说的是秦始皇帝；周厉王的故事则见于《史记》的《周本纪》。周厉王是周夷王的继承人，是个著名的坏家伙，正因此他才得到这样一个难听的谥号。他在干了许多坏事，弄得“民不堪命”、闲话蜂起以后，大怒了，想出了一种古怪的对策。找来了一个卫巫，使他“监谤者，以告，则杀之”。那后果是“国人不敢言，道路以目”。这使他得意极了，把爱说真话的召公找了来，对他说：“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的回答却是，“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水。……”召公还说了许多道理，这里不多引。这些早在公元前八百五十多年说过的话，今天听来也还是非常新鲜的，简直就像刚从报纸上看来的一样。

厉王自然不会听这样的老实话，他的结局也一些都不会使人惊奇，“耳根清净”的日子过了三年，就被国人赶到彘去了，那地方就是现在山西的霍县。

郭老并不是刘伯温那样的“预言家”，他这首诗的抨击对象是1917年的国民党反动派，但诗人创作时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却使他的作品有了长久的生命力，时间过去了三十多年，它仍然活着，而且还将更长久地活下去。

1979年9月11日

朱佩弦

这是朱自清先生给我写的一首诗，原作共四首，这是第一首。全诗收入《犹贤博奕斋诗钞》中。

1948年，报纸早被封门，副刊也不办了。但早已开始了的收集时贤手迹的工作并没有停止。我买了一盒笺纸放在住在北平的吴晗那里，请他随时留意约人写字。请朱先生写字是我特别提出的请求，搁了很久才写好寄来。几天后又接到吴晗“朱佩弦今午逝世，心境极不快，……”的信，这是1948年8月12日的事。

今天我还能够清楚记得这消息给我带来的震动。当时住在北平的名作家、名教授多得很，但朱先生是不同的。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和青年中间，他的“份量”是非常重的，这事到今天还值得沉思。

我没有认识朱先生的机缘。一篇《背影》是中学时就当作课文读过了的，也是从那时起，知道并敬佩着这位作者了。朱先生是著名的诗人、散文家，但他的诗我却读得很少。他的散文给后辈带来的影响真是非常非常的大。从他的文字中读者认识了他这个人，也懂得了他是经过了怎样的途径打动并征服了自己。朱先生是个平凡的人，是一位教员，从中学教到大学，除了偶然写点小文章以外，就是编教科书，编讲义，后来还作一点考证、研究的工作。他只活了五十一岁。50年代印成的《朱自清文集》一起有四册，成绩不算小，但他最好的东西还是散文，在《文集》中占的分量并不大。能用这么精致、少量的作品奠定了自己文学史上的地位是很不容易的。那原因我想应该是，通过文字，读者非常容易就接近了作者，了解了作者，而且一些都没有拘束地和他成为熟人，并喜欢了他。朱自清实在是个非常天真、平易、正直、真诚的人。

他身上的“份量”在他生命最后的一两年中急遽地增重了。在昆明的西南联大，在劫后的北平，在那么复杂、残酷的现实斗争中，病弱的他加紧迈出了艰难但踏实的步子。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这个诚实的作家身上有着怎样惊人的勇气。他成了向新时代、新社会不停步前进的知识分子的象征，使人信服的象征，因而他有了自己的“份量”。

正因为他平凡，所以他有更大的代表性，所以他伟大。

他向全社会说出了一个正直的中国人在那个时候应该说的话，没有半点装饰、虚夸。

很有意思的是五四以来的许多新诗人晚年都写起旧诗来。朱先生是喜欢宋诗的，这无论在他的作品还是教学中都可以看得清楚。即以这首诗而论，明显地表示了他的迟暮的焦虑心情。但不是消极的，实在是很积极的。关于朱先生晚年的心情和精神境界，叶圣陶先生在《谈佩弦的一首诗》里写得很清楚、深刻。文章写于1948年8月18日，在朱先生逝世后六天，收入新近出版的《叶圣陶论创作》中。这里不必多引，只将朱先生的原诗抄在下面，这也是一首好诗。

中年便易伤哀乐，老境何当计短长。衰病常防儿辈觉，童真岂识我生忙。室人相敬水同味，亲友时看星坠光。笔妙启予宵不寐，羨君行健尚南强。

这首诗和这里的一首写的几乎是同一种心情。

1974年底，叶圣老填了一阕“兰陵王”，怀念朱佩弦。起因是俞平老信中提起了当年在杭州时的往事。叶老说“佩弦之逝已二十余年，览此（指俞

信)感逾邻笛,顿然念之不可遏,……”就在这种心情下填了这阕词。词经与俞平老反覆斟酌商定。叶至善有《书后》一文详记其事。结尾说到俞平老特别欣赏的一句是“君辄沉沉醉凝睫”,说,“初见此句即激赏之,以为神似”。

这些是只有老朋友才能说得出来的话,不是没有得见颜色的后生晚辈所能想象的。

1982年3月25日

茅盾印象

茅盾一直是我非常爱重、佩服的作家，可是一直没有拜见的机缘。1946年秋在上海编报，常有机会看到他的手稿。那实在是非常可爱的，一笔娟秀的小字，写在毛边纸或宣纸上，几乎很少改动。这样的稿子不但在编辑部，就是在排字房也是受到欢迎的。可惜的是，大家都并不觉得珍贵，用过以后大抵散失、毁弃了。不过我有时也想，这样的字如果是写在漂亮的诗笺上，那该是更加出色的吧。于是有一天路过荣宝斋，就买下了一匣诗笺，打算什么时候去碰碰运气看。我的忽然想起要收集作家手迹，好像最初就开始于这时候。那是1946年秋天的事。

茅盾当时住在上海，就在闸北的什么地方，这我是知道的。不过因为种种原因，住所保着密。但在报社里打听起来也并不困难。那是1946年10月28日的早晨，决心去访问了。为了壮胆，还拉了一位朋友作伴，同时也分给他两张笺纸。茅盾的住所在北四川路底的大陆新村，门牌号码忘记了。好像是住在二楼。我们走上楼梯，立即看到打开的房门外面放着一把椅子，上面端端正正地坐着一位中年并有些发胖了的太太。虽然是第一次看见，但直觉地判定，这一定就是孔德沚——茅盾夫人了。

我们恭恭敬敬地说明了来意，是报社的记者前来访问。想不到孔先生告诉我们，茅盾正在发痔疮，睡在床上。我从门隙里一张，果然看见他蜷着身横卧在床头。没有法子想，只好告辞。从身边摸出了一张名片，请孔先生转交并代致敬意。正当我们想转身下楼的当口，名片已经到了主人手中，只见他从床上一跃而起，跳下床来，赶着唤住了我们。在我的旧日记中记道：“握手甚久，极致殷勤之意。吁！可感也。”当时的这印象，到今天还是非常鲜明的。至于谈了些什么，可是一些都记不起了。我想他一定告诉了我们，为什么他要睡在床上；以及当他知道了我们是谁、在什么地方工作时，他的“宿疾”就立即霍然的原因。这一切都是很有趣的，谈话因此也极为自由而亲切，谈话的对手也完全不是我想象中的大作家。他的热情，对后辈的爱护，对共同奋斗着的事业的激情，都是不易忘却的。我记得只说了很少几句仰慕的“套话”，但都是真实的话。此外，没有了。只好取出带来的笺纸，说明了来意，站起来告辞。这次会见，前后不过十分钟。

过了几天就收到他寄来的一叶诗笺，写的是林和靖的《旅馆写怀》。果然神彩飘逸，秀气扑人，和他的手稿，他的本人都一般无二。记得那天他穿了一袭灰呢夹袍，清瘦，但却神采奕奕，好像身体内部正孕蓄着无限的创作力。

他当时为什么选写了林和靖的这首诗，我其实并不曾细想过。今天重读，似乎多少可以了解此中“微意”。特别是在知道了《子夜》的原题本是《夕阳》以后，就更感到十分亲切了。

第二次看见茅盾是1950年1月27日的晚上，在北京东四头条他的寓中。这次是陪柯灵一起去的。柯灵正打算把《腐蚀》改编为电影，去听取他的意见。在他那舒适但不免有些冷清的小楼下面的客厅里谈了一会。柯灵把他的意见随手记在带去的一本《腐蚀》的封面上。这次谈话的时间也很短。

这就是我与茅盾仅有的两次会面。

大约是1979年，因为旧有的那张手迹“失落”了，觉得可惜，就写了一封信去，请他再给我写几个字。不久得到家属的覆信，说茅公身体不好，还

是不要多浪费他的精力，让他能集中精神完成回忆录的写作为好。我觉得这意见是很正确的，虽然感到遗憾，也决定不再想方设法去打扰。茅盾晚年为许多人、在许多地方题字。数量之多几乎可以与郭沫若媲美。有些写的是自作的诗词，其中有很好的作品，无论是诗或字。但我还是觉得三十六年前得到的这张手迹最可爱。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

茅盾后来应苏联的邀请，去游览讲学。住在上海的许多朋友都曾到码头上送别。马叙伦先生作了两首诗，后来也写给了我。

世有桃源君且去，留余反袂泣郊原。明年海燕重来日，此地桃花应满园。凭君妙舌吐莲花，

天下从今是一家。送别江浔惟一语，借他金镜照中华。（送茅盾应苏联讲学）

这也是一件历史文献了。诗中反映的是当时当地朋友们的共同心情。马夷老的善良愿望有的实现了，有些则不免成为虚幻的梦。“桃源”、“金镜”其实都不像诗人所想象的那样美丽。不过，作为历史的遗痕，却是真实的。

1982年清明后一日

许寿裳

许寿裳是鲁迅的老朋友，终生的朋友。他留下的两本关于鲁迅的回忆录，是非常重要的鲁迅传记资料。他们之间友谊之深厚，交往之密切，都不是别人所能比拟的。鲁迅生平之交游极为广泛。尤其是在不同时期随时接近青年，团结他们一起战斗，前进，成为先生光辉的一生的主要基调。因此人们好像留下一种印象，他并没有几个老朋友，其实这当然并非事实。老朋友也很难经过几十年一直志同道合，就像许寿裳，在思想认识上和鲁迅也不是没有分歧。但他们之间始终保持了诚挚的友谊，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可贵的。鲁迅就曾经说过，并不像一些人所想象，他也还是有着保持了几十年友谊的老朋友的。只要不是明目张胆地走进了敌对的阵营，那就还是朋友，是可以求同存异，并不一概视为仇讎。这一点，我以为非常重要。有一个时期，因为机械地突出鲁迅的战斗精神，将他描画成一个终日横眉冷对，面无笑容的“英雄”，其实正是歪曲了先生的形象。

记得刘半农逝世时，鲁迅和周作人都写过纪念文章。当时读了就给我留下了非常鲜明、深刻的印象。觉得从两篇悼文里，完全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立场、感情、胸怀、气质。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老朋友”观。怎样才是正确的对待友谊的态度，这里表现得明明白白。

许寿裳并不曾一直和鲁迅并肩战斗，但他一直坚信鲁迅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这事情发生在两位思想上有着距离的老朋友中间是很不容易的。这就是友谊，是古人所说的那种“真堪托死生”的友谊。好像有人说过，在某种意义上，鲁迅可以说是一位结束了若干年来中国传统学者风习最后一位大师，我以为说得好。看来在对待友谊的态度上，也正有着同样的特点。

我于1947年秋冬间，写信给在台湾的台湾大学里任教的许寿裳先生，希望他给我写两张字。当然希望他写鲁迅的作品。当时我没有见到发表在女子文理学院的校刊《新苗》上的《上遂顾诗草》，不知道他也能诗。否则一定也要请他写几首自己的诗的很快就接到他写来的两叶诗笺，写了鲁迅的两首七律，都是有名的作品。在《阻郁达夫移家杭州》那一张上，还留下了日子，“三十六年（1947年）十二月”。当时因为某种原因，我的许多函件都托上海出版公司代转，不免有些延误。等这两页手迹到了我的手中，好像没有几天，就在报上看到他惨遭杀害的消息。这真不亚于晴天霹雳，手里持着这可能是最后的遗墨，一时竟愤慨得说不出话来。这以后，我就随时注意、剪存了当时报纸上发表的此案的全部报道，读尽了编造得漏洞百出的“神话”，据说最后终于捉到了“凶手”，而且立即枪毙了。“正法”以后的尸体照片也登在报上。这一束特别的文件，后来失落了。只记得全案被说成是一件因细故而引起的“仇杀”，凶手是曾在许家作工的两个年轻人。真是只能骗鬼的拙劣的“神话”。

许先生的书法是清劲的，当然不能说是怎样出色的书法，不过在我看来却别有趣味。特别是多用古字的一点，就分明表现了曾从章枚叔学习《说文解字》的遗痕，好像这中间也存在着与鲁迅的某种联系似的。

章太炎、鲁迅、许寿裳、郁达夫都是浙人。这中间好像确也存在着一种微妙的联系。

1982年4月8日

冰心的手迹

冰心女士的《到青龙桥去》是我在小学时读过的国语课本中的一篇，说来已是五十年前的事了。这大概是我最初接触的新文学作品之一，比认识鲁迅、叶圣陶……都还要早。后来进了中学，春假到八达岭去旅行，爬山、看长城、瞻仰詹天佑的铜像，细心观察火车是怎样前拉后拥地爬过山头……，脑子里还总是记着冰心写青龙桥的那篇文章。

我第一次看到冰心的照相是从郑振铎的《西行书简》前面的插图里发现的。她们站在大同久胜楼（传说是李凤姐卖酒的地方）头的一张不清楚；穿了矿工服装站在矿井前的全影也不清楚。只有与雷洁琼在蒙古包前的一张是清清楚楚的。我真高兴，第一次认识了自己崇拜的女作家。

《春水》、《繁星》我没有好好读，《寄小读者》零碎地读过其中一部分。《南归》给我的印象最深，应该如实地说，我不大敢读这篇文章，它给我带来了多么深的哀愁与痛苦。最近得到《记事珠》后又翻看了一下，感想依旧，很快就掩卷了。

于是我懂得了冰心作品中最重要的东西，母爱、孩子，还有大海。

冰心的小说，我曾经爱读过一篇《我们太太的客厅》，这是写30年代北平高级知识分子生活的。

最近读杨绛的《倒影集》，在卷末又发现了那篇《路路》，真是如遇故知。这也是我当时喜欢的小说之一，曾收入《大公报丛刊小说选》。这篇写的是学生生活，与冰心的一篇合看，当时北平高等学府里的侧影依稀可以看到了。两位女作家写的都是她们熟习的人和事。我的喜欢这两篇小说自然也说明了我那时作着的是怎样的梦。

幸运的是，这样的梦终于被抗日战争的炮声惊醒了。

我是在重庆的豆油灯下第一次读到署名“男士”的《关于女人》的。记不起是早就听人说起，还是自己从文字中辨识出来，这其实是冰心的作品。我当时就想，这是冰心最好的作品。作者到底已经从“客厅”里走了出来，抬头一看，外面的天地是多么空阔，人间的悲欢又是多么深广。在作家说，这是一次真正的解放、升华，但却没有割断与过去的联系，因此倾泄的感情也是实实在在的，作品是真正茁壮地成长了。

据作者说，这里写的是十四个女人的事。“连带着也呈露了我的一生”。这就是了。这大约都是“真人真事”，但仍然经过了艺术加工。但我不想把它算做什么“报告文学”。文学就是文学，作品就是作品，自有客观标准加以检验、衡量。

三十四年前正当我起劲地收集师友“墨宝”时，曾问过巴金，想请冰心给写字，不知道行不行。他说可以，就为我寄了一张笺纸去。不久，就收到她从东京寄来的一张字，写的是《憩园》后记中的一节。但她把一九四八误写为一九三八。这是在《憩园》出版三年以后。

1941年巴金为冰心编《著作集》，在抗战中的内地重印。巴金在“后记”中说，（冰心）“抗战后新写的《默庐试笔》，及译作《先知》一册，因原稿散失，一时无法找到，只好从阙……”。

这《先知》，我却在抗战初上海的旧书摊上得到了译者自藏的校改本，书前还有自跋。这是被我看做“善本”中的“善本”的。战后归来，依然无恙。一直藏到十年前，被抄去了，但终于回到了书架上。我就又和巴金说，

这本书还是给译者自己收藏吧。他说“好，好！”就代我寄还给译者。我当时又曾说起，1948年得到的那张字没有了，能再请冰心写一张就更好，结果就是她在1980年5月8日写来的一幅，这次的笺纸是她自备的，我手中已经没有了笺纸，而她大概还保留着三十四年前在花笺上写过一张字的印象吧。这次她写的是：

收到巴金转来的您“还”给我们的那本附有题字的《先知》，真有意外的欢喜和感激！几经离乱，赠书人和受书人的脑海中，都早已没有了那片帆影。为了晚年的慰藉，我们向您深深地致谢。

应该致深深地感谢的是我。能珍藏从儿时起就尊敬、爱重的前辈作家的手迹，隔了三十年先后写下的两张手迹，不能不使我感到极大的幸福。

1982年11月16日

阿英与书

《阿英文集》在作者逝世四年以后问世了。这本七十万字的文集收入了散文、随笔、回忆、序跋等部分单篇作品，篇幅较巨的创作与论著都没有选入。尽管如此，文集还是清晰地反映了作者五十年来走过的道路；一展卷，作者的言笑，在革命道路上仆仆前行，伏案研究，南北访书的种种，都如在目前了。作者的文学工作涉及了非常广阔的方面，但他所作的一切都没有离开为中华民族的生存与解放而战斗的轨道。作者是文学家，但首先是革命者。

我认识作者很晚，已在全国解放之后。虽然从30年代起已经耽读他的许多著作和编著的大量书册了。第一次见面就使我确认了在心目中存在了很久的印象，他应该就是这样一个人而不可能是别一个人。他是前辈，是有威望的革命前辈和名作家，但在后辈面前却没有那种常见的架子。他有一种一下子就能把人们的心拉近的魅力，能立即给人一种安定感，只会有这一种而不可能是多种面貌的安定感。这真是一种罕见的可贵品质。

第一次看见阿英记得是在梅兰芳护国寺街的寓所里。他好像已经是梅家的常客了，非常随便地坐在缀玉轩的客厅里谈天，后来又一起去恩成居晚饭。就在那一次我见到了一种奇异的场面。在我们就餐的小房间外面，饭店的走廊、门口，一下子就聚集了那么多普通的北京市民，以至后来离开时都发生了很大的困难。这些自动聚集起来的都是梅先生热心的观众，他们脸上都堆着欣喜、兴奋、幸福的笑。当我们跟着梅先生挤出饭店时，阿英轻轻地对我说：“这就是人民的艺术家。”

后来我从梅先生和梅家友人口中常常听到阿英的名字。要安排演出节目了，写好了什么文章和发言稿了，要修改剧本了，还有许多几乎是琐碎的小事，人们总不会忘记问问阿英的意见或请阿英来谈谈。这种尊重与信任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阿英还约我到他的寓所里去看过书。

他取出了一些明刻白棉纸印本来给我看。书的名目记不起了，反正并非什么罕见的秘本。但对其中的一部他特加说明，说是抗战中在苏北敌后抢救出来的，我却翻阅了许久。我想，作为藏书家，他也是有自己的特色的。记得我曾告诉他，两年前在上海的书市地摊上曾发现了他所藏的大量新文学书籍，可惜没有可能为他买下。他也只是少少表示了一下惋惜的心情，接下去就说，书还是要继续买下去的。我想，他在买书上的锲而不舍、再接再厉的精神也是不寻常的。

后来是继续的通讯，最早是商量印行古版画的事情。从《第一次文代会日记》中知道，他曾几次到傅惜华家里去看过碧藻馆收藏的大量明代版画，这中间有郑振铎的《中国版画史》没有收入的许多重要作品。他想到的第一件事是设法尽快地印行、流布，于是就起劲地筹画编纂，并答应写一篇有份量的长序。这件事经过长久的努力终于没有成功。开始时我们就曾意识到这中间可能有人事的牵制，但终于过于天真地作了乐观的估计，认为在今天这一切都不应成为问题。但事实证明并不如此。从这件事可以看出阿英对人办事的基本态度和他的纯朴的心。他是从人民的事业出发进行考虑的。这样一批珍贵的古版画，是应该尽快介绍给读者，还是加以抑制使之不见天日，还是像康生那样，索性掠归己有呢？这是三种截然不同的立场、态度、方式。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后来出版了《中国古典文学版画选集》，是1964年傅惜

华编订的。基本轮廓还是当日拟议的面貌，但解题，选材，时代地域区划，历史、艺术分析的设想，木刻画发展的研究……这些方面，都不是原来设计的样子了。最可惜的当然是阿英没有写出的那篇总序，至于制版印刷，为了保持原作面目的一些设想和努力的没有完成，就更不用说了。

1955年上海出版公司出版了阿英编的《红楼梦版画集》，则是这一次努力留下的仅有的小小纪念。

这以后在信里常常要我为他留心找书。关于汉画像石刻的，戏曲、小说、版画的，晚清的诗文集是他后期重点收集的对象。有一次还指定要找一些清末石印小说附插图的本本，老同文和点石斋的出版物。

从这里可以看到他视野的广阔和眼光的敏锐。他不跟在别人后面跑，采取了一条“人弃我取”的途径。他注意的是那些寂寞的、受到不应有冷落的区域。他尽自己微薄的力量在书市上进行“抢救”。书籍到手以后并不束之高阁或装饰书房，而是抓紧阅读、研究、选录、纂集，把30年代开始编著的《近百年来国难文学大系》扩展、丰富，完成了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庚子事变、反美华工禁约等《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集》。同时又完成了规模庞大的多卷本《晚清文学丛钞》。

这一大批文献汇编在近代史、近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用不着多说。开辟了这个重要研究领域的阿英的眼光和魄力真应该受到后辈的尊敬。《文集》中收有好几篇记述在上海买书的文字，是非常优美的散文，也是可以与李南涧、缪荃荪的《琉璃厂书肆记》（前后记）并存的珍贵书林史料。文章中也记下过他收集晚明文集的故事，但更多的是他搜集当代、近代革命、文学史料的故事。他写出了访书的辛苦和得书后的欣喜心情。这种心情记述在藏书家的题跋中并不少见，可是阿英的抒写却不同。同样是激动、欢喜，但买得被禁毁追查的革命书报的心情到底和得到宋板明抄的意趣是两样的。

新文学史料的开始成为搜集研究对象，新文学出版物被当做版本书籍而受到重视，好像都是近年来才出现的热闹现象。人们看到这种研究工作在国外已经开展了许多年，并有了不少成果时，就更产生了不能再继续漠视不顾，必须加紧建设的迫切要求。我们必须有自己的文学资料收集保管机构，这对作家、研究家、出版者和广大读者都是不可缺少的。不能让我们的研究者到域外去寻找资料，这种“史在他邦、文归海外”的现象不能再在今天出现了。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伟大事业中，这绝不应被放在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地位。阿英在五十年前，就已经把这当作头等重要的大事来做，在1936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中，以个人的努力编成了《史料、索引》一卷，这是何等的气魄与见识！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开展了十六年的当时，阿英就看到人们对之产生了“三代以上”的生疏感，他对《新文学大系》的发刊的估价是“超过于翻印一切的古籍”之上的大事。他在1935年写《版本小言》，就将“新书”的版本价值拿来与旧书相提并论，在当时可能是惊世骇俗，在今天，则正是高明的预见。在鲁迅逝世周年时，他写了《鲁迅书话》，谈到《河南》和东京印的《域外小说集》。作为新的“书话”，阿英也是最早的先行者。

《文集》中的几篇访书记，写的是他在上海城隍庙、西门、浙东、苏常等地访书的故事，不但有文献价值，也是优美的散文。如果说这一切还不过是出于个人的爱好，表现的也依旧近于“冷摊负手对残书”那样的情趣；那么在《敌后日记》中所记在苏北新四军中的访书活动，意义就截然不同了。

在烽火遍地、民族战争的战场上，那种迁徙无常、战斗频繁的艰苦环境中，在陈毅同志的直接关心下，阿英展开了困难的抢救、收集、保护书籍文物的工作。对祖国文化遗产炽热的爱，精神文明建设在整个革命事业中所占的地位，在这些重大问题上他们的见解与行动直到今天还值得引为骄傲。

在1949年写的《第一次文代会日记》中，显示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在文化建设上雄伟壮阔的草图。规模的广阔，人才的众多，工作的气势……都使人人为之神往。就在这群峰耸峙、万壑争流的情景中，阿英又和郑振铎等一起研究了有关文物管理组织等问题的设想，并很快向周恩来同志作了汇报。新中国的文物工作就在这时奠定了基础。从旧社会的个人访书到新时代人民的文化事业，这是怎样的一种飞跃啊！

从《文集》的篇目中，我们会惊异地看到作者的兴趣是如此广泛，视野是何等开阔，他从新文学的创作研究开始，写下了许多闪烁着战斗锋芒的文学评论；在连续的战斗中尝试使用话剧、电影等多种艺术形式；在抗战烽火中开始注意通俗文艺的运用，从而打开了更广阔的视野。画片、西湖景、年画、相声、窗花……，都受到注意。这种生气勃勃的研究兴致，一直保持到60年代中期，从不少衰。作者在文化园地上辛勤耕耘了五十年，经历了风风雨雨、胼手胝足的艰难历程，有自己的辛酸与愉悦，可是从没想到放弃自己的劳动，他实在是个不知道疲倦的人。

阿英同志逝世已经四年了。有时想，他实在离开得太匆促，留下了那么多重要的工作来不及做完，这是非常可惜的。但又时时觉得他好像还走在我们前面，迈着稳重而坚实的步子。“闻鼓鼙而思将帅”是一句老话了，但我觉得放在阿英同志身上是很合适的。特别是当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放在面前的时候。

1982年9月17日

诗人冯至

冯至是诗人，他写的散文也凝聚着极为精炼的诗的素质。《伍子胥》是小说还是散文诗，就很难说得清楚。正如何其芳是诗人同时也写王子乔的故事一样。五四以后小说中有此一派，作者不多，也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但却是应该给以注意的。

冯至在《伍子胥》的后记里就直白地述说了他写作的最初曾受到里尔克的散文诗《旗手里尔克的爱与死之歌》的影响。里尔克这篇作品有卞之琳译本，收入《西窗集》，题《军旗手的爱与死》。卞之琳在《西窗集》的题记里说过一句话，“ 编理完了，仿佛在秋天的斜阳里向远处随便开了一个窗，说不出的惆怅，…… ”这句话很好地说明了这一文学现象的时代背景与踪迹。五四以后，从“ 西窗 ”里吹来的一股清新的风，吹醒了一些沉醉于古代诗歌海洋里的年青诗人，他们摩挲着迷离的睡眼，想起要做一些新的尝试，……

冯至在《伍子胥》的后记里说明了他这本作品从最初的酝酿到最后完成中间经历的过程。伍子胥最早曾音乐似的在他的头脑中闪过许多遍；经过了许多年，他的青年时的梦想一部分已被经验填实，一部分则被驱散。等到作品完成时，冯至说：“ 里边既缺乏音乐的原素，同时也失却这故事里所应有的朴质。其中掺入许多琐事，反映出一些现代人的，尤其是近年来中国人的痛苦。 ”这些话是 1944 年冬写下的。

我得到他写的这一叶陆放翁诗，正是在这两年之后。

那时冯至已经回到北平，仍在北京大学里教书。从他在放翁诗后面写的几句话，也可以看出那时一个“ 中国人的痛苦 ”。诗人仿佛又返回诗的故国，惊异地发现生活在南宋的大诗人竟自写出了使 1946 年的读者“ 觉得非常亲切 ”的诗句。

三十年后重展，也实在不能不使我感到惊异。现实主义的力量真的如此强大，可以使作品永远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历千百年而不褪色。陆放翁写这诗时已经老了，但他关心着年青人，寄期望于年青人，他知道希望在他们身上。诗人对自己和自己的同辈的告诫是“ 万事不如公论久，诸贤莫与众心违 ”。这是陆放翁考虑了一生所得到的结论，这结论是正确的。

得到这一叶诗笺以后两年，我在北京的北大教员宿舍里访问了作者。在那小小四合院的南房里，四周是矮矮的一圈书架，放满了德文书，有许多是精装的。诗人有着温柔敦厚的典型特征，非常随便的谈话，简直看不出他就是《伍子胥》的作者。

冯至近来好像一直在从事外国文学的研究和领导工作，好久没有写诗了。

今天整理书橱，找到了 1955 年作者自选的《冯至诗文选集》，这是一本薄薄的册子，共两辑，第一辑是诗，第二辑是 1939 年以后所写的散文，这里面就有一篇写于 1944 年昆明的《一首陆放翁的诗》，讲的正是两年以后写给我的这首《送国子监司业芮国器》。可见放翁这首诗在他心中徘徊了许久，一直没有忘记；也证明 1944 年在昆明引起的感慨，到了 1946 年的北平也还是没有多大的变化。作者在文章的开始时说：

近来电力不足，常常灯光如豆，晚间不能看土纸印成的书报，不得已只有读大字的古书了，一天晚上，无心拿起一本陆放翁的诗集。窗外黑暗的天空上飞机的声音没个停息，自己读着“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是多么无聊；但是开卷有益，翻了几页，却碰到一首好诗，……

读了这一节，仿佛也牵起了我的旧梦。我不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但我有些同学在这个学校里工作，不过工作的地方是工学院，地方在拓东路。我在抗战中有好几次路过昆明，有时也借住在朋友的宿舍里。上面所说的那种灯光昏暗的情形，也是经常遇见的。不过我没有古书，在地板上打地铺时也还是只能看土纸印的书报，拓东路离开巫家坝很近，美国飞机不停地起落的噪音听得也更为清楚，但习惯了，好像也并不影响谈话或睡眠。这些记忆直到今天也还是鲜明得很。

作者文章中有些话，我觉得今天读来也还是很有意思的。他说：

在抗战的艰虞中是产生能手的好机会，难道人材根本没有吗？我想绝不是。反而我相信人材可能很多。只是他们有的像是石下的小树，要伸腰无从伸腰，有的像是壅塞的流水，要前进无从前进，他们都在重压与壅塞的状况下凝滞了。这个状况是怎样造成的呢？那些老名字要负大半的责任。——我并不是不敬长者，可是我敬重的是领导着来者前进的长者，而不是自己高高在上使来者凝滞在苦闷里边的“长者”。

这些话是说得很好的。他是在1944年的昆明说这番话的，指的当然是当时的人和事。但近四十年后重读，依旧觉得说得很好。因为这是可以说明他写下放翁诗的心情与意见的，所以不惮烦地介绍在这里，算做一点补充。

1982年4月6日

废名

废名是五四前后出现的很有特色的作者。关于他的小说，鲁迅先生有过这样的评论：

后来以“废名”出名的冯文炳，也是在《浅草》中略见一斑的作者，但并未显出他的特长来。在1925年出版的《竹林的故事》里，才见以冲淡为衣，而如著者所说，仍能“从他们当中理出我的哀愁”的作品。可惜的是大约作者过于珍惜他有限的“哀愁”。不久就更加不欲象先前一般的闪露，于是从率直的读者看来，就只见其有意低徊，顾影自怜之态了。

这简短的一节话，很能说出废名小说的特色，在《桃园》、《桥》、《莫须有先生传》中显露的就正是这种特点。记得我在中学里读废名的小说，就不能懂，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我想那是因为自己的幼稚，还谈不上“率直”。废名是北大出身的，他虽然写小说，但我想从根本上说他还是一个耽于哲学玄想的诗人。他的小说似乎也是近于新感觉派那样的作品，他想描述的不过是他的一些思想活动，对生活的感觉、思维。当然，这一切都局限于非常狭小的圈子里，他的“哀愁”也是“有限”的。“哀愁”并不一定是非否定不可的感情，重要的是要看这是怎样的“哀愁”，是阔大还是狭小、深刻还是浅薄。鲁迅的意见原是很明白的。

废名后来一直在北大教书，作品不大写了，兴趣转移到儒家、释家哲学上来，人也变得古怪了。据说他曾与熊十力讨论佛学，争论到后来，没有声音了，两人在房里无言地扭打起来。但第二天又照旧讨论下去。这种举动和他的小说一样都很不好懂。但他讲唐代的杜甫和李义山的诗却实在有许多好意见。解放后他在东北的的大学里教书，有《杜诗讲稿》发表在学报中。我记得他讲杜甫的“影静千官里，心苏七校前”两句实在讲得好，好像把杜甫赶到灵武的行在后，喘息未定的内心活动都揭示出来了。我就想，废名讲唐人诗和他写小说用的好像是同一种方法。

写到这里，从书架上找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的《废名小说选》来看。书前有作者的自序，他在序里说：

我最后躲起来写小说乃很像古代陶潜、李商隐写诗，——这个判断是真实的，……

又说：

就表现的手法说，我分明地受了中国诗词的影响，我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我的一篇小说，……实是用写绝句的方法写的，不肯浪费语言。……运用语言不是轻易的劳动……

我很高兴，我前面的猜测没有大错。

废名还忍不住要在小说里写出他的诗论。如《桥》中就说：

今天的花实在很灿烂，——李义山咏牡丹诗有两句我很喜欢，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叶寄朝云。你想，红花绿叶，其实在夜里都布置好了——朝云一刹那见。

他给我写的这一张字，也是转录他自己的玉溪诗论。不知道出处在那里，废名好像一直没有散文集出版。

李义山咏月有一绝句，‘过水穿楼触处明，藏人带树远含清。初生欲缺虚惆怅，未必圆时即有情’。其第二句意甚晦涩，似指月中有一女子，并有树如小孩捉迷藏一样，藏在月里头，不给世人看见，所以我们只见明月。诗人想象美丽，感情溢露，莫此为甚。

这是很好的一节“诗话”。李义山也实在被人说得滥了。特别是前些年，许多论客一窝蜂地拼命把李义山说成政治诗人，使他百口难辩。不论他在写爱情，写幽期……，都是在暗暗地影射着什么重大的政治斗争。这原是古已有之的一种研究方法。我们也不否认义山确实写过一些政治诗，但说他连睡

觉喝酒吃饭打喷嚏都忘不了政治可就不免近于胡说八道。几年前的那一窝蜂，其实不过是一种历史沉渣的泛起，一些都没有什么新鲜。这样，读了这样的艺术分析就使人特别喜欢。他就像一个小孩子述说自己对诗句的思索、想象、理解一样，语言特别朴实、真挚。自然我们也不一定就完全接受他在这里的解释，也许李义山写的是现实境界，不是月宫中的事情。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欣赏废名眼中的义山诗。

废名的字写得也很有特点，稚拙得像小孩与小楷似的，就像他那么顽强地雕琢着他在小说中使用的语言一样。

我觉得废名在新文学史上的努力与表现是应该受到注意的。他开了一条寂寞的头，接下去就被人忘记了。但我想他并不是孤独的。如何其芳，也曾在《画梦录》里摸索过同样的道路；何其芳在写他的美丽的散文时也是非常顽强、艰苦的，也深知运用语言不是轻易的劳动。我相信，在何其芳身上就有着废名的影响。

废名还有过一本《谈新诗》，是他在大学里讲课时编的讲义；解放后他还写过一本鲁迅先生与青年的小册子。好像他已经不在世上了，什么时候死去的我也说不清楚。但我想他的有些遗文是应该辑印问世的。如他讲杜甫、李义山的文章就是如此。1982年5月8日

今天买到新出版的何其芳的《一个平常的故事》，从其中一篇《给艾青先生的一封信》中知道刘西渭（李健吾）先生曾经非常认真地读了何其芳的《画梦录》，但“主要地只看出了我受了废名的影响的那一点”。何其芳说，接下去他又列举了对《画梦录》曾经有过一些影响的作者的名字，其中有废名。

刘西渭的文学评论在一个时期里很有名，但我却不曾看过。何其芳的这封“信”过去我也没有见到过。不过我却得到了与他们相同的结论，我是通过作品的阅读感受到这一点的。我很高兴在这里自己没有猜错。

1983年12月6日，重校记。

忆李广田

汉园三诗人中现在活在世上的只剩下了一个卞之琳，想起来真使人感到惆怅。论年龄，算到今天他们都只不过七十左右，本应可以好好地工作更长一段时期的。

我手边有两本书。一本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园集》，是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三人的合集，李广田的诗题作《行云集》，收诗十七首。三位诗人的风格有其共同之处，但又有各自的特色。在《地之子》和《上天桥去》两诗中就显出了李广田的特点。在共同的玄想、哀愁、寂寞、呻吟中，李广田是表现得较为踏实，带有更多的泥土气，也更多注视着人间相的一位。

另一本是收在《文学丛刊》第九集中的散文《日边随笔》，薄薄的一本小册子。诗人这时已久不写诗了。“我离开一个最宜于做梦的大城，又到一个最不宜于作梦的小城，……”这小城就是昆明。昆明市中心有座近日楼，这是书名“日边”的一个理由。他依旧用诗人的眼睛观察人间的动静，但这些年他看见的是“如此伟大而壮烈”的时代。不过他还是忘不了萦回在心头的旧梦，于是在序言一开始就写下了：

‘日边清梦断’。若干年前，我曾经喜欢过秦少游的这句词。

这自然依旧说明了他的诗人气质。他始终忘不了一些清词丽句，富有哲理性的美丽语言，但又好像在二十多年前就已预示了他在昆明的结束。……

我只见过诗人一面，那是1956年冬我旅行经过昆明的时候。当时他已是云南大学的校长了，完全变成了一位学校行政干部。我到云大去访问，他热情地带着我参观学校的校园、建设、图书馆……又坐在他的办公室里谈天，他谈得高兴、畅快，多半是关于学校的事情。他几乎不谈诗，好像与云南作家的来往也很少。我当时不禁想，这难道就是《行云集》的作者么？

我和李广田在文字上打过两次交道，但却都为他带来了麻烦，今天想起也还感到遗憾。

1962年在报刊上曾经展开过一次小小的讨论，那是因对杜甫诗“香稻啄馀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的不同理解而展开的。我发表了他的文章，引来了非难，后来他又写了一两篇论辩的文章。详细的论点记不清楚了。总之是为他添了麻烦。我觉得杜甫这两句诗是无可争辩的名句，也一点都不难解。我是个粗疏的人，不耐烦研究杜甫在这两句诗里用的是否倒装句法，也不想深究诗里表现的是怎样嘲讽的微意。只要从全诗中领会到诗人情感上的低回、叹息就行了。诗中的含意，也是清清楚楚的，用不着一点点地来坐实。

1946年我搜集师友墨迹的时候，也得到过他的一幅。但后来抄没了，也没有找回来。但原信却在的，写在一张草纸上。

黄裳兄：字愈写愈难看，真是无可如何也。匆此候安李广田。六月廿一日。

信封上写着“天津南开大学李斌”

此外还有一封信，附着一张剪报。信上说：

黄裳兄：示悉。剪报两份，已读过，觉得十分好笑。一卒先生意见，我完全赞同，翟君的访问记却真令人胡涂。事先既不知道他作访问记，事后也未看过他的原稿，其过失一在于我说话不清楚，也并不认真，再则在于翟君听话与记言均未到好处。此事与吾先无关，徒惹不快，亦至歉然！对此决作缄默态度，因不值一辩，也愈辩愈糟也！以后翟君有稿，务须改正后再刊，不然则可不用。匆覆，即候著安。李广田，廿五日。

这次的乱子惹得比较大。1946年冬我由南京调回上海，在报社编“文教

版”。发了一篇《李广田访问记》。作者自称是他的学生，所谈则是有关抗战中戏剧运动的意见。我没有经过核实并多方面听取意见，就冒然发表了。这一方面固然因为没有经验，更重要的则是自以为是。草草看了一遍，觉得被访问者八年中一直在内地，是文化界中人，他的意见也算是一家之言，就匆匆见报，让他文责自负了。不料立即引来了批评。当时年少气盛，听不得不同意见，就“反攻”回去，和一位朋友讨论后写了一篇答覆，把问题搞得越发复杂。事情以我被撤换结束，改行去编副刊了。工作改变使我不能不为填满版面而赶写连载，几个月中成为我写得最多的一个时期。正是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了。

我寄了两份剪报给李广田，现在信封里却只有一份“依人”作的《戏剧作品的思想问题》，看样子是从《联合晚报》上剪下来的。“一卒”的一篇不见了。看“依人”的文章，我是被称为“杂感家”的，可见我作为“杂感”作者的历史确也是很长久了。“依人”的结论是，“戏剧作品的思想内容，不是死盯在作品上能发现的，也不是作为时代的传声筒能唱出来的，更不是‘杂感’家的‘感—感’能求得的。”这些话虽然不无道理，但也较为深奥，不是当时的我所能安然接受的。一卒的文章可能发表在《新民晚报》的副刊上。这副刊是吴祖光所编，而举出的抗战中戏剧佳作又正有《风雪夜归人》在内，这就使我很不以为然，觉得在自己编的副刊上说自己作品的好话，是不应该的。我的“反攻”好像就是抓住了这一点。五四年在北京看见祖光，握手以后他第一句话就是：“你骂得我好厉害！”指的就是这件往事。

从李广田的信里可以看出，“访问记”没有能不走样地反映出他的主张，他也完全同意一卒的批评。事情本已清楚，可惜这信收到时，反攻的文章早已发表，来不及了。

依人的文章中还提到曹禺的《蜕变》，约略介绍了吕荧、杨晦、胡风的意见，说“恐怕未能使‘杂感’家‘如愿以偿’地满意。”因为我说《风雪夜归人》的题材与抗战无关，而《蜕变》则是正面写抗战故事的。可见当时自己看问题的简单，这真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经验教训。

1983年10月27日

关于周作人

最近关于周作人在抗日战争中投敌前后的史实有过颇为热烈的讨论和研究。结论大体上是一致的。周作人的落水投敌是不可辩驳的事实，在他自己说来也正是一种必然的归宿。这个案是翻不了的。至于在这中间他的思想活动、心理状态的变化，则是另一个研究课题，意义恐怕比研究周作人本身来得更为重要。作为一个典型人物，周作人一生所走过的道路，从光荣而没落而沉沦，在考察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时，自有其特殊的参照意义。

过去我曾在什么地方说过，在中国文学史上似乎存在着一种“贰臣文学”。从汉李陵的答苏武诗算起，可以说是有十分长久的历史了。苏李诗姑不论其真伪如何，即使是后人的拟作，那意义也仍是重大的，说明人们早已觉察到文学史上存在着这样一个严重的现象了。推而广之，凡是出卖或背弃了自己过去一直持有的信念，为了卑鄙的个人目的，或投降敌国，或在邪恶面前屈膝，卖论取官，不知羞耻，都是属于同一范畴的历史现象。这样，广义的“贰臣文学”就更加值得注意。对这样的严峻的课题，人们是不应该置之不论的。

周作人的不肯离开北平，终于陷入耻辱的深渊，当然不只是因为他自己所辩解的“家累”，其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他对抗战前途的漆黑的预测，也就是对国家民族已经失去了信心。他说是在北平“苦住”，其实是不愿舍弃苦茶庵的生活。《玄同纪念》一文是周作人的一篇重要的文章，是他决心“破了二年来不说话的戒”写下的第一篇文章，也可以看作是他决心下水的宣言。他在这篇文章里引用了钱玄同的几封通信，但“信中略去两节，觉得很可惜。因为这里讲到我和他自己的关于生计的私事”。又说，“今玄同往矣，恐遂无复有能规诫我者”，从这些话里不难想象钱玄同对他规劝与警戒的内容。徐炳昶在纪念钱玄同的文章里曾说：

“还记得我们有一位老朋友，先生多次向我谈起，深表不满，指出他除了个人享受以外，几无余事。当时我颇诧异，先生的态度，何以忽如此严峻？但至今日，这位颓唐文人的老朋友，依违于敌伪之间，莫能自拔，……推他所以不能自拔的原因，只是个人享受一事，在那里作祟！”（《我所认识的钱玄同先生》，载齐鲁书社版《钱玄同年谱》）

这个“不能自拔”的老朋友就是周作人。从徐炳昶的话里同样可以推知钱玄同对周作人的规诫。而周作人的恋恋不能舍去的“个人享受”，也并非一般的声色犬马，其实不过是苦茶庵的平静舒适生活与那些旧书而已。

周作人就这样摆脱不掉自己多年来建造起来的硬壳而不能自拔了。这真是一个“颓唐文人”的命定的悲剧。

苦茶庵这个坚固的堡垒其实也并不是完全平静的。有的研究者曾经指出，在北平围城之时，芦沟桥的枪声响起一个月之后，周作人竟自在苦茶庵中写下了悠闲淡远的《野草的俗名》那样的文字，以为不可能。其实这正是周作人内心极不平静的一种表现。他是用这种方法来掩盖、排遣、压抑绝不平静的内心激荡的。

陆游的《老学庵笔记》中有一则炒栗子的故事，记北宋故都著名的炒栗名手李和儿，于燕山迎出使虏庭的宋使，献炒栗十裹，自赞曰“李和儿”也，挥涕而去。这则故事周作人前后几次引用在自己的诗文中。1937年3月30日写《老学庵笔记》一文加以引用，称之为“笔记中最有意义也最为人所知

的一则”。1937年12月，作绝句两首，收入1914年写定的《苦茶庵打油诗》中，列于篇首，其诗云：

燕山柳色太凄迷，话到家园一泪垂。
长向行人供炒栗，伤心最是李和儿。
家祭年年总是虚，乃翁心愿竟何如。
故园未毁不归去，怕出偏门过鲁墟。

1940年3月又写“炒栗子”一文，仍引上面的两诗。看他反复抄引，多次谈及，可以看出这实在并非偶然的。这两首诗也实在含有非常刻露的黍黍之感，只差没有明说王师北定中原。以已经落水的汉奸而写出这样的凄哀欲绝的诗，表面看来正是一种绝大的矛盾，然而却是周作人祈求内心平衡而流露出来的心曲。

同样，在《关于朱舜水》里引《先哲丛谈》纪事，

舜水归化历年所，能倭语。然及其病革也，遂复乡语，则侍人不能了解。

也同样隐曲地表示了这种哀苦的心情，检查周作人在投敌以后所写的文字，类似的地方也还所在多有。这大约可以与吴梅村的诗词相提并论，“死生已负侯嬴诺，欲奠椒浆泪满襟”，都是类似的悔恨之词，只是表现形式少有不同而已。

周作人自己建筑起来的这个堡垒是非常坚固的。在这内外分开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他就躲在这个坚硬的壳里做着安然的白日好梦。这种双重人格的心态正是使他能够安心立命并写下了那许多文字的基础。我只见过周作人一次，那是在1946年南京老虎桥的监狱里。作为记者我曾向他提过一些问题。记得当我问到投敌以后写过那么多文告、讲话、并做了那么多丑恶的表演时，他的反应是使我吃惊的。他坦然地不屑地说那些不过是做戏，仿佛完全不值一说。只有当我问起，一向佩服倪云林的“一说便俗”的他何以在法庭上作出那么说不圆、讲不通的丑恶辩解时，他才颓丧地没有了话。今天想来，应该是倪云林的故事触到了他那个坚硬内壳的核心，才使他默然无语的。至于他偶然伸出壳外做了些什么，就全然不当回事或不加考虑了。这真是一种奇异的现象，但并非不可理解的。

正是在这种双重人格的心态之下，他才能关起门来致力于“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的思索。周作人多次提到他心里有两个鬼，也就是说绅士与流氓，或叛徒与隐士。并多次声明他的闲适的小品文只是次要的，而道德的文章才是值得注意的。这都不能说与他的双重人格没有关系。他是把正经工作与“游戏人间”看作水米无干的。在他看来，做敌伪的贵官，登台检阅，晋京朝拜……一律都只是一种“游戏人间”的姿态，并不妨碍他自己的胜业。这实在是一种奇怪而可耻的逻辑，也正是一种文化史上的特殊的扭曲现象。正因为他是处在沐猴而冠的情形下发表了一系列正经的议论，人们就将这看作是为日本侵略者出谋献策，也就是无足怪的了。

周作人一向标榜“知之为之知之，不知为不知”，一向自命不说假话，但终于不能不在现实面前碰壁，这简直是命定的。他曾提出现代中国心理建设的两个要点，一是伦理之自然化，一是道义之事功化。前者说的是过去中国学者观察自然常与人事连在一起，以致造成许多不科学的说法如羔羊跪乳，腐草化为萤……，这自然是成问题的。后者的大前提也是不错的，但在运用上就显出不可弥缝的大破绽。周作人很佩服洪允祥的两句话，“是要你拼命做事，不是一死便了事。”称之为“极精”，今天看来这也正是非常精辟

的话。一切努力如不落在实处都只能是空话。不过周作人用这个理论来反对岳飞与文天祥，那就只能说明他顽固的失败主义，因为岳、文两人都有奋斗至死的事功，与洪允祥的标准是一致的。历史上当然有许多在国家危难之际空言眩世最后糊里糊涂的死去，被列入节义传的人，但他们都不是岳飞与文天祥。

这个“道义之事功化”，他一直没有放弃，1948年3月在老虎桥监狱中写《儿童杂事诗》序，他说：“我还深信道谊之须事功化。古人云，为治不在多言，但力行何如耳。”解放后周作人写小文骂董仲舒，说“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空头文人的祖师”，并说，“凡是道义的可贵，便因为它在人生有功效存利益的缘故，若不求其实现，只是讲讲，那么有何用处？岂不等于和尚道士的念经么？”这些话于不同时期，因客观环境的不同而各有其不同的意义，但可以证明一点，周作人当缩回他自筑的坚固的内壳时，确是在做着白日梦，满怀着忧惧之感在考虑着种种问题，认为这是“知识阶级”应守的“准则”。和吃茶饮酒一样，即使已经堕入罪恶的深渊，但仍求得能享受一点美与和谐，以取得心理上的平安与平衡。虽然相信“日光之下并无新事”，看得前途一片漆黑，但却还确信自己依旧没有脱离现实世界，只是站在一边，怀着易卜生“群鬼”的恐惧，注视着它会变出什么可怕与愚蠢的花样。扮演一个虔诚的旁观者的角色。说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历史性格的一种“相”，大约不是毫无根据的吧。

周作人在解放后的新中国，得到国家的安排，在翻译希腊日本文学的工作中作出了不少成绩，这可以说是他的一次新生。此外，他还提供了不少鲁迅研究的资料，并写了大量的杂文。最近有机会浏览了一下这些小文章，发现前后写作有三个高潮期。最早是解放初期的几年，他以卖文为生（照他自己的说法是“以工代赈”），多发表在上海的亦报和大报上；另外在1956年与1962年前后也与了不少。总的看来，是掌握着反封建的主题，歌颂新社会，谈东西文化交流，记草木虫鱼、儿童生活、方言名物……，依旧保留着过去的作风与情调。但因新掌握的资料不多，有些话题往往是过去曾经说过的。但经过一番清理，过去的许多偏激、“别扭”的色彩洗掉了。在这里应该说明一下，关于他在解放前的文字中明明暗暗对左翼文学的批判与攻击，他在1949年7月4日写给周总理的一封长信中只在结末处带了一笔，归之为“过去思想上的别扭”表示承认错误。在研究者看来，当然是不能就此放过的。

周作人的这些短文，依旧保持着杂文的锋芒，他还是主张“不写说理文”，骂韩退之，并说，“只有贾谊我觉得不喜欢他，似乎他是后世无聊文人的祖师，虽然实在乃是三闾大夫的徒孙。”在谈二丑与副净时说：

正如老鼎对台下所说，‘吃了你的酒，出了你的丑’么。在某种意义上说来，促成坏人恶贯满盈早日灭亡，也有好处。副净的价值或者就在这里吧。

对于“四库全书”他表示了相当的不满，借用段玉裁、王荦友的话来揭穿皇帝的不通和乱改古书。和鲁迅的意见是一致的。

在一篇题为《祖国的伟大》的短文里，对当时人民日报开辟的“伟大的祖国”的专栏表示赞美，说“这不但促进读者的爱国思想，更能鼓励人在伟大的祖国面前，不要去干无聊事，显出渺小卑劣来”。轻描淡写地流露了对自己过去的罪恶的忏悔。同时他又反对说任何事物都是“古已有之”，如说什么潜艇即古之螺舟，隋炀帝的龙舟其实即是轮船，只不过少了机械……，

主张“一面改去自卑感，一面也要像追赶敌人似的对新的事理急起直追”。

周作人对旧戏是没有什么好感的，但这时也常常谈到，如谈《钟馗送妹》时就论及了鬼戏与神话剧的问题。他说，

“利用神话来编喜剧，中国人民的智慧是很可佩服的。《闹天宫》之用玉皇大帝、太上老君来陪衬一个毛猴，《天河配》之用西王母来陪衬一对牛女（耕织的男女），都是很大的对比。……中国人是乐天明朗的民族，利用迷信做材料，却转变成很好的戏剧，看过去豁然都忘了，不让它留着，只当做游戏看去……我疑心中国戏上出鬼，多是此意。鬼不显出鬼的可怕，神不见神的可畏，这是中国戏的特点。”

这些意见比起《有鬼无害论》之类的高见来，自然要明净得多，尤可注意的是他对中国民族乐天明朗性格的认识，比起过去的暗黑的宿命论确是有所不同了。我们如果拿他写于1944年的《灯下读书论》来作一比较，就更能看出其间明显的差异。在那篇文章中，周作人说：“盖据我多年杂览的经验，从书里看出来的结论只是这两句话，好意思写在书本上，一点儿都未实现过，坏事情在人间全已做了，书本上记着一小部分。”

周作人称这种史观为“此中实只有暗黑的新宿命观”，这中间哪里还有一丁点儿光与亮，其实正是他最后陷入耻辱深渊的思想基础。接下去他又说：“使人更不能忘记的是国子监生而请明魏忠贤配享孔庙的陆万龄，东林而为阉党，又引清兵入闽的阮大铖，特别是记起咏怀堂诗与百子山樵传奇，更觉得这事的可怕。”这就更使人可惊，以投敌后的周作人而畅论投敌的阮大铖，这如不是极端的无耻也将是无端的梦呓吧。这正好证明当他缩回那坚硬的堡垒中时，就不自觉地与他的“游戏人间”划清了界限，坦然地进行他那忧生念乱的思索去了。这种二重人格的现象是中国知识分子历史性格中的一种致命的痼疾，也不只是像周作人这种附敌的人物为然。鲁迅列举历史上舍生取义的仁人志士赞颂之为中国的脊梁，其实就是旧日所说的“气节”，正是一剂对症的良药。我们今天研究周作人，重印他的著作，不是为了将他从耻辱柱上解放下来，而是为了为新文化新文学史提供充分的研究资料，以便从这个非常复杂的人物身上找出中国知识分子的致命弱点，使后来者不去蹈他的覆辙。自然，重复周作人的历史经历是不可能了，但以另外形态来重复并非完全不可能。这是我们应该警惕的。

故人书简——叶圣陶

华夏出版社最近出版了《叶圣陶遗墨》，收先生手迹极富。我读了最感兴趣的是致俞平伯先生书札若干通，其中有一通是谈到圣老的蜀中书简的，摘引如下：

“平伯兄赐鉴：今日孙媳休假，一早与游天坛公园。回来开桌上之手书，欢悦乃无可言状。计有八页之多，其四页言及弟之蜀中书简，诵之数遍，感极欲涕。因兄之指示与评品，俾弟以今日客观之我重省当时主观之我，一若当时所言所做所想似还可以也者。非由受奖而感，乃缘相知而感。得相知之言，真可袭用‘荣于华袞’之套语而不嫌其泛矣。现在思之，当时信笔而言，有啥说啥，盖以受书者皆极熟极相知之亲友故。……惟于上海诸亲友最为拳拳，故纤屑无不告，忧喜悉俱陈也。……因读兄之四页书，自觉非说几句不可，而说来殊平平，并未抓住所要说者，只得如此已。惟恳览而鉴其意，然后一笑置之耳。”

这是圣老自己对蜀中书简所说的话，虽然俞平老的来书今不可见，也应看作极珍贵的文献了。这一组蜀中通信是1938年所作，曾片段发表在当时上海出版的《文学集林》中。当时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我，读后非常感动，历数十年而不能忘。从这些通信中仿佛真的看到了作者的面影，听到了作者的言笑感喟，可以说这是得能认识圣老这位新文学大前辈的最早的机缘。这一束信终于幸存下来而未遭毁失，后来补足了当时删落的段落而重新发表了。重读一过，四十多年前的旧信仍不失其吸引力，这是什么缘故呢？在散文中间，日记、书信是最能表现作者真实性情面貌的东西，何况这是写给亲近的亲友的书简，其中句句都是真话。自然，真话并不等于真理，但它绝非虚假的大话、套话，读者是喜爱前者而厌弃后者的。也只有反映作者真实内心世界的作品才有长存的价值。使我最初感受圣老和平敦厚的哲人面影的是他在信中发表的对马一浮的观感的两节话。他在1939年4月5日一信中说：

“马一浮先生已来，因昌群之介，到即来看弟，弟与欣安陪同出游数回。其人爽直可亲，言道学而无道学气，风格与一般所谓文人学者不同，至足敬。其复性书院事，想为诸翁所欲闻，兹略述之。先是当局感于新式教育之偏，拟办一书院以济之，论人选，或推马先生。遂以大汽车二乘迎马先生于宜山，意殆如古之所谓‘安车蒲轮’也。（马无眷属，惟有亲戚一家，倚以为生。）接谈之顷，马先生提出先决三条件：一、书院不列入现行教育系统；二、除春秋释奠于先师外，不举行任何仪式；三、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当局居然大量一一赞同，并拨开办费三万金，月给经常费三千金。而马先生犹恐其非诚，不欲遽领，拟将书院作为纯粹社会性的组织，募集基金，以期自给自足，而请当局诸人以私人名义居赞助者之列。今方函札磋商，结果如何尚未可知。院址已看过多处，大约将租乌尤寺，寺中有尔雅台，为犍为舍人注《尔雅》处，名称典雅，马先生深喜之。至其为教，则以六艺。重体验，崇践履，记诵知解虽非不重要，但视为手段而非目的。此义甚是，大家无不赞同。然谓六艺可以统摄一切学术，乃至异域新知与尚未发现之学艺亦可包罗无遗，则殊难令人置信。马先生之言曰：‘我不讲经学，而在于讲明经术’，然则意在养成‘儒家’可知。今日之世是否需要‘儒家’，大是疑问。故弟以为此种书院固不妨设立一所，以备一格，而欲以易天下，恐难成也。且择师择学生两皆非易。国中与马先生同其见解者有几？大纲相近而细节或又有

异，安能共同开此风气？至于学生，读过《五经》者即不易得，又必须抱终其身无所为而为之精神，而今之世固不应无所为而为也。”

记得五十多年前读了这些话以后曾萌生过怎样奇怪的感觉。在抗日战争中居然出现了这样一所书院，不是倒退是什么？可是圣老却以为设立一所也不妨，但也明确指出这实在不是办法。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一位思想宽博而清澈明净的哲人的面影。他佩服马一浮的风格，却怀疑他的主张的实际意义。本来道学就是难懂的东西，何况还想拿来“易天下”，岂非陷于荒谬了么？这就不能不使人联想到近来甚嚣尘上的“新儒家”，也是声称想来拯救已形成的“文化断裂层”的，高深的文化问题且慢谈，叶圣老这些平实因之也就伟大的思想却时时使我想起而不能忘。圣老又在另一信中提起此事：

“丐翁言其六艺之教为礼、乐、射、御、书、数，而其所教非此六艺也，盖诗、书、礼、乐、易、春秋也。最难通者，谓此六艺可以统摄一切学艺，如文学、艺术统摄于诗、乐，自然科学统摄于易，法制、政治统摄于礼。其实此亦自大之病，仍是一切东西皆备于我，我皆早已有之之观念。试问一切学艺被六艺统摄了，于进德修业、利用厚生又何裨益，恐马先生亦无以对也。弟极赞其不偏重知解而特重体验，不偏重谈说而特重践履；然所凭藉之教材为古籍，为心性之玄理，则所体验所践履者，至少有一半不当于今之世矣。好在学生决不会多，有一二十青年趋此一途，未尝不可为一种静修事业，像有些人信佛信耶稣一般，此所以弟前信有‘以备一格未尝不可’之说也。大约理学家讲学，将以马先生为收场角色，此后不会再有矣。”

这就说得更清楚了。在宽阔的胸怀包容之下，作者始终坚持脚踏实地的实事求是精神，此所以经历漫长岁月而颠扑不破也。抗战中《中学生》在内地复刊，作者论办刊宗旨时更有一段沉痛的话：

“今后我们要说真有所见的话，不效一般人搬弄几个名词术语，一切都是从嘴唇边滚下来的。又，我们要特别提倡个人之志概与节操，天下事未可料，今日之读者或者命里注定要当‘遗民’，须有志概与节操，将来乃有生望。此二意皆有感而发，言之有深痛，兄当解之。”

此信在《文学集林》发表时，“遗民”云云一句被删去了，这实在是抗战中后方忧国的知识分子的内心情愫，难得作者直白地说出来，今天读了，依然感到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至于搬弄名词术语，从嘴唇边滚下来的宏文巨制，则是于今为烈，直到今天依旧是一种普遍现象，这是不能不使人感慨系之的。在《叶圣陶散文乙集》里收有1980年写的一篇《提倡平等讨论》，说到：“常常听见有人问，‘上边’吹了些什么风？”为什么在有些人中间，打听风向已经成为习惯？“据说不打听还不行。因为在过去的年代里，许多人积累了这样的经验：‘上边’吹起一阵微风，越往下刮风越大，七八级，十来级，不少人莫名其妙地被卷了进去，挨了整。”“在过去的年代里，对文艺作品的所谓批判，大多是先有了结论然后发动起来的。结论当然来自‘上边’。大家按照既定的结论做文章，捕风捉影引经据典，调子越来越高，声势真够吓人。”

圣老在这里对过去年代里的某些文艺批评作了生动的刻画，言人之不能或不敢言。按照这种方法写出的理论文章，也就很少不是“从嘴唇边滚下来的”。对照蜀中书简的旧话，可见他一直是对此深恶痛绝的。姜桂之性，老而愈辣，不能不使人钦敬。《乙集》里还有一篇《重读鲁迅先生的 作文秘

诀》》，引鲁迅先生的原话说，做古文的“秘诀”之一“是要通篇都有来历，而非古人的成文；也就是通篇是自己做的，而又非自己所做，个人其实并没有说什么。”圣老说，“看了这几句，我不免笑了。鲁迅先生这个话说得确切，我在看书看报看刊物的时候也往往感觉到。笑虽笑，心里可不大舒坦。鲁迅先生说的是古文，指的是从前的弊病。如今是20世纪80年代了，而类似古文的说了等于没有说什么的文章还时常看得到，这怎么得了呢！

这实际上就是指出，古文的流毒已经深深渗透到今天的文字中了。尽管用的是白话，然而精神未变，依旧是老的一套。真是怎么得了！圣老对抗战中大后方的大学教育有过一节极深刻的评论，而更难能的是他的“自剖”。

“大学殆是一骗局，师生互骗，学校与社会互骗。大学之最有意义者二事：一为赡养许多教师；二为发出许多文凭。教师得赡养，可以不饿死；文凭在手，可以填履历，如是而已。弟以作小说人之眼光观种种现状，颇得佳趣。若连续任教师三年，当能作一小说，以大学为对象，令教育专家爽然自失也。即弟自己亦骗局中之一员。弟何所知乎？而人以为有所知，同业与我商谈，学生就我问业。当斯时也，亦复俨然自以为有所知，正颜庄语，‘像煞有介事’。另一个‘我’在旁，不禁窃笑。此等语不便告同业与学生。然于家中诸人则拆穿言之。今书以告公等，以公等如弟之亲弟兄也。”

这一节话读了不禁使人反复感叹。叶老自责如此之严，却并不丝毫脱离了实际。我偶尔也有参加“学术讨论”的机会，和老师宿儒们坐在一起，就常常想起叶老这一番话，“弟何所知乎？而人以为有所知。”只能沉默。但也听见许多不着边际的漂亮话，觉得实在是身在骗局之中了。记得鲁迅先生曾有过一篇杂文，题目就是“大家降一级试试看”，说的差不多也就是同样的意思，目的无非是减少、更好是消灭这种大大小小的骗局而已。蜀中通讯曾提到当时任教育次长的顾一樵，寥寥数语，就活画出官僚的形象来了：

“上星期忽有教次顾君来访，弟不识其名，及见面，方知是顾一樵也。马褂长袍，微有官气。询对于中等教育有无意见，未及弟开口，即兴辞而去，则问亦多事矣。”（第十号信）

就是这位顾一樵，“到处演说，俱传述陈立夫部长那一套，用几个德目调来搭去，说些似真理又似游戏的话。大家说今后教育必须彻底改造，看见了他们，殊觉希望无多也。”（第二十二号信）

叶老和丰子恺是旧友，抗战中同携家去内地，书简中亦常道相思之情，但对他的画风也坦率地表示过一些十分中肯的意见，甚是难得。第十一号信云，“子恺笔下殊闲适，于此似不甚相称，然经过这回播迁，或许风格一变。他近来仍作漫画，弟观之依然有形式与内容不相应之感。”第十二号信又说，“昨曾寄与（子恺）一长信，讨论作新歌曲，并劝其改变漫画之笔调，使形式与内容一致（彼虽画一赳赳武夫，仍令人觉得是山水中人物，此殊非宜也）。”这真是老朋友之间的诚恳劝勉。记得抗战中在重庆看子恺画展，即深有此感。

冰心老人在《心灵深处的叶圣陶老人》一文中有几句话说得极好：“谈起叶老，我觉得与他相对，永远如沐春风！他那谦和慈爱的言谈、态度和容颜，永远悬挂在我的面前。”这几句话真能写出与圣老对坐的人所得的一致印象，即使在我这样晚辈的面前，也依旧保持着一种端凝诚敬的姿态，这是多年来一直保留着的习惯。我在一篇访问记中说明自己的印象时，不由地想起用直有名的唐塑，自己觉得这实在比拟得不差。他晚年听觉不好，离不开

助听器，谈话时就一直在胸前执持着，这就更加深了这样的印象。

老人还有一种难得的习惯。每逢得到赠书时必给作者回信致谢，虽然不过寥寥数语，也写得风趣盎然。手头还保存着他的几封来信，大半是得到赠书后的覆信。1981年12月信上说：

“承赐新印《山川·历史·人物》，今日拜领，感之无极。甚爱读兄书，而目力不争气，未能通读。然刊于《读书》诸篇皆分次勉力徐读，得大欣悦。今于此册，亦当如是，然未知何日得卒業也。”1982年6月信说：

“今日接惠赐《榆下说书》，喜不可支。敬申谢忱。此事由兄说之，可喜一。不切边装订久不遇，徐徐翻之裁之，别有妙趣，可喜二。最重要者兄之笔墨，娓娓谈说，悉具佳致，可喜三。我虽以视力衰退，鲜亲书册，兄此书或将勉力阅览其一部分也。”

1982年11月19日信谈到巴金伤腿及沈从文新著事，说明他对出版事业之关心和对新出好书的渴望，是一封很有意思的信：

“黄裳兄惠鉴：正欲作书，而十五日手示先到，敬诵悉。《淮上行》登出之时必令家中人念与我听之。此法虽颇迟缓，总较对书兴叹为胜。得巴金之女小林来信，云用牵引法治伤腿，可不须动手术，然牵引须历六周，卧床动弹不得，思之亦复可虑。蜀中书信，先友王伯祥先生家保留前期之一部分。今分两次载于《收获》，渝州书载今年之末期，嘉州书载明年之首期，依尊意补入前曾删去者，小引中且叙及尊意也。所云正欲作书，请道其详。闻知从文研究服饰之著作已出版，屡与至善至诚商量，何日往访从文一观之。既而思访晤之顷，听念文稿既不可能，翻看图版亦不能遍看且看清。即令假归，其文亦未能遍听，其图仍未能看清，遂作罢。近接《读书》十月号，知刊载尊作介绍从文此书，亟令至诚诵之，分两次诵毕，我听之大感欣慰。兄之文边叙边评，精当扼要，俾我宛然如读从文之书，洵可感佩。而从文二三十年来潜心著述，言必有据，思无虚鹜，虽其凭藉之贍富，亦由识力之邃密也。此书由何家出版，尚未探悉。闻非国内出。我以为如此著作而不由国内出版社出，实为出版界之羞。不甚识货，印刷技术差，皆堪羞也。我耳目均极差，极感不方便。惟念有涯总跟不上无涯，聊以自宽耳，余俟后叙，敬候撰安。叶圣陶。1982年11月19日上午。”

此信用钢笔写于稿纸上，字迹清晰有力，可见此时老人精力尚未大衰。听见有一本好书，就亟想一看，跃跃欲试之状如见。隔了不到两个月，他又来一信，还是有关沈从文的新书的。

“黄裳兄惠鉴：接到赐寄《金陵五记》，欣感如前度屡蒙赠书时，多谢。即将全册徐徐裁开，此裁书亦为一乐。至于听受，须待有人得闲乃可，已成习惯，不亟亟矣。于《读书》听台从介绍《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之作，兴不可遏，即托范用同志代向香港购之。书去数日而巨册已送来，讶其迅速，听来者说明，乃知系范用同志出版社所藏。云尽可观玩，不急于交还。此本价昂，国内亦将印行云云。范用同志之意深可感。惟观玩此巨册，言之亦复可懂。字体不小，墨色不淡，而我凭二镜亦不能看清。只能看图，图之细微处固莫能辨，其说明亦依稀仿佛，看明白者不逮其半。如许文字不便听人诵读，只得放弃，其怅惘可想矣。近赴医院，请问眼科大夫，可否认真检验，配一副较便于阅览之眼镜。大夫悉心检验，断言配眼镜先须去白内障，而此非小手术，大夫亦不言为我动手术。我则从此断念，不作重配眼镜之想。得便时即令人念诵，不便时即不与文字为缘，只能如是，非安之不可。琐叙

个人事，有读清听，深歉。即请撰安。叶圣陶。1983年1月10日下午。”

关于蜀中书信及报告文学事，又有一长信：

“黄裳兄惠鉴：上月廿九日手书敬诵。前载于文学集林之书信，系徐调孚兄所摘采。当年蜀中寄沪之书极多，汇存于王伯翁处，嗣以孤岛情势紧张，伯翁毁之。伯翁逝世之后，其子湜华发现遗而未毁之一包，截至1939年秋止。今已令志诚钞录。因来示提及，故以奉告。大著《榆下说书》不能自观，日来令孙媳于每夜读四五页，已听得三篇——《杨龙友》、《阿英一封信》、《日记·日记文学·日记侦察学》。《杨龙友》令我长见闻甚多，议论至公平允当，极为心折。听《日记……》之篇，始知日记文学已为通用名称，自愧所见之不广。前些时姜德明同志来信中提及日记文学，我谓日记即称日记可矣，何须加称文学。既有日记文学，殆将有书信文学游记文学等名陆续新生。未免巧立名目，近乎赘矣。诸种文学中又有所谓报告文学者，或称报导文学，其名殊不可解。据云其作法系叙真人真事，而又不必切合其人其事，作者尽可驰骋想象，出以虚构。由此而引起被叙者家属之不满，已颇有所闻。尊见于此如何看法，如有兴不妨提笔论之。尊集中尚有多篇欲一听，惜诵读者暇时不多，未能连日不断为我念若干页耳。执笔闲谈，字不成字，良愧。敬请撰安。叶圣陶（1982年）7月7日下午。”

80年代初，报告文学兴起，一时颇有讨论。其主要弊病，如圣老所说，正在想象与虚构。惭愧得很，我未能执笔参加讨论。其后此道大行，又衍化为纪实文学，作者蜂起，书摊上陈列的大都是这类东西，虚构益多，去事实愈远，读者也以读“×宫+×朝”的态度对之，消闲解闷之余又可窥见某些政坛秘闻，一时畅销，成为一大文化现象。可惜圣老已不及见矣。

叶老自己不藏书，也不讲究版本。抗战中郑西谛在上海发现也是园藏古今杂剧，惊为国宝，电重庆教部拨重金买得。圣老对此是不以为然的。1938年7月2日信中说：

“铎兄代购之元曲，中间有无出色之作？教部居然有此闲钱，亦殊可异。现在只要看到难民之流离颠沛，战地之伤残破坏，则那些古董实在毫无出钱保存之理由，我们即没有一只夏鼎商彝，没有一本宋元精槧，只要大家争气，仍不失为大中华民族也。以教部而为此，亦不知大体之一证矣。”

话虽如此，他也能理解并同情朋友们的搜书，有他为《西谛书话》写的序为证。这也是他胸襟宽阔的一个方面，也决不从钱眼里看问题，以为这只是倒卖钱财的手段。我自己做过一件荒唐事，请俞平伯先生为一本《拙政园诗余》作跋后，又再请叶圣老也写一篇，还寄去了几页备用的旧格子纸，却全然没有想到叶老已不能写小字了。书寄去后不久就得到他的回信：

“黄裳兄惠鉴：大礼接诵。前日平翁来访，携来拙政园诗余及所撰题辞。我亦勉书数语，先以裁贴之一纸写之，模糊歪斜，只得易一纸，写到第七行又写错。附来旧纸只余一张，不敢再写。因钞录拙稿，敢请兄缮录之。平翁题辞附词集中挂号寄上。写错之一纸附此书寄上，藉见我确已不能作小字。匆匆，即请著安。叶圣陶。（1980年）5月3日。”

接此信后真使我有惶悚无地之感，同时更感到老人喁喁的温暖，自己的荒唐举动正如一个顽皮孩子在大人面前撒娇放肆一般。多年来一直在老人的提携护惜之下，当此老人百年冥诞之时，只能缀辑遗文，少抒怀念。殊不能尽其感念之情于万一也。

1994年9月19日

故人书简——沈从文

黄裳兄：拜读介绍拙编“服饰资料”文章，提的弱点极对，杨宪益兄也觉得极好，还拟添些他的意见，将译成英文，在英文版《中国文学》中发表，或已着手，或未着手，因彼工作极忙，原本允将全书先试译唐代部分，若顺手，则进行全译。大致因事忙不易动手，只合作罢。此书只是一个试点性工作，图廉价付印，所以本来有原色图均改成摹抚墨本，时间既短，且来不及仔细校对，多不得原意。出版原定六四年试印，不意“文化革命”一来，忽成为“毒草”，支持此书编印的齐燕铭先生，被绑来历博斗了一整天。我则本为陪斗人物，但心脏病已明确，恐在斗中倒下，所以一会即放至隔室坐听各种丑恶凶狠辱骂，计上下午七小时。事实上却并无甚么人看得懂书中内容。甚至于根本还不曾看过此稿。最有趣是，即好几位首长（包括文化部某某副部长）审看此图稿时，曾在稿上另纸写有赞赏眉批的，到批斗时，亦早已将眉批撤去，免遭连累，真是绝顶聪明。还有一位，后来断定此书无事，搁于其手边，待付印送审时，却忽然发生兴趣，以为将我姓名去掉，用彼姓名。照当时情形甚合理，所谓“首长出思想”，十分重要，以文物和人美均不同意而搁下。到书印出时，却又不高兴，以不曾提及他的“热情支持”一番美意，而大大不快。真十分有趣，不久又有聪明人出主意，以为应将一切文字说明删除，只印图像的，亦未能取得出版方面同意而搁置，一直搁下十七年，才能机会付印。本来因材料过多，先出一小型试点本，等待得到各方面意见后，再改订重印，或采另外一种方式，进行第二、三、四……各册，总计以十册为限。但因“人为大旋风”还不知何时暂告结束，到付印这个试点本时，且担心到重印机会恐不会多，原有材料又多全部散失罄尽，不如将剩在手边资料尽可以附加上去，又得照顾原历博那二百图本来设想，所以随便附加材料，处理编号，都显明多不大接榫处，混乱以至于错误处。不少图安排不大适当，或秩序混乱，或和说明不衔接，都待改正。出版后，院中搞历史的，还认为像一本常识性大型图录，有些参考价值。许多提法虽不尽正确，见解新，还是值得称许。但内中自然不少和传统正宗画学史专家见解（特别是和故宫及东北专家）多抵触处，特别是不易得到正统考古学家认可，则为势所必至，理有固然，难于点头，意中事也。八一年起，即拟重订重印，重换彩色原图一百种，主要材料多在故宫、历博。社会发展，新问题一切是钱后，每图必得卅五十元，实在不大合理，更新麻烦则或出钱三千，说尽好话，亦不卖帐，可以用种种理由推托，均得不到应有方便，有的在另一大单位收藏的图像，本可以借用的，却忽然为另一单位预先借走，致工作迟迟不易交卷。原定今年三月，在国内之重订本可以缩小付印，香港重订本亦可于六月交稿，（且已和美之蓝灯出版社口头说定，将文字说明简化一些，即将在美出版），至今犹有卅多图无法得到应得便利，只好拖延下去，只能说中国“新风尚”，因不少材料，我们还看不到。日本人给了点钱，便占先付印了，真是无可奈何。

另寄北京新印旧作三册，想可收到。内中散文有几篇过去未集印过，写得还有意思。花城所收较匆促，内容亦杂乱。四川五月拟印五册，似较整齐，总之均属过时旧作，绝不抱任何不切现实幻想，至多三年，一切便成陈迹，意中事也。五月已小中风二次。报废将是迟早间事。写成习字一纸，手生笔呆，可见老之已至，只供玩玩而已。弟从文，四月九日（一九八三）。

香港座谈，评的也极中肯，但也有妄义。先说材料丰富，末尾却以为毫无可取之处。却又在另一文中，将新出李寿墓石刻线图盗去，加上一美国藏石刻，误以为即柘枝耳，其实我书中引柘枝舞图及诗，彼均视若无睹，可叹之至（此节写在信笺第一页眉端——黄裳注）。

整理书丛，发现从文先生1983年4月9日旧信一封，系看到我介绍他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文章后所寄。同时寄来的还有一幅字，仍是老习惯，用狭长皮纸，写章草，写的是1971年冬，独住湖北咸宁双溪时所作七十生日诗。卷尾题“近月连续出现小中风二次，书不成字。八三年四月，沈从文时年八十一岁”。

从文先生逝世，迄今已将六年，此信已成历史文物，信中围绕《研究》一书编写出版前后发生的大小事情都有所记述，实在可以看作一篇详实的后记。其意义恐怕也不只此，应当看作一本学术著作问世的苦难的历程。现在事过境迁，一切都成为历史，作者也已长逝，也许已经到了可以发表的时机了。

信中所说虽然是一本学术著作诞生的经过，但在那个特定的时代中，种种世态人情，却表现得淋漓尽致。齐燕铭为此被整日批斗，这是过去人们不知道的。对此书的处理方式，不同人物也提出过不同办法，可以看出种种特异心态。而国家收藏的文物，也因种种人事关系，不能为学人合理使用，更是屡见不鲜的事。一切向钱看，只要肯出一点费用，外国人就能取得国内学人所不能企及的优越地位，更是言之痛心。原书虽然已由香港精印行世，但因种种原因，仍存在不少缺点，作者也都有所说明。书中提出的许多新观点，与国内专家多有不同，作者加以坚持，表现了他的执着，这种独立思考的精神，是尤为可贵的。从信中可以知道，《研究》曾有订正重刊的计划，还有出版英译和普及本的动议，至今未能实现，也许永远不会实现了，实在是可惜的事。

故人书简——钱钟书

一

奉书感愧。佳笺已付内人，命其从容习写，以塞尊意。丈夫肯大踏步走出，妇人女子必千呼万唤始出来，解人如公，当不怪其迟缓也。但身非名器，误玷山公启事，惶愧何极。拙作蒙齿及，感刻、感刻。大名早在再版书赠送之列。聊报《美国兵》佳贶。近作一首，纸尾呈教，不一。即颂黄裳才人吾兄吟吉。弟钱钟书顿首。

秋怀

鸣声渐紧草根虫，时看停云抹暮空。寥落感深秋后叶，高寒坐怯晚来风。身名试与权轻重，文字徒劳较拙工。容易一年真可叹，犹将有限事无穷。（后山语。时方订《谈艺录》付印。）槐聚未是稿。

此信大约写于1948年顷。当时我的《关于美国兵》刚出版，他的《谈艺录》正待付印。我又正收集师友墨迹，给他寄去两张诗笺，不久收到他们写赠两诗，即收入《珠还记幸》中的开手两叶。默存谈笑间咳吐珠玉，即长笺短札亦复风趣可观。他每有著作，我也必向之索赠，这事四十年前即已如此。不料近来的“当代学人”以为怪事，读此信当可知其端末矣。

二

《围城》遵命已致初版一册奉贻，乞饬足来取。先事可托湛贤通一电话也。人事历六，续写小说，迄未着笔，思之怅恨。垂询一节，乃极劣之拉丁，代译如左：

They are not men, they are animals whom we have vivisected.

兄文笔之佳，著译皆然，甚畏佩也。匆复即颂裳兄文祺。弟名正肃。二十日。

此信约写于1948年。《围城》1947年在上海初版，翌年再版，我向他要了一本初版本，当时正着意收集新文学作品的初版本，于此书亦不欲遗珠。湛贤姓王，笔名阿湛，当时在上海出版公司工作。默存常托他转递信件。阿湛曾有短篇集在开明书店出版。解放后在一次运动中被流放，不幸死去。

我当时正在译一本威尔斯的小说《莫洛博士岛》，这书是先师李林先生未完成的遗译，由我为之续完。后收入《译文丛书》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原文中有一句拉丁文，无处请教，想起了他，就麻烦他代译了。

三

黄裳道兄文几：顷奉手帖并惠赐大译，欣感无既。九十五面拉丁文一句，极易译，乃蒙齿及，只益惭耳。《谈艺录》中行文误脱错简处甚多，再版时或可改正。考订旧小说者（甚琐屑，不足道）他年当另成一书耳。弟蓄念又写一长篇小说，经营一年许，人事历六，仅写八百许字，未知何时可卒业也。专此布谢，即颂撰安，弟钱钟书顿首。

这是收到我《莫洛博士岛》赠书后的复信，又提到了那句拉丁文。《谈艺录》在开明书店初版，颇有校误。后再印一次。新版增订则是1984年中华

书局本了。此信说到他又蓄意写另一长篇，构想经营已有一年，但只写成八百字。这就是他在《围城》重印前记中所说的《百合心》，后来写成了两万字左右，手稿于移家北京时遗失了。未再继写，真可惋惜。

四

袁兄文几：复书奉悉。比见人民日报及读书杂志中大作，均隽妙迥异凡响，忆蔬堂李翁晚岁识君，驰书相告，喜心翻倒，老辈爱才，亦佳话也。题目仰观俯拾，在在都是。所谓宇宙之大，蝇虱之微，何至描画及于老夫，君休矣。小集乃《旧文四篇》，上海古籍出版社索去者。

《堂吉诃德》初版校者草率将事，漏百出。季康侯重印校正本出，必奉一部。现手边亦无书。十年前小诗一律，补白呈吟教，即颂著安。

叔子病起寄诗，并招游黄山，和韵奉答。病余意气尚骞腾，想见花间著语能。老手诗中孤竹马，壮心酒后海东鹰。雕疏亲故添情重，落索身名免谤增。欲踏天都酬宿诺，新来筋力亦难胜。弟钱钟书上。十四日。

此信约写于1979年。信中所说蔬堂李翁是李释戡。我于梅浣华座上相识。李翁是诗人，喜观剧。早年曾精刊罗瘿公《鞠部丛读校补》，浣华新剧编制亦多出其手。晚年居沪上，座上多梅门女弟子。观剧之兴甚豪，每撰七绝观剧诗，附以小注。诗筒见投，月必数至。晚岁诗曾油印成《苏堂诗拾》。

默存信中对文字涉及他表示反对。于和叔子诗中“落索身名免谤增”句旁，自画数圈，亦是此意。知其宿志如此，不自今日始也。

五

“袁兄鉴：剪报奉到，谢谢。弟两日前移住于面胡同十五号，三三一室。犯暑历六，殊惫。一切都未就绪，先以奉闻。新寓较旧居舒旷，足慰远系。拙选已增订七八十处，月前交出版社。（请勿告人，以免索者纷纷。）出书后必以一册呈教。即颂撰祺。名正肃，杨绛同叩。”

这是一张名信片。寄于1962年8月。我当时在文汇报编文艺理论版，曾向他约稿，拟了一些题目，可是他都谢绝了。三月八日来信说：

“弟数年来兼一外文职务，未能专以所中研究工作，亦乏暇晷。兄所出考题，无一不好，但举子不能入场，无从缴卷。奈何，奈何。”

正好伍蠡甫教授主编的《外国文论选》中有他的一篇译文，就设法取来发表，写信去征求同意，后得八月四日信说：

“译稿专应伍翁之属而成，限于体例，未能详加诂评考释，单独发表，殊觉不伦。伍翁三日前书来，已专函请其代向贵报谢绝。顷奉手教。乃知生米已下锅煮饭，不便固辞，只好勉强应允，并将误字校定寄还。然牛鼻子脾气，总觉期期不可耳。发表后烦惠一叶。弟六月起又全部外调半年，只偷暇写得论诗画一文，尚有新见。惜未能定稿。将付《文学评论》，出版后请教。”

从这几通信里可以看出他对自己的著译是如何的审慎，对我迹近绑票的约稿，也是大有意见的。名信片中所说订正的选本就是《宋诗选注》。我买得此书初版的精装本后，曾发兴取手边旧刻的宋诗加以校定，发现异文不少，有一些是可以订正《选注》的，就写了一纸校记寄去，随后就接到六二年十月一日的来信。

六

“裳兄文几：得书一月来公私蝟集，遂稽作报，歉仄之至。承校勘异文，如获珠船。恨早付削瓦，弟又为外务所牵，喧宾夺主，无暇旁及。只能待三版耳。先此谢谢。内人开刀经过好，已出医院，知注并闻。匆布即颂秋安。弟钱钟书再叩，国庆日晨。”

七

“裳兄文几：音问久疏，忽奉惠颁尊集新选，展卷则既有新相知之乐，复有重遇故人之喜。深得苦茶庵法脉，而无其骨董葛藤酸馅诸病，可谓智过其师矣。贱名与唐尧裔孙同挂选中。虽一荣於华袞，而一严如斧钺，要均得藉以并传，作庄生齐物观也可。弟前年大病以来，衰形俱备，心力销亡，畏笔墨如寇仇。容老夫袖手偷闲，婆娑风月，祝诸子挥毫兢爽，弹压江山，如是我云。草此复谢，即颂春禧。弟钱钟书上。十二日，杨绛同候。”

这大约是收到《榆下说书》以后的复信，这书中有两篇写到他的文字，紧接就是一篇谈周延儒的杂文，所以才有那一节对比的话。他指出我受了周作人散文的影响，也自是一种看法。知堂的文字我是爱读的，但不一定亦步亦趋。他所指出的那些缺点，也正说中了周作人文章的缺失。相比之下，鲁迅晚年杂文中如《病后杂谈》、《题未定草》却正是我衷心向往而无从追蹑的典范。他的另一封1981年3月来信中，又对我的杂文作了过情的鼓励。

八

“裳兄文几：报刊上每读高文，隽永如谏果苦茗，而穿穴载籍，俯拾即是，着手成春。东坡称退之所谓云锦裳也，黄裳云乎哉。南北不相识少年，函索拙著者络绎，并附钞票，弟无以应求，徒增退款麻烦。十日前人民文学出版社通知，初印售罄，已决增印二十万册，流毒愈广，钳我市朝之期不远矣。承命如奉军令，即将自存一册挂号寄上，亦征兄之声威遥被，持黄钺垂衣裳而治天下，一笑。即颂近安。弟钱钟书上，杨绛同候。十四日。”

此信寄于1981年3月15日。《围城》新版于1980年11月印行，印数十三万册，不及半年即售罄。我得讯晚，市上已无存书，只得求救于作者。承以自存本一册见惠。扉叶有墨笔“槐聚自存本”五字，又题记六行云：

“裳兄函索此书，手边只存是本。不敢自秘，倾筐上贡。感惠酬知耶？畏威乞怜耶？姑学太白之笑而不答，留供后世学人聚讼题目。一笑。”

下钤“中书君”印。

默存先生的长笺短札，正像他平时谈话一样，是庄谐杂出，极得手挥目送之致的。这写在书前的小跋更是一个特例。不料不等“后世学人”的聚讼，早已得到“当代学人”的讥评，现在就将附此书同寄的原信发表出来，有兴趣的“学人”不妨作进一步的研讨。新文学书的版本研究是一门新兴的学问，成绩不小，收获甚多，但也应防止陷入琐屑沦于恶趣。像这样一本小书的投赠，是不值得聚而讼之的。默存先生流露出来的微意，大抵就是如此。友朋戏谑之言，也当不得真，下面是1984年11月一信，是收到《过去的足迹》、《晚春的行旅》等两书的复信。

九

“裳兄文几：两周中叠奉惠赐大集二种，足迹长留，晚春常在，西子灵岩之印，庄生灵椿之寿，差堪喻其必传也。贱冗稽复为罪。散文之风，比来弥盛。学会书刊，各标帜招。众星拱北，百川归海，皆推贤者为教主矣。匆此布谢，即颂近祉。（黄裳将易服为红衣乎，一笑。）弟钱钟书上，二十二日。”

十

“裳兄文几：前奉致内子书，甚感垂注。第十月下旬中寒，牵动宿疾，哮喘复发。打针服药，未为大患，而转成咳嗽，终日如《西青散记》中腐儒鬼咯咯先生，病魔多情变幻，缠贱躯作祟，前后约四十日，幸暂舍而之他矣。顷奉《山川·人物·历史》，昔之仅窥豹斑龙爪者，今乃获睹全身，情挟骚心，笔开生面，解颐娱目，荡气回肠，兼而有之。愚夫妇得挂姓名，如登金榜，不胜愧谢。惟弟发已半灰，山妇发未全白；弟面色黄而兄目为紫棠，是变水浒中之病关索为金瓶梅之王六儿矣。大著必传世，误尽千秋考据家，奈何奈何，呵呵。专此布谢，即叩冬祺。弟钱钟书敬上，杨绛同候。十二月五日。”

此信写于1981年2月，是收到我的《山川·历史·人物》后的复书。照例说了些过情的话。信的后半，对原书所记作了更正，晤面之时，我确为他的健康和善谈高兴，印象深刻，就这样写了。他又提到“考据家”，可见对之是一直怀有敬畏之情也。

十一

裳兄文几：奉书失喜。年光逝水，世故惊涛。海上故人，零落可屈指。而酌古斟今，雅人深致，首数贤者与陈君西禾。契阔参商，如之何勿思也。弟无学可讲，可讲非学。访美时绝未登坛说法，彼邦上庠坚邀，亦皆婉谢。报章煊染，当以疑古之道疑今。兄旧是个中人，美言不信，必不受眼谩耳。明年或尚须远役，自知不舞之鹤，难为伏枥之骥，贻讥腾谤，且食蛤蜊。拙选初非惬意，本勿欲灾祸梨枣，而出版社强聒不舍，以台港盗印为口实，烈女怕缠夫，遂增订数注与之，未及细校，讹错殊多。重劳齿及，徒增颜汗。有小集一种，月内问世。差如韩陵片石，君堪共语也。马君美才，通函以少作相询。弟老而无成，壮已多悔，於贾宝玉所谓小时候的营生，讳莫如深。兄不为锦被之遮，而偏效罗帏之启，薄情忍心，窃有怨焉。弟此番在美，睹博士论文及拙作译本小传，语多不经。一作者自加拿大来见，问之则云，曾至港台，遍访弟师友，采摭轶闻，弟乃知自传不可信，相识回忆亦不可信。古来正史野史，均作如是观。VOLTAIRE所以言PYRRHOUSMEDEL'HISTOIRE，身外是非谁营得，隔洋听唱×××可矣。佳“牋玷污，愧甚。即颁近祉。弟钱钟书上，四日，杨绛同候。”

此信写于1979年9月，是睽隔了三十年后收到他的第一通来信。我曾在《榆下说书》的一篇文章中引用过一次，但不是全文。他在信中提到的陈西禾是一位使人不易忘记的朋友。学养俱美，议论风发，是聚谈极好的伙伴，难怪默存忘不了他。惜因久病长逝，身后寂寞，几乎已被遗忘。解放前他和巴金同住霞飞坊（今淮海坊），常常夜里来巴金处谈天，因而相熟。他在一家银行里工作，精通法文，专研戏剧，后来就下海当了导演，曾导过《姊妹妹妹站起来》，是写妓女解放的故事的。根据巴金原著改编的电影《家》也是他导演的。他为人拘谨，考虑甚多。译作矜慎，好像只印过一本戏剧《沉渊》，一本译剧《玛婷》，都是文化生活出版社印的。此外还发表过几篇讨论电影艺术的论文，都是著力之作，终于未能成书。他对川剧有特别的爱好，每逢川剧来沪演出，座中总少不了他。他特别欣赏一出《帝王珠》，在座谈会上大加称赏。有一次到他家里访问，他取出一本齐白石的册页《借山图》给我看，这是我所见过的白石老人最精的画卷，可见他对美术的真知笃好。一次我到国泰电影院去看电影，看到他站在戏院门口自言自语地说，“到底是看还是不看呢”，不禁失笑，可见他对无论什么事都是要再三斟酌考虑的。

默存信中提到的马君是香港中文大学的马力，曾经帮助他校订过《谈艺

录》的，也是最早研究钱学的人，曾向我打听默存散见报刊未经收集的诗文。默存对少作是不愿人搜集的，曾戏称之为“摸金校尉”，而下面的一通信中，又有强烈的表示。

十二

袁兄文几：得书惊诧。弟初不忆曾与范用同志出言編集事。得无曲解鄙意耶。上月马力兄来，云晤范，范嘱其征弟同意，搜集拙作，弟坚拒不许。盖并世诸公，自识之无时，即已吐言为珠玑，掷地比金石，故数十年来片纸只字皆珍惜如头目，而自信可以寿世。弟于旧作，自观犹厌，敝履视之。而国内外不乏无聊好事或啖名牟利之辈，欲借弟为敲门之砖，易米之帖。港商越在化外，非王法所及，只得听之；他年弟身后有为此者，弟不能如郑板桥之化厉鬼以击其脑，亦唯啣恨泉下。一息尚存，则掩耳摇手而已。去冬人民文学出版社请出选集，最近上海古籍出版社第三次请重印谈艺录，均不敢闻命。两年来高等院校以围城为论文题者约三十余人，皆来函请提供著作及传记资料，弟胥答以林之洋所谓一概勿得知，外交词令所谓无可奉告。前日贵报徐君开垒惠过，欲作采访，弟亦婉却。此物此志也。盛意心识而已。即颂近安。二月四日夜。

此信写于1982年3月。是义正词严的一纸告白，自然使动员他重印旧作的野心变得烟消火灭了。平心而论，搜集佚文，编成全集的事，是古已有之的。从或一角度看，也是研究的基础工作。近来人们推而广之，新文学的辑逸工作也已成一种显学，成绩不小。但在作者看来，就未必值得赞赏。爱惜羽毛，务求精粹，这是人之常情。在这里也只有尊重作者的意愿，不强人所难为是。

十三

袁兄文几：读今日人民日报中大作“衙内”一篇，正击节称妙，忽得尊书，大有“偶思小饮报花开”之致。山妇拙著将由读书编辑部单行，剪示之文，已承广角镜社复制寄来。潘君忆未见过，闻名则久矣。王湘绮自言有帝皇思想，故其日记中叙家常琐事皆用朝廷堂皇之词，戏以此博兄一笑耳。拙诗补白，乞吟教。即颂近祉。弟钱钟书上，二十七日。

马先之属题诗集

先公宿许老门生，行谊文章异俗情。旷世心期推栗里（君题陶集云千载邈无伦。），胜朝宗派守桐城。（君亦出其乡姚仲实先生之门，撰姚年谱。）风恬春雨知时霁，潦尽秋潭澈底清。把玩新编忽惆怅，卅年梦影溯诗盟。（山中诗社同人，君其一也。）

此信作于1981年5月

十四

袁兄如握：音问久疏，每于刊物中睹大作，病眼为明。有一篇跳出之感。兄虽考订之文，亦化堆垛为烟云。时贤小品，抒情写景，终作握拳透爪，戴石臼跳舞之态。瓠北诗云，此事原知非力取，三分人事七分天，信然。承惠重印本记游旧集，谢谢。改正处尤感虚怀，信史美具难并，然后世学人失去考据题目，只能作校讎功夫，不免扫兴矣。弟七月起忽蒙命承乏敝院副院长，尸位挂名，捉将官里去，不待人笑，弟复自笑。幸邀曲体其衰朽龙钟，不以公事相奸，

而俗务未堪全谢，逋客因以剧增。故每周辄避地数日，重订谈艺录，应中华之请也。作辍不恒，未识明春能交卷不？今日适返舍，即获尊刻，岂心有灵犀耶。专布，敬叩近绥。弟钱钟书上，杨绛同候。十八日午。

此信写于 1982 年 10 月。在这封信里，又顺便对“后世学人”捎带了一笔，可见他的痛心疾首。他却未料到，不及等“后世”，“当代学人”就对《围城》下了手，所作的也正是“校雠功夫”，不由分说，连原作也一鼓脑儿绑了去了。

1994 年 3 月 14 日

跋祁承 《两浙古今著作考》稿本

此山阴祁氏澹生堂抄本《两浙古今著作考》十五册，祁承 著。未刊稿本也。《千顷堂书目》卷十有祁承 《诸史艺文钞》三十卷，又《两浙著作考》四十六卷一条，诸家著录，仅见有此。《澹生堂全集》，崇祯刊二十一卷本，自涉园陶氏流出，后归北平图书馆。藏园传增湘曾记其卷十二“戊午历”中有辑《两浙著作考》，半载而成之语，是此书辑于万历四十六年也。其书湮沉三百余年，世无知者，而今一旦更出，岂非快事。余初闻石麒见告，有澹生堂抄本一部出于杭市，书为残帙，而索直奇昂，即嘱其索寄一观。后果以此书头尾二册及远山堂抄本《里居越言》见寄，索重直，还价不允，遂寄还之。然其书往来胸中，实未尝一日忘也。后二月，石麒又告有澹生堂遗书若干册出绍兴，中有承 、彪佳手稿，半为残帙，而价亦不廉，余意复动，念此当为一家眷属而析居异地者，遂告以必欲收之，先后得夷度手稿《老子全抄》、《易测》二种，皆有长子骏佳手跋，云是“府君为诸生时手辑手评之本，先人手泽，子孙当世珍焉。”其书蓝格竹纸，版心有“聊尔编”三字，楷法精整，朱墨杂下，犹是毛订。又《澹生堂诗文钞》八卷，为待刻稿本，前有骏佳跋，谓“先君文集，原编二十八卷、十六本，流通颇难，诵读不易，受请海内名公，拣择精华，合而钞之，正得八卷，以付剞劂”云云，卷中校定之处不少，多出诸子之手，后祁氏遭难破家，遂未刻也。又《守城全书》十八卷，彪佳手稿本，毛订原装八巨册，忠敏手迹，此为钜观。此书辑于崇祯戊寅甲申之际，南北舟车，不废丹铅，积数年之精力，方欲有所用之，而北都国变，宏光拥立，迨忠敏自金陵归里，犹数数以剞劂为念，于远山堂抄本《里居越言》致友人函札中，屡屡见之。至乙酉闰六月初六日。遂自沉殉国矣。遗稿不能刻亦不敢刻，深藏密锁，三百年后，一旦复出，真异书也。此外，骏佳手稿《禅悦内外合集》十卷，仅存卷一之二；远山堂抄本《里居越言》，存癸未甲申御寇一卷；《崇祯戊辰浙江恩科选贡齿录》一册，为骏佳登第同年录；刘宗周稿本《古学经》八卷，残存卷一至五；《孔子家语考次》四卷；天启刊顾若昔《桃花里集》四卷。是皆梅里祁氏遗书也。困于资力，未能全得。曾余北行，留京师月余，南旋之日，即访石麒于其家，遂又得此本以归，价只少减，余亦不更计直，竟辇之归矣。此书外尚有藏书楼黑格抄本《诗经》二册，亦祁氏旷园写本；《礼记集说》十卷，闵刻本，祁奕庆寓山藏书，原装未损，旧写书根尚存，亦并收之。至彪佳奏疏《宜焚全稿》十八卷、《阳谏牒》十三册、远山堂抄本《里居越言》八册，皆当日原钞底册，却无力更收之矣。承 此书所录两浙著述至富，而尤详于绍兴一府，体例至严，大抵明以前人著述略备，而尤加意于朱明一朝人物撰述，中多秘册，有未见于诸家簿录者，往往存其原序，天壤遗书，借此聊存梗概，俾不湮沉，其为功艺苑，岂浅鲜哉。夷度匪独富收藏，且能读书，更能深识书中趣味，非古董家数比。澹生堂藏书与四明范氏天一阁、会稽钮氏世学楼同为浙江著名藏书旧家，遗籍散亡最早，流转绝稀，得其一鳞片爪，往往球壁视之，况此为主人手订之书，煌煌十数巨册，自当珍护，苟有机缘，得流通之，亦书林一快也。

壬辰白露后二日记。

案：《两浙古今著作考》，祁承 稿本。竹纸蓝格，白口，单阑，十行，二十字。板心下有“澹生堂抄本”五字。前有万历戊午祁承 “敬询两浙名贤著作檄”，“辑浙中著作考察”。凡杭州府著作考五卷；嘉兴府（以下“著作考”略）三卷；湖州府三卷，附诸志考；绍兴府四卷，附诸志考；宁波府未分卷；金华府不分卷，今存六朝至元，国朝以下佚；衢州府五卷；严州府一卷；温州府不分卷附诸志考；台州府不分卷；处州府不分卷；以下佚去二册；道家二卷；浙中名医不分卷，总计全书一千二百十二番。

《辑浙中著作考》：

古今之称不朽有三，著作之为立言则一。故言以人重者，亟收之。即人以言重者，亦收之。大校以前哲遗编之名目，便后人按籍之寻求。至于德业闻望，蔚然一时，而生平论著，无专帙，则别有吾浙文献之辑，在此不参入。

文章经世大业。不朽盛事。然往往品定于后人，而价增于易世。故一时之评品，终不敌千古之升沈。惟听宇宙为销磨，任岁月之淘汰。则百年之后，其存于世亦寡矣。况著作之事，日新富有，盖棺而止。故是编之辑，即在国朝者，亦止采列于身后，而不及于生前。正以生前之著作，固未可量也。

男儿堕地，能与造物争盛衰之运，与天子较荣辱之权者，惟著作作为然。故上之足以翼经，下之足以佐史。精而抉性命之微，大而廓经济之用，卓乎尚已。其他咏物抒情，琐谈丛语，或倡一人之独见，或述前古之遗言，或以钜帙鸿裁，或以短篇小牍，虽为品自殊，而其称于著述则均也。凡有名目可稽，一随时代编入。

尚友原在于论世，而诵书贵写其神情，是以博采史传，旁及群书，略叙生平之大端，庶征一时之品概。至于履历之或详或略，事实之或寡或多。随所见闻，更无优劣。若其次序列名，一以朝代为凭。即一朝之中，不无前后之参差，然总为一代之人物，总为一代之著作无疑也。若夫祖孙父子，世握如椽，昆从叔侄，代擅不朽，或总列以见一门之盛，或分纪以表世业之传。或父从子见，或兄以弟称，则各因其时云。

七略起于更生，七志定于王俭。嗣是而隋唐以后，惟四部之例，相沿不移。篇目之不可溷也，审矣。但是编之辑，既以书从其人，又以人从其世。倘一人而兼四部之作，则将以四部分一人之身。绪目多端，不便检阅。今不论经史子集，凡其出一人之手者，总列于一人之前。惟统一省之书，再依四部之例，另为总目，列于卷首，则不特展卷了然，而吾乡立言之富，亦庶免寂寥之叹矣。

著作之以浙名，记浙也。而浙以外则不及。有及之者，如六朝之华亭，原为长水，则六朝以前应入也。如王谢之居会稽，始于永嘉，则永嘉以后应入也。有历世尚称其故乡，而生长久居于此土者，如东莱吕成公之类是也。有先人之丘垄在此，而后人之发迹或彼者，如陈宗鲁、倪文僖之类是也。诸如此类，各有考据，例不漫然。其他以流寓称者，凡为浙土，即入于原贯世次之中。如系外邦，始列于各郡寓贤之内。若夫展采错事，敷政一方，此之谓宦迹，不在流寓之列。

域中有三教，而释道居其二。微言渺论，了性明心，何可废弗录也。若其惠泽及人，医之所垂，为利更薄，是书正编之外，名僧之著作有考，道家之著作有考，名医之著作有考，各为一帙，以便稽览。但释道之栖止无常，而应缘之踪迹难定，彼所托居，即同土著。故二氏者流，生于斯隐于斯，薙染结茅于斯，皆仿寓贤之例，概为编入。（案，原书缺第十六、十七两册，据此知为名僧著述考也。祁氏诸子佞佛，骏佳尤耽溺，此两册或为抽取以致残缺不完。）

载籍难穷，搜罗苦隘。是编所据者，先征以史传，次及于郡志，再次及于邑志，又次及于家乘。然后遍搜四部之藏，博稽百家之说，凡有可征，固无微不录矣。然不佞生长东海之滨，未窥天府之秘，见闻有限，挂漏无穷。况世有慧业文人，而姓名不垂于记传；共称当代作者，

而简集不落于人间。则与其强为入也，无宁姑为存也。补其阙略而润色之，则以俟君子。

《澹生堂全集》卷十七、十八两卷为尺牘，中有卷札言此书辑撰始末，兹录有关段落于下：

浙中辑著作考，虽古人之遗书，十不存其一二。而使后人尚识其著作之名目，犹有存羊之意也。合十一郡中大约有八十余卷。此书于世道无所关系，而于吾乡亦有小生色。书成，当求兄为第一序之（与黄寓庸书，卷十八）。

越郡自汉晋以来，颇多作者。东晋六朝之后，尤甲宇内。然某客岁家居，偶辑两浙著作考，而前辈所著，百无一存。无论其书，即其书之名目有不能举者矣。

而志之外有文献一书，则所以表章前哲，而收罗弘文者也。今天下之名郡，如新安，如莆阳，如淮安，如清源，皆有文献志，而敝郡缺焉至今者，岂时之有待于祖台乎？倘蒙燕间之余，稍赐留神，檄下八邑，令凡有前人之遗集者，或经或史，或小记或琐谈之类，皆令其抱而献之学宫博士，类而上之明台，间取其特佳者时梓一二，以示风励，其余以俟哀选。更檄八邑，各举茂才异等之士、学识淹博者，以资编辑，而一应去取，皆取裁于祖台。此亦敝郡不朽一盛事也，某窃有望焉（与张泰符，卷十八）。

弟今老矣。功名固不敢望人，利欲向非所溺，惟好裒辑古人之遗书，表章前哲之遗范，而追悔六十年之间，何曾有经年历岁专功于此之日。故如《绍兴文献志》、《两浙先辈盛德录》、《越中隐佚考》之类，皆有志而未能此也。如《世苑》，如《友鉴》，如《前贤大事案》之类，皆已辑而未就者也。惟自通籍二十余年来，回环郡邑之间，曾辑有古今守令之事，足为后人取法，名曰《牧津》五十卷，分为三十类。于弥变安民化导肃法之事，颇为详尽。此书或于世有小补乎。至于两浙著作之考，为卷亦六十有四，于吾乡前辈之著述，无不备载其名目，第尚恐有遗于耳目闻见之外，此二书者，虽已成卷，然更当请裁于兄者也。（与陶公望，卷十八）

凡此皆可征夷度著述之大凡，规划用力之勤，及已成及未就之书，湮沉而无闻者，都可于此数札中得知梗概。《两浙古今著述考》始辑于万历四十六年戊午，《澹生堂全集》卷十三“戊午历”中记之颇详，今亦为排比如次：

正月，二日，是日辑两浙著作始，首辑杭州府。二十五日，杭州府著作考完。二十六日，是日辑绍兴著作考起。

二月，十二日，辑绍兴著作考完。十五日，是日辑严州著作起。

三月，朔日，辑严州著作考完。十五日，辑宁波府著作考起。

四月，初八日，辑宁波府著作考完。十八日，辑金华著作考起。

闰四月十一日，辑金华府著作考完。十六日，辑湖州府著作考起。

五月，朔日，辑湖州著作考完。初八日，辑嘉兴府著作起。初九日，再检阅绍兴著作考。初十日，再检阅宁波著作考。十六日，辑嘉兴府著作考完。十七日，辑台州府著作考起。

六月，初六日，辑台州府著作考完。初八日，辑温州府著作考起。十一日，再检所辑绍兴诸府著作考，为补十七条。此书已尽半年之力，而尚有遗漏如此。乃知著述一事，慎不可草草。十六日，辑温州府著作考完。二十日，再检杭州府著作考，为补九条，得新城与钱唐二志检入也。二十一日，辑处州府著作考起。二十三日，再检金华府著作考，补十一条。盖最后始得义乌新志采入者也。

七月，初十日，辑处州府著作考完。处州于近来作者颇寥，而南宋以来，名臣宿儒，多出其地。盛衰循环，岂气运所使耶？十一日，辑衢州府著作考起。二十日，再检嘉兴府著作考，因为补六条。二十一日，辑衢州著作考完。衢志修于嘉靖初年，文献不备，检阅无资，深以为歉。二十三日，辑两浙道家著作考起。二十六日，再检宁波府著作考，有姓氏未确者六人，为之改正。三十日，辑两浙道家著作考完。

八月，初二日，辑两浙名僧著作考起。初四日，作“敬询两浙名贤著作檄”，传之同志。

十三日，辑两浙名僧著作考完。

综上所述，此书始辑于戊午新春，断手于八月半。此本尚有名医著作考，或后来所辑。所失十六、十七两册，则是名僧著作考也。

《澹生堂全集》后亦流出寓山，为祁氏世守之书，卷中奴虏字俱用浓墨涂去，当是清初文字厉禁时事。因得遍读，得有关此书撰作故事，附识于此。原书后遭劫掠，洎还来已残零不完，赖旧跋未失，尚留鳞爪，亦不幸中之大幸已。

1992年6月30日

“葫”中日月长

王世襄先生以《说葫芦》一册见赠，希望我写些读后感。这是个不易完成的任务。对葫芦器一无所知的我，怎能对这样一部精美的学术著作说三道四呢？说是学术著作，也许有人觉得有点夸大，但我觉得与他的另一部名作《明式家具珍赏》一样，同不愧为民俗文化研究的开山之作。大册精印，多附彩图，虽然研究的对象有巨细的不同，但其研究方法却并无分别。正是以狮子搏兔之力积数十年的钻研、探索才能完成的著作，在在显示出作者对民间器物笃好、追求的执著情愫。中国自古以来对草木虫鱼、百工器物就少有人注意记录，说起文化研究来除去得到庙堂承认的数种项目以外，对民间爱好趣味所寄的种种都一概不置一顾，这样，写起文化史来就总是缺胳膊少腿的没有坚实的基础。《说葫芦》的出现正是一个绝好的消息，不只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对民俗研究也提供了出色的范本，教给我们怎样进行这种艰巨而急迫的工作。它不只是“开风气”而且也是“师”。

《说葫芦》分上下两卷。上卷分述天然、勒扎、范制、火画、押花、针划、刀刻等葫芦体式，下卷则分述鸣虫种类及捕捉、蓄养之道。说来惭愧，小时候也曾玩过秋虫，但对不同的种类则从未留心过。蚰蚰是唯一蓄养对象，对油壶鲁则绝不重视，视之为“三尾”，弃而不取。读了《说葫芦》后才知道它的身价之高。作者指出，电视剧《末代皇帝》有溥仪小时候玩蚰蚰的场景，误以油壶鲁葫芦作为蚰蚰葫芦。又指出海外博物馆刊物将各种葫芦一律称之为 Cricket Cage. 都因未经调查研究而妄下论断，仿佛也是对我年幼时的浅尝无知的呵斥。鸣虫共六类，从彩色精印的插图中我是第一次才获得清晰完整的认识。它们是蚰蚰、扎嘴、油壶鲁、蚰蚰、梆儿头、金钟。作者各附以详细的说明，多引刘侗的《帝京景物略》和富察敦崇的《燕京岁时记》，这是两种关于北京的地方志类名著，是仅有的旷世难逢的好书，以作者搜集资料之勤，作为典据的也只此二三种，可见此类著作之寂寞了。

可以和作者另一名作、附于《蟋蟀谱集成》后的“秋虫八忆”媲美的是“秋山捉蚰蚰”一章，记自己亲身经历，是很美的散文，作者说，“捉蚰蚰之劳累不亚于‘拉练’急行军。”他在这里用了一个不见于词书的词，“拉练”，是“文化大革命”中盛行的一种惩罚性的劳动项目。查看后面所附的英译，也只能译为“军事训练中的强迫行军”，实在不免失去了神味。作者说，“惜西山近处，由于污染，蚰蚰已稀少，且无佳者，不得不远往安子沟或牛蹄岭。当时每月领生活费廿五元，实无余资乘长途汽车，只有骑车跋涉。半夜起程，抵沟咀或山麓，日初升，待入沟或越岭，已上三竿，而蚰蚰方振翅。午后三时即返回，入城已昏黑多时。骑车往返百数十里，入沟登山，往往手足并用，亦不下二三十里，迨至家门，臀腿早已麻木，几不知如何下车。巷口与邻翁相值，见我衣衫零落，狼狈不堪，笑谓：“你真跟打败了的兵一样”，此语诚对我绝好之写照。私念得入山林，可暂不与面目狰狞、心术险恶之辈相见，岂不大佳，夜蜷铺板（床已被抄走），虽力尽精疲，亦未尝不默感上苍，于我独厚，使又得一日之清净也。”

这真是文情俱至的文字。谈葫芦而连及文革佚事，这使我想起陈寅恪撰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中的话：“谁实为之，孰令致之。岂非宗教与政治虽不同物，而终不能无所关涉之一例证欤！”不禁感慨系之。

作者在所附器物图版中，都撰有说明。于谱录款识之余，也记些轶闻故

事，阅之忘倦。于“红雁倒栽蝓蝓葫芦”一品后记。

此乃麻花胡同纪家旧藏之“红雁”，清末民初与“紫雁”为京师最驰名之蝓蝓葫芦。红、紫言其色，雁言其形，谓修长如雁脖也。

1934年秋，行经东四万聚兴古玩店，名葫芦贩孙猴（姓孙，因精明过人而得此绰号，是时年已七旬）先我而在，手持红雁与店东葛大议价。轻予年幼，未必识货，予价不谐，予欲去。正待出门，予已如数付值。渠急转身，已不可及，大为懊丧，不禁失色。是时余虽知葫芦绝佳，但对其来历，茫然不晓。后承讷诏先（名净）先生见告，乃知即赫赫有名之红雁。倒栽底部不镶牙托而以同色之葫芦填补乃红雁特征之一。据讷老称，紫雁视此色泽浓艳而身矮，停匀秀丽则远逊。

此节写得器过程，极为生动。盖不只买葫芦为然，所谓可遇而不可求之境，在收藏家必深有体会。此书的另一特色，是对制作家、藏家、贩家都有所记，琐琐可观。余叔岩曾爱好葫芦器，有著名的藏品，可见当时艺人的业余好尚。如油壶鲁葫芦就有乐咏西之棠梨肚，余叔岩之大白皮，王星杰之沙酒壶，都是名彻九城的精品，时世承平（虽然只是短暂的），人们乃能倾心于此种玩器，而文化生活乃赖以发展得丰富而多彩。谈北京的文化生活，离开了这些简直就无所附丽。陈寅恪诗“依稀廿载忆光宣，犹是开元全盛年”，烘染的主要也就是这样一种文化空气，而并非指朝政党争而言。

民间艺人在旧社会不只生活在社会底层，无人齿及，连笔记小说也极少顾视，这是极不公平的。作者在书中却时时有所纪录，值得感谢。鲁迅在编定《北平笺谱》时给郑振铎的信中曾慨叹于木版刻工的不为人知，他说，“板儿杨，张老西之名，似可记入《访笺杂记》内……中国竟可糊涂到不知其真姓名（况且还有绰号）……”（1933年11月11日信）真是慨乎言之。记下这些难道真的是为将来重修工艺史准备资料么，这未必然。但不可不有此心志，于此更可见作者的襟怀为不可及矣。

1994年3月24日

关于《饯梅兰芳》

1947年初，我在文汇报的副刊“浮世绘”上发表了一篇《饯梅兰芳》。这是我自己喜欢的一篇文章，曾先后收入《旧戏新谈》、《黄裳论剧杂文》和《过去的足迹》。文章发表以后，开明书店叶圣陶先生等主编的《国文月刊》曾选入当代文选。我自己喜欢它因为写的时候带着浓挚的感情，虽然不免有些感伤的情调，但确是由衷之言。目的是想劝他摆脱南京方面的纠缠，洁身事外。这只要是不带偏见的读者，都能一望而知的。原文中有几句是，

“我又想起沦陷八年，梅在上海留须隐居的故事。这正可以媲美南唐的乐官，‘一曲伊州泪万行’，有多少说不出的辛酸。时至今日，梅恐怕又将有留须的必要了，为了那些外来的‘殷勤’。”

这是皮里阳秋么，是一个谜么？都不是的。这是一个深爱艺术家的年青观众的拳拳之心。在那种时势，话说到这个份上，也已经达到最大的限度了。

想不到四十七年以后，对这一篇小文章竟有了崭新的评价。柯灵先生在《想起梅兰芳》一文（《读书》1994年第6期）中指出，这是一篇充满恶意的“请梅下台”的文章。真的是看不懂我那简单的白话文么？也未必然。就在柯文的结末，增写了两节“附记”，它不但没有能证明我“事后补述的写作动机并不合乎事实”，恰恰点出了我写此文的作意，正在于此。只是我当时不愿直白说出的话，在四十七年以后竟再度公之于世了。这倒是不能不使人感慨系之的。“附记”的第一节说，

“本文曾请一位熟悉情况的同志过目，承来信提示，1946年5月，傅作义军队攻占解放区政治军事中心张家口的下午，蒋介石即宣布召开‘国民大会’，并安排了一场京剧晚会以示庆祝。我记得参加演出的名伶有梅兰芳、程砚秋、谭富英、叶盛兰、林树森……，梅演大轴《御碑亭》。散戏后，我和浦熙修跑到后台看梅先生卸装。”

这就是我所说使人难忘的“外来的殷勤”，而且更将是促不及料随时可来的“殷勤”。那是什么时候，内战如火如荼，国共谈判破裂，“国民大会”召开，全国人民和进步知识界的心情是可以想象的。是否参加“国大”，就成为进步和反动政党分明的分界线，在这当口，参加国民党政府的内战“祝捷”演出，是怎样的一种政治姿态，是明若观火的。京剧艺术家不必卷入“政党斗争”，但政治却不肯轻轻放过艺术家。这是历史，不是谁要“强使”的问题。梅也用不着把“带有严重政治性质的思想活动”透露给像我这样“素无交往的人”，这原是大吹大擂见之于报章的。要加以抨击，在《旧戏新谈》的专栏里原是大有文章可做的，然而没有，我只是写了那篇《饯梅兰芳》。说我“左得可爱”也不要紧，但至今我还弄不懂“内战和外战性质不同”的奇妙逻辑。这种逻辑在1947年的中国行得通么？当时像我这样对梅怀有惋惜心情的，怕不只一二人而已。

柯灵当时是文汇报的总编辑，为什么竟将组织梅传的重要任务交给我这个犯有开罪梅氏“前科罪案”的人呢？这也是个很难弄懂的谜。奉命组稿，的确花了很多精力，这并不是一部容易到手的稿子，其中周折也绝非柯文所说的那么简单。梅先生在《舞台生活四十年》出版前记中有所说明，事实大致如此。对梅的演出，我也并非对每出戏都同样地欣赏爱好，这是很自然的事。我写过不少评梅戏的文章，大抵喜欢的多说一些，不大喜欢的少说一些。但从未放过“冷枪”。对他早年的反串戏，我也并不认为是他的代表作，未能一律吹捧。就在《饯梅兰芳》一文中，也指出了他的一些缺点，如笑场、

未曾完全恢复盛年原样的嗓音、身段等。我觉得这是剧评作者的权利也是义务。齐如山给梅写了许多信专挑梅剧的缺点，后来他们终于成为知交。固然这是梅的从善如流，虚心求教，也正是交道的正轨。我的敢于讲大师的缺失，在有些人看来，怕是不可忍受的。怎么提了一下梅与孟小冬的故事就是“即使用最新式的精密仪器，大概也检验不出丝毫的善意来”呢？梅孟的关系真的是“与梅毫无关联的题目”么？

柯文写得迷离恍惚，颇有神龙见首不见尾之妙。文章开头就推出了《饒梅兰芳》，却不指明作者；说到《舞台生活四十年》的出版，又引出一件“匪夷所思”的“怪事”，当事人又化为“有人”了。《舞台生活四十年》最早确是我介绍给平明出版社出版的，当时出版社初办，稿源不足，我和潘际垞都是特约编辑，帮忙组稿。不支薪水，与出版社商定，于所编《新时代文丛》每本提出定价 1~2%作为编辑费，这办法一直沿续了一个时期。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超人的勇敢”“不可思议”的事。不过必须说明，《舞台生活四十年》我并没有得到任何编辑费，而是由许由来与出版社直接处理的。倒是后来有一次（也仅是一次），在此书转归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时，许源来说是梅先生的意思，在版税中提出几百元算做我的劳动所得，我感谢梅念旧的好意，欣然接受了。觉得自己为此书花费了不少心力，取得这点报酬是心安理得的。

解放以后因工作关系，我与梅的接触多了，他一直未向我提起过《饒梅兰芳》，这也说明他对此文的态度。他的宽阔胸怀，霁月光风的襟抱着实使我钦敬。彼此的关系也不只是采访一番、吃饭几次。不过我从未在文字中记述，我写下的只是舞台上的事情。在《舞台生活四十年》开始发表的前一天，我在文汇报上写了一篇《应该有这样一部传记》，说明了我对这一连载的设想与希望。但因种种原因，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要求。今年是梅先生百岁诞辰，谊当撰文纪念，天热如火，心事芜杂，只能借这篇短短的杂文，少抒思念之情。不禁感慨无端，掷笔恍然。

1994年7月6日

一点闲文

柯灵先生写给编辑部的信读过了。我觉得是没有答复的价值的。但它也告诉我们一事实，《想起梅兰芳》一文的写成是因为我在一篇回忆文中没有举出文汇报四大连载的设计者的名字。柯灵是前辈又是领导，我不应有此疏忽，这是首先应该说明的。

关于《舞台生活四十年》的组稿过程。柯灵说：“报社并没有给黄裳向梅兰芳组稿的任务，事实是，稿子约定之后，报馆才派他和梅文的执笔者之一许源来负责联系，以保证连载不至中断。”

事实是当我奉命访梅时，第一次就碰了个软钉子。梅以工作和演出过忙，无暇执笔的理由婉言辞谢了。我这才知道“稿子约定”之说是的确的。与我最先联系的是许姬传。后来才认识了许源来。当时梅葆玖正率团在苏州演出，我赶到苏州与姬传长谈，打消他的顾虑，并周密设计了撰稿、寄稿、整理的工作方法。后来几次访梅，才敲定了连载的约稿任务。许源来参加工作是姬传推荐的。关于文章体例，也是几经商量才定下来的。如用按语形式处理一些梅氏自述以外的珍贵历史材料，即是一例。第一次收到姬传从天津寄来的原稿，使我大吃一惊，原来他的名士气更甚于乃弟，他只是在一张白纸上草草写下了几条素材，全未形成文字。姬传兄弟都是写八大家古文的好手，对报刊文字并不熟习。为了定稿，我与源来真是花了不小的力气。后来姬传的文章越写越熟练，我们加工的劳动也逐渐减轻了。这些琐事本来不值得多说，但为了反对“肆无忌惮地改造历史”的恶劣作风，不能不加以说明。

关于梅参加南京演出的往事，并不是我对此“至今耿耿”，而是柯灵自己首先在文章的附记中借知情人之口旧事重提的。我曾说过，在四十七年以后使此事再度公之于世，倒是不能不使人感慨系之的话。攻下张家口与“国大”召开，其间的因果关系是路人皆知的。知情人虽然“叙述简略，记忆疏失”，但抓住的是事物的本质。对此实无繁琐考证的必要。

柯灵又说，《钱梅兰芳》现在已成为我的一块“心病”，这也是不确的。如是“心病”，为什么我还要将它选入散文集，并至今仍认为这是我喜欢的一篇文章呢？

上海出版公司是很熟悉的地方，我有两部著作就是由他们出版的。我受作者之托，为《舞台生活四十年》找出版社接洽，（柯灵用的字眼是“兜揽”，无非想把我说成是“跑街”，以便和后面的“佣金”相映成趣。）到上海出版公司去洽商，也在情理之中，虽然我已完全不记得此事。我和西谛也是熟人，他从北京来沪，偶然相遇，必无不见面招呼之理。西谛是秉性鲠直，疾恶如仇的人，真如柯灵所说有那么一段“匪夷所思的怪事”的话，他是不会不向我提出的。但此后与西谛多次见面，他都从未提及此事。在《舞台生活四十年》出版以后不久，他听说我得到了一部明人韩世能的《韩氏书画记》，托刘哲民向我借抄，后来我告诉他我买到的是《郁氏书画记》，而且到北京去时带给他看。（以上见《郑振铎书简》）在他团城的办公室里，欢谈往往移晷。这不能不使我怀疑故事的真实性。可惜上海出版公司的负责人刘哲民、唐弢、师陀都已逝世，无从取证了。

其他类此者尚多，俱可付之一笑，不再缕，以污读者的清听了。

1994年8月17日

第三条道路

从《读书》上读到张中行先生论读史的文章，《有关史识的闲话》，有耳目一新之感。他提出的重要原则是“人文主义”，其理解为“评定事的是非（或对错、好坏），要看这事能不能使所有有关（包括受间接影响）的人获得幸福，趋向文明，能者是，不能甚至反其道而行者非。”接下去就用农民起义的张献忠几乎把四川人杀光，和为周作人所十分推崇的李小池《思痛记》所反映的太平天国的残暴为例，声明自己宁可作朱氏或爱新觉罗氏的顺民、咸丰皇帝的子民，也不肯跑到四川或南京去“分享农民起义的光荣”，因为“舍不得小命，两害之中取其小，不光彩吗？人文主义要的是实实在在的福利，常常不管本性可疑的光彩不光彩。”

只此，已可见“人文主义”和实用主义已经密切相关，不可分割了。张先生又用大段文字批判了“忠君的信念”、“两性道德和政治道德”，这些，都已经是人尽皆知早已取得共识的意见，是极正确、也不劳词费了的。有意思的是张先生又举出了许多明清易代的史事加以评论，却又声明“这里有异族入主问题，且放下不管”，这就奇怪了，如果撇开了这个，这一时期的历史又怎样分说呢？

我过去曾说过，旧南明史家有一条原则，凡是在甲乙之际死掉的，不管是抗敌而死或死于乱兵死于殉节都一律列入节义传，是简单化达到可笑程度的史法，说不上史才，更不论史识。我又说过，明末，宋末也一样，在许多人心目中，皇帝只是国家的象征、符号，不能单纯理解为忠君，更重要的是对故国的怀念。崇祯是个昏愚的皇帝，明末的阶级矛盾又已达到炽热的程度，但老百姓还是忘不了他，难道真是舍不得这个“好皇帝”么？其实不过是在异族统治下怀念亡掉的故国而已，在这里可以引用一段周作人《阳九略述》的文字：

“民国初年我在绍兴，看见大家拜朱天君，据说这所拜的就是崇祯皇帝。朱天君像红脸，被发赤足，手执一圈，云即象征缢索，此外是否尚有一手握蛇，此像虽曾见过，因为系三十年前事，也记不清楚了。民间还流行一种太阳经，只记得头一句云：

‘太阳明明朱光佛。’这显然是说明朝皇帝，其中间又有一句云：

‘太阳三月十九生。’三月十九日正是崇祯皇帝的忌辰，则意义自益明瞭了。年代相隔久远，东南海边的人民尚在那么怀念不忘，可见这一年的印象是多么深刻。”

这个例子很好地说明这是人民的意愿，并非只是有“忠君的信念”的士大夫的念头，难道人民念念不忘的仅是给他们带来了无穷苦难的皇帝么？

甲乙之际有许多忠臣义士，并未在崇祯“完蛋于煤山”之后立即自杀殉主，他们起兵抗清，直至兵败身殉，张苍水、祁彪佳（他是不肯接受贝勒的劝降，自沉殉国的）、陈子龙都是的。陈子龙是抗清起兵，兵败被俘后死去的，“陈子龙是好样的，因为死了”，一点也不错。顾亭林的祭十三陵与孝陵，并不是念念不忘朱明历朝皇帝，他想的是已经覆亡了的故国。“旧识中官及老僧，相看多怪往来曾。问君何事三千里，春谒长陵秋孝陵。”（重谒孝陵）中官和老僧对顾亭林的行径都不能懂，觉得奇怪，于是他写下了这首诗，告诫后人，切不可像中官老僧那样只着眼于表面现象，要看事物的本质，这对有史识的学人怕并非过高的要求。

南都覆灭之后，柳如是劝钱牧斋清流自尽，是不明“大义”的，她看不出钱谦益投降，就能使“所有有关的人获得幸福，趋向文明。”同一时还会有一个龚鼎孳，自称“我本欲死，奈小妾不肯何！”这小妾就是顾横波。郁达夫有诗云：“莫怪临危艰授命，只因无奈顾横波。”郁达夫在这里也脱不掉“历史的局限”，他的“忠君的信念”太强了。

张先生曾不只一次反问：“钱牧斋，除了没随着崇祯皇帝死之外，你还能举出他什么劣迹？”这一道策问太是初级的了。只要翻看《虞阳说苑》，就能发现记有钱谦益许多劣迹的纪事，其中张汉儒控告钱谦益的若干条罪状，都是“基本属实”的劣迹。钱谦益和董其昌差不多，都是恶霸地主，凌虐小民，包揽词讼，无所不至。这在钱牧斋的尺牘里也留下了不少证据。董其昌是被“民抄”了的，钱谦益也被人京控，虽不曾办罪，但舆论谴责是逃不掉的。

我没有读过葛剑雄先生论冯道的文章，只从张文中读到一节结论，回答着“生在乱世的知识分子，除了效忠一君，君败亡则竭力致死和灭迹山林之外，就不能走冯道的第三条路吗？”的疑问。

“如果有第三条道路，那就是以人类的最高利益和当地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前提，不顾个人的毁誉，打破狭隘的国家、民族、宗教观念，以政治家的智慧和技巧来调和矛盾，弥合创伤，寻求实现和平和恢复的途径。这样做的人或许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但他对人类的贡献无疑会得到整个文明社会的承认。……与‘灭迹山林’或效愚忠于一姓一国的人相比，他无疑应该得到更多的肯定。”

话说得堂皇而正大，但放在家国危亡之际来考察，就不能不产生大的疑惑。请原谅我浮想联翩，拟于不伦，忽然想到这与汪精卫“我不跳火坑，谁跳火坑”的“高论”，何其相似乃尔。回到明末清初之际，走第三条道路的钱谦益、龚鼎孳等登高一呼，果真能感动得“一队夷齐下首阳”，随同新主子共建使全国人民获得幸福、趋向文明的大业，也许开国的清朝诸帝，用不着再费如许手脚，立即可以进入“升平盛世”了吧。

鲁迅先生早就说过，“因为卫国和经商不同，值得与否，并不是第一着也”（《立此存照》）。说得何等透辟，也正是为明清之际史事而发的。先生早在数十年前就已将爱国主义与实用主义划清了界限，不能不使人警醒。直到今天还要为这样的问题费唇舌，也不免“真是太可悲了”。

答葛剑雄先生

葛剑雄先生在答辩文章中给他关于“第三条道路”的结论加上了一顶帽子，埋怨别人扩大了他的议论的适用范围。是谁将葛先生的一段“针对特殊情况而发的议论普遍化了？”也只能是张中行先生。他是将葛先生的结论作为普遍真理介绍给读者的，而这结论确也看不出有什么限制性，该适用于随便什么乱世的知识分子。同时又觉得，经过深思熟虑发现的“第三条道路”，竟只有冯道一个人在踽踽独行，不免过于凄凉落漠了，于是遍求往史，上起明清之际，直至太平天国，终于找到了一个钱牧斋，拉了来给冯道作伴。葛先生的事后声明不但来得晚了一些，也辜负了张先生的一片苦心，事实上起不了什么作用，也改变不了原结论的普遍性。至于为了摆脱困境，不能不下狠心贴上封条，把自己的论点封闭在狭小范围之内，几近取消，这种壮士断腕的悲壮举措，倒是值得同情的。

葛先生既“不敢原谅”我的“浮想”，那么我也就顺便收回这两句“客套”，看看汪精卫的言行与“第三条道路”到底有怎样的牵连。

汪精卫在叛国投敌、跳入火坑之际，所持的“理论”就一直是“以人类的最高利益”（体现在“大东亚共存共荣”的口号中）“和当地人民的根本利益”（“拯沦陷区人民于水火”）。他也确是下了狠心，“不顾个人的毁誉”，向火坑“勇敢”地跳下去了。在汪精卫的心目中，哪里还有什么“狭隘的国家、民族、宗教观念”，这些都是中听不中用的教条，在实用主义者看来，是一文不值的。汪精卫在进行卖国勾当时，确也不乏“政治家的智慧与技巧”，他正是用尽全力来“调和矛盾，弥合创伤，寻求实现和平和恢复的途径”。汪精卫从逃离重庆之前，直至开伪府于金陵之后，一刻也没有放弃向日寇屈膝求和，他的“国策”就是臭名昭著的“和平反共建国”。凡此种种，历史记载得明明白白。我们不久前刚纪念过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人们也都记忆犹新的。上海人民出版社就出版过几厚册汪伪罪行实录，材料多得很，用不着在这里多说。对这样在“第三条道路”上奋进的出众选手，葛先生却拚命要将他从跑道上拉下来，于是一场不可避免的喜剧演出了。

据此，我又怎能不反对葛先生所肯定的“第三条道路”。至于“生在五代十国和前南斯拉夫地区的文人应该走什么道路？”这样上下千年，相去万里，又存在着国家分裂、民族仇杀、宗教冲突不同国情的困难截搭题，和“冯道汪精卫异同论”这样的策论，还从来不曾做过，只好敬谢不敏了。

人们脚下是摆着不同道路的，第三条，甚至第四第五条都会出现的，尽可由人们自行选择走去可也。

1996年1月19日

开风气的选辑

中国学人留下了丰盛的读书随笔，在四库里分类为杂说、杂考，数量极多，至今还不见出版社汇印成为一套丛书，其实这里面是有着异常丰富的知识的。清人考据的随笔就占了很大的分量。这都是前人知以的积累，披沙拣金，往往可以得到可贵的资料，可惜这种撰作的风气近来几乎消失了。

不久前王元化先生出版了几种思辨短简思辨随笔，可以说是开风气之作。比起长篇的论文，就有更显著的特色，它选取的是精辟的短论，有时是思想的火花，如果铺展成文，篇篇都将是独立的文章。这样做既节省了读者的时光，又能更简捷地接触作者的思想实际，而且能清晰地看出作者思想蜕化的痕迹。实在是值得称赞的一种学风。也许正是从这样的思路引出，上海文艺出版社又推出了《学苑英华》，以人为纲，将学人毕生的学术成果，取精用宏，采辑成篇幅不大的短论，手此一册，可以见作者学术积累的大凡。当然，这种工作是艰难的，操选政者必须有敏锐的眼光，又遍读作者的全部或大部著作，才能选取精当，使选本有代表作的意义。

学苑英华，第一批的四本书，四位作者中，港台与大陆各半，这也显示了一种特色。眼光是开阔的。个时期以来，对海外学人的介绍比过去多了，著作出版也跟上去了，可是总的说来了解还是不多的。现在能介绍他们的学术成果，用“掇英”（多）的方式，使读者一卷在手就能得到一个明晰的印象，有所理解，有所受益，实在是一种值得肯定的作法。在李亦园先生的书里，看到有关李济之先生的悼念文章，非常亲切，听到久久睽隔的前辈学人的消息，即使已是故世的消息，也还不能不感到满足。李先生关于大传统与小传统的论述，对关心中国文化遗产的人，还是一种可贵的启示。

饶宗颐先生著作等身，国内能见到的极少。能有这样一本取精用宏的书，对了解他的学术世界是有帮助的，这里也不能不感谢胡晓明先生编选所花费的劳动。当然，浅浅的篇幅要表现得完满，是困难的。记得从《选书集林》中曾读到饶先生一篇论岳飞满江红词的文章，印象甚深。这是个敏感而又引起广泛注意的问题，似乎应该使国内的读者知道。

总之，这套书是开风气的选辑，值得赞赏，值得肯定，即有所不足，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希望陆续读到其他学者的书，把“英华”扩展开去。

